罗马教皇列传

刘明翰 著

東方出版社

前　言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塑造着文明；文明衬映了时代。

人类的文明，旖旎瑰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文明的生成、发展和分流的历程中，有同步和协调；也有碰撞和螺旋；更有逆差和倒退。一尘不染、天衣无缝的文明，是不存在的；要么是神、要么是鬼，一成不变的人，也是没有过的。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下，一切都在变。生活模式、思维模式在变；人生观念、价值观念，甚至知识观念、信息观念也在变。应该说，主观世界需要开拓、刻意创新是对的。对历史轨迹重新反思、广泛探索也是必要的。然而，大潮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该变的，还应继续向纵深发展，不该变的，绝不可随波逐流。

怎样看宗教？如何评析教会和教皇？这是一个很难三言两语便可下结论的问题。某些传统的命题，如关于"宗教是人们的麻醉剂"、"宗教是贫困、愚昧的产物"、"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先遣队"，以及"教会是人类落后的策源地"……等论点，今天已引起了人们的认真思考！看法不一。但至少有一点业已趋同。那便是：既不能笼统化，以偏概全；也切忌

一风吹，翻云覆雨。正确的抉择是：应按历史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其中基督教影响最广，它流传在五大洲，分布于约160个国家和地区。当代，基督教徒约占人类总人口的1/5还多，在基督徒中，罗马公教——天主教徒又占一半以上。教皇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世界中心。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天主教和新教的活动“常温”未衰，今日不能把宗教与贫困、愚昧等同化，是显而易见的了。传教士中确有充当帝国主义鹰犬之徒，然虔传教义、为科技文化的交流而献身之士亦非个别人。我国关于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会史的著作和译著，数量虽极少，但近几年毕竟是有了一点。然而，关于罗马教皇的历史和传记却是长期阙如。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只能说是试图弥补不足的一个尝试而已。

本书是东方出版社于1988年末约写的。对于罗马教皇，西方世界虽说不上妇孺皆晓，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对其都不陌生。而对我国同胞来讲，能知道罗马教皇事迹，或者说能叫出罗马教皇法号和姓名的，确实是寥寥无几。因为毕竟是隔得远、书刊少、中文资料奇缺之故。要想使本书做到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能深入浅出地把一个个教皇列传写出，难度确实很大。我写作本书的几点思路是：（一）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历史时间为序，实事求是地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写。天主教会和教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教皇不是神，也是人。所有教皇的言、行，都离不开当时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对任何一位教皇绝不片面拔高或笼统否定。要按他的实践、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着眼，应看他是推动抑或阻挡历史发展，而评析其是非功过。（二）要坚持阶级分析。任何教皇的政治观点和主张都有其阶级属性。历史上，有些教皇毕生从事和维护封建压榨，主宰异端法庭；而有些教皇支持过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有过贡献；也有的教皇热衷于从事资本主义公司、金融和证券交易……有人严谨正派，也有人骄奢腐化，总之不可千人一面，要力争如实地写出教皇之间互有长短，各具特点。（三）选典型，写重点。罗马教皇历代相传，现今已是第266代。不能对每个人都写，这势必陷于"蜻蜓点水"；也不能事无巨细，全盘罗列，那会成了"流水帐"的汇编。本书从266位教皇中选出30位典型代表列传。这30位教皇的共同点是：在位时间较长，观点主张和实践活动较多，影响广、作用大，也兼顾及每个世纪都有代表性的教皇。由于每位教皇本身的活动情况有别或文字资料的多寡不同，故而各传互异。有的传八九千字，有的仅三五千言，字数不能绝对平均，不可"一刀切"。（四）坚持一分为二。迄今，一些外国著作中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因而对同一位教皇往往褒贬不一，或颂为英雄、"神明"，无以复加；或斥为"狗熊"、罪人，一无是处。事实上，有些教皇目光短浅、碌碌无为或专横跋扈，争权夺利；有些教皇既有真知灼见、严格自律，又能整肃教纪、扶扬文化。而多数教皇是优点、缺欠兼容并蓄，集双重性、矛盾性于一身。

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参阅、引用过国内外一些文献、著作，不再一一注明。因限于本人水平，自感对某些教皇的

著述及其历史轨迹，尚缺乏研究。因而书中粗疏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斧正！

刘明翰

1994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附　录

教皇制的产生与利奥一世

教皇（pope），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拉丁文写作“papa”，其含意与读音都是“爸爸”。在罗马帝国时代，“papa”一词是基督教徒对主教和一般神职人员的尊称，并无专门含义。当时，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各城市的主教，同罗马主教的地位与权力类同，都称为“papa”。

罗马主教地位的上升

基督教会初期，没有主教制。公元2世纪以后，教会活动的扩大和经常化，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神职的人员，他们当中的少数人逐渐将主持教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此即“主教”的由来。最初，每个教会都是由若干主教共同主持事务的。迄二世纪中叶，从东方到西方，才发展成单一的主教制。

当时，各地主教在理论上一律平等，只是经济和政治实力有别。教会规定：“凡要作基督徒的都必须进入教会，教会是由主教所组成的，教会的一切行动都由这些领袖作主。主教在教会里面，教会在主教里面，凡不与主教同在的，都不

在教会。主教是使徒的继承者，主亲自拣选了他们，主教组成一个会，就是主教团。他们的合一就是教会合一的基础。背叛主教，就是背叛上帝。”

教会是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教会的主教经常派人到附近的乡村传教，逐渐在乡村建立起来由城市教会管辖的乡村子教会，于是城市教会（“母教会”）的主教权力便扩大了。他有权向乡村的“子教会”推荐主教，批准乡村的主教选举，召集自己辖区内的主教会议，甚至充当各地主教之间争端的调解人或仲裁人。这时，罗马帝国境内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大城市中主教地位逐渐凌驾到其他主教之上。大城市的主教力图把本身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他对其它教会的管辖权，如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等大城市的主教显然具有突出地位。除了上述超越行省范围的大城市的都主教称为“宗主教”外，各行省省会所在地主教的权势也开始扩大。他们在本省的范围之内，凌驾于较小的城市的主教权限之上。

从公元2—5世纪，罗马主教为争夺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罗马主教宣传道：罗马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而彼得因为是耶稣最大的门徒，有权领导全教会。”据说彼得本人在1世纪中叶到过罗马，建立了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乃是“大公教会之母和本。”彼得当过第一任罗马主教，后来所有的罗马主教都是他的继承人。故罗马主教应当享有领导整个基督教会的权力。

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为了巩固奴隶主统治的需要，对

基督教的政策从镇压改变为利用和支持。公元313年之初，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颁布了"米兰敕令"，给基督徒以宽容，宣布基督教同其它宗教一样，在帝国内合法。319年颁令，免收神职人员赋税；321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同年，为了保证基督徒作礼拜，下令禁止城市居民星期日工作。在罗马帝国的赞助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它地方不断建起大教堂，罗马主教的地位，在奴隶制社会后期迅速得到了提高。这首先是由于罗马地处京城，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帝国各行省官员镇压基督徒时，经常把"犯人"解交罗马，罗马主教有时参予审理；其次，各地主教在统一基督教的教义、信条及圣礼、仪式时，很重视京城罗马主教的见解；最后，各地主教经常请求罗马主教的经济资助和政治上的支持，有时依靠罗马主教而同京城或外地奴隶主集团相抗衡。因此，罗马主教的地位迅速地高踞于其他主教之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30年当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东罗马重建的新都拜占廷（又命名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时，将皇帝自身的拉特兰宫赠给罗马主教为宫邸……，还授予罗马主教对西欧、北非各地异端分子的审判权，这些措施都提高了罗马主教的地位。留在故都的罗马主教成为西罗马人们瞩目的中心人物，操拉丁语的西罗马基督徒将罗马主教视为自己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领袖。

教派斗争激化与罗马主教渐为核心

公元325年5月，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倡议和支持下，于

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著名的主教公宗教会议。被封为“圣者”和“功德同符圣徒”的君士坦丁大帝向各地主教发出通知，为他们提供会议经费和交通工具，并亲自主持了宗教会议的开幕式、致祝词和宴请与会人员。约 300 名主教参加的会议除了制定“七条”作为《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和反对分裂之外，还颁布了若干整顿教会的重要法规 20 条，规定了主教的权力、对叛教者的处理及统一的复活节日的日期等，又规定了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主教由皇帝任免等等。会议中间，基督教会各个教派间的辩论甚为激烈。许多争辩持续下去，最后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公元 335 年，君士坦丁大帝致信给推罗宗教会议，强调：“君主所作的各种决定，旨在维护真理，不得稍有违抗。”同时，君士坦丁履行了罗马宗教的礼仪，并具有最高祭司称号。

公元 337 年 5 月 22 日君士坦丁大帝逝世。罗马帝国由他的三个儿子分治。长子君士坦丁二世分得帝国西部的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次子君士坦蒂乌分得帝国东部的小亚、叙利亚及埃及，而中部则分归幼子君士坦斯所有。这时帝国境内基督教会中的教派斗争更为加剧。君士坦丁的儿子们各支持一派教会。君士坦丁二世于 340 年去世，结果帝国又分为两部分。西部归君士坦斯，东部归君士坦蒂乌，大体是西、东罗马帝国的雏型。这两个皇帝比其父君士坦丁大帝更加偏袒基督教。

公元 343 年秋，东、西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为了解决基督教教派间矛盾的激化问题，乃在撒狄卡（现今索非亚）召开基督教会议。开会时，罗马教会恢复了被东方教会革职的

主教们的职务并派他们与会。东部主教发现西部主教人数远超自己而退席。因而这次会议的初衷——调解教派争端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西部主教在哥多瓦的主教何西乌的领导和支持下，利用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会议中，确立了罗马主教在全基督教内的“荣誉首席”地位，扩大了罗马主教的司法权，规定罗马主教为神学争端的最高仲裁人，由罗马主教委任法官开庭审讯；今后凡是被革职的主教，如果不服，他可以向罗马主教上诉，罗马主教可委任专人重审，或将该案退回原教会复审，罗马主教则出席听审。任何主教上诉的案件未经罗马主教判决之前，不得另委他人接替。这一系列的规定，后来被称为“撒狄卡上诉条款”，成为罗马主教可以干预其它教会的“根据”。

公元4世纪，基督教的地位逐步得到巩固。公元341年、346年和356年，陆续颁发敕令，禁止异教进行祭祀活动、封闭异教寺庙，焚毁异教作者反对基督教的一切作品，甚至规定凡基督教徒改宗异教者处以刑罚直至处死。最后，在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时，于392年颁布法令禁止异教，确认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并立为国教。继而广泛开始了对异教徒的迫害。

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会内扩大权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挑战。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做出了决定。认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理应继罗马主教之后，亦具有荣誉首席地位，因为它所在的城市是新罗马。”公元392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定为国教。过去罗马皇帝先后颁布的《米兰敕令》（313年）和尼西亚决议

(325 年)，曾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奠基性文件，但狄奥多西一世进一步前进。他在 393 年颁法，禁止罗马帝国内原有的宗教，明确了在帝国内基督教享有特殊地位。395 年狄奥多西一世病故。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罗马帝国则仍以罗马城为都。由于古代日耳曼人的大规模迁徙，在西哥特和汪达尔人大举入侵的威逼下，西罗马帝国日益衰落。西罗马帝国皇帝先后迁移到米兰和拉文那。罗马城的文明古迹和社会秩序，实际上由罗马主教掌握着管理权。教会内外的许多人士进一步信任罗马主教。

罗马主教之所以能成为全基督教会的特出领袖，能发展成为罗马教皇，最主要的原因是：(一) 罗马是当时世界政治和地理上的中心，人们心目中罗马乃世界首都，称罗马为"世界主妇"。(二) 长期以来，帝国各行省官员镇压基督徒和人民群众时，往往把"犯人"解交罗马，因罗马城成为基督徒殉教圣地而闻名于世。(三) 罗马的教会是基督教中最大的一个教会，政治、经济实力雄厚，由于"富有货财、善待远客、周济穷苦的人"，因而声望"传遍天下"，超过任何教会；(四) 各地主教为了自身及教会的存在，同罗马主教和奴隶主统治集团互相支持和联系，求得罗马主教的赞助；(五) 盛传使徒保罗在罗马住过并为此城殉死，彼得曾任罗马城第一任主教，他于公元 64 年尼禄在位时为道殉难，各地主教对京城主教向来尊重，在基督教的教义、信条及礼仪等诸多方面，采纳了罗马主教的主张。罗马主教在 4、5 世纪时逐渐高居于其他各地主教之上。

利奥一世生平的主要事迹

早在5世纪初，罗马主教英诺森一世（402—417年在位）时，罗马主教便是西方基督教会的主要奠基者。他主张罗马教会是使徒传统的护卫者。他把撒狄卡会议的决议归之于尼西亚会议，并以此为根据，主张罗马主教拥有普遍管辖权。利奥一世任罗马主教期间，加紧了罗马教廷的建设，使罗马主教初步具备了教皇实权。

利奥一世（Leo I，440—461年在位），原出生于意大利的沃尔特拉，他是一个智谋双全又有修养的人，早在青年时代便参加了罗马的政治活动。他任罗马主教后，残酷镇压摩尼教，将其首领送交罗马法庭审判，还焚毁其书籍，同时积极同异端展开斗争。他挫败了在阿尔创建独立的高卢主教区的图谋，并在西班牙和北非行使了宗教上的权力。公元445年，利奥一世鉴于西罗马帝国已陷于瘫痪状态，趁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廷三世急盼得到教会支持的时机，乃怂恿瓦伦廷三世发布诏令，授予罗马主教有制定全教会法律的特权，罗马主教的决定应成为全教会的法规，任何主教若被罗马主教传召，而拒绝前往者，该省总督可用强迫手段将其押送至罗马。诏令甚至规定，所有的人都应服从罗马主教，因为他具有“圣彼得的首席地位”。这一诏令为罗马主教攫取教会最高领导权提供了法律根据。事实上，西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主教已充当了西罗马帝国行政代理人，他维持奴隶主统治的秩序，负责城市修建，给雇佣兵发饷，组织对外敌的抵御及媾和等。罗

马主教利奥一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自诩为罗马教皇的。由于当时皇帝的政令在境内已被“置若罔闻”，更何况东派教会并不承认什么诏令。

公元 450 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逝世，其妹夫马西安继承帝位。他为了取得东派教会的支持，拒绝了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提出的在意大利境内召开宗教会议的主张，并于 451 年在小亚细亚的查尔西顿召开主教公会议（又称第四次普世会议）。会议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调和基督教东、西两派的分歧。会议谴责了阿列乌派及其基督一性的主张，宣布利奥一世的“道成肉身”的论述[①]、即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同样完整存在的见解乃是真理。会议通过的查尔西顿信经便是以“道成肉身”为蓝本，这样一来，利奥一世的观点被突出和肯定。但与此同时，这次会议制定的法规，却对西派教会不利，按法规的第 28 条规定是，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牧首）在宗教事务上同罗马主教具有同等权力。针对这一条，利奥一世当即提出坚决抗议。查尔西顿主教公会议在充满矛盾的气氛中结束，东、西方教派的矛盾并未解决。这次会议预示着东、西教会的必然分裂，利奥一世时在分裂问题上政治原因超过了宗教纠纷。

利奥一世以罗马城的保卫者身份进行了大量赢得民心的活动，使罗马主教得到极高声誉。452 年，被人们称为“上帝之鞭”的凶猛的匈奴人领袖阿提拉率军攻人意大利，焚毁了

① 利奥一世于公元 449 年 6 月在写给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富拉维安的一封信中，论述了他本人在“道成肉身”问题上的观点，因内容重要，故称为“大卷”（Tomo），亦称“利奥大卷”。

阿揆利亚、味罗纳和米兰等城进逼罗马。利奥一世忙率使团亲赴曼图亚求和，劝说匈奴军不要进攻罗马，而应退回匈牙利，终于使“永恒之城”的罗马，一度得到拯救。当时虽因匈奴军中瘟疫流行而撤军，但利奥一世功不可没。455年6月2日，罗马城被汪达尔人侵占和洗劫。利奥一世冒险前往劝说汪达尔人的领袖该萨利克，晓以利害。此举也受到天主教会和信徒们的普遍称赞。

利奥一世努力维护基督教的教义、习俗，他曾下令取缔一部分基督徒在庆祝圣诞节时还保留的仍崇拜太阳神的旧俗。

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突出贡献是制定了教皇权力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圣经中的三段经文为根据。即以《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18、19条；《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15—17条；和《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第31、32条做为理论的依据。利奥一世在理论中把使徒彼得立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罗马主教既然是彼得的直接继承者，也就自然地享有这位大使徒的一切特权。他们把彼得当作最高导师，有权纠正其他使徒，那末其他使徒的权威也是由他而得来，于是罗马主教和罗马教会拥有最高权威而成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教皇。这个权力是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所不能僭取的。教皇（papa）制的萌芽产生于利奥一世时代的5世纪中叶，但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许多曲折和变迁。6世纪末格利哥里一世时仅是形成教皇制的雏型，中间经过几个世纪，直到11世纪格利哥里七世时教权的垄断地位才最后确立。

被称为“中世纪教皇之父”的格利哥里一世

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一世(Gregory I,590—604 年在位)是中世纪教皇制的奠基人。他在教会史中被称为是站在古代和中世纪新旧世界分界线上的“伟人”，说他是古代末的一位神父，是第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说他是最后一个罗马主教和第一个中世纪的教皇。格利哥里一世被列为与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哲罗姆齐名的拉丁教会的“四大教父”之一。

在教会史中格利哥里一世被惯称之为大格利哥里。他曾是最先将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罗马主教。在他之前，罗马主教对其主教区之外的教会并无管辖之权，而大格利哥里利用当时的形势，使罗马主教在教义上得到了西欧教会的首席权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东方教会人士也不得不给予承认。他能力非凡，业绩出众，虽然任教皇职仅 15 年，但因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因而曾被誉为“中世纪教皇之父”。

格利哥里一世时的形势和他的生平

格利哥里(540—604 年)，意大利人，他出身于西罗马帝国元老院贵族世家。祖上曾任西罗马帝国元老院元老之职，在

罗马教会中也占据要津。他的家族拥有万贯财富、显赫地位。他的曾祖父曾是罗马主教，即非力克斯三世。他的父亲曾是罗马城的参议员，晚年得到枢机助祭的教职。格利哥里 33 岁时（573 年），他由拜占廷帝国皇后索菲娅以查士丁二世皇帝的名义提拔任命为罗马城执政官，即总督。格利哥里由于预见到在意大利的教会比世俗政权的权势更大，也由于受到隐修生活的吸引，他任罗马执政官一年、又逢父亲去世，之后，他便走上了抛弃仕途弃官隐修之路。574 年，他把全部家产捐献给了教会，把自家位于克利安山上的宅第、庄园变成隐修院，以圣安德烈命名。他本人发“三绝”大愿，成为圣安德烈隐修院的修士。这“三愿”是基督教会对修士、修女要求必遵、坚守的清规。即：一、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二、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三、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格利哥里在他家族西西里的领地上，还修建了六座隐修院，并大力周济穷人。这些作法大大提高了他在教会中的声望。

579 年，格利哥里被罗马主教皮雷吉二世提升为枢机助祭，担任罗马主教秘书。不久，他被任命为罗马主教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从事外交工作。约 586 年，他返回罗马，担任他自己创设的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兼罗马主教首席顾问。这段时间，格利哥里从事教会理论建设，钻研奥古斯丁神学思想，成绩斐然。590 年初，皮雷吉二世去世，他被推举为罗马主教。但由于当时西欧和亚平宁半岛上形势莫测，北方有伦巴德人威胁，罗马遭自然灾害，格利哥里没及时上任。在东罗马皇帝一再催促下，他才于当年 9 月 3 日就职。斯时，罗

马主教即教皇，第一个隐修士出身的格利哥里被称为教皇格利哥里一世。

6世纪末与7世纪初，格利哥里一世时代的形势有下述几个特点。即：（一）法兰克人信仰并利用天主教加强了国内统治和对外征服。克洛维及其后代在天主教会支持下对外战胜了早已信奉基督教异端——阿利乌派的东哥特、西哥特及汪达尔人，疆土扩大到高卢地区后，又先后征服了勃艮第人、图林根、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地区，法兰克王国成为西欧最强盛的封建王国。（二）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时代大力扶持并提高基督教会的地位，建立了封建神权统治。在法兰克，一方面教会有种种特权，任何自由民到教堂避难，政府机关不得派人进教堂搜捕。神职人员犯法时只能由主教按教会法规加以审理，国家法庭无权处置。宗教会议制定的法律同样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神职人员的财产免税，本人免服劳役、各地教会拥有大量地产，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封建主。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统由国王管辖，主教由国王委派，要对国王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高级神职人员参与国家的政治、法律事务。教会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三）查士丁尼复辟奴隶制帝国的计划全面破产后，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越来越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经过近20年战争，打败哥特人军队，虽重占意大利，但反动的复辟政策违背了历史规律，引起人民广泛反抗，到6世纪80年代彻底破产，皇帝派的总督驻在拉文那，渐无实权，有利于教皇扩大权势。（四）格利哥里一世上台时，罗马形势对他十分有利。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392年）后，在英诺森一世（402—417年在

位）和利奥一世（440—461 年在位）统治下，教会已有政治、经济实力，教皇地位扶摇直上。法兰克王国鉴于罗马教会是西欧基督教最大的中心，教皇最有权势，因而要想扩大势力必须重视与教皇发展关系，常请教皇协助整顿高卢教会。6 世纪末由于伦巴德人劫掠的威胁，意大利又深受自然灾害之苦，以致掌握神权的罗马主教倍受瞩目，意大利人将他视为天然的保护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气氛中，格利哥里一世迅速扩大了教权。

集罗马城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

格利哥里一世上台时，伦巴德人不仅盘踞意大利北部，并且直接向罗马发动攻势。这时再想依靠拜占廷的武力已不现实。于是格利哥里一世以罗马城主教身份成为保卫罗马城的真正组织者。他一方面采取断然措施，独揽罗马城的军政大权，自称“总司令”，趁混乱局势，把前西罗马帝国皇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卡拉布利亚的大地产收到自己手中，将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及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以及北非某些地区；另一方面他下令拆毁异教神庙，修建城垣，还用教会的银饷，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力量以抗击伦巴德人的进攻。格利哥里一世还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控制罗马法庭、监狱，亲手培植一大批亲信的神职人员，铸造货币、管理市场、整顿财政，严惩罗马城的渎职、贪污分子，创办慈善事业和广行善事。由于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一系列的新措施，使罗马教会不仅成为罗马城的世俗统治者，而且成为

在西欧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格利哥里一世是一位卓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一面积极防御伦巴德人，一面也用外交手段对付入侵的伦巴德人。592年，伦巴德国王阿机鲁勒夫率大军围攻罗马时，他背着东罗马帝国驻拉文那总督，暗中与伦巴德王谈判；又以大量财物贿赂来犯者促其北归；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伦巴德王王后，促其丈夫改宗。为了保住罗马城，格利哥里一世甚至鼓动过拉文那居民投降伦巴德王。格利哥里一世运用各种策略的结果，使罗马城得以保住、未沦陷。教皇威信大增。6世纪时，罗马主教与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各主教区的大主教名义上似乎仍然类同，但在实际的权力和地位上已大相径庭。6世纪末，罗马主教已成为意大利罗马及中部诸省的世俗统治者。这时罗马主教已逐渐拥有罗马教皇的权能。君士坦丁堡牧首在东罗马的中央集权国家中执行宗教的最高权，但他完全依附于皇帝。罗马教皇形式上不受西罗马帝国领土上新建的各蛮族国家的直接管辖，然而罗马教皇在同蛮族诸王国不断周旋、共处之中，在力图摆脱东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的过程中，格利哥里一世充分显露出他的本事来。

格利哥里一世同拜占廷的关系

6世纪末，格利哥里一世上台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而是存在着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中心的希腊派（东正派）和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拉丁派（西方派，加特力派）。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教会都同时具有帝国内基

督教会首席的荣誉之称，因此君士坦丁堡牧首同罗马教皇二者是并列共尊而无上下高低之别。但是罗马教皇同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则全然不同。尽管查士丁尼的后代对意大利早已捉襟见肘、鞭长莫及，但教皇上任还需东罗马皇帝批准，罗马每年必须上缴一部分经济收益给拜占廷，罗马教皇在意大利还有个顶头上司，那就是东罗马皇帝驻拉文那总督。

格利哥里一世竭力为摆脱东罗马皇帝的控制而斗争。他称拉文那总督是"无用而琐屑之长物"。教皇同外国交涉时，经常有意绕过这个总督。当拜占廷皇帝对罗马教皇怂恿拉文那投降伦巴德，还准备认同伦巴德人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一事给予斥责时，格利哥里一世则复信抗议。602年，拜占廷帝国驻扎在多瑙河上的军队发动起义，并拥戴百夫长福加斯为皇帝，一度攻下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摩里斯及其儿子和亲族均被处死。从602年至610年，起义长达8年之久。格利哥里一世对福加斯起义加以赞许，他声称："长期加于我们颈项上的重负业已解除，代之以皇帝大权温和的羁绊。"而福加斯为报答格利哥里一世对起义的支持，则承认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会内有最高权力，尊格利哥里为"普世牧首"。这当然引起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抗议。

格利哥里一世按照西方教会的传统说法，即：圣徒彼得曾任过罗马主教，因而历代罗马主教都是彼得的传人和继承者。格利哥里一世表示："所有熟悉福音的人显然知道，是主亲口吩咐把整个教会的管理交托给圣使徒和诸使徒之首——彼得的。"他本人既然是彼得的继承人，当然应对全教会行使管辖权。所以，他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约翰所拥有的教会惩

治权提出抗议。他对约翰自称为“普世主教”以及“牧首”的称呼，拒绝承认并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罗马主教沿用的“上帝众仆之仆”非常合适。6世纪末，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争夺教会首脑权的斗争已经揭开了序幕，格利哥里一世向西欧、北非推广教权，以及通过“圣彼得教产”扩大罗马教会经济实力等措施，说明罗马教会屈从于东罗马帝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广建修道院，向西欧、北非扩大教权

格利哥里一世远在未当上罗马教皇以前，早已注意到罗马教会在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凯尔特人以及信仰阿利乌派的日耳曼人中间的传教工作。587年，经过大量工作之后，格利哥里一世使西班牙国王放弃了阿利乌派的信仰，接受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加入了天主教会。590年，格利哥里一世就任罗马主教（教皇）职后，利用罗马城与东罗马帝国统治隔绝的局面，直接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等地教会的事务，595年在亚尔勒地区又重建了教皇的代牧区。他同法兰克王国墨洛温朝签订了友好协定，罗马教会得到了法兰克王国的支持，教会也对法兰克王国一些教区中的弊端进行了改革。596年，格利哥里一世向英格兰派出奥古斯丁和40名本笃修会中的修道士，经高卢前往肯特等地传教。597年肯特王埃塞伯特（560—616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第一个接受奥古斯丁洗礼的皈依基督教的国王。同年，奥古斯丁被尊为罗马教皇任命的第一个“英国大主教”。在埃塞伯特支持下开始修

建坎特伯雷大教堂，这座教堂1300年之后依然是英格兰的母会堂。在肯特王埃塞伯特的劝说下，他的两个侄子埃塞克斯国王和东盎格里亚国王都先后信奉了基督教。他还逐渐向其它王国扩大传教。格利哥里一世曾指示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逐步、和缓地前进！"格利哥里一世使距离罗马很近的伦巴德人皈依罗马教会是几经周折、费了很多力才实现的。特别是借助了王后之力才使信仰阿利乌教派的伦巴德王转变过来。

在扩大传教过程中，格利哥里一世还重视以武力作为后盾。他曾对非洲总督说过，为了扩大宗教据点，除了用和平方式之外，在传教难于进行的地方，也可以"发动几次战争"。据此，后来有些学者称他是"十字军"东征思想的最初提倡人。

在传教过程中，格利哥里一世，特别提倡在西欧各地建立修道院，作为扩大罗马教会势力的据点。6世纪末的修道院是俗人依附教会过苦修士生活的团体，它与教堂有别。修道院直接归修道院院长领导，不受当地主教管辖。修道院内教士扩建庄园，有大量土地出租，农奴耕种，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格利哥里一世原是本笃修会修士出身，他与本笃修会关系密切，并按本笃修会的规章和模式推广。格利哥里一世领导下的本笃修道院中的本笃思想是西欧新建修道院的基本思想。本笃修道院，最早是由意大利贵族出身的本笃（约480—543年）主持筹建的。位于距罗马90英里的卡西诺山

上。本笃为本笃修道院制订了酷苛的《圣本笃法规》。这本《圣本笃法规》的内容是：凡进修道院当修士、修女的必须宣誓听命、安贫、守贞，不得有私人的任何财物。要乐于接受鞭打、体罚。因为据《圣经》的教导，“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地狱”。所有修士有72条准则，如：“任何时候不准发怒”，“不准发牢骚”，“不许说笑”，“一有邪念便应报告长上”，“每天应流泪叹息，向上帝认罪”，“要以爱基督的心去爱仇敌”……。修士、修女们为培养“谦卑”须经过几个阶段，如“要愉快地接受任何不公道的待遇”，“要甘居卑贱地位”，“要确信自己比其他人更卑下”，“要时刻想到自己罪孽深重，如同站在被审判台之前，不敢抬头、不敢说、不敢动”。以上这一系列的说教便是本笃思想。《圣本笃法规》后来成了所有罗马教会修道院的通用章程，本笃思想的传播和本笃修道院的巩固，加速了西欧修道院的发展。

经营“圣彼得教产”，加强“理财”措施

格利哥里一世在6世纪末，趁各蛮族国家之间战争及意大利天灾人祸造成的混乱局势，他以圣彼得的继承人自居，对原罗马教会分布在意大利、西西里、撒丁、科西嘉、西班牙、法兰克以及北非等各地的教产、庄园均收归教会所有，并加强经营、管理。

从目前仍留存的教皇格利哥里一世的《通信登录簿》以及当时罗马城居民的户籍等原始资料的综合分析中，可见到当时如何经营庄园和控制农民的具体记载。格利哥里一世基

本上按照罗马帝国庄园管理的办法来经营，但也有一些新的措施。他命令教会中具体办事人员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苛刻的现款或实物地租。他把一些庄园分别交给管家（多是神职人员）进行管理。从管家送上来的报告中，他能了解到庄园和教区神职人员的工作情况以及当地宗教信仰的动态，他不断地向这些管家发出详细指示。据《通信登录簿》所载，他给西西里的副管家（兼罗马主教派驻当地的全权代表）彼得的信中写道："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者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立即出售，这样至少还能从它们身上收回一些利益。……所有属于教会的农具必须在它们因年久生锈成为废铁以前出售。应把你所收到的所有款项连同这些帐册全部送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在教会的庄园里住着很多犹太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的交款数目可予以适当减少，以便使别的犹太人在这种利益的刺激下，产生同样的愿望。"

从格利哥里一世的通信中，还可看到他对一些"疏忽职守"的主教们的指责。他写道："告卡利阿里主教：由于你的疏忽，允许那些属于你教会的农民迄今还保留着异教徒的信仰。……如果我在撒丁岛的任何一个主教辖区内，能够找到一个依然信仰异教的农民，我将因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严厉地责罚该地区的主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异教信仰、拒绝皈依上帝的农民必须课以重税，加以其它严厉措施，迫使他走上正路。"

格利哥里一世在教会领地和修道院中，加重剥削的一系列措施，使农民所受的搜刮显然比世俗封建主的压榨有过之

无不及。他还给予大的庄园主管理人以当地的经济、政治大权。使他们握有干涉当地主教补缺、召开地方宗教会议以及训戒主教之权。这些措施使各地主教进一步隶属于教皇。

格利哥里一世除了从“圣彼得遗产”中捞得大量收入外，还以一部分收人购置更多的土地，使“圣彼得遗产”得以无休止地膨胀。他重视商贸活动，罗马教会的经办人从欧洲向埃及运去木材，向君士坦丁堡输去小麦，又把撒丁岛的生铁运往拜占廷帝国以制造武器，在教会领地和修道院中酿造葡萄酒输往各地。格利哥里一世的“理财”措施多种多样，在他手下有一批商业代理人，又称“教会商人”，都是擅长贸易和远途贩运的能手。格利哥里一世期间的“理财”和各种经济措施为7世纪以后罗马教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格利哥里一世的神学思想及其著作

格利哥里一世根据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认为，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括在《圣经》中了。任何人如遇疑难，都可以从《圣经》中求得解答。故解释《圣经》便是人类最大的学问。怎样解释圣经呢？他很夸耀人的“灵感”。他以自己的经验说道：他向修道僧们解释《圣经》含意，往往自己原来也不甚懂，但到时灵机一动，就会脱口而出的。格利哥里一世曾指示法兰克的维昂主教，基督教会应反对世俗知识。这一点成为中世纪教会长期的方针。

格利哥里一世的神学著作很多，作为一位著述家，他的三部著作在欧洲中世纪时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一部是《约

伯记解说》(又译为《约伯记释义》、《以西结书讲解》，也有译成《伦理丛谈》或《道德论》的)。这部书共计35篇，是对《圣经》的诠注，也是关于教会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再一部是《论神职人员的职责》(或译为《论司祭品行和职务的书》，也有译成《神父守则》或《论教牧职守》的)，写的是关于主教、神父们的人品和职责指南，曾被译为希腊文、英文而流行各地。此外，还有一本是他根据道听途说的内容而写的《意大利父老生平神迹对谈录》(又译为《对话录》)。在这本书中，他把世界描绘成充满了神迹、天使、魔鬼和炼狱等情景，并有来世好人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迷信故事。

格利哥利一世的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系统，但与奥古斯丁相比两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对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格利哥里一世在论述中更大量地结合了大众基督教的内容。他对神迹、天使、魔鬼和炼狱等观念要比奥古斯丁著作中在这方面的观念有更重的信仰色彩。他像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已把拣选人规定好了，但他又不像奥古斯丁那么过份地强调“预定论”。格利哥里一世认为：人之得救不仅要靠上帝的恩典，而且也要靠个人的善功。他说：“我们行善，一面由于上帝，一面也为了我们自己；由于上帝先赐下恩典，由于我们用善意接受了这个恩典”。他强调主要的善功就是履行教会的圣事。如受洗后犯了罪，就要靠忏悔来补赎。“圣餐”非常重要，它可以救助活人和死人。

关于“炼狱”，格利哥里一世认为这是基督教信仰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提出“要相信在审判之前，有炼狱的火，炼净某些轻微的罪”。这一点同东正教派在“炼狱”问题上的观

点不同，东正教派认为人的灵魂在炼狱里能因别人的代祷和献祭而得救。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在“炼狱”概念上的不同主张，成为以后长期争端的问题之一。

格利哥里一世在整饬教会过程中还强调，严格执行教士独身制以及教士、修士和信徒必须苦修和遵守“绝对服从”的誓言。如他所提到的“即使当局的行为应受指责，而用暴力反对当局也是绝不容许的。”(摘自《论教牧职守》)。此外，在宗教仪式上，格利哥里一世发展了罗马礼仪，对弥撒的祭典方式也有些改革，在教堂音乐中，提倡了“格利哥里无伴奏齐唱法”，主持编订了《格利哥里颂歌谱》，在天主教弥撒仪式中长期沿用。

格里哥里一世毕生极有成效的活动，为罗马天主教会教权的扩大和日后教皇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格利哥里一世时代，由于发挥了教皇的历史作用，确立了天主教会的教皇体制，因此，他正式宣布“教皇”的称号只能属于罗马教会，其他主教不得再称“教皇”。从此西方教会不论在教义、教会组织和修道院生活等方面都是沿着格利哥里一世所开创的方向发展的。

64 岁的格利哥里一世病逝于 604 年 3 月 12 日，他的遗体葬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他受到后世天主教徒的顶礼膜拜和悼念。

扎迦利支持法兰克宫相丕平当国王

“懒王”时期宫相当政

公元511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朝的开国君主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分裂了。由于国王把大部分土地都分封给了王子、王孙和贵族，使贵族们既有大片封地、又有封地上的司法行政特权，通过不断进行封建战争，更扩大了他们的势力。到7世纪中叶，国王仅有空洞称号、已没有实际上的统治权。由于他们闲散着，不参与国政，或当了傀儡，乃得到了“懒王”的称号。因此，在法兰克王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懒王”时期（639—751年）。

法兰克王国王权衰落的时候，国内的加洛林贵族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他们拥有土地和军队。在“懒王”时代，加洛林贵族世袭了“宫相”的职位。宫相原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宫廷总管，相当于宫廷大臣，最初主管国王财产的收支和王室地产。后来权力日重，代替国王主持王室法庭、经管官员任免、土地封赏，特别是主管租税的征收和统率军队。任宫相职务的人，7世纪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到8世纪变成王国的实际统治者了。

法兰克王国杰出的一位宫相是查理·马特。他率领军队英勇地抗击了阿拉伯人的侵略、取得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波亚迭之役的大捷。通过一系列战争扩大了版图，又进行了采邑改革，实际上已将法兰克王国的最高统治权操纵于自己之手。查理·马特于741年病逝，他的次子丕平不甘心再当宫相，乃同罗马教皇加紧直接联系，企图得到教皇的支持。

教皇扎迦利的和平外交

罗马教皇扎迦利，又译扎卡里斯(Zacharias，741—752年在位)，父母原系希腊人，因久居意大利而取得意大利国籍。扎迦利是继前任教皇格利哥里三世(731—741年在位)于741年11月逝世后不久便即位为教皇的。

罗马天主教会同法兰克人的关系由来已久。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领其3000名亲兵于496年圣诞节那天在兰斯教堂入教洗礼时，当时的罗马教皇阿那斯塔修斯二世（496—498年在位）曾向克洛维表示："愿您像一根铁柱那样支持教会，教会也会使您战胜一切敌人。"果然，法兰克王国赢得了高卢地区基督教徒的支持，打着镇压异端的旗号去征服信奉阿利乌教的其他日耳曼人国家。从5世纪末起，法兰克人便常请罗马教皇在教会事务上给予指导，请教皇帮其整顿高卢的教会，还大力扶持教会并给以各种特权。如规定教堂神圣不可侵犯，任何自由民到教堂避难，政府机关不得派人进入教堂搜捕；教会神职人员犯法时，只能由主教按教规审理。克洛维还下令，宗教会议制定的法规，具有法律效力。到7世纪

初，国王在订法时，还吸收主教参加。在法兰克，主教政治上享有权力，不但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还有权处分渎职的法官。经济上，各地教会拥有大量地产，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大封建主，神职人员的财产免税，本人免服徭役。

查理·马特进行采邑改革时，因没收教会部分土地，一度与教皇关系紧张。但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因身材矮小而得名），极力调整与教会的关系，如追认所有被作为采邑的教会土地仍是教产，封臣应向教会交纳一定的费用。

教皇扎迦利时期，教会的力量有限，他对周围的伦巴德、拜占廷等国采取的是和平外交政策。8世纪中叶，北方的伦巴德王国入侵。教皇向拜占廷帝国报警，扎迦利与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素来友好，但帝国自身虚弱，又鞭长莫及，无力援助。751年伦巴德攻陷并控制了归拜占廷帝国统辖的拉文那。罗马面临严重威胁。

扎迦利同法兰克王国的上层人士交往频繁。7世纪末，来自不列颠的西撒克逊人卜尼法斯到大陆传教，扎迦利与卜尼法斯经常通信，关系密切。741年卜尼法斯被任命为教皇使节、日耳曼人主教，在教皇主持下，负责整顿全法兰克的教会事务，加强了罗马教廷与法兰克教会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由于法兰克统治者与扎迦利的密切合作，促使教皇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约束，而直接得到法兰克的庇护和支持。教皇扎迦利曾组织神学家们，把教皇格利哥里一世所著的《讲话录》，译成希腊文，加强了对希腊语地区的影响。

矮子丕平仰仗其父查理·马特的成就，想当国王心切，为使自己上台合法化和神圣化，于是他用了冠冕堂皇的方式来

实现其夺位称王的计划。

扎迦利支持掌政权者改朝换代

751年，矮子丕平派专门使臣到罗马去谒见教皇扎迦利，向教皇询问道："谁应该称王？是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让真有实权的人当国王好？"扎迦利心领神会，按丕平的意愿做了明确的回答说："由握有实权的人当国王比有名无实的人当国王强得多。"矮子丕平得到教皇的认可，大喜！乃示意臣下办"劝进"。同年11月，法兰克王国的权贵、高级僧侣们在苏瓦松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教皇支持丕平的声明，要求与会者讨论王国的王位问题。结果到会的贵族和僧侣一致表示服从教皇的意见，共同拥戴丕平为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并当场把丕平抬起，边敲打武器，边高呼"万岁"，会上利用教皇的声明，把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懒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废黜，并将他送往圣托美尔城修道院做僧侣。矮子丕平就这样被称为是通过"诸侯选举"而登上王位的国王。扎迦利闻讯立即表示赞许和支持。不久，教皇特派美因兹大主教卜尼法斯专程前往为丕平举行盛大的加冕涂油仪式，授丕平以法兰克国王的称号。这便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开始。从此开创了国王即位由教皇加冕的先例，这种仪式表明丕平是受上帝的"挑选"、"蒙上帝之恩"当上国王的，使篡权活动合法化。从此，"君权神授"观念逐渐传播开来，反对国王便是反对上帝。为加洛林王朝蒙上了神圣的光环。

斯德望二世与“丕平献土”

斯德望二世北上搬兵

罗马教皇扎迦利于752年3月14日逝世后，意大利罗马教会司铎斯德望于752年3月22日当选为新教皇。但他尚未正式登位便在当选的第三日中风猝死。于是不得不补选了另一位意大利教士斯德望继承教皇之位，是为斯德望二世(Stephen Ⅱ 752—757年在位)。

为了解除伦巴德王国对罗马城的进逼，教皇斯德望二世于753年曾亲往伦巴德的首都巴威亚城，同伦巴德国王爱斯托夫（749—756年在位）进行谈判，希望保持住教皇辖区的主权，但未能成功。754年，伦巴德人攻陷罗马城，斯德望二世匆匆越过阿尔卑斯山北上，长途跋涉前往法兰克王国，直奔丕平王宫求援。教皇斯德望二世仿照古犹太人的习俗，全身披麻，头洒灰土，以表示自己犯了罪过。他匍匐于丕平脚下，恳求他率兵解救罗马，直到丕平应允方才立起。为了报答丕平的承诺，教皇在巴黎附近的圣狄尼教堂内亲自为丕平及其长子查理、次子卡洛曼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加冕祝圣礼。再次承认矮子丕平是“神命君主”，僭封丕平为“罗马贵族”和

"教会保护人"的称号，并宣称：天主安排丕平及其家族世世代代为"罗马人之王。"

不久，丕平履行了互惠的义务。754年底和755年初，他率法兰克军队攻入意大利，经过激烈战斗，把伦巴德国王爱斯托夫围困在巴威亚，迫使伦巴德国王同意向教皇交回拉文那等被占领的地区。755年，丕平派军护送教皇斯德望二世回到罗马后，丕平则率军离开意大利，返回高卢。但爱斯托夫并不履行其诺言，756年再次出兵进犯罗马教皇。斯德望二世乃一再致函给丕平求救。同年，756年至757年，丕平及其子查理乃第二次远征意大利，彻底打败了伦巴德王国的军队。

"教皇国"与《君士坦丁的赠礼》

756年，矮子丕平通过两次战争和新缔结的"巴威亚条约"，迫使伦巴德国王交出了以拉文那为首府的整个总督辖区以及意大利中部的彭达波里斯（即"五城区"）等地区。丕平把这一片土地直接"赠献"给罗马教皇斯德望二世，成为教皇所属的领地。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事件"丕平献土"。从此，罗马教皇的世俗君主权开始出现，这便是"教皇国"的开端。此后，"教皇国"共维持长达1100多年（自756年至1870年）。教皇国（教廷称之为"圣彼得的事业"）诞生后，罗马教皇不再是一般宗教的最高首脑，他不仅是世界天主教会的领袖，而且成为教皇国内的世俗君主。应当指出的是："丕平献土"中，并未把罗马城本身交给教皇所有或由其管辖，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虽已同拜占廷脱离了关系，但在"法"的

观念上，罗马城仍属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的管辖范围之内。直到772年，罗马教廷在所发出的公文中，仍然不得不承认东罗马的皇帝为政治上最高统治者，尽管这时的罗马城实际上已属教皇所有。

丕平的献土，引起东罗马帝国的强烈反对。他们强调意大利中部一向是属于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丕平无权赠送别人搞政治交易。罗马教皇就在这时公布了一份经过精心策划而炮制出的伪造文献，证明西罗马的土地本来就是隶属于罗马教廷的。这份文献便是著名的《君士坦丁的赠礼》。

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文献，采用的是特许状的形式，由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写给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主教西尔维斯德一世。它用的是信经的措词笔法，首先是写寓言故事式地叙述了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皈依基督教和受洗的过程。文献中写道：罗马大祭司曾建议并要求君士坦丁应在盛满儿童热血的池中洗澡，以便治愈皇帝本人的麻风病。但是，皇帝不忍心杀害无辜的儿童，他并未听从大祭司的建议。当皇帝夜间熟睡时，基督门徒彼得和保罗向他显圣，告诉他只要领洗便可除病。当君士坦丁大帝站在池内请罗马主教授洗时，天上降下的一双手触及到他的身体，从而使病体痊愈。其次，君士坦丁大帝接着写道：为了感谢罗马主教给皇帝治好病，皇帝决定东迁首都去君士坦丁堡，并命令全体神职人员归顺罗马主教西尔维斯德及其后继所有担任罗马主教的人。还把“罗马城和所有意大利的或整个西部地区的行省、地区和各个城市”统统交付给他们。按这份文献，罗马教皇是统治整个帝国西部版图的君主。罗马教皇认为：根据这份重要的“文

献”，“丕平献土”，只是把君士坦丁大帝早已宣布的决定和圣赐，付诸实现而已。不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对于昔日君士坦丁大帝早把西罗马土地赠给了罗马主教这件事是否相信，都不能，也无力改变“文献”中早已做出的决定。

在中世纪期间，由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竭力渲染和宣传，大多数人们对于《君士坦丁的赠礼》多半相信无疑。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经过人文主义者库萨的尼古拉和罗伦佐·瓦拉专门撰文揭露了《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文件。瓦拉利用大量史料拆穿了被教皇奉为至宝、作为教皇国土地来源的根据的这份“文献”，纯系8世纪时作品，因为文献中所用的拉丁语语法并非4世纪时的用语，而是756年时法兰克王国时代的语法。瓦拉等人的辨伪，澄清了历史公案，也揭穿了教皇的骗局，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利奥三世把皇帝金冠戴在查理曼头上

公元 8 世纪下半叶，教皇国刚刚建立，羽毛未丰。罗马教皇斯德望三世（768—772 年在位）和阿德里安一世（772—795 年在位）都深知确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对罗马教廷支持的重要性。他们力图缓和各方面的关系，在同东罗马帝国及东派基督教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发展自己。加洛林朝丕平之子国王查理统治时期（768—814 年）也与罗马教皇结盟，相互利用和支持。

“靠武力保卫教会，用祈祷支持武力”

利奥三世（750—816 年）原系意大利教士，795 年，他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手段继阿德里安一世之后，登上了罗马教皇宝座。新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 795—816 年在位）引起罗马许多大贵族和教会人士的强烈反对。教皇陷入困境之后，他便竭力争取法兰克国王对自己的支持。利奥三世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的教堂内特地布置了一幅镶嵌的彩色大画，描绘的是使徒彼得把教士的圣带赠予教皇，把“罗马帝国”的旗帜送给查理。在祷文中这样写道：“圣彼得把生命赐给教皇利奥，

把胜利赠予国王查理”。利奥三世上台不久，进一步派人向查理国王呈送上“圣彼得墓”的钥匙和一面罗马城的旗帜，其用意是表示查理有统治罗马的权力，他甚至以查理在位的年号作为教皇文书的纪年。

796年，查理国王在给教皇利奥三世的回信中重申了自己对罗马教廷的政策。他写道：“正如我们同您的前任阿德里安达成的协议一样，我们同样愿意同您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虔诚的信仰和仁爱的团结契合基础上的……，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和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神圣的教父，您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封建欧洲的政权同教会神权的配合，通过这封信会更清楚地看出端倪了。

799年，罗马爆发了贵族党派的斗争。反对派贵族和前教皇阿德里安派分子掀起动乱。他们借口利奥三世行为不端，殴打利奥三世后将他逮捕监禁起来，并且宣布要废黜教皇，还扬言要把利奥三世的眼睛挖出、舌头割掉。利奥三世仓惶地只身逃出罗马，赴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行宫乞援和避难。因为教皇国乃先王丕平所赐，查理与教皇属于封君和封臣的关系，查理乃认真负起封君保护封臣的职责，令国家卫队护送教皇返回罗马，又派去专门使节加以调停。查理甚至宣布所有对利奥三世指控的内容均为不实之词；将控告和逮捕利奥三世的人全部押送出境。查理依靠武力的支持，使罗马教皇利奥三世渡过了严重难关。

利奥三世为查理曼行加冕礼的台前幕后

公元800年，罗马局势仍然十分混乱。查理国王率军于11月进入罗马。查理召集所有的贵族、主教及神职人员举行会议，胁迫大家承认和支持利奥三世的合法地位，重就教皇之位。利奥三世为了报答查理之恩，刚复位便建议查理改王称帝，行加冕大礼。对此，查理国王再三盘算，他本想通过同拜占廷帝国亡帝立奥四世的遗孀艾琳皇后之联婚，使自己身兼为东、西两帝国的君主，权衡利弊后，查理决定充分依靠西方的基督教会而接受了教皇的主张。

800年12月25日，圣诞节日这一天，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罗马人公众举行圣诞弥撒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大典。利奥三世亲自把一顶皇帝的金冠戴到正跪着的查理头上，同时涂抹了圣油，并且尊称查理为“奥古斯都”、“凯撒”和“伟大的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当时，西罗马帝国已灭亡300多年，这次教皇公开恭维查理曼是“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是世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教堂里人们掌声雷动。欢呼查理为“查理曼”(乃“查理大帝”之意)。此后，法兰克王国通常便称为查理曼帝国。

利奥三世为查理曼的加冕称帝意义重大。首先，这等于是布告天下，教皇有对国王称帝的加冕权，明显地提高了神权地位。此举得到了罗马民众的喝采，西方人们认为这是罗马帝国摆脱拜占廷控制而在西方的复兴，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基督教会在西方的"中兴"时期。其次，这次加冕礼是西方基督教会成为查理曼帝国后盾、是帝国统治的精神支柱的表现；而西方教会有了一个强大的非意大利的帝国作为依靠，亦是十分重要的。教皇的加冕给帝国打上神权政治的标记，说明罗马教会比东方教会有更大优势，这同当时拜占廷由于保罗派运动和"圣像崇拜之争"对教会的削弱，恰成对比。再次，此后西方教会受查理曼的武力保护，免受阿拉伯军队的攻击；最后，查理曼利用"罗马人皇帝"的招牌和教皇的支持，大举对外扩张和侵略，建立起类似昔日西罗马帝国的版图，北从北海，南到意大利中部，西起太平洋，东临易北河的查理曼帝国。还应指出的是，加冕礼显示了皇权来之于上帝、受之于教皇，含有教权高于政权之意，自此埋下了一个世纪后政教之争的种子。

东罗马向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诩，强烈反对利奥三世的这次加冕查理，斥罗马教皇为"非法"和"叛逆行为"。西方教会对此早有准备，同东方断绝了关系，更加深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利奥三世时期皇权和教权的扩大

查理加冕称帝后，一方面加强政治统治，将全国分为98个州郡，在各地任命伯爵负责收税、征兵、司法、维护治安，又于802年颁布巡按使团敕令，规定使团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及忠于皇帝的世俗官员共同组成，巡视各地，以防伯爵势力坐大；另一方面，继续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决定着

教会的事务。对于教会的布道、立法、行政，特别是控制主教的人选和任免权，派亲信去操纵教会事务，甚至于遴选教会中的主要领导人、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查理曼一生共主持16次宗教会议，将帝国扩增为21个大主教区。他在著名的《查理曼书》[1]中反对东方教会与教皇的主张，不同意在礼拜堂中敬拜图像。《查理曼书》还将"和子"[2]经过809年阿亨议会之认可，介绍和扩广到法兰克教会当中。

教皇利奥三世对查理实行加冕礼后，教会利用政治特权进一步扩大教会、修道院的领地。810年，在阿亨宗教会议上把神职人员的财产分为三个等级。第三等级拥有不到一千处领地；第二等级拥有一千至三千处产业；而第一等级的领地竟达到三千至八千处。日耳曼一个富尔达修道院竟拥有一万五千处产业。这些领地大部分是真正的庄园，小修道院的庄园中约有二、三百户农民；大修道院中的农户多达数千。主教除享有皇帝授予的"特恩权"外，还有种种司法权。查理曼的军队扩张到哪里，教会的领地也随之扩张到该处。查理曼在811年的诏令中透露出：神职人员们"以天堂为诱饵，以地狱相恫吓，使农民放弃财产，变为贫困。"

813年，经教皇利奥三世同意，在美因兹宗教会议上正式批准教堂墓地可以葬入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从此，教堂内

---

① 查理曼口述，令人笔录，后由神学家成书。

② 即主张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原来亚他那修信经中称"圣灵"系"来自圣父"。589年托利多议会补充为来自圣父"和圣子"（"和子"），东方教会和教皇利奥三世虽然都反对在文件中增加"和子"，但查理曼却坚持这一主张。

墓地成为了荣誉的安葬处。

814 年查理大帝逝世。罗马贵族曾群起反对利奥三世，815 年一度将他推翻。利奥三世又依靠查理曼的继承者、对教会忠心耿耿的“虔诚者”路易的出兵相助，处死反对派的首领，使利奥三世复教皇位直至 816 年去世。

约翰十二世给鄂图一世加冕称“罗马帝国皇帝”

约翰十二世上台前教皇走马灯似的更替

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政治纷争加剧，教皇不断地卷入了争夺意大利的纠纷之中。随着罗马被不同党派所控制，教皇也频繁地更替。从教皇斯德望六世（Stephen Ⅶ，896—897年在位）到约翰十二世（John xll，955—964年在位）接位前，先后登上罗马教皇宝座的共有16人。这些教皇多半是被废黜、被驱逐或被谋杀而死于非命。一些世俗的豪门权贵，看到教皇权位是个“肥缺”，乃竞相控制教皇的废立，借以谋私。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人们所说的“谁能控制罗马，谁就可以废立教皇”的局面。甚至出现一段被教皇史学家们贬之为“淫妇统治教皇的时代”，这是指10世纪初起，统治罗马的是公爵、执政官西奥菲拉克特及其两个声名狼藉的女儿玛罗齐娅和西奥多勒，教皇的选立都由他们所操纵。904年，玛罗齐娅利用罗马市民对新当选的教皇克里斯托弗的不满，派军队拥立自己的情夫为教皇，称塞吉阿斯三世，把克里斯托弗害死在狱中。此后几十年中罗马教廷的状况，曾有人描述道：“高踞的不是教皇，而是那荒淫无耻的娼妓安置

在那里的真正恶魔。他们全权支配着主教的职位，他们践踏所有古老的习俗、所有的法规和法令。”931年，玛罗齐娅又把她与情夫教皇塞吉阿斯三世（Sergius Ⅲ，904—911年在位）的私生子，21岁的约翰扶上了教皇宝座，称为教皇约翰十一世（John Ⅺ，931—935年在位）。932年，约翰十一世的同母异父兄弟斯波莱托公爵艾伯里克剥夺了母亲玛罗齐娅的称号。936年，玛罗齐娅和教皇约翰十一世均被艾伯里克囚禁并害死。

艾伯里克有权有势，体格壮，个性强，他在罗马独裁20余年。他先后任命了教皇斯德望八世（Stephen Ⅷ，939—942年在位）、马丁三世（Martinus Ⅲ，942—946年在位）和阿加皮图斯二世（Agapetus Ⅱ，946—955年在位），这些教皇只能对艾伯里克唯命是从，无所建树。艾伯里克临死前策划了由一部分意大利贵族出面拥立出自己的儿子屋托维当下任教皇。

纨绔子弟屋托维（937—964）生活放荡、花天酒地，无恶不作。他是艾伯里克的独生子，完全靠他父亲的权势，刚当上枢机主教又升任教皇的。他给自己取名为约翰十二世（955—964年在位），是最早的几个当选以后为自己取名的教皇之一；他任圣职不办圣事，杀戮神父，把10岁的小孩任为主教，吃喝玩乐，遭到许多贵族的强烈反对。

鄂图一世接受加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

查理曼帝国瓦解后，德意志王国是由东法兰克王国发展

而来。为了抵御诺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德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王国。911年，德国的贵族和高级僧侣曾推选弗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为国王（911—918年在位）。接着在919年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当选为德国国王。亨利一世能力强，作用大。他建立了萨克森王朝，把丹麦人赶回老家，征服了易北河中游和东部的斯拉夫人，并于933年3月最终击败匈牙利人。936年亨利一世临终前指定长子鄂图一世为其继承人。

鄂图一世（936—973年在位）特别能干。他即位时，接受了美因斯大主教希里德波特的加冕王冠和涂圣油，推行与教会结盟的政策，把教会作为王权的支柱。鄂图一世授予教会更多的特权，他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要求主教和修道院长服军役，主教及其附庸均应率军队参加鄂图一世的军事征讨。他重申查理曼以来历代君王的惯例，如：让主教在教会领地上及其周围地区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主教和修道院长在一些城市的集市贸易中有征税权等。鄂图给予教会的这些权，又称"特恩权"，在历史上被称为"鄂图特权"。鄂图一世利用教会的支持，对内抑制诸侯，对外扩张，征服了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广大地区，并向北延伸到日德兰半岛。

富庶的意大利北部诸城，是鄂图久已垂涎的目标。950年，意大利原统治者罗退尔的遗孀阿德里根德逃到鄂图处请援。鄂图乃顺水推舟于951年率军南下，直接干予意大利北部封建主的争权战争。9月，鄂图占领伦巴底后，接受了"意大利王"的称号。但鄂图并不满足，他还企图实现对罗马教皇的支配权。

年轻的教皇约翰十二世在任很不得人心，遭到许多贵族强烈反对。当时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国土的贝伦加尔二世，是约翰十二世家族的世仇，借机声讨教皇。约翰十二世惊恐万状，无力应付，961 年吁请鄂图一世出兵来援。鄂图一世再度率大军入意，于 962 年 2 月 2 日进入罗马，压服了反对教皇的贵族，巩固了教皇的地位。同月，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鄂图加冕，称“罗马帝国皇帝”。尽管这次加冕，乃是继承了从奥古斯都和查理曼一脉相承的罗马皇帝的帝位，但历史学家们习惯上把 962 年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当然，事实是直到 1155 年德皇腓特烈一世加冕时，在罗马帝国前面才加上“神圣”二字。此后，这个帝国在名义上一直持续到 1806 年被拿破仑推翻为止。鄂图一世承认教皇对意大利地产的要求，但保留皇帝对地产的宗主权，教皇就职后应向皇帝宣誓效忠。鄂图常驻意大利的代表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这样一来，约翰十二世虽然摆脱了罗马和意大利贵族的控制，但他也不愿向皇帝宣誓及服从皇帝的制约和命令。

约翰十二世的被废黜

约翰十二世对德皇鄂图的控制十分不满，乃密谋反对他。他与阿达里伯特为首的一批意大利反德皇的贵族结成联盟。

963 年，鄂图一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召集罗马主教和市民会议，宣布约翰十二世品行恶劣、玩忽职守，又阴谋反对帝国，乃决定将其废黜，并迫使罗马市民宣誓，未经皇帝同意不得选举教皇。在这场斗争中，鄂图得到了南意的卡普

亚和贝纳凡托两地公爵的支持，因为后者在同拜占廷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需要鄂图的帮助。与此同时，在鄂图一世操纵下，选出了自己手下的意大利籍侍臣，当时并无神职的利奥为教皇，称利奥八世（Leo Ⅷ，963—965年在位）。这位新教皇虽得到帝国的支持，但964年，当鄂图率军离意大利回德国时，约翰十二世便东山再起，他纠集一批支持者在罗马举行宗教会议，宣布废黜利奥八世，自己重任教皇。利奥八世被迫出走，前往德国投靠德皇。约翰十二世荒淫的秉性不改，不断寻欢作乐，964年5月14日，猝死在情妇的怀中，年仅27岁。

约翰十二世死后，罗马几派贵族共同推选本笃继任教皇，是谓本笃五世（Benedic Ⅴ，964—966年在位）。鄂图一世闻讯，立即在964年第三次出兵罗马，把本笃驱逐出境，用武力恢复利奥八世的教皇职位。但一年后，利奥八世去世，鄂图又让意大利人约翰十三世（John ⅩⅢ，965—972年在位）当选。当约翰十三世被罗马贵族扣押时，966年鄂图一世甚至再次出兵罗马，使教皇不受罗马贵族的控制，并以残酷手段严惩了反对新教皇的意大利贵族。为了维持“神圣罗马帝国”，为了自己安排和牢牢控制罗马教皇，德皇不断对意大利用兵，严重地影响了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政教之争”高潮中的格利哥里七世

希尔德布兰与克吕尼运动

格利哥里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年在位），是中世纪时期事迹突出、影响重大的罗马教皇之一。格利哥里七世又译名为“额我略七世”，意大利人，原名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1020—1085年），长期从事克吕尼派的宗教改革活动。他任罗马教皇期间为了扩大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同德国皇帝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政教之争”。

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坎纳的索瓦纳村内一个贫寒的农家。少年时在他叔父担任院长的罗马阿文亭山上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中读书。他深得该院中一位名叫约翰·格拉齐亚尼神父的信任和培养。青年时，他曾留学法国和德国，返回罗马后再入修道院，此后，长期过着教界生活。他虽五短身材、貌不惊人，但才智超群、谋略过人、意志坚定。

1044年，罗马教皇本笃九世因准备同自己表妹结婚、出卖教职，而不得不还俗离开教廷。希尔德布兰的一位同学约翰·格拉齐亚尼用1500镑黄金贿买到了教皇职位的肥缺，即教皇位，称为格利哥里六世（Gregory Ⅵ，1045—1046年在

位)。新教皇重用希尔德布兰为教皇内宫的机要秘书兼教廷总司铎(即总司祭)。1046年，格利哥里六世谋教皇职的贿买丑闻暴露了，加上本笃九世婚事未成要求复位，德皇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借机将格利哥里六世废黜。希尔德布兰陪同格利哥里六世流亡德国并在科隆一同被下狱过。1047年，约翰·格拉齐亚尼死于狱中，希尔德布兰避往克吕尼修道院，他在这里接受了克吕尼派主张。

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初，其目的是为了振兴天主教会。910年，法国南部勃艮第境内的克吕尼修道院正式建立。该院第一任院长伯尔诺(910—927年在职)和第二任院长圣奥多(927—942年在职)提出了僧侣应当：(1)守贫(不置私产)；(2)守贞(独身)；(3)反对买卖圣职；(4)反对教产世俗化。只有教会才能支配教产、任用教职；(5)加强以罗马教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不受主教和世俗领主的管辖。马若尔(948—994年在位)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时，克吕尼运动已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势力，各地许多修道院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的指挥，强化教会权威的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希尔德布兰同德、法的克吕尼派联合行动。

1049年1月，德皇亨利三世推荐克吕尼派的德国人布路诺(他是亨利三世的堂兄)任罗马教皇，称利奥九世(Leo Ⅸ，1049—1054年在位)。利奥九世从克吕尼修道院中把希尔德布兰带出来，陪同他一道前往罗马加冕就职。希尔德布兰升任枢机主教，并任教会领地的“宗座总理”，成为新教皇的心腹和教会中的知名人士，自此他开始进入罗马教廷中的上层。利奥九世在其外交代表宏伯特和希尔德布兰等人的协助下，

按照《君士坦丁的赠礼》伪文献的原则和克吕尼的改革精神，下令改组罗马教廷。希尔德布兰主张多数高级教职均应委克吕尼派僧侣担任；宣布所有教产统归教皇，应向罗马教廷纳税，严防教产转入俗人手中。由于希尔德布兰善于经营，教廷收入剧增，他本人的财富也扩大了。他还要求各级教士严格实行独身制，同时整肃了一些修道院。

利奥九世逝世时（1054年），教会中一部分人拥戴希尔德布兰当教皇，但是希尔德布兰自忖任教皇的时机欠成熟，乃亲率代表团赴德国，恳请德皇亨利三世指定新教皇，此举深为德皇所赞赏。亨利三世根据希尔德布兰的提议，选立了威克脱二世（Victor Ⅱ，1055—1057年）为新教皇。威克脱二世出于感激之情，将希尔德布兰提升为罗马教廷顾问兼"枢机神品"（即枢机"圣品"或"圣秩"），成为神职人员中职分、权力的最高品级。此后希尔德布兰进一步展开了为扩大教权的广泛活动。

为"教权至上"而斗争

1056年，德皇亨利三世驾崩，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帝国事务由亨利四世之母太后阿格尼斯摄政。这时的罗马教皇斯德望九世（Stephen Ⅸ，1057—1058年在位）和本笃十世（Benedic X，1058年）得到了太后阿格尼斯的支持。从1056年起，红衣主教宏伯特发行了抨击"西摩尼"（又译西门，"买卖教职"丑行）的名著。宏伯特扩大了"西摩尼"的范围。他反对政府干涉教职之任命。宏伯特认为：德国主教由德皇

任命乃是一种大罪，倘若这种惯例不能废除，则应鼓动平民起来反对各主教，促使后者被废黜。希尔德布兰坚决拥护宏伯特的主张和计划，反对同德国太后政见一致的本笃十世。在意大利，凭借托斯坎纳伯爵的武力支持，联合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人和从10世纪起占据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挫败对立的教皇，重新组织教皇的选举，选出了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1058—1061年在位）为罗马教皇。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两个教皇同时并存的对峙局面。

教皇尼古拉二世和希尔德布兰积极推行宏伯特的计划。希尔德布兰在1059年帮助尼古拉二世制订了教皇选举法，通过拉特兰宗教会议正式颁布，规定今后不能由皇帝、任何世俗君主和罗马贵族指定教皇或干予教皇的选举。而教皇的人选，必须首先由罗马城郊七大教堂的枢机（红衣）主教会议选举产生候选人，最后由枢机院主教团（红衣主教）全体会议审议后选举决定，中间也参考罗马教廷神职人员和民众的意见，但实际是由枢机主教控制，必要时，可不在罗马选举。这样一来，便从根本上排除了德皇对选定教皇的操纵。这个选举法是教皇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教皇选举法。尼古拉二世还派遣教皇的钦使到各国去，这些钦使不久便成为国际上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希尔德布兰被晋升为罗马教廷总六品教职，这已相当于教廷中的“内阁总理”。希尔德布兰又同南意的诺曼人结盟，使教皇有了军队作为后盾。中世纪的武士团和十字军精神由是产生。希尔德布兰还给北意大利教皇党的改革工作以帮助。他利用德皇亨利四世尚未成年的有利时机，竭力使罗马教廷摆脱皇权的控制，扩大和提高教皇优

于皇帝的地位。

1061年，罗马教皇尼古拉二世逝世。帝国试图拥立一个反对希尔德布兰的政策的人当教皇，但希尔德布兰联络德国一部分贵族，坚决反对帝国皇帝所遴选的教皇，终于使希尔德布兰提名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1061—1073年在位）当选为新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顾问希尔德布兰的意见言听计从。他们同法兰西国王缔结了坚强的同盟，这是制服德、意那些权贵们的有效措施。在西班牙，教皇钦使促成教会同罗马联合。在英国，征服者威廉根据希尔德布兰的劝告取得了王位。威廉使分裂的英国教会重新皈依罗马教廷所辖。德国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亚大伯特（Adalbert），因企图筹建一个包括德国北部和斯堪底纳维亚半岛的北欧主教的独立特区，结果于1006年被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黜。

希尔德布兰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努力打破罗马教廷枢密院的成员只能由意大利教士组成的惯例，他从西欧各地物色支持克吕尼运动的主教加入枢密会议，以充实改革派的阵容，扩大罗马教廷的力量。

时机成熟 登上教皇宝座

1073年4月21日，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希尔德布兰认为时机完全成熟，未及葬礼完毕，当晚便依靠武力，迫使枢机主教选他为教皇，取名格利哥里七世。德皇亨利四世及其近臣们本来准备抵制罗马教廷组织的这次选举，但由于帝国内萨克森地区发生叛乱，为了避免同新教皇为敌，乃妥协

未予干涉。

格利哥里七世上任后，首先是力图阻止法兰西的诺曼人入侵意大利并保护教皇领地。他贯彻并阐发了奥古斯丁的关于《上帝之城》的思想，力图扩大罗马教廷的地位和权势。他反复宣称："罗马教会是上帝独自建立的，唯独罗马教皇有权称为大公，唯独他可用皇帝徽号，所有诸侯都应俯伏在他脚前。他可以废黜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审判他；罗马教会从来没有错误，将来也永无错误。"他还强调道："一切基督教的国家应当合组为一个世界帝国，而以罗马教皇为元首，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格利哥里七世的关于教皇权的中心思想是教皇拥有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围绕神职人员的任免问题，新教皇坚决反对皇帝干予。1073年，德皇亨利四世曾邀请格利哥里七世协商解决，后因亨利四世又忙于镇压大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不得不同意暂时放弃了叙任主教之权。

1074年，作为克吕尼改革派首领的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利用克吕尼运动在西欧已发展壮大之机，在拉特兰召开宗教会议，连发四道谕令：指斥神职人员结婚，号召一切教牧都应遵守独身，严禁买卖神职，而且规定神职不准由其后代继承，凡违纪者将处以"绝罚"（即：教会与其断绝来往，受此处分者死后均不能升天。）教皇还派出枢机、亲信充当"钦使"去贯彻谕令，遇违抗者则撤职查办。

德皇亨利四世反对教权至上。他鉴于国内渐趋平静，乃亲自提名让宫廷神父前往意大利米兰，由德皇直接任命其为米兰大主教。1075年，格利哥里七世再次颁布《教皇敕令》（27条）。宣称教皇位于世俗君主之上，有权废立皇帝或国王。

在一本有名的书《独裁者》[1]中，表述了格利哥里七世的原则："唯有教皇一人具任免主教之权。"教皇"拥有制订新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及设置新教区的权力。"格利哥里七世特别强调的是："禁止任何神职人员从世俗诸侯、乃至从国王或皇帝手中接受任何一个主教区或修道院或礼拜堂。今后，主教的授职礼必须由上帝在世上的最高代表——教皇主持。"甚至规定出"教皇有权可以解除其臣民对于邪恶统治者效忠的誓约"等等。

1075年，德国希尔绍(Hirschau)修道院院长威廉访问罗马，通过格利哥里七世的同意，希尔绍修道院脱离了德国当地教区的管辖，并执行克吕尼的规章和制度。威廉还积极推行格利哥里七世强化教权的政策，竭力争取德国多数主教的支持。格利哥里七世对外广泛活动，力图使许多王国服从教皇。诺曼底公威廉征服英国称王后，教皇坚持要英王威廉向罗马教廷称臣，声称否则威廉则"不能进天堂"。教皇不准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干予国内的教会事务，规定法国主教必须由罗马教皇任命。教皇支持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因为西班牙是使徒圣保罗传播教义的地方，故西班牙乃教会领地。格利哥里七世还宣称：由于匈牙利国王斯德望早把国土奉献给了圣彼得，故匈牙利王国亦归罗马教廷所辖。教皇根据伪文献《君士坦丁的赠礼》和查理大帝的馈赠，自命是意大利当然的统治者。教皇在南部斯拉夫的土地擅立国王代他实行统治，还图谋操纵俄罗斯境内王公之间内讧，利用1075年基辅

[1] 据说并非希尔德布兰所撰，而是枢机主教多伊德迪特写作的。

大公内部的斗争，将基辅罗斯划归为罗马教廷的封地。教皇还准备利用突厥人进攻拜占廷的时机，试图组织十字军远征打击异教力量和并吞拜占廷，后因政教之争的激化而延缓。教权的扩大，严重地威胁了皇权。德皇亨利四世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格利哥里七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终于以“主教授职权”为焦点而全面爆发。

“主教授职权”之争白热化

“主教授职权”又称“神职册封权”，是指授予主教、修道院院长的职权和封地的一种特殊权力。长期以来，“主教授职权”在德国境内由德皇掌握，在其它国度，通常是由罗马教廷授以指环和权杖，象征着主教在封地中具有宗教权力；另由世俗政权授以权标，标志着主教在封地内有世俗的统治权。封建时代的西欧，主教拥有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力。在某些教区内，大主教和主教本身便具有公侯的爵位和权势。因而关于主教的授职权，不单纯是仪式问题，它关系到皇帝和教皇的权力和收益，双方都企图独占它，故长期竞相争夺，互不相让，斗争愈演愈烈。

在《教皇敕令》颁布的同年（1075年），格利哥里七世在罗马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同德皇的斗争白热化。教皇把德皇的五位近臣以出卖神职罪开除教籍并宣布教产归属教皇，废除世俗君主对主教的授职权。这样一来，主教向君主的效忠誓言自然失效，直接影响到德皇的利害。亨利四世藉着刚刚镇压了萨克森地方贵族叛乱的胜利余威，照旧重用五位近臣，而且在同年

秋，亲率大军进入意大利，支持各地反对克吕尼运动的势力，在一些地区委派新主教。圣诞节（12月25日）时，德皇指使罗马贵族詹奇尤斯劫持了正在做弥撒的格利哥里七世。后来因亲教皇的支持者包围了詹奇尤斯的城堡，教皇才获得释放。

格利哥里七世怒斥德皇亨利四世的卑劣行径是“兽行”，亨利四世则针锋相对地揭露教皇曾雇佣杀手妄图行刺德皇。

德皇亨利四世利用法、德的数千名主教、神父们对教皇禁止神父结婚、禁止买卖神职等禁令的不满情绪，乃于1076年1月24日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会上由枢机主教于格（洁白的）（Hugh The White）带头控诉格利哥里的罪行，德国许多主教都是于格的支持者。亨利四世以“不靠篡权而是奉天主之命的国王”自诩，他授意会议致函骂格利哥里七世“不是教皇，而是假修士希尔德布兰”。沃姆斯会议还指控道：希尔德布兰是用狡猾的阴谋和金钱收买的方式爬上了教皇宝座，滥用权力……。亨利四世又派专人赴罗马，宣布希尔德布兰“将永世受诅咒”，“立即从圣彼得宝座上滚下来！”这一主张得到伦巴底许多主教的支持。

教皇格利哥里七世这时气势正盛，怎肯罢休。他看准德国国内局面并不稳定的现实，乃决定迎头回击。1076年2月22日，他在罗马公开发布了被称为“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宣布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处以“绝罚”，即：革除教籍，取消他对德国、意大利的世俗统治权，撤消百姓对亨利四世的一切誓愿与义务，号召教徒应同他断绝关系，亨利四世死后不能升天等等。与此同时，教皇又把紧跟德皇的美因兹大主教基戈弗里德也开除出教。在这种形势下，德国

境内克吕尼派响应教皇号召纷纷活动，萨克森地区又乘机发起暴乱，德国境内不愿皇权扩大的一些政敌兴高采烈，以致某些原来支持亨利四世反对教皇的德国主教们也反戈一击，形势急转直下，对德皇十分不利。

“卡诺沙事件”

德国许多诸侯、贵族们在1076年10月于黑森州的特里布尔集会，并在10月16日以教俗封建主的名义向亨利四世递交最后通牒，限他在1077年2月22日前（即被教皇处分后的一年之内）向教皇伏罪，否则德国全体臣民将解除对他的效忠誓言、并废黜其皇位，这次会上还决定于1077年2月在奥格斯堡举行新的会议，共商全德的政治和宗教问题，而且商请教皇以德国的最高仲裁人身份莅会。亨利四世终于陷入四面楚歌、空前孤立的境地。他无奈乞求教皇给予谅解，但格利哥里七世却坚持把一切问题留待奥格斯堡会议上去研讨，任何调停方式均被拒，胜败之局已见出分晓。

德皇亨利四世在强大的敌对势力面前，为了保住皇冠，摆脱困境，以便争取喘息和报复时机，乃决定忍辱低头，巧施苦肉计。他推测教皇前往奥格斯堡参加会议的途中必经阿尔卑斯山，于是偕全家在1077年1月提前赶去选择了一个地点等候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在途中得悉亨利四世在途中等候自已时甚为不安，忙躲进意大利庇特里丝之女——托斯坎纳的马蒂尔达女伯爵的卡诺沙（Cannossa）城堡之中，以防不测。时值隆冬严寒季节，出乎教皇意料的是，亨利四世身披

悔罪的麻衣，蓬头赤足站立在卡诺沙城堡女伯爵别墅第二层院子屋前的冰雪之中，等候得到教皇的赦免。历经三天三夜后，在第四天——1月28日，由于马蒂尔达女伯爵及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的帮助求情，格利哥里七世终于接见、允准亨利四世跪在教皇脚前，并宽恕了德皇亨利四世，准他恢复教籍，从而保住了亨利四世的皇位。一位皇帝向教皇正式负荆请罪，这是史无前例的。人们通常把"卡诺沙事件"作为教皇盛世的标志，而"到卡诺沙去"这一历史典故却成为"屈辱投降"的代名词。

格利哥里七世通过"卡诺沙事件"赦免了亨利四世，表面上看是政教之争中教皇的告捷，但实际却等于放虎归山，阻止了奥格斯堡会议的召开，是关键时刻里教皇的失着和德皇政治上的成功。一方面，使德国国内准备废黜德皇亨利四世的一些诸侯、贵族灰心失望、陷于混乱，丧失了对教皇的信任；另一方面，亨利四世稳住皇冠返德以后，巩固了国内局势后，他又自行其是，不理睬教皇，重新任命了一批主教。亨利四世依靠家臣、骑士及南德一部分城市的支持，还有一些深感若取消德皇对主教的授职权、而本身必受损失的主教们的相助，乃重整旗鼓再同教皇抗衡。

变幻莫测的政局

德国的政治形势很复杂微妙。一些反对亨利四世的政敌并不善罢干休。1077年3月，他们仍罢黜亨利四世，另推出亨利四世的宿敌士瓦本公爵鲁道夫（Rudolf）为德皇，于是德

国出现了两个皇帝对立并存连续三年的内战局面。格利哥里七世对德国内战，开始时以调停为名，实则挑动，谋取渔利。1080年1月，鲁道夫在一次战役中战败亨利四世，占据上风。格利哥里七世误以为德国的政局已定，乃于3月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再次革除亨利四世教籍，废其皇位，加封鲁道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样的政治武器和手段第二次重复使用时是难以奏效的。这次的教皇敕令已难同四年前（1076年2月22日的《教皇敕令》）相比。《敕令》的威信已动摇，翻云覆雨的政局莫测，使人们的问号也增多了。

不久，亨利四世的军事形势有了好转。同年6月，支持亨利四世的势力在意大利布列克森（Brixen）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并推选出拉文那教区的大主教维伯特（Wibert 1025—1100年）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三世（Clement Ⅲ，1080—1100年在位）。维伯特早年曾在德意志王朝中任职（1054—1055年），还任过帝国驻意大利的使臣（1058—1063年）。他一直是亲德皇的人物。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同一个天主教会内两个对立教皇同时并存的局面。

1080年10月，鲁道夫在埃尔斯特战役中战死，形势剧变。亨利四世在德国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巩固。1081年春，亨利四世率军进入意大利。由于亨利四世得到意大利北部一些城市和主教的支持及拜占廷经济上的援助，围困罗马城达两年之久。这时，格利哥里七世的支持者日弱，罗马人以及至少有13位枢机主教公开表态支持德皇亨利四世和新教皇克莱门特三世。格利哥里七世被迫向侵占南意的诺曼人求援。因诺曼人领袖吉斯卡尔正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援军尚未抵达时

罗马城已于1084年3月21日被攻破。格利哥里七世仓惶间逃到罗马城西北角梵蒂冈的圣安吉罗城堡（San Angelo）避难。克莱门特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加冕就教皇职之后，又为亨利四世举行了皇帝加冕大礼。不久，吉斯卡尔率诺曼人军队移兵罗马，经过激战后追使德皇亨利四世率军北撤。野蛮的诺曼人进入罗马城后，烧杀劫掠了三昼夜，罗马城约有1/3地区被毁，民怨沸腾。格利哥里引狼入室的行为大失人心。他本人不敢再在罗马城内继续停留，又随诺曼人撤出南下。几个月后，一代枭雄的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于1085年5月25日在悔恨懊恼交加中死于意大利南部西岸港口城市萨勒诺。他死前最后说的话是："我爱好正直、憎恨邪恶，因而我才死于流亡之中。"显然他并未醒悟最终的处境。他的遗体葬于该市圣马太大教堂内。格利哥里七世的逝世，并非教皇同德皇"主教授职权"之争的结束。此后，"政教之争"时起时伏，又延续30多年，直到1122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协定才告一段落。

格利哥里七世的一生，本人虽无重要的神学著述问世，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教权并不具备战胜世俗君权的历史背景，但他毕生从事了频繁的宗教活动，事迹显赫。他从事并领导过克吕尼运动，在他的组织下，大量的教会法规被编纂成集；他整饬教会的改革以及提高教权的斗争，为后来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教权臻于鼎盛奠定了重要前提。格利哥里七世在天主教教会史上，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作为、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罗马教皇，他的宗教业绩为教权走向顶峰作了突出贡献。公元1728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三世追封格利哥里七世为"圣徒"。

“十字军东征”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乌尔班二世

乌尔班二世（Urbanus，Ⅱ，约1088—1099年在位）是中世纪时期一位著名的罗马教皇。他积极推行教会改革和继续扩大教权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大力鼓吹和发动十字军东侵。

乌尔班二世的上台

乌尔班二世，法国人，原名为奥托·德·拉尼（Eude de Lagny），1035年出身于法国马恩河畔香滨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苏瓦松和兰斯读书。1055—1067年曾任兰斯教区助祭长（亦称“总六品”，系高级神职人员）。1070年进入克吕尼修道院，后来成为该院院长，深得前任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的赞赏，关系极为密切。他可以说是被格利哥里七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和接班人。奥托·德·拉尼是一个很有政治谋略和处世手腕的人，又是一位博学、办事有毅力和目的性很强的人。他表面上温文尔雅、举止深沉，处世不像格利哥里七世那样锋芒毕露，而是谦和、忍让、笑容可掬，但实际上城府很深、柔刚兼施。1078年，格利哥里七世将他提升为意大利奥斯蒂亚的枢机主教。1079年，他被召到罗马教

廷供职。1084—1085年，格利哥里七世委任他作为教皇的钦使（代表）派驻德国。他坚决贯彻格利哥里七世的政策和主张，把教皇开除教籍的德国主教全部革职，又抵制了由德皇亨利四世扶立的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1080—1100年）及其党羽。奥托·德·拉尼在德国的措施，受到格利哥里七世的称许，被格利哥里七世提升为意大利奥斯提亚枢机主教。

罗马教皇威克脱三世（Victor Ⅲ 1086—1087年在位）没有什么作为，于1087年逝世。为了解决教皇的继承人问题，克吕尼派的枢机主教们去罗马南部的特那西那开会，经过多次磋商讨论，在1088年3月12日终于推选出枢机主教法国的奥托·德·拉尼为接替威克脱三世的新教皇，称为乌尔班二世。

教会改革和扩大教权

1088年，乌尔班二世被选任教皇时，形势仍然严峻。当时，受神圣罗马帝國皇帝（德皇）亨利四世支持的“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仍然占据罗马教廷，发号施令。乌尔班二世在希尔绍修道院修士们的帮助之下，得到了德国一部分神职人员的支持，坚决反对世俗王权任命神职人员。他甚至主张，主教必须经神职人员和教徒选举产生。1089年，由于诺曼军队的支持和保护，乌尔班二世一度曾进入罗马并在宗教会议上宣布将对立的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处以“绝罚”。但并无效果，因为当时罗马的主要地区仍被克莱门特三世的势力所操纵，无奈，乌尔班二世只得离开罗马城。

为了进一步扩大天主教会的教权，乌尔班二世在11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进行过一系列的活动。他在1088—1089年，企图使东正教服从教皇，但却无效。他同德皇亨利四世、法国腓力一世及英王威廉二世之间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乌尔班二世坚决贯彻格利哥里七世的“教权至上”的克吕尼方针，但同世俗王权的斗争策略和手腕都是比较灵活的。他曾同游各地，广泛联系各种势力。他对德皇亨利四世和其他权贵人物、主教们表面上应付与让步，但暗中却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对帝国境内德皇阵营中的实权派进行拉拢、离间，挑拨人们对亨利四世的不满。他通过王位继承问题，离间亨利四世诸子同其父的关系，曾支持康拉德在米兰称国王，背叛其父亨利四世。1093年年底，乌尔班二世的翅膀完全硬了以后，乃逼使另一个教皇克莱门特三世离开罗马。1096年，乌尔班二世返回罗马，在拉特兰宫召开宗教会议，把长年在“卧榻之侧”的宿敌克莱门特三世及其追随者全部革除了教籍，由此，乌尔班二世的地位更加巩固，此后他主张办的扩大教权的教会改革，才说话算数。乌尔班二世任教皇计12年，到最后，即1095年后的5年，才施展出才能，在教会史上因作出重大事迹而名声显赫。

在法国，乌尔班二世同法国国王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也针锋相对地斗争。腓力一世组织一批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对乌尔班二世推行的克吕尼运动公开予以抵制，在法王的支持下，法国有两位著名的教会领袖夏尔特尔主教伊沃和弗勒里主教雨果，曾在1099年和1106年间撰文论证国家和教会都有神职叙任权，即教会授予宗教权，由国家、国王

授予世俗之权，这显然是与教皇对立的主张。乌尔班二世伺机加以报复，他利用法王腓力一世提出与原配王后荷兰的贝塔离婚案件，扬言要以通奸罪革除腓力一世的教籍，迫使法王不便公开对抗罗马教皇。

在英国，“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一世（1066—1087 年在位）的次子威廉二世（1087—1100 年在位）反对教皇乌尔班二世扩大教权的改革。他为了扩大王室的收入，曾先后没收了英国最富有的 11 座修道院和 3 个主教区的教产，其中之一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区。自 1089 年起，五年来一直未委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由神学家安瑟伦担任。安瑟伦坚持不承认克莱门特三世，而主张必须承认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权威。他主张既向英王行臣服礼，也要当乌尔班二世的仆人和封臣。1095 年 2 月在洛金罕会议上辩论了四天，由于英国教士承认乌尔班二世为教皇的越来越多，迫使英王威廉二世对于“除非国王赞同、教皇命令在英国无效”的主张，无法再坚持下去。

教皇乌尔班二世对西班牙人反抗阿拉伯征服者的“收复失地运动”曾给予积极的支持和赞助，使托勒多等城在基督徒手中长期坚守而未失陷。乌尔班二世利用南欧各地耽心德、法强国入侵的心理而使各地成为教皇臣民，在各地推进了克吕尼运动的发展。例如 1096 年乌尔班二世授予西西里伯爵罗吉尔一世（1031—1101 年）以教皇使节称号，使他得以控制西西里教会，罗吉尔一世死时，西西里已建成隶属于教皇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1095—1099 年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行教会改革活动的

全盛阶段。他开始把多年来教会改革、扩大教权的敕令、主张等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和充实，提出了更准确的概念并发布了多项敕令，使其为欧洲广大地区所接受和进一步巩固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权威性的依据。1095 年 3 月，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召开的大型宗教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改革法”，重申禁止圣职买卖和不准教士结婚的规定，此外又加上了教士不得向世俗官员宣誓效忠的内容。1099 年罗马的宗教会议对这个“改革法”加以确认。“改革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和条例，被以后中世纪著名的《革拉先教会法规歧异汇编》(1140 年以前编) 所采纳，成为 12 世纪教会法典中的一部分，在天主教会中沿用数百年。

教皇乌尔班二世生平中另一重大事件便是鼓吹和发动十字军东征。

发动“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最初的呼吁人和推动力是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七世(1067—1078 年在位)，他曾向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吁请帮助他们抵抗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因为 1071 年在曼奇克托战役中，塞尔柱·突厥人粉碎了拜占廷军队占据小亚后，付赴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施以暴行，拜占廷一再失利。格利哥里七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乃筹划了一个含有三重目的的战争，即十字军的东征。这样，一来可以从异教徒手中拯救耶路撒冷和圣地；二来可使东正教教会同拉丁教会重新联合起来，以便实现由罗马教皇的统一领导，十字军可

给教会带来许多利益；此外，教皇也感到发动对外的十字军远征是中止欧洲贵族、骑士之间私斗、内讧不断扩大的好措施，是有利于欧洲内部和平，提高教皇威望的有效办法。格利哥里七世以支援东方教胞的名义，于1074年着手组织十字军，甚至他还通知德皇亨利四世准备5万人马，指定能征惯战的将领统率，还通知法国贵族组织远征。教皇本人甚至公开表示亲自远征。后来由于主教授职权之争迅速扩大，这一计划受挫，未能实现。励精图治的教皇乌尔班二世继承了格利哥里七世的遗愿，复兴了十字军东征的运动。

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I，1081—1118年在位）虽比前几任皇帝较有魄力，但仍无力解决突厥人日益进逼首都的危机。他主动向乌尔班二世表示对长期以来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争端而感到内疚，要求罗马教皇以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的名义派兵拯救东方的基督徒。

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3月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接见了拜占廷皇帝的特使，答应给予援助。在这次会上，乌尔班二世还作了鼓动十字军远征的讲演。由于事前的酝酿和准备工作欠充分，这次会后十字军东征并未立即成行。

1095年夏、秋之际，乌尔班二世为了发动十字军东征，乃回到自己的本土——法国，进行广泛宣传和鼓动。西欧从970至1040年间约有48年是连续的荒年，而自1089至1095年的情况更坏。在法国更是连年灾荒和瘟疫，骑士的劫掠活动变本加厉，人民处境悲惨，社会十分动荡。乌尔班二世用好

几个月的时间到法国东部和南部向教会和封建主宣传、游说，筹组十字军远征。

1095年11月28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阿汾尔涅伯爵领地中的克勒芒城召开宗教大会。从各地来克勒芒的有成千骑士和教士以及无数平民。参加会议的有14位大主教、200多名主教，以及400多名修道院院长。克勒芒城里安顿不下这么多人，于是在克勒芒城周围搭起了许多营幕。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乌尔班二世在露天下发表了庄严的极其动人的重要演说。乌尔班二世公开发出了为解放"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而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圣战"号召。他在演说中讲道：

"上帝的众子们！……你们必须去援救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正迫切期望你们的援助，时刻在祈求你们啊！

波斯的突厥人已发动了进攻，侵入了罗曼尼亚境内，一直到达了号称"圣乔治的臂膀"[1]的地中海边境，占领着更多的基督教徒的土地。他们屠杀和俘虏了很多人，毁坏了许多教堂，正在上帝的国度中大肆蹂躏。……

我作为基督的使者，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和穷人都应迅速行动起来，将邪恶的突厥人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或海上，或者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顷刻间获得赦免。上帝已授权给我，让我把这个赎罪权力赐给一切参加的人。

---

① 指建有圣乔治教堂的赫勒斯滂

啊！假如一个卑贱的、退化的给魔鬼作奴隶的种族，竟能把信仰万能的上帝的人们征服了，那将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

让仇恨从你们中间消逝，让争吵终了，让战争停歇，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墓的征途吧！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吧！那个地方，如同《圣经》所说，是上帝曾经赐予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乳如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这座城，由于人类救主之诞生而驰名全世界，由于他在此地居住而变成美丽，由于他的受难而成为圣洁，由于他的死而得救赎，由于他的安葬而获光荣。

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到那一边有的则是欢乐和丰足……"

乌尔班二世的演讲，不时被听众的呼声所打断。群众高呼："天主的意旨如此！天主的意志就是这样！"乌尔班二世激昂慷慨、蛊惑人心的言辞，特别是故意编造出许多关于基督徒如何受塞尔柱人迫害的谎言，煽起了宗教仇恨。"夺回主的陵墓的号召，激起了各个阶层对远征的狂热情绪。会场上还有个异常动人的场面，当教皇的演说刚完时，法国土鲁斯伯爵雷蒙的使者当众出场，大声疾呼。年近六旬的老伯爵，不顾年迈，誓死听候教皇之命参加远征……使与会者的狂热达到顶峰。当时，人们东征的心情是：封建主利用远征企图获得新的土地和战利品；而成千上万贫困饥饿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则是为了免除债务、改善处境和想摆脱掉受奴役的枷锁。克勒芒大会规定的十字军东征的日期是 1096 年 8 月 15 日，但

是激动万分的人们，会后便在胸前或臂部佩上了红十字标记。人们一般都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两种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是“十字架反对新月”（伊斯兰教国家的旗帜上多半有“弯月”为标志）的战争；说十字军是为基督胜利而战，这是对过次侵略战争的美化之词。

大会之后，教皇乌尔班二世继续在西欧各地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他指示主教和神父们在其所辖地区内游说，命令修道院院长动员修道人员在田间、街市中演讲，并应随同十字军出征。乌尔班二世派出教士各地宣传说东方金银珠宝遍地，香料、丝织品和各类水果无处不有，……。他甚至号召说全能的上帝希望监狱中的罪犯，作伪证者和强盗们有好机会了。凡愿加入十字军东征者均可获得赦罪而释放。1096 年初春，法国北部和中部及德国莱因河地区的贫苦农民提前出发踏上了征途。继而几批斯堪的那维亚、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穷人，“赤手空拳的人群”和潦倒的无土地的“光蛋骑士”、亡命之徒们也纷纷向东方进发，从而揭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封建军事殖民远侵的序幕。

十字军的远征，加强了天主教阵营，扩大了罗马教廷的权势。1096 年乌尔班二世借助十字军力量进军罗马，最终清除了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的势力。乌尔班二世本来准备亲自出征东方，但是由于在罗马刚刚站稳脚跟，敌对教皇的残余势力还在顽抗，他本人不便远离，只得向各路十字军派出教皇的代表坐阵督战。

1098 年，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巴里城召开会议，他在会上为了使天主教会同东正教实现和好以及提高罗

马教廷的地位作出了努力。乌尔班二世在1096年曾授与西西里伯爵罗吉尔一世（1031—1101年）以教皇使节称号，使他全权控制西西里教会，促成西西里形成了封建统一集权制的政府。而罗吉尔二世（1095—1154年）时代西西里也与罗马教皇关系良好。如前所述，1099年罗马宗教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教会的新法规。乌尔班二世一面发动“十字军东征”，一面仍然长期致力于教会改革的克吕尼运动。乌尔班二世毕生为统一东西方教会作了长期努力，也曾引起拜占廷（东罗马）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的重视，但东方希腊教会态度很冷淡，因而乌尔班的希望只能是幻想而已。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经过激战攻陷耶路撒冷，十字军对该城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和大洗劫，充分暴露了“圣墓解放”者的真面目。7月19日乌尔班二世在罗马去世。

乌尔班二世出任教皇12年，只是在最后12年才空前活跃起来。他是一位十分能干的教皇，一生坚持扩大教权和教会改革的活动，是继承格利哥里七世事业的著名教皇，对天主教和教会的事业有其重大贡献；但他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侵略。它给东西方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乌尔班二世的耻辱和罪责是不容忽视的。

自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英诺森三世

历史上罗马教皇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极盛时代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英诺森三世的口号是："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英诺森三世是一位表面谦卑、虔诚的人，但他的城府极深、才干出众。他对扩张教权的雄心之大为其他教皇所望尘莫及。英诺森三世是教会史中最有权术、成就最大的教皇之一，也是13世纪初欧洲政治史上的中心人物。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出身于有德国血统的意大利罗马的贵族世家。原名塞尼·洛泰尔，又译为洛旦里（1160—1216年），父亲是特拉西蒙伯爵。洛旦里学生时代先在巴黎大学读神学，后在意大利波伦亚法学院读教会法。1185年回到罗马，在教廷供职。他的叔叔——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在1190年将洛旦里提升为枢机助祭。后来由于他的家族世仇塞勒斯廷三世任教皇（Celstine Ⅲ，1191—1198年在位）后，使他失势，乃闭门写作。他的著作《论人的贫苦条件》曾广为传播。此书在15—16世纪时曾再版过47次。1198年1月8日，教皇塞勒斯廷三世去世。2月，洛旦里任罗马教廷司铎，不久当选为教皇，法号称英诺森三世，时年38岁。英诺森三世在位18年，他把教皇权推到了教皇史中的

最高峰。

英诺森三世时代的形势和教权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在教会内，教皇大权独揽，完全按专制君主的观念行事。这个观念便是：主教的职责只是协助教皇管理教会，“他要求他们帮助他，分担他们的忧虑，使他肩负的巨大责任在下属的协助下，得以稍稍减轻”。教权臻于顶峰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争取和斗争才取得的。英诺森三世时期，在扩大教权和教皇威信诸方面之所以能比他的前任教皇所得到的成就都巨大，是同英诺森三世上台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欧洲封建制确立不久，自然经济处于完全统治地位。封建分裂割据状态下，英法等许多国家中央王权软弱无力，中世纪的城市经济还不够发达。天主教会是西欧各国最大的封建主。自法兰克王国以来，教会不但保有原来地产，还得到了向教会封赐或捐赠的土地。810 年，阿亨宗教会议依据财产的多寡，把教会和神职人员划分为三级，拥有 3000—8000 处领地的为第一级；有 1000—3000 处领地为第二级；不满 1000 处领地的为第三级。教会在西欧各国耕地中约占总数的 1/3，各地甚不平衡。9 世纪末，在阿尔萨斯 435 个村庄里，竟然有 399 个属于教会所有。教会利用得到的豁免特权对农民土地的霸占和兼并或招引“让地”等现象，甚为普遍。教会所属的庄园不仅生产谷物，还经营森林、牧场、磨坊以及海陆运输等活动。教会在每个天主教国

家内部都占有大量耕地，向教徒征收大什一税（粮食）、小什一税（蔬菜）和血什一税（牲畜）等，利用圣职买卖、收取诉讼费等各种名目，大肆聚敛。在封建土地经营上，教会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各地创设了许多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在造酒、开发盐井、煮盐销售上发了大财。修道院后来又发展了抵押、放款高利贷业；有的修道院甚至雇用当时最熟练的银钱兑换商和掮客——犹太人或伦巴德人，用以专门从事金融业。12世纪末，罗马教廷的年收入比西欧任何一国的国王年收入要高得多。

其次，罗马教廷和经过克吕尼改革运动后的天主教教会，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封建统治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各国各地的天主教会到12世纪末已经拥有人数众多的僧侣。这些教会甚至利用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制服封建君主，影响或操纵君王的废立，控制许多国家的法庭。教会的教条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均有法律效力。教会法成为欧洲一些国家通用的法典，许多主教直接充当法官，教会法庭甚至凌驾于国家法庭之上。因而罗马教廷称霸于西欧和中欧。“教皇至上”逐渐成为世俗界的主宰和教皇的封建专制权力的学说，从教皇格利哥里七世起到英诺森三世时最后定型。

再次，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天主教会利用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垄断教育，支配了意识形态领域，使哲学、科学、文学等，以及各种舆论机构都为神学服务。教会宣扬的是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来世主义。从教学内容的“七艺”科目，到教师的任用，都操之于教会之手。实际上是

唯罗马教皇之命是从。

最后，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的教权，还由于得到北部意大利威尼斯等城市商人的支持而加强。教皇向欧洲征收的各种赋税，包括英诺森三世创立的“十字军”税，通过北意设在外国的银行汇集于罗马。由于教皇的财政金融力量与北部意大利部分城市利益的暂时一致性，以及反对德皇的共同需要，所以英诺森三世提高教权的理论和活动，得到了这些城市的支持。再者，当教皇同世俗君主之间的斗争中，英诺森三世不仅得到了各国反对集权中央的世俗封建主的支持，也得到了一部分反王权的教会封建主的支持。这些都是教权在英诺森三世时之所以能达到顶峰的背景和条件。

“双剑说”和“太阳与月亮的理论”

学法律科班出身的英诺森三世上台以后，特别重视宣传“教皇权力至上”的理论，并为此理论制造法律根据。

英诺森三世把 12 世纪上半叶著名修士圣伯那（1090—1153 年）阐述的“双剑说”（即“两把刀”说）作了补充和发挥。

据《路加福音》第 22 章第 36 节中的记载，耶稣在被捕前打发门徒去传播福音时嘱咐说：“现在，形势不同了！有钱包或背囊的，都要带着，没有刀剑的去卖掉衣服也要配备！”而在第 38 节，门徒说：“老师，请看，我们有两把剑！”据教会法学家的解释，两把剑指宗教和政权，一把司拯救，一把司惩罚。并且还说这两种权力都统归耶稣亲自掌握。圣伯那

对“双剑”说的分析是：教皇不仅是彼得的继承人，而且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教皇直接继承了耶稣的“双剑”，即两种权力。所以，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力均属教皇。君主的世俗权力只有教皇的命令或授意下才能行使。教皇英诺森三世对圣伯那的“双剑”说，所加的重要补充是：教皇除了亲自掌握神权这把剑（刀）之外，还通过教皇对君王加冕的形式，暂时把政权这把剑（刀）交给君王去掌握。教皇对君主授职加冕，就是代表上帝授予君主一把剑的权力。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双剑”说的解释和宣传并不一致。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公开表示：“我们国王和皇帝的权力是通过诸侯的选举，由上帝亲自授予的，上帝通过基督的受难，使世界受两把必要的剑的统治”。12世纪末，一些代表城市贵族的法学家在同教皇斗争时，他们对“双剑”说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他们主张，神权和政权这两把剑都是上帝所创立，分别授予教皇和君主，所以教皇不比君主优越，废黜君主应经过贵族同意，根本无须教皇的审批。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这种论战的形势之下，乃提出“太阳和月亮的理论”与之相对抗。他提出：教皇虽在上帝之下，但他却在一切人之上。因为教皇是基督的代表，所以教皇操有两种权，即属灵和属世的君王与诸侯是从教皇那里得到的权力。即：“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借得了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了权力。”英诺森三世提出了和平与正义应当在地上掌权，这是适应民众心理的一句重要口号。

1209年，英诺森三世再次发布通谕，重申教皇的“无上神权”。他认为王公贵族选举皇帝的权利是教皇赋予的，所以

最后审定当选的皇帝是否合适，是否批准他，其权由教皇掌握。凡教皇不满意的皇帝人选，应另行选举；倘王公贵族拒绝另选，教皇可把皇位直接授予别人。因为君主之光是从教皇处借来的，故教皇有权主持帝王忏悔，甚至开除帝王教籍，公开解除臣民对帝王的拥戴。英诺森三世在行动上还设立了教皇钦使的总机关，由教皇直接管辖。他在位期间，利用各种手段曾迫使西欧一些世俗君主不得不俯首听命或以教皇附庸自称，使教皇权力达到空前绝后的登峰造极的阶段。

“驱德”运动与插手德国皇位之争

英诺森三世上台后不久，借助于意大利人民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心理，掀起了一个在意大利驱逐德国势力的运动。教皇的步骤是首先掌握对西西里的控制权，为达目的，不惜交战。

西西里原属诺曼人国王统治。1194年德皇亨利六世因他的妻室是诺曼王国的公主的关系，乃在西西里兼称国王。由于他的残酷统治，激起了西西里人民的反抗。亨利六世还无视教皇的领地主权，擅将教皇在意大利的安科纳、拉文那和罗马尼阿收交给其心腹管辖。英诺森三世上台前一年（1197年），德皇亨利六世前往西西里镇压人民暴动而身亡，这时德皇兼西西里王亨利六世之子腓特烈二世（1194—1250年）年仅十岁。德国境内皇位争夺激烈，亨利六世的遗孀偕子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躲避。是时诺曼人来重兵威胁，西西里人民要求维护独立自主，反外敌入侵。英诺森三世趁西西里王太

后、亨利六世的遗孀君斯坦丝请求教皇保护腓特烈二世王位之机，成为了西西里国王的冲龄监护人并对西西里行使摄政权。此举引起已故国王亨利六世心腹们之不满，举兵攻打西西里。教皇花费大量资财，组织军事力量打败对手，控制西西里并收回了拉文那、安科纳……等地区原属教皇领地的主权。

教皇还利用罗马教廷自制的地图，到处索要教皇的领地。当时罗马教廷内流行着各种教皇领土的地图，标明丕平、查理曼"赠送"过的"城池地域"，其实这些地图多半是前任教皇们托人随意绘制的，任意扩大"赠予"的范围。有些教权势力未及的，如托斯坎纳等，则采取欺骗手段，派专使前往，宣称该地自古便属教会领土。英诺森三世还趁德国在意领土的混乱状态，趁机占领了梅迪奇纳、阿尔杰拉塔、蒙泰韦利奥和马革尔达的全部领地。教皇甚至扩展到那不勒斯边境和乌姆伯利亚与亚平宁山之间的富庶地区。

教皇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趁德国争夺皇位之机，竭力扩大教权。1197 年德皇亨利六世逝世后，在德国围绕新德皇人选问题意见分歧。一派拥戴亨利六世之弟，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士瓦本公爵腓力，此派得法王腓力二世支持；另一派拥护敌对的韦尔夫家族的不伦瑞克公爵鄂图（得英王理查一世支持）。从 1197 至 1212 年德国内战多年，帝国混乱，教皇的对策不断变化。英诺森三世先派钦使去会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力，表示承认他称帝，但以必须归还德国占领的教皇领地为条件。腓力允诺后，钦使赦免了腓力曾率军侵占教皇领地之罪，为腓力加了冕。这时竞争的另一方，不伦瑞克公爵

鄂图自行加冕称德皇，双方开战。1208年腓力遭巴拉丁伯爵谋杀。1209年鄂图彻底战败腓力，并允诺教皇的一切条件。即：一、承认教皇对西西里的统治；二、不再操纵德国天主教会的选举；三、承认教皇拥有在意大利本土上不久前夺回的原属教皇领地等。英诺森三世于1209年10月在罗马为鄂图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鄂图四世。但加冕之后，鄂图四世立即食言，派兵侵占教皇领地及西西里。英诺森三世大怒，宣布绝罚鄂图，又唆使法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1180—1123年）向德皇发起进攻。1211年，在法王支持下，教皇伙同德国各地贵族、诸侯召开会议，废黜鄂图。1212年，教皇指定受自己监护的西西里国王，亨利六世幼子腓特烈二世为德皇。得到德国反鄂图分子的拥护。腓特烈二世除承诺教皇前述的条件外，还宣誓（一）不把西西里统一在帝国之内，即保持德国、西西里两个王位分离；（二）德国主教有权直接向罗马教皇申诉。这样一来，英诺森三世实现了插手德国皇位之争的原定目标，既保持了教皇对西西里的统治，又暂时控制了德皇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在位）。桀骜不驯的腓特烈二世后来又同几代教皇为敌，被教廷斥之为“反基督者和浪子”，那是后话了。

教皇同英国“无地王”约翰的较量

英诺森三世也成功地斗败了英国国王。1205年，当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职位出现空缺时，英王约翰（1199—1216年，因在法国无封土，故得绰号“无地王”）委立了他的

一个心腹好友德·格雷去充当，英诺森三世宣布无效。1207年教皇改派在教皇手下工作多年的英格兰神父史蒂芬·兰顿赴任。但英王约翰又拒绝接受，不准史蒂芬·兰顿入境，还下令没收大主教府的财产，驱逐英国的一些效忠教皇的或老弱的修士返回大陆，还没收听命教皇的修道院的财产。英国北部约克大主教杰弗里（约翰的异母兄弟）也同约翰闹翻，跑往大陆，英国南北两大教堂都不归天主教。教皇在愤怒之下，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英诺森三世于1208年3月下令停止英国的一切宗教活动。1209年10月，教皇又革除英王约翰的教籍，更甚者是责令"无地王"约翰应把英格兰献给上帝的代表——罗马教廷。英诺森三世一方面鼓动英国国内贵族造"无地王"约翰之反，另一方面又利用英法两国王室之间旧有的领土争执，唆使法王腓力二世在法境内，占领英国在罗亚尔河以北，包括诺曼底等属地，之后，又准备率军渡英吉利海峡，大举侵入英国本土。1212年他又宣布废黜约翰王位，形势紧急。本来"无地王"在英国就很不得人心，据史家记载，他卑鄙、无信、纵情淫乐、奢侈无度，是"历史上一切暴君中最凶狠的一个。"在内外重压夹击之下，英王约翰无奈，1213年4月只好接受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退回没收的教产，赔偿教会损失，最后甚至宣布把英国作为领地献给教皇，自己以教皇的附庸自称。他还每年向罗马教廷新交年贡700英镑，再加上教皇每年通过教会采邑从英国榨取的巨款，实际上三倍于英国国库日常的收入。1214年1月英王约翰与德皇鄂图四世联合向法王腓力二世发动的战争，英国不仅没能夺回13世纪初以来在法失去的领地，反而于7月27日在布汶决战中

遭惨败。英国在法的领地损失殆尽，佛兰德尔此后也置于法国控制之下。

1215年4—5月间，英国一些封建贵族和市民，因不满英王增加额外税收、没收附庸土地，特别是上一年布汶战役的惨败和对教皇的一再屈服，怨气沸腾，酝酿起义。矛盾的焦点集中到英王约翰的头上。英国贵族男爵们联合一部分神职人员、骑士、城市市民，共同反对英王，双方展开谈判。5月29日，英王约翰致函英诺森三世，约翰叙述了自己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之后，表态准备接受教皇的仲裁，并希望谈判时教皇作为“上级”参加。诸侯和骑士们于1215年6月15日拟出了典型封建法和习惯法相结合的《自由大宪章》(61条)，6月19日修订完毕，维护了城市的一些权利，英王被迫和25名男爵作为执行人在宪章上签字署印。教皇这次又站到了英王一边，6月18日发信命令开除所有跟英王捣乱者的教籍，7月7日的信更强硬，8月24日英诺森三世宣布《大宪章》是非法无效的，12月16日又把英国参与闹出“大宪章”的30名男爵，都开除出教会。教皇立场的向背、政策的变换，都服从于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目标，即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和巩固教权。

教权极盛时，英诺森三世一度成为欧洲霸主

尽管法王腓力二世在教皇同英王的斗争中为罗马教廷出了大力，在德国皇位之争中坚持同教皇合作，但英诺森三世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候，绝不手软，根本不念及旧情，照例

还是想方设法要制服腓力二世。法王要求离弃原配另行结婚的离婚案，始终没能得到教廷的批准。法王腓力二世乃与教廷对抗。英诺森借机召开宗教会议，不仅革除法王教籍，还将法国罚为禁区，即停止法国境内的神权，禁止法国神职人员从事“圣事”（即禁施洗、作弥撒、主持婚礼等宗教仪式）。这种处分，在中世纪时对天主教作为国教的法国来说，是特别严重的。这必然引起广大教徒对国王的不满，后果严重。法国的主教们纷纷逃到国外，封建主们趁机反戈国王。连法王身边的一些卫士也陆续逃离。腓力二世见情不妙，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不得不听命于英诺森三世，与自己废黜的王后英格堡复婚，而且公开承认了神权至上的理论。

此外，英诺森三世还软硬兼施，通过各种办法，使许多国家臣服自己。他先后把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波兰、丹麦、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都置于教皇的控制之下，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彼得也把自己的王国视为教皇的封地。甚至东方的亚美尼亚也承认是教皇的属地。这样一来，英诺森三世成了西欧、中欧的最高统治者。整个西欧、中欧，除了西班牙南部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外，都成为教皇的天下。当时有人根据英诺森三世一度成为欧洲霸主这一事实分析道：“教皇不是在继承圣彼得的衣钵，而是在承袭君士坦丁大帝的余威。”

英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儿童十字军”

在8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第四次）东

征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具体组织和发动的。

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过 8 次，具体时间如下：

1 次	1096- 1099 年建耶路撒冷王国（组各类骑士团）	5 次	1217 1221 年
2 次	1147—1149 年	6 次	1228—1229 年
3 次	1189 —1192 年	7 次	1248- 1254 年
4 次	1202-- 1204 年（建拉丁帝国）	8 次	1270 年

前三次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在“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口号下进行的。1198 年，英诺森三世一上台，便积极筹划、发动新的一次十字军远征，以便建立起对世界的神权统治。英诺森三世在 1198 年 9 月发出的通谕中号召所有信徒都要为“保卫圣地”的“神圣战争”而出征。教皇命令各国修道院和教会都要献出其财产和收入的 1/40，作为捐税支援东征。教皇本人表态愿献出自己财产的 1/10，甚至出资装备 1 只低层帆浆船，以便到东方去拯救“基督教兄弟”。最初东征的目标定为远征埃及，直捣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心脏。因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惨败后，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萨拉丁发动大反攻，经 1187 年的赫淀战役，将十字军主力 2 万多人全部歼灭，活捉了耶路撒冷国王，并恢复了耶路撒冷。后来英、法、德三国君主统率的第三次十字军也失败。名震西欧的反十字军英雄萨拉丁虽在 1193 年已逝，但埃及已成为教皇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英诺森三世又通谕给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三世，要他为十字军远征埃及提供人力、物力，要他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归并为罗马教廷的下属，并暗示，倘拒绝这些要求，西方可能对拜占廷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英诺森三世策划、组织下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参加者主要是法、德、意贵族，但实际起支配作用的却是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因为远征军要靠大量船只运至埃及。1201年初，十字军的6名使者向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罗商谈运兵条件时，威尼斯已着手策划将第四次十字军的矛头从埃及转向威尼斯的商业劲敌拜占廷了。因为当时威尼斯同埃及商贸关系密切，威尼斯向埃及输出大量木材、铁、武器及其他用品，年利百万以上，仅从埃及输入威尼斯奴隶一项亦获暴利。威尼斯总督丹多罗，决定运送十字军去东方的价格是每个人2马克，每匹马4马克，共需付85000马克运输费方可载运。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在1201年4月初，双方签订了协定，载明威尼斯运兵的各项条件。

1202年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汇集于威尼斯，运费只付上51000马克，还欠34000马克。原拟远征埃及，但威尼斯总督以十字军未交足兵员运输费为由，劝十字军先攻打威尼斯的商业劲敌萨拉城（今扎达尔，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以对该城所获战利品来补欠款，1202年11月萨拉城被攻陷，遭到洗劫。不久，十字军和威尼斯的执政者，趁拜占廷帝国发生内乱，被废皇帝及其太子亚历克修请求帮助复位的机会，于1203年4月向拜占廷进发。最后在1204年4月，十字军舰队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的基督战士在城中抢劫、杀人、破坏，并纵火三昼夜。佩十字军的基督徒竟狂热地牵骡子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搬运圣器、非凡的艺术珍品，稀有的宝物以及金银等劫到的财物。教皇英诺森三世对此“战绩”十分赞许。他评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乃是“上帝的

奇迹”，认为这是“对背叛罗马的东方教会的惩罚，”是“拜占廷人对天主教背叛的天谴”。教皇写信给十字军首领说：“我们希望能赖诸位的努力，使君士坦丁堡会恢复对教廷忠实的尊敬”。催促希腊教会服从罗马教会。

1204年5月9日，十字军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1261年)，英诺森三世在致拉丁帝国皇帝的信中道：“我们多么希望通过你的统治，使希腊帝国（东罗马帝国）臣属于教廷。”1205年英诺森三世派遣自己的使臣红衣主教本笃到拉丁帝国，责成他使希腊人相信天主教的优越性。拉丁帝国向教皇称臣纳贡，使东方教会处于教皇统治之下。

英诺森三世贪心极大。1207年10月还通谕“俄罗斯全体僧俗人民”，要求俄罗斯教会服从罗马，免蹈希腊人覆辙。

拉丁帝国于1261年灭亡。13世纪初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十字军的状况日益恶化。夺回耶路撒冷无任何希望。这时在欧洲流行一种说法，讲有罪的人是不能夺回“圣地”的，只有12岁以下童贞“无罪”的儿童，才可能解放耶路撒冷。于是成群的孩子开始在日耳曼、法兰西各地，特别是马赛集合起来。有些船王和黑心的商人自作主张，将儿童们运往巴勒斯坦。这些孩子的命运极惨，有2艘船在地中海撒丁岛的暴风浪中沉没；另5艘船抵达埃及，孩子们多数被卖作奴隶。在德国集中的2万儿童，南下于1212年8月抵达热内亚，又到罗马，当地主教和政府禁止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疲劳不堪的孩子们几乎都由于饥病死在回家的路途中。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是一次荒诞离奇、千古未闻的惨剧。教皇英诺森三

世对这样卑鄙龌龊的勾当并无谴责，仅仅是主张“儿童应延期到成年以后再履约出征”而已。数万儿童在宗教狂热下就这样白白送了死。

征讨阿尔比异端

英诺森三世除了组织十字军远征东正教外，还组织十字军进行征讨“异端”的战争。英诺森三世上台不久，便写信给欧洲的主教们称：“精神的刀剑已无济于事，必须使用真实的刀剑。”还对异端法庭的裁判官说：“得罪天主比得罪君王的罪更重。”他开创了用十字军征伐异端的先例。

自1054年基督教两派教会大分裂以后的500年中，在天主教会中，凡否认教皇权威的人，统统被冠以“异端”罪名。12世纪末，拜占廷的保罗派运动已衰落下去，保罗派信徒在巴尔干半岛一带活动时，有些人吸收了摩尼教的思想，形成为鲍格米勒—卡塔尔派（“卡塔尔”乃纯洁之意，故又称“纯洁派”）。这一派的教义思想和信仰，由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农民和来往于巴尔干及法国西南部土鲁斯地区的商人，带到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其中以土鲁斯的阿尔比城最为活跃，因此当时把信奉这一教派的信徒称之为“阿尔比派”。这一派的神学思想主要是反映了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反封建的要求，他们认为：天上有善、恶两神在交战，地上的一切均属恶魔。他们提出了打倒罗马教会的口号，阿尔比派还否定地狱、炼狱等教义，不信洗礼和弥撒的作用。12世纪末，在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势力已超过罗马教会。据1145年修道

士巡视的记载，当时土鲁斯地区“教堂里没有信众，信众没有神甫，神甫没有威信，教徒没有基督。教堂不再被认为神圣，圣事也不被认为神圣，节期无人遵守，儿童不受洗礼……”。总之，土鲁斯的大部分居民已改信阿尔比教。

1206 年英诺森三世利用法国北部贵族骑士的掠夺欲望，组成了讨伐南法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宣布凡参加讨伐异端的十字军成员可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他们过去和将来所犯的任何罪，皆能得到教会的赦免，所欠一切债务都可免付利息。在教皇直接指挥下，当十字军攻陷土鲁斯地区的比塞埃城时，由于当地阿尔比派信徒太多，难于在居民中辨清谁是“异端”。随军的教皇特使下令道：“统统杀光，让天主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当时一位十字军将领、锡托修道院院长在给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报告中写道：“比塞埃攻陷了。我们的人对城中居民不管其身份、年龄、性别，一律不饶，死于刀下的约 2 万人，大量敌人被杀，整个城市被烧，这是上帝惩罚的最好说明。”对阿尔比派的血腥讨伐，持续 4 年之久，大批阿尔比派被处火刑，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英诺森三世除了讨伐之外，还在 1209 年、1215 年两次下令查禁违犯正统教条的一切书籍。英诺森三世讨伐阿尔比派后，一向经济最富饶、繁华，文化最为发达的法国西南部土鲁斯地区受到了彻底的破坏和蹂躏。

强化教皇权能的全方位建设

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在天主教会史上被称为“黄金时

代”的根据之一便是：英诺森三世时教权达到顶峰，他的业绩和建树突出。英诺森三世曾被誉为：坐镇罗马的“上帝代办”中最卓越的人物；特出天赋的外交家；全才的不屈不挠的政治家；最熟谙神权政体理论的教皇……。他从教会内部强化教权的主要措施是：健全机构、增设修会、编纂敕令、镇压异端。

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健全了教皇国的机构。1207年，他在意大利维特尔博城召开会议，补充、完善了教皇国的政权体系。当时他规定在教皇国内的最高元首、神权政权的合一主宰者是教皇。最高权力机构是罗马教廷，以罗马城为教皇国的首都，以黄、白、绿三色旗为教皇国国旗。罗马教廷下设枢机主教署理日常事务，教廷中专设“教皇最高法庭”，审理国内各省上诉的案件。国内由各个省分治，各省省长由教皇从高级神职人员中挑选委任。俗人只能担任下属官职，或统率各省自己的军队。13世纪初时教皇国本身的军队，给养优厚，较有战斗力。各省省长每年需向教皇缴纳贡金，并宣誓效忠。基本体制与当时西欧封建的君臣封授制相仿。绝对专制与政教合一乃其特点。

为了提高教会威信、扩大传教和镇压异端，在英诺森三世时，由他亲自批准成立并支持了两个天主教修会——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

圣芳济会，又称方济各会，以该会创始人修道僧方济各（1182—1226年）命名，方济各又译为佛兰西斯，故亦称“佛兰西斯修会”。方济各乃意大利呢绒商之子，青年时放荡无度，后当骑士，战争中曾被俘，出家修道大悟，与友合组修会，手

托乞食钵，麻衣，赤足奔波各地以示与奢华神父有别。修士自称小兄弟。1210年获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并被派往法国南部助讨阿尔比派异端。

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派，系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神父多明我（1170—1221年）创立于法国图卢兹，反对异端，标榜赤贫，注重布道。1215年英诺森三世同意成立该会，亦参与镇压阿尔比派。此会以“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传信仰，培养道德”为宗旨。

上述两个修会是在广大人民痛恨教会奢侈腐化的情况下组织的，各有规章，对巩固教权起过作用。

英诺森三世重视教会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在位期间对所颁的敕令加以整理、编纂，经他本人审阅并批准的以《三编》之名正式印发。另有一些敕令收入《教会法大全》的第二部分及补编之中。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诺森三世为了确立和宣扬“教权至上”理论，1215年曾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第12届大公会议），到会有400名主教、800名修道院正副院长和托钵僧，还有各国教会首脑、君王及德皇的代表。这是中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会议，会上作出了“天主教会是举世唯一的教会”的重要决议。会议重申了教义信条、圣礼是神恩的渠道，修道生活更加严化，对主教选举及教士资格定出规则……等。特别是颁布了《教皇敕令》，重点是严惩异端。如第3条规定“已判处异端的分子，严加刑罚，没收其财产。如有世俗领主，不遵教会要求，应由大主教对其革除教籍，如该领主一年内不悔改补过，则由教皇宣布解除其侍臣誓约，将

其土地转赠其他众教徒……。凡参与镇压异端者享受十字军骑士相等的特权和赦罪规定……。”敕令第7条规定“对有异端活动的地区，要加强巡视，号召检举异端……”。这次会议加强了罗马教廷的集权地位，也是对镇压“异端”的一次全欧性的动员。

1216年，英诺森三世又在积极筹备新的十字军东征。但6月16日他在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贾突患暴病而亡，据说死于疟疾，享年仅56岁。

教权从“顶峰”跌落下来时的卜尼法八世

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最早的一位杰出代表——但丁，在他那部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神曲》中，曾描述过在“地狱”第八层（欺诈罪）的第三条沟内，烈火正从脚底烧起，向头倒栽在下面的谋杀犯，施以火刑。这个沟正在等待的那个人就是当时（1300年）高踞于教皇宝座还没死的卜尼法八世。如果不是被人们恨透了的话，活人怎会在地狱中早就留下必受酷刑的位置，何况这个人还是号称上帝在现世的代理人——教皇呢！

爬上教皇宝座时不光彩的一页

卜尼法八世（Bonifacius Ⅷ，1294—1303年在位）的世俗原名为本笃·凯达尼（约1235—1303年），他生于意大利中部罗马附近阿那尼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曾在意大利托蒂、斯保莱托读书，受过高等教育。青年时当过律师，1276年正式在罗马教廷担任教廷御前会议参议和教皇总书记官。1281年被提升为枢机主教。他在教廷的枢机主教团中，以擅长法学、外交和实务而超过其他同僚。他这个人俊美、好虚荣，精通异教古典，学识渊博，但却迷信符箓和魔术，虽然

有时沉溺于下等交游，但还不像当时敌对者们所宣扬的那样坏。他以教皇特使身份出使欧洲各国，1290—1291 年，他在巴黎调停过世俗君主争端，推迟了英法战争重新开战的日子，又使法国同阿拉贡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

1294 年 6 月，教皇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Ⅳ 1288—1292 年在位) 逝世后，本笃·凯达尼竞选教皇，但失败了。他没有竞争过他家族的世仇——罗马科伦纳家族，后者推出 85 岁高龄的莫罗内上台为教皇，称塞勒斯廷五世 (Celestine Ⅴ, 1294)。凯达尼心怀不满，趁塞勒斯廷五世对教廷事务无精力应付之际而发难，最后依靠西西里的安茹·查理的军事支持，逼迫塞勒斯廷五世辞职逊位，凯达尼于同年 12 月举行盛大典礼，自行篡位上台，取法号称为教皇卜尼法八世。因为当时法定任职终身的教皇，从来没有过未死便自己辞职一说，卜尼法八世便强迫塞勒斯廷五世补办了签署“主动”让位给卜尼法八世的“声明”。接着又把塞勒斯廷五世逮捕下狱，以防泄露内情。1296 年 5 月，年迈的老教皇惨死于狱中。卜尼法八世进而于 1297 年发兵征伐科伦纳贵族，摧毁该家族的据点帕莱斯特林纳城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革除其家族的教籍。卜尼法八世一时得逞，但他篡夺教皇位的丑恶和凶残的肮脏史，却遭到教会内外许多人士的唾骂，与科伦纳家族之间的仇恨更深，也为自己的日后种下了祸根。

教皇卜尼法八世上台时已是花甲之年。骄傲、粗暴、贪婪的卜尼法八世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固执得出奇，完全不能适应欧洲政治形势已发展变化的现实，仍死抱着“教权至上”的观念不放。他刚上台便自诩道：“我为教皇，我即

凯撒。”意思是：我既是教皇，又是皇帝。他经常身穿皇帝御服，以代替教皇法衣。他在教皇宫内终日沉醉在欧洲太上皇的美梦之中。他所憧憬的教权要比英诺森三世时还要大。他想要使人们知道：教皇是“上天派来的皇帝”，“凡是上帝能做的事，教皇就能办到。”

卜尼法八世加强教权的新举措

1295年，卜尼法八世为了使教廷重新控制西西里，他继续支持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为王位候选人，安排了1295年的和约，力图让阿拉贡的詹姆斯以西西里换取受封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并取消法国对阿拉贡的要求，结果并未成功。他对匈牙利、波兰以及托斯坎纳的政务，也都有过蛮横的干涉。

卜尼法八世还主持编纂了第六部“教会法”（又称《宗规法大全》），汇编了自1234年以来迄他任期之内，历任教皇所颁布的称为敕令、诏书、诰书及“回状”（通告）等等教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宗规法大全》的第三部分而流传下来。《宗规法大全》不仅制约教会内部的关系，而且规定了关于异教、妖术、婚姻、遗嘱，甚至有关契约等案件均归教会法庭管辖。实际上是让教会长期迫害异教徒。这部“教会法”（宗规法大全）是1917年以前最重要的一部教会法典。

早在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时，便有由教皇举行大赦的措施。卜尼法八世在教皇大赦和教会信徒悔罪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一种利用固定年份做为“大赦

年”的“赎罪”办法。教皇规定，所有基督徒只要在教会规定的“大赦年”——“圣年”中到罗马去朝圣，给教会的各种圣礼和仪式交纳一定款额之后，他的各种罪行将得到赦免。最初规定外地教徒本人到罗马后，在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祈祷15天（罗马本城内的教徒则须祈祷30天）。由于这项新举措给教会开辟了大宗新的财政收入，原来规定每100年举行一次“大赦年”（“圣年”）的祭典，后来改为50年，甚至又缩短为25年举行一次。而且又变通了办法，老弱病残无法亲往罗马者，只要交纳出相当于去罗马所需的全部费用，亦能同样得到神功。1300年，罗马教廷举办的首次“圣年”活动，是卜尼法八世成功显赫的表现。据说朝圣者们奉献的钱财甚多，工作人员一度忙不过来不得不用耙子来收集钱币。

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为“征税”案的争斗

13世纪后，法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级逐渐壮大，他们与国王结盟，共同为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扩大王权而斗争。法国一批法学家、平信徒的律师，援引罗马法，主张国王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反对罗马教皇的控制和压榨，他们提出了天主教会应服从世俗政权的管辖，教会财产应当纳税，减少神职人员的特权、凡神职人员的民事案件应由世俗法庭审理。法国国王延聘了这些法学家为王家顾问，成了法国上层实权人物。法国国王同专制神权的冲突在教皇卜尼法八世在位期间日益尖锐化。

1285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即位后，他依靠联姻和军事征服的办法，将法国境内的许多伯爵领地并归王室，他还从英国手中夺得了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和卢瓦尔河下游地区的安茹领地。英法之间矛盾加剧，英法战争（1293—1298年）持续进行。1295年，法王腓力四世因战争的巨额开支，不仅从法国圣殿骑士团借到一大笔钱款，还下令直接向本来享有免税特权的法国教会征税，法王腓力四世此举，引起卜尼法八世的强烈反对。卜尼法八世在1296年2月颁发了《教俗敕谕》，宣称，教会一向拥有至上权力，任何人未经教皇同意，无权向教职人员征税，凡违背此谕而向教会财产征税或交税者，一律受"绝罚"被革除教籍。但此时专制的法王已非昔比。由于法国的民族国家正在形成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市民阶级的支持，腓力四世又看到教权已走向下坡路，乃针锋相对地加以抗衡。

法王腓力四世在同年8月17日下令，严禁法国的金银财币出境、驱逐教皇派在法国的财政特派人员，这实际是断绝和限制了教皇在法国的财源。法王甚至不准教皇的使臣进入法境。9月20日，教皇又发布通谕，重申二月的《敕谕》。但腓力四世对教皇的谕令置之不理，反而派人四处活动，揭露教皇。卜尼法八世的政敌趁机传播教皇出卖神职，耍阴谋，迫使前任教皇塞勒斯廷五世退位又加以谋害等罪行，要求法王腓力四世召开宗教会议，研究和确定教皇新的继任人。这时，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与昔日已有所不同。英诺森三世时代，因不满于德皇对意大利的压榨，曾支持教皇反对德皇的斗争。而卜尼法八世时，因德国势力在意大利削弱后，意大利各工商

城市深感教廷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对教皇不满。再加上1297年7月罗马科伦纳贵族发生叛乱，卜尼法八世因内外交困，出于无奈不得不接受了法国主教们的请求，在7月31日发表了妥协声明，不再禁止法王向法国教会征税，而只是禁征“苛税”，教皇又把法王腓力四世的祖父——路易九世尊谥为天主教会“圣徒”，于是“征税”案的前哨战暂告平息。

“至一至圣”教谕和斗争的激化

卜尼法八世同腓力四世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维持了几年。1300年时，腓力四世支持逃亡到法国的意大利科伦纳家族进行反对教皇的活动，法王甚至企图接管教皇的世俗权力。而1300年，罗马教廷由于百年“大赦年”朝圣者的大批涌入罗马，使教皇处境好转，恢复了信心。卜尼法八世得悉腓力四世的图谋后，大发雷霆，派出法国南部巴米叶地区的主教伯尔纳·塞森特作为使节前往抗议。但1301年，法王将该使节斥为犯下叛国罪，加以软禁，并拟交法国世俗法庭审理。卜尼法八世闻讯后，在1301年12月4日、5日两天间连发三项谕令，谴责腓力四世“骄横跋扈”、“凌辱了教会的自由”，并且撤消了原来允许法王可向国内神职人员课税之权，还命令法国主教到罗马开会研讨法国教会的处境问题，甚至准备传讯法王腓力四世到罗马。法王大怒，他把教皇的谕令投入火中，并下令禁止法国主教前往罗马。这时，法国的一些大贵族以腓力四世名义拟定了一些敕令，指出：“愚蠢得出奇的僭位者——教皇”，应服从法王权威。又宣布无论是世俗的或宗

教的事务，法国决不听从任何外国人的摆布。与此同时，法国世俗政权广造舆论，宣称基督教会出现以前，高卢地区早已有王国存在，所以世俗政权应领导神权。

1302年5月10日，法王腓力四世在巴黎圣母院召开“总议会”——法国历史上首次三级会议。有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阶级的代表参加。会上把教皇攻击法王的一系列通谕展示给与会人员。接着，大法官以法王腓力四世的名义，引用大量圣经中有关的词句，论证王权早于教会神权，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王国的自由和独立，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付出身躯和一切财富。会上煽起了对抗教皇的民族情绪，贵族和市民的代表一致表态坚决支持国王。与会的一些高级教士也因教廷征税过重而对教皇不满，他们上书卜尼法八世，希他不要滥用神权。

被“神权至上”思想迷住了心窍的卜尼法八世，仍然一意孤行，他在11月18日发出了著名的“至一至圣”教谕。①因这个教谕（又称诏书）开头的第一句是“至一至圣”，故后人以此命名。此谕着重论证了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它之所以重要和著名，是把自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以来“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系统化和完整化了。教谕明确地提出了“两把刀”的理论。教谕中指出，基督把两把刀都授予了教会，一把刀由教会直接使用，另一把刀是世俗统治者要按照教会的意旨去使用。教会的权力凌驾于尘世权力之上。

---

① 又称《一圣通谕》、《神圣一体敕谕》，一圣（唯一神圣的）是指教会，这是该教谕的头两字，一般教皇的通谕并无标题，均以头一句命名。

教谕强调，君王和将领只有根据“教士的意图和得到教士的许可”才能使用世俗权力。谁要对抗教皇的权力，谁就是对抗天主。根据阿奎那的教皇永无谬误的观点，教谕最后称道：“每个受（天主）造的人，只有服从教皇才能得救”。这份教谕是中世纪关于教皇权力至上的最著名的诏书。法王腓力四世收到教谕后，十分气愤，立刻召集会议讨论，宣布卜尼法八世犯有异端罪和道德堕落罪，并取消教皇在英法之间充当法国仲裁人的资格，斗争更加激烈化。卜尼法八世派出法籍枢机主教勒穆瓦纳作为教皇钦使，赴法国向腓力四世当面抗议，准备对法王处以绝罚，并且还表示，如果法王接受由教皇行使对法国教区和采邑的管理权和教权至上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十二条件”，则可以免去对法王的绝罚处分。腓力四世断然逮捕罗马教皇的钦使并以叛国罪论处。腓力四世还决定，由他这个“世人”亲自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去审判“不被世人审判”的教皇卜尼法八世。

卜尼法八世受尽凌辱，郁闷而亡

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是一个非常倔傲的权欲狂，人们说他是一个“软硬不吃”的老迈、迂腐之极的怪人。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彼德拉克出生时（1304年）卜尼法八世业已逝世。对卜尼法八世，彼德拉克曾评述道：“他是一个具有铁石心肠的教皇，武力摧毁不了他，顺从和奉承也难使他心软”。

法王腓力四世在1303年6月于卢浮宫举行秘密会议，会

上对卜尼法八世进行了广泛的指控，共累计出他的异端、渎圣、诡骗、欺诈、暴虐、出卖教职、杀死前任教皇、甚至奸淫、鸡奸、腐化等共29条罪状，并决定要公审背叛上帝的卜尼法八世。会上派遣了以法国的副首相、法学家威廉·诺加雷为首的使团去意大利，还联合同卜尼法有世仇的科伦纳家族共同对付教皇，传讯卜尼法八世，抢先下手。1303年9月，他们闯入意大利南部小城镇阿南尼的教皇夏宫住地。这时的卜尼法八世正在这里召集枢机主教秘密会议，筹划对腓力四世的报复措施。9月7日这一天，教皇正躺在床上，忽然闯进科伦纳贵族家的一批打手、暴徒，这批闯宫者把卜尼法八世痛殴一顿，百般污辱，接着又把他囚禁到科伦纳家族的卡达尼宫，逼他辞职，不给饮食，不断戏弄。气得卜尼法八世伸出脖子、拍着脑袋哭吼道："这是我的头，这是我的脖子，你们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但不要这样折磨我啊！我是教皇，死也要死像一个教皇。"不料第三天，当地教徒就把教皇救出来，并送回罗马。从此以后，卜尼法八世和从前判若两人，终日住在宫内，闭门不出，忧闷交加，人也呆傻了，一个月左右就死去。

当时有人评论卜尼法八世道："他爬上教皇宝座时像只狐狸，统治时像头狮子，最后死时像一条死狗"。这其实是对卜尼法八世一生的真实又微妙的写照。

教皇卜尼法八世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斗争的失败，是中世纪罗马教廷从盛至衰的标志，它同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前往卡诺沙向格利哥里七世请罪，恰好是鲜明的对照。卜尼法八世时代是教权从"顶峰"下跌的转折点。

克莱门特五世与“阿维农之囚”

卜尼法八世死后，意大利人的枢机主教博卡西尼(1240—1304年)在1303年底接任罗马教皇，是为本笃十一世(Benedict Ⅺ，1303—1304年在位)。他在位期间罗马形势混乱，乃逃到佩鲁贾。他任教皇的时间仅九个月，在翌年7月7日便病死，传说是死于中毒。他在位时主要致力于缓解关系，处理原教皇卜尼法八世同法王及科伦纳家族之间的矛盾和遗留问题。他一方面颁布教谕、谴责在阿南尼城凌辱卜尼法八世事件的主犯；另一方面又陆续取消了原教皇针对腓力四世的各种谕令。本笃十一世死后，在枢机主教当中赞成和反对卜尼法八世的人数几乎各半，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秘密会议之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插手，在里昂会议中选出了法籍波尔多的大主教伯特朗·德·戈特为教皇，他即位后的法号是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Ⅴ，1305—1314年在位)。

罗马教廷倒向法国和发动十字军

克莱门特五世是靠法王腓力四世之助才登上教皇宗座的。他的个性是：对上懦弱、屈顺，对法王言听计从；而对下却冷酷、暴戾，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他入主罗马教廷后，

首先在教皇宫中增添了三名法籍主教，在枢机主教中增加了九名法国人，其中有五名竟是他自己的亲属。克莱门特五世即位前原来属于折衷的候选人，他同法王腓力四世的关系并不密切，但由于法王的胁迫和他即位后力图取悦于法王，他宣布卜尼法八世颁布的在法国停止圣事的命令作废，他全部撤消了教廷谴责指控法王的历次通谕和绝罚令，并从教廷史籍中全部剔除。还同意法王对法国教会领地和教产征收"什一税"(即教会领地税收的10%献给法王)。克莱门特五世修改了"至一至圣"教谕，他在1311年颁布《荣耀君王》通谕，承认世俗王国是上帝直接设立的，法国如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一样，乃是上帝选民。教皇自动把法国教会置于王权之下，公开声明"两把刀"的说法是错误的。甚至更突出的是，他声称腓力四世派使团指使贵族打手殴辱卜尼法八世是为了"拯救教会的崇高目的"。这样一来，完全抛弃了"教权至上"方针。

1304—1307年意大利北部味瑟利主教区爆发了以"使徒兄弟"教派多里奇诺及其女友玛格丽特领导的农民和平民起义，这是14、15世纪欧洲一系列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驱。这次起义揭露封建制和天主教教会的弊端，他们提倡平等、财产公有，号召通过暴力斗争，建立基督教的共和国。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于1305年，组织封建主十字军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迫使多里奇诺和他的6000名武装信徒不得不退守山林，抵御封建主军队的围剿。1306年，起义军以味瑟利和诺瓦拉山两地交界的采别洛山为根据地，击败了味瑟利主教区的军队，结果引起封建反动势力（当地的

教会、世俗封建主及萨伏衣公爵等）在罗马教皇领导下更广泛的联合。1307年3月，起义军在斯塔维洛乡村里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失败。起义者们被浸入到血海里，当着多里奇诺的面，教皇的代表宣布将玛格丽特活活烧死，随后多里奇诺本人也被残酷折磨致死。

解散圣殿骑士团

法王腓力四世为镇压佛兰德尔人民起义，对英国长期作战，开支巨大，欠下圣殿骑士团巨额债务；骑士团趁机要求政治特权，以致矛盾加剧。腓力四世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密谋后，于1307年以圣殿骑士团传播异端、道德败坏为由，于1307年决定取缔圣殿骑士团。

当时，圣殿骑士团的情况如何呢？圣殿骑士团（又译神庙骑士团。最初原名为“基督贫穷骑士团”，因开头是由法国的几名破落骑士发起组成的，故名。）它是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后，为了保卫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和朝圣者，于1118年（又一说为1119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宗教性封建军事组织。因其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中，故名为圣殿骑士团。这个军事封建修会主要由法国骑士组成，他们的最初目的是担任从地中海岸到耶路撒冷危险的通路上的保卫者，成员着白袍，佩红十字，1128年获罗马教皇批准。由于从事抢掠，得到帝王贵族的捐赠及从教皇处享有固定特权，以致财富和权势大增。他们在东方和西欧拥有大量地产，在西欧兼事高利贷和银钱业。1291年，十字军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圣殿骑士

团的武士们都放弃军事，而将主要精力转入商业交易和世界经济之中。他们在巴黎的圣殿，不久变成国际的钱币中心，他们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势力甚大，引起了国王和其它修会的嫉妒。法王腓力四世竭力煽起对圣殿骑士团的攻击。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亚奎·迪·摩莱曾挺身出面抗辩，他坚决否认该团犯有不信仰上帝和不道德之罪。

法王腓力四世于 1307 年 12 月，把圣殿骑士团的许多骨干人员逮捕，并交送法国异端审判官审理，骑士团的财产陆续由法王和教皇所瓜分。在法王腓力四世的直接干预下，教皇于 1311—1312 年在法国维恩举行宗教会议（第 15 次公会议），主要是研讨镇压圣殿骑士团问题。最后，克莱门特五世按照腓力四世的旨意，在 1312 年的维恩宗教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撤消圣殿骑士团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决定，其财产被没收或转归医院骑士团掌握。这是一种不孚众望的举措，曾激起人们对教皇的广泛不满。不久，圣殿骑士团的原团长摩莱及 60 余名主要骨干均被处以火刑，许多一般成员则被终身监禁或被处酷刑。

克莱门特五世的国内外措施和教权衰落

克莱门特五世任教皇几年之后，他深感罗马教廷之内派系纷争十分激烈。反法的势力盘根错节，抵制他推行的依附法王的政策。在腓力四世的胁迫下，为了避开教廷内对教皇新举措的干预，克莱门特五世于 1309 年将罗马教廷搬迁到意

大利北部罗纳河边、靠近法国的阿维农小城镇。[1]这里当时系意大利领土边境的普罗旺斯省，乃教皇属下的土地。从此，在阿维农设立了教皇的新首都。历届教皇以此小城为中枢约达70年之久。当时的人们想到犹太人之被流放于巴比伦，因而用了“教会之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名词。此后教皇多屈从于法王的意旨。从他算起，接连七个教皇都是法国人，（中间另有一个敌对并存的教皇是意大利人），因而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教皇是法国国王的“阿维农之囚”（1309—1378年）。“阿维农之囚”是教权衰落的明显标志。

克莱门特五世任教皇期间，编订了一部正式的教会法规集，或称“教会法典”。六百多年来至今仍为天主教会所采用。有趣的是，克莱门特五世逝世时，恰好这部法典刚刚编成，由他的后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17年正式颁行。这部权威性巨著是把历届主教公会议和历次宗教会议的决议、信条及历代教皇颁布的教谕、法令等全部收载入其中，是从最早尼西亚公会议以来教会史上重大成果的汇编、是一部包括教会生活诸领域的教会法全书，是对卜尼法八世于1298年刊行的《宗规法大全》的增补。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措施。[2]

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重视学校教育。他把佩鲁贾学校升格为大学。他重视教会同东方国家的交往，支持把巴黎、牛津

① 又译阿维尼翁，原属那不勒斯王所辖，罗马教廷于1348年将它买下，成为教皇属下的一块飞地。今归法国管辖。

② 自克莱门特五世之后至20世纪以来，汇编教会法规的工作，并未停顿。1904年教皇庇护十世委任专门委员会负责编纂精简教会法规，1917年5月，教皇本笃十四世（1914—1922年在位）颁布了《天主教会法典》（共五卷，包括2414部法规）。

及意大利的波伦亚、西班牙的萨拉曼加等大学开设亚洲国家的语言课程。传教活动显著扩大到远东。他任教皇期间，正式委任约翰·孟德高维诺为派往中国的第一任大主教，另外还有副主教九人，他们在中国传播了天主教。他的任期内，在东方共建圣芳济会僧舍达50所之多。

克莱门特五世在任期间，还支持过德国卢森堡家族、特里尔大主教的兄弟亨利七世（1269—1313年），使他在1308年当选为德国国王。亨利七世亲法国，在教皇怂恿下曾出征意大利，并于1312年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克莱门特五世一度宣称过，王位空缺时，教皇有权实行统治，据此可以证明他之听命于王权是不甘心的。

历史学家们对克莱门特五世的评价不一。有人讲他十分无能；也有人讲他的内外措施还有所建树，当然这也是事实。但不少史书却忽略了这位教皇的贪婪和腐败。他是一位搜刮钱财的能手。据载，1314年他死时，私人遗产竟达到80.4万金币之多，令人十分震惊。下面引用14世纪初两名忠于教皇的主教迈尔和杜朗向克莱门特五世呼请教会应当改革的直接上书中的几段，足以窥见当时教会的端倪。他们在上书中写道："教会动辄以革除教籍惩罚教徒，以致一个小小的牧区内，被革除教籍的竟多达六、七百人。许多被委派的神父，不学无术，不了解当地情况，甚至不会讲当地话；有的神父并不参加弥撒，一味寻欢作乐。酗酒、贪吃、聚赌、纳妾成风。教区法庭贪赃受贿。要在教会里找一个守教规的神父，就像在荆棘丛中寻找百合花那么难。一个人可以在五个教堂中兼职，享受十几份教产收人。修道院无人过问，修道僧穿行市井，追

名逐利……。迈尔主教警告道：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如不从上到下彻底改革，教会就将崩溃；杜朗主教则说：教会不彻底改革，基督教将在地上消失掉。在书信中的这些片断，证实“阿维农之囚”时期的教会是明显地衰落、腐败了。

制定出"赦罪价目表"的本笃十二世

罗马教廷迁往法国南部阿维农后，在"阿维农之囚"(1308—1378年)期间，教权急剧衰落，罗马教廷更加腐朽堕落。在法国国王操纵控制下的罗马教廷，继法国人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之后，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克莱门特六世（1342—1352年在位)、英诺森六世（1352—1362年在位)、乌尔班五世(1362—1370年在位)、格利哥里十一世（1370—1378年在位）等六人都是法国人。他们基本上成为法王的附庸。在这段时间里，罗马教廷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生活糜烂、荒淫无度。

教廷腐朽生活面面观

从阿维农罗马教廷遗留下来的帐簿看，教廷63.7%的支出用于镇压人民起义和异端运动，以及对意大利封建主的战争；另外的36.3%是维持教廷神职人员生活。这两个主要数字说明了阿维农教廷的主要开支。阿维农的历任教皇多半是作两件事：一面镇压人民，鼓动封建战争；另一面却过着特权的寄生生活。有的教皇蓄意开展教会改革，努力兴办文教

事业，但由于整个教权开始衰落，积重难返，因而力不从心，无力扭转大局。

仅从教廷开支的百分比例数字，还不能深入了解内情，必须着眼于一些具体情节和数字。阿维农的教皇们，为了追求排场和享乐，他们耗巨资建造了与西欧帝王宫殿相媲美的教皇宫。在教皇宫殿里，使用了金桌、银桌、象牙桌，而且墙上也用金银镶嵌作装饰。宫内仅侍奉教皇个人生活的奴仆就有 300—400 人之多。当时罗马教廷雇用的粗工，每人每年的工资约为 20—30 个金币，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登位的宴会便化费了 15000 金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每年仅衣装费用一项便由 3100 金币增到后来的 12500 金币。约翰二十二世的御厨，每天宰一头牛，每月宰 20—40 头羊，每月要 200—400 只鸡，6000 多个鸡蛋。仅管理酒窖和供应各种新鲜果品的专职神父就有 4 人。他在位期间，仅马厩费用便达 13931 金币之多。

教皇奢侈的程度十分惊人。为教皇采购各种皮货、丝绸、呢绒等各种衣料及珠宝，和名贵酒类的商人要跑遍全欧。教皇对他所宠幸的亲信、教士、亲朋以及情妇等，不时赠以珠宝、名贵衣着，甚至赠送金制玫瑰花。教皇进膳时，掌握教皇饮食的总管必须恭侍在侧，每上一酒一菜，都要由总管当面先尝，验明无人放毒后，才能由教皇进食。

阿维农从 14 世纪起，已成为天主教会的一面缩影，它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剥削机构。当时在教廷中工作的一个西班牙官员曾追述道："任何时候我进入教廷神职人员的房间，总看到神父和金银商在一起，忙于鉴别钱币成色和计算数目，面

前堆着成堆的钱币。”这时教会中还有一个普遍现象，便是神父们的娶妻纳妾，教皇和神父往往是私生子众多。并且教皇和主教有权“施恩”宣布不算私生子。如教皇本笃十二世亲自为大批私生子“施恩”。在1535年2月20日至5月29日期间，他曾对207个私生子“施恩”，其中有148人是神父的私生子。教皇英诺森六世本人就承认他有7个私生子。教皇们的私生子多数身居要职，有的在教会中任职，有的成为官宦。为掩人耳目，教皇同他们常以“叔侄”或“秘书”相称。在阿维农，买卖神职成风，钻营神职的人员经常有10万人左右。他们往往是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子弟。这些人对拉丁文一个大字不识，或不懂教义为何物，然而一旦买到神职，就享有了教产和俸禄。但不少人却不真正到职，仅挂名而不到教会的教堂和修道院干事，有时委派或雇佣一些副神父去替他办理或应付教务。到处都有不在职的“假神父”，他们只知无限地搜刮、纳贿，尽情挥霍，巧立各种名目勒索信徒。这种现象甚为普遍，据记载，在1294—1352年之间，在莱因河地区约有100个教区长期并无常驻的神职人员，有的教区无神职人员甚至为期达10年之久。

阿维农的历任教皇除了靠出卖圣职，攫取大宗财富供他们挥霍外，还不断出卖教皇宫中的“圣物”和用品：如金银器皿、“圣物”纪念品，甚至地毯，祭台上的各种装饰物，也一一卖出或抵押给高利贷者。有些教会高价出卖基督诞生在上面的草褥子（这种“草褥子”不止一条，而且经过约1400年毫无任何磨损；更荒唐的还有贩卖天使翅膀上的“羽毛”。总之，古怪离奇之极。不少教皇和红衣主教都欠下大量债务。

教皇在位时经常是一上台便想方设法，巧立各种名目，大肆搜刮。

“赎罪券”和“赦罪价目表”

本笃十二世系法国人，原名富尼埃（？—1342年），任教皇后，法号为本笃（又译为本尼狄克）十二世。他公开号召整顿教会、严肃规章制度，而且明令采取一些措施。但由于本笃十二自身贪欲过大，言行不一，因而不仅未能革除积弊，教廷和教会中的腐败反而更为变本加厉。下表便是具体例证之一。

阿维农几任教皇搜刮财富情况简表

教皇名称	在位时间（及年限）	搜刮金额
克莱门特五世	1305—1314年（9年）	81.4万金币
约翰二十二世	1316—1334年（18年）	450万金币
克莱门特六世	1342—1352年（10年）	200万金币
本笃十二世	1334—1342年（8年）	120万金币

从上表可知，本笃十二世在位八年，比起克莱门特五世在位时间短，而搜刮到的金额却远比克莱门特五世为多。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当时世俗君主的压榨收入。

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本笃十二世时，继约翰二十二世后，再

次发行大量赎罪券，用天主的名义对犯了各种罪行的人定出出钱购券免罪的价格。以便根据出钱的多少，赦免其不同的罪过。

本笃十二世时“赦罪价目表”

罪　　名	赦免价（金币）
杀　　人	8
谋杀双亲或兄弟姐妹	6
在教堂犯奸污罪	6
伪造文书	7
……	

“赎罪券”为何物？人为何要祈求赦罪、花钱去赎罪呢？按天主教的教义说法，人生来有罪，因为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所以他们的后代便生而有罪，是谓“原罪”。再者，人长大的过程中或成人以后，也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天主教诫而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大自杀人放火，小至骄傲、嫉妒（这本来构不上是罪）等等。天主教主张，耶稣基督功德无量，圣母玛利亚及其他圣徒都积有许多“善功”，除赎去他们自身的各种“罪过”外，还有很多剩余，积累后便成为教会的“功库”，信徒可免罚，从教会的功库中抽取一定功德以偿罪债。自14世纪以后，免罚的办法逐渐兴起以出售赎罪券的方法实行。教皇们为了搜刮钱财，乃大量印制各种票值的赎罪券，同其它类似的有价证券相仿，以供罗马教廷奢侈挥霍。

按罗马教廷的统治，“赎罪券”是万能的。只要购了它，便可以赎下自己的罪或亲朋的“罪”。甚至荒谬到不论罪孽大小，只要将购买赎罪券的钱币一投入到贩卖者（教士）的箱中，这个罪人的灵魂就会比刚出生时还要纯洁。不仅从前和现在的罪，可以用钱买券赎，而且还可以预买免除将来罪恶的赎罪券。

宣传“赎罪券”的“功能”和大量印制“赎罪券”、到处推销这种“券”，成为教皇本笃十二世时的时髦事。

本笃十二世在位期间，还有过下述事迹：

他不同意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关于蒙福者只有等待末日审判后才能见到上帝的观点，他在1336年曾发布教皇谕令道：蒙福“称义”之人死后，他的灵魂能立即进入天堂见到天主。这种主张日后成为天主教会的正统教义。

本笃十二世在位期间正是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前夜和大战的第一阶段，本笃曾试图劝解双方和缓关系，避免开战而未果，他的下一任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调停斡旋，却一度奏效，使战火停顿过几年。

在本笃十二世任教皇期间，曾与中国元朝有过关系。元顺帝在1336年曾挑选到达中国的欧洲人充任使节派往罗马教廷。本笃十二世隆重地接待了元朝的使节，并委任意大利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为教廷特使，率团回访中国。马黎诺里于1338年末出发，经由欧亚大草原，陆行到中国。教皇使团于1342年抵达中国上都，在献给元顺帝的礼物中，有一匹骏马，马身全黑，而后二蹄为白色。元廷命朝臣画图赋诗，称教皇本笃十二世的礼物为“天马”，引为盛事。

镇压胡司运动而名噪的马丁五世

"主嘱咐我们决不惧怕，
那些生灵的死敌，
主更嘱咐我们，
要为四邻的友爱肝脑涂地。
不要惧怕你们的敌人，
也不要把他们的众多放在眼里，
记住你自己的主，
为着主战斗，和主站在一起，
在敌人面前决不退避！
……
冲啊！向他们进击，进击！
基督教补偿你们的损失，
他将赐给你们百倍的东西，
无论是谁为他捐躯，
都会得到永恒的生命；
为真理而死的人将得到祝祈。
来自骑士的弓箭手、枪骑兵啊，
来自老百姓的长矛手、使用连枷武器的战士，
你们要把慷慨的上帝记在心里。

捷克人早就说过，
他们的格言说出真谛，
有至善的上帝为主，
我们能纵马驰骋万里。”

——摘自塔波尔派战歌

捷克人民宗教改革领袖和民族英雄约翰·胡司在1415年被烧死之后，捷克人民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塔波尔为主力的胡司战争（1419—1434年），并打退了十字军的五次讨伐。胡司革命军曾高唱塔波尔派战歌威震东欧。教皇马丁五世生前是四次十字军镇压活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对马丁五世的评述，应当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谈起。

君士坦斯宗教会议

罗马教廷和德皇为了镇压捷克的异端和欧洲日益高涨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为了转变西方教会多年大分裂的局面，于1414年11月在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君士坦斯城（又译康斯坦茨）召开了宗教大会（第16次公普世会议）。这次大会的参加者除德皇西吉斯孟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外，还有29位红衣主教、33位大主教、约150名主教、100多名修道院院长和300来名大学的神学、法学教授、国王代表等，总共约600人，规模十分宏大。可以说是15世纪初欧洲反对宗教改革势力的大汇合，会议断续开到1418年4月才结束。大会由德皇西吉斯孟（1368—1437年）主持，他强调这次会议“乃凭圣灵所合法召开之普世教会会议，它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它

的决议‘神圣不可侵犯’，不问职位高下，连皇帝、教皇，均应一律服从。”这次宗教会议指令胡司到会受审，皇帝保证胡司人身安全，可以自由返回祖国。然而胡司到达君士坦斯不久便被逮捕，会议根本不准胡司申诉，德皇背弃诺言，主张严惩胡司。1415 年 7 月 6 日，胡司被火焚于君士坦斯城郊，统治者对胡司既恨又怕，把胡司的尸灰投入莱因河，把火刑柱下的泥土挖出运走。

君士坦斯宗教会议召开时，同时并存着三个互不相让的敌对教皇，即：本笃十三世（1394—1423 年在位）、格利哥里十二世（1406—1415 年在位）和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5 年在位）。因这次会议受德皇西吉斯孟的直接操纵，经过争执后，于 1415 年 5 月 29 日，通过决议废黜了得到法国和意大利支持的约翰二十三世，7 月 4 日，让格利哥里十二世退位，规定本笃十三世也退位。但遭本笃十三世拒绝，直到 1417 年 7 月 26 日他被废黜。最后经过枢机主教们与各国推出的六名代表的选举，于 1417 年 11 月，选出意大利教士奥托・科隆纳（1368—1431）一人为统一的新教皇，称马丁五世（Martin V，1417—1431 年在位）。这样一来，从 1378 年以来西欧教会大分裂和三个教廷鼎立对峙的局面基本结束。马丁五世分别同各国君主订立了一些协议，作了某些让步，会议便草草结束。

马丁五世的外交活动

君士坦斯会议表明宗教会议权力高于教皇，这时教皇的

地位已退回到11世纪以前的状况，处于由世俗君主操纵的宗教会议权力之下。马丁五世是由宗教会议选出的，他一方面赞同这次会议的结果，废黜了比萨、罗马和阿维农的三个教皇，由自己出面为统一教皇，但另一方面对许多决议却是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态度。根据会议的决定，新教皇不得不答应每五年要召开一次这类宗教会议。

马丁五世反对并谴责了当时流行的“宗教会议至上论”，他一上台便公开宣布，凡属教义问题和罗马教廷内部的事宜，唯教皇的决定是从。关于罗马教廷的组织，马丁五世在1418年规定枢机主教的人数定额为24名，以前，枢机主教的人数是不固定的。

马丁五世向君士坦斯宗教会议提出的有些建议，如凡属教会领地一律由教会管理等，没有遇到异议；但是他整饬教会弊端的许多设想却是碰壁的。因为这次会议成员中多股利害关系冲突的势力，互相妒忌无法协调一致，枢机主教们反对会使他们本身收入减少的任何改革。意大利愿意维持现状，英法正处于百年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不愿联合行动。会议中有关教会改革性的问题讨论不下去，只好暂行搁置留待五年后的下次“会议”或请教皇与“各国代表再行协商”而了事。虽然不少代表讨价还价地争议过一阵子，但关于圣职授任、捐款和教会行政改革等原定议程，都是不了了之的局面。

马丁五世为了扩大教皇威信和教廷影响，曾广泛开展了活动。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灵活的外交活动。

马丁五世上台时，正是阿金库尔战役之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率军大举入侵法国，法国处境危险，英法百年战争在

法境内战斗激烈。马丁五世热心调解过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

马丁五世为维护意大利的和平，避免战乱，做了大量工作。他正确解决了布拉西奥的问题。布拉西奥本是意大利的军人，马丁五世为了安抚他，于1420年任命他为意大利中部教皇领地佩鲁贾和翁布里亚教区的主教。布拉西奥拥兵夺取南意。经1424年阿奎战役，打败了布拉西奥的叛军，战事没有扩大。

马丁五世为自己的科隆纳家族在意大利增加了大量领地，扩大了教皇辖区的庄园。他还加强了罗马城的对外交流，使罗马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马丁五世和德皇勾结镇压胡司运动

马丁五世在位期间最大的活动是与德皇西吉斯孟一道组织十字军残酷镇压胡司运动。

马丁五世登上教皇宗座之后的第一项行动便是立即同意君士坦斯宗教会议中所作出的英国的威克里夫和捷克的胡司都是异端，必须坚决镇压的决议。他下令凡是胡司派的神职人员均应逐出教会。1418年马丁五世颁布了历数胡司罪行，专门反对胡司派的敕令。

自1419年7月22日，塔波尔派集会和农民战争正式爆发起，捷克民族反对德皇、反对德国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逐步走向高潮。1420年1月至4月，德皇西吉斯孟在伏罗茨拉夫召开了帝国会议研讨策略。3月，罗马教皇咒骂异教徒和组织“十字军”，征讨捷克的敕令当众宣

读后，德皇要求德国封建主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并开始征募十字军。

从1420--1431年，教皇和德皇陆续发动了五次镇压胡司运动的十字军远征。第五次是马丁五世死后，由教皇尤金四世组织发动的，五次十字军远征全部遭到失败。

五次十字军镇压胡司运动概况的简表

次	时　间(约)	胡司战争的领导人和主要地区(或战役)	备　注 (十字军的统帅)
1	1420年4月—1420年7月	领袖：约翰·杰式卡 古登堡。布拉格附近。"维特科夫山战役"。	德皇西吉斯孟统率约10万封建主军队参加镇压。(大部分乃德国人)
2	1421年9月—1422年1月	领袖：约翰·杰式卡 雅切堡。古登堡等地。	最初以德国五大选侯为主，还有英国、西班牙的亚拉冈等地骑士参加。后来由雇佣军意大利统帅奥索拉率领德军。以德、匈封建主为主力。
3	1422年8月—1422年11月	领袖：约翰·杰式卡 塔霍夫。查理斯坦等地。	勃兰登堡边地侯腓特烈为统帅。

（续）

次	时　间(约)	胡司战争的领导人和主要地区(或战役)	备　　注 (十字军的统帅)
4	1426 年 6 月—1427 年 8 月	领袖:大普罗可普(杰式卡 1424 年 10 月病逝)①"乌恩齐会战"布尔什茨拉夫之役"(胡司军乘胜出征奥地利,有"茨威特尔之役"。)②塔荷夫。斯特尔希布罗。	共两度入侵①萨克森公爵腓特烈、莱因宫伯约翰、奥地利公爵阿尔布列希特分头率军进攻。德军联军约 7 万人。②萨克森封建主(主力)勃兰登堡、特里尔选侯。英国弓箭手约千人。
5	(马丁五世在 1431 年 2 月去世,尤金四世继任新教皇)1431 年 8 月	领袖:大普罗可普多马日利茨。捷克边境。	奥地利、西里西亚公爵率军分头进攻(共约 10 万人)。红衣主教契沙里尼参加。

胡司运动虽遭罗马教皇和德皇组织的十字军五次讨伐,但英勇抗击,曾转防守为反攻,把战争推向敌人统治区。他们依靠骑兵和步兵的配合作战,先后进军匈牙利(1427 年 12 月底)和西里西亚(1428 年),并远征深入德国的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甚至攻抵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1432 年)。

马丁五世为了扑灭胡司运动曾竭尽全力活动。1420 年初,他在宣布组织十字军时,曾要求所有的教会显贵和基督教徒准备对"捷克异端"作战。教皇允诺每一个举起刀剑来反对

胡司派的人不只可得到异端者的财产，而且还赦免他所有的罪。当大普罗可普继承约翰·杰士卡指挥塔波尔军于1426—1427年粉碎十字军的兵车战役之后，马丁五世又指挥天主教会不断供给镇压军以大量金钱，妄图打败大普罗可普。当胡司军对欧洲的远征取得辉煌战果时，教皇同西吉斯孟又一道策划了暂时"休战"和采用假谈判、真备战的策略。

1430年，大普罗可普率领下的胡司军，向德国远征途中占领班贝克后，曾进入纽伦堡。传说胡司军曾向纽伦堡的儿童分发樱桃以示友好，时至今日纽伦堡城每年仍有"樱桃节"的庆典，据说即源于此。在筹备第五次十字军进剿的过程中，马丁五世派使节契沙里尼十分卖力协助，照例赞颂十字军，怂恿扩大侵略。

1431年1月，马丁五世临死前曾下诏筹开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商讨十字军征讨等事宜，并拟委任红衣主教契沙里尼代教皇主持会议。但一个多月后（2月20日）马丁五世去世，由尤金四世继任教皇。这次巴塞尔会议推迟到1431年7月才在尤金四世主持下召开，会开不久，对胡司军的第五次十字军征讨便开始了。1431年8月1日，十字军约10万人进入捷克，同月14日在多马日利茨的战役中，十字军大败。红衣主教契沙里尼本想鼓舞侵略军的士气，但他为保活命，不得不逃窜，逃跑得太仓惶了，以致他个人的衣物、红衣主教的金杖、甚至关于十字军进攻"异教徒"的教皇训谕原件，都来不及收拾而落入塔波尔军的手中。最后，尤金四世（1431—1447年在位）依靠各国封建主和运用阴谋诡计，利用胡司军中圣杯派才最终镇压了胡司运动。

“人文主义教皇的第一人”
——尼古拉五世

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原名托马索·普伦图切利，1397年11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塞雷拉纳的一个贫苦的“微贱人家”。其父原居比萨，由于在城市斗争中遭放逐，被迫迁到塞雷拉纳。

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学者

普伦图切利自幼便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文法，“从孩提时起酷爱读书”，9岁时其父逝世，他大病了一场。据传说，他母亲在他病中向上帝祈祷时，梦见天使，被告知普伦图切利将来会成为教皇。故母亲敦促他发奋学知识。他16岁时，能用拉丁文听说读写并熟练地掌握了文法知识，他从这时起已开始学习神学和逻辑学。这一年，他前往波伦亚求学，由于特别勤奋，18岁便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此时其母改嫁，他经济上无力学习，便只身前往佛罗伦萨，先后给贵族维尔多·德利·阿利里和帕拉·斯特罗里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在佛罗伦萨城，他经人介绍加入了人文主义社交圈，接触了文艺复兴新思潮，结交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开始热衷于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在佛罗伦萨的这段经历，对他本人后来成为博学的人文主义者有决

定性影响。

1419年，普伦图切利22岁时便得到了神学博士学位。1422年，他受到波伦亚主教尼古拉·阿尔贝加蒂的赏识，任命为教士并被聘为主教的秘书兼家务主管人。不久他又随同荣任枢机主教的尼古拉·阿尔贝加蒂同赴罗马。从此，在尼古拉身边前后共20年，多次陪同枢机主教出使欧洲各国。在罗马期间，普伦图切利经常同人文主义者一道热烈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教皇尤金四世为逃避内乱移居佛罗伦萨时，普伦图切利也跟随前往，并重归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学者的社交范围。那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习惯于晚间在宫廷一隅举行讨论会，他是热心的参加人，有时也主持会议。他继续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加以整理、研究。埃内阿斯·西尔维乌·皮科洛米尼，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1458—1464年在位)曾这样描述普伦图切利："他涉猎整个文科领域，熟知所有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宇宙志者、神学家，通晓教会法、城市法甚至医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难以企及的。"

整饬教会弊端，维护教廷稳定

普伦图切利先后担任过副主祭、总主祭、佛罗伦萨罗伦佐望族的机要顾问。尼古拉·阿尔贝加蒂死后，教皇尤金四世于1444年委任普伦图切利为波伦亚主教及枢机主教。1446年，普伦图切利出席德国的法兰克福会议，平息了帝国选帝侯的不满，因而获得声名。1447年2月教皇尤金四世死，3月，普伦图切利被枢机主教选为新教皇。他为了纪念对他有厚恩的原

波伦亚主教尼古拉·阿尔贝加蒂，乃取法号称尼古拉五世。

新教皇尼古拉五世是继教皇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之后上台的。当时教权急剧下降，教皇领地残破不堪，拉文纳被威尼斯人控制，斯福查继续统治着教廷财政的重要收入地——东部的安科纳港，罗马南部的特腊契纳港口和贝内文托也于1443年被亚拉冈的阿方斯所割占，因而罗马教廷处于经济拮据、内外交困之中。

1447年春，尼古拉五世教皇上台时，巴塞尔公会议尚未结束。同前教皇尤金四世并存唱对台戏的另一教皇（世俗人员萨伏依公爵）非利克斯五世（1439—1449年在位）尚未下台，尼古拉五世努力促使非利克斯五世退了位，克服了教廷的分裂。1448年，尼古拉五世撕毁了原教廷同捷克圣杯派签订的布拉格协定，对胡司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倒算。尼古拉五世为了稳定意大利，同罗马贵族及参加过骚乱的市民和解。

尼古拉五世向各国派去自己的全权代表，努力整顿教会，废除买卖圣职，不准神职人员结婚，责令各主教加强教区管理。1451—1452年，他派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去德国、尼德兰进行教会事务的改良，以缓和那里的社会矛盾。尼古拉五世斡旋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城邦国家之间，缔结了为期25年的各国防御联盟，藉以促进意大利的和平，他还力图从文化领域入手，重振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声威。

广泛招揽学者　重金奖励学术

各地人文主义学者得悉尼古拉五世当选新教皇的信息后，欢欣之至，从各地云集梵蒂冈，尼古拉五世也热情接待，扶持并重用他们。从此，直到教皇利奥十世在位时，即从1447—1521年，开始了罗马教廷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文艺复兴教皇时期"。尼古拉五世被人们称为："佛罗伦萨文化的支持者"、"人文主义教皇的第一人"。

当时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多数荟萃于罗马。例如，有"复兴和普及古典文化的领袖"之称的弗朗西斯科·费勒福；著名语言学家达·韦罗纳·盖利诺；文艺复兴全才的典范、"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等，还有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画家弗拉·阿尔杰利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曾因坚持认为《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书、尖锐抨击教会，因而被宗教裁判所传讯过的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罗伦佐·瓦拉，也被尼古拉五世委任为教皇秘书。他把大量人文主义学者聘为教廷秘书，多得超过了文人社团，并非让这些人处理文书信件，而是为了便于使其有工作环境，集中精力从事古典文化的研究。

他在财政上，赞助学术工作。每当一部译著或新著问世时，他都拨款奖励。学者佩脱罗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得到500金币；盖利诺因译出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地理》一书，得到1500佛罗林，其中亚、非、欧洲三部分各得500佛罗林。费勒福以六步韵文翻译《荷马史诗》，尼

古拉厚赠以一万佛罗林。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贾诺拉、莫内蒂应邀来罗马从事翻译和写作，尼古拉五世除授予他们担任教廷的秘书职外，还赠给600金币便于译《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等事例甚多。

复兴古典文化　建筑成就斐然

尼古拉五世特别倾心于古典文化艺术。他早在青年时代，便热衷于搜寻、收集手稿、图书。他常出国，每次总带回一些国内鲜为人知的书回来。他本人常抄写手稿，是最优秀的抄写手之一。尼古拉五世任教皇后，身边常带有一支由调查员和抄写手组成的队伍。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前后，尼古拉五世迅速派出代理人前往收购因主人被杀或逃亡的无主书，特别是价值连城的古希腊手稿。

尼古拉五世任教皇后，卓有成效地充实和发展了梵蒂冈图书馆。在他的努力下，花了约四万金币，共收集进来约5000册图书，为梵蒂冈的扩充奠定了基础。他曾多次受邀参加组建和整理图书馆的工作。如：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图书馆、费雷塞莱和乌尔比诺的图书馆、蒙泰·奥利维托修道院的图书馆等，都倾注了尼古拉五世的汗水。当时，据说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有资格主管图书馆的选择和整理工作。由于尼古拉五世的大力支持，罗马城的古典文化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时奇葩竞放。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阿庇安、波里比阿；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还有一批新著作也问世了。

如：阿尔贝蒂的《论建筑》，盖利诺的一本系统的拉丁语语法研究的著作等等。西蒙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一书中曾把尼古拉时代的罗马城誉为“一个巨大的知识的工场。”

尼古拉五世突出的成就之一是根据著名建筑师阿尔贝蒂的建议，拟就了罗马城的除旧布新的建筑计划并着手实施。罗马城的建筑分为三大部分，即：教堂、尤其是梵蒂冈的装修与改建；城防设施的加固和扩建；市政建设。对罗马城内所有教堂均进行装修，并兴建了教皇公寓。1450年起，对圣彼得大教堂的破土重建，是引世人特别注目的巨大工程。尼古拉五世下令拆除了具有1200年历史的旧圣彼得长方型教堂，他招来许多建筑师、艺术家投入这项工程。在原址将矗立起具有时代艺术风格的全新建筑。新教堂的设计形同一个拉丁十字架，由穹庐状的巨大圆型屋顶加以覆盖，门廊旁有两座用以陪衬的高塔，教堂长约200米，最宽处为137米，处处以艺术品点缀，巧夺天工，富丽堂皇，全部工程需70年才能最后竣工。此外，16世纪中叶时，罗马城内街道拓宽、桥梁修复，城防加固，维修了水管系统，新建筑明显增多，这些是劳动群众的血汗结晶，但是同教皇的提倡与支持是不可分的。

教皇尼古拉五世的晚年，1452年在罗马为德皇腓特烈三世举行过加冕礼，这是由教皇加冕的最后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苏丹军队围困时，尼古拉五世曾派舰队往援，无效。葡萄牙早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等地发动侵略扩张时，尼古拉五世曾宣布支持，并宣称异教徒及其土地，是“上帝赏赐给信徒的产业”，这是极其荒谬的殖民主义强盗逻辑。

尤里乌斯二世以复兴教皇国为首要任务

在教皇和教会史中，14—16 世纪初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这一段既重要又复杂。由于"阿维农之囚"、教会分裂、三教廷并立后，局面混乱、积重难返。一方面，有些教皇如本笃十二世（1334—1342 年）、英诺森八世（1484—1492 年），特别是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年）等人奢侈、糜烂、放荡无羁，臭名远扬。另一方面，也有个别教皇力图复兴教皇国，还支持过文艺复兴，其中以亲自带兵作战，并最先组织瑞士雇佣兵的第 218 任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较为突出。

尤里乌斯二世上台前后及他的生平

15 世纪下半叶和 16 世纪初，罗马教廷是一个乱摊子。意大利连年战火，教皇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

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1503—1513 年）在教会中享有盛名，被称为是"很有天才、有抱负的统治者"。他本人就是建筑师，赞助艺术，"堪称教皇中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在《天主教百科全书》（罗马 1952 年第 1 版，第 9 卷）中，尤里乌斯二世被列为历代教皇中最有突出成就的 25 名教皇之一。

尤里乌斯二世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世家中。他

原名是朱拉诺·代拉·罗维雷(1443年12月5日—1513年3月21日),生于意大利阿尔比索,其父拉法埃洛加入方济各修会。不久,因朱拉诺之叔塞克斯都四世于1471年上台任教皇,罗维雷家族都跟着受惠。朱拉诺于1471年便被其叔提升为枢机主教,并辖有6个法兰西主教区、3个意大利主教区以及一部分富有的修道院。朱拉诺是其叔教皇塞克斯都四世同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斗争的帮手,朱拉诺成了有权势、能干的枢机主教。最寡廉鲜耻、贯于谋财害命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刚一上台,便决定阴谋除掉朱拉诺。朱拉诺闻讯于1494年逃往法兰西的宫廷避难。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借口有权继承那不勒斯王位,从1494年起发动了长期的入侵意大利的战争。朱拉诺先后随同过法王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世对意大利的历次战争。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惯于在宴会中下毒药,谋财害命。1503年8月的一次晚宴中,他因大意误饮下为客人准备的毒酒,丧了性命。他死后,继任的教皇庇护三世,仅在位几十天,又于10月18日病死,同月,朱拉诺·代拉·罗维雷当上了教皇,称尤里乌斯二世(1503—1513年在位)。他在台上的十年间,主要进行了下述三方面的事情。

组织瑞士雇佣军并领兵作战

教皇塞克斯都四世之侄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与前几任教皇有许多不同之处。他虽然也卖教职,有过私生子,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为复兴教皇国世俗权而发动战争上,他不像前几

任教皇那么腐化堕落，那么肆意为亲属和家族而贪婪聚敛。

从1506年起，尤里乌斯二世开创了从瑞士召募雇佣兵的办法，利用他们在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中效力。雇佣军中分为两部分，从瑞士贵族家庭出身的军官中精选一部分充当教皇宫廷的卫队，负责护卫教皇及宫殿财产的安全。其他多数人则用于战场厮杀。此后，在欧洲雇佣兵制度普及，各国王朝和一些将领纷起效尤，雇佣兵成为给封建王朝或贵族卖命的职业军人。他们不问战争性质，只知为金钱出力，有些浪迹天涯、不爱劳动的青年以当雇佣兵为职业，造成了社会一个弊端。由瑞士青年充当罗马教廷警察卫队的制度，几百年来沿袭至今，如今梵蒂冈的卫队常以穿16世纪的服装、佩16世纪时的武器为荣，其根源是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开端分不开的。

尤里乌斯二世亲自率领瑞士雇佣军，首先在意大利境内作战。1508年秋，他征服了佩鲁贾和波伦亚。1509年，参加了反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后，同盟军在克雷莫纳地区击溃威尼斯主力，终于恢复了教皇国的领土。

尤里乌斯二世在收复原教皇国的版图以后，便着手准备对法战争，目的是从意大利领土上逐出法国势力。法王路易十二世(1498—1515年)占领米兰(1503年)之后，不愿离意，同西班牙为争夺那不勒斯而激战的同时，也与尤里乌斯二世不断交战。由于教皇兵力不足，不断败北。有些枢机主教纷纷离弃教皇，从罗马逃出投靠了法王路易十二世。这样形势下，法王路易十二仿效一个世纪以前1409年开过的比萨公会议那样，在他操纵下于1512年拙劣地召开了比萨宗教会议，妄图压服或废黜尤里乌斯二世。为了证明比萨会议的非法性并抵

消其影响，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于1512年在罗马召开了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1512—1517年)，又称第18次公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也下令实行一些改革，但没有任何重要的成就。

1512年4月，在拉文那战役中，路易十二世一度打败过尤里乌斯二世的教皇军。由于教皇依靠瑞士雇佣军的增援，特别是因为法国占领区内意大利人民抗法斗争的发展，尤里乌斯二世终于收复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等地。意大利战争长期拖下去了。

尤里乌斯二世支持文艺复兴的艺术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意大利形成三个艺术中心，即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作为托斯坎纳的首府的佛罗伦萨，既是意大利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也是复兴艺术的先锋。罗马利用它是天主教世界首都的特殊地位，罗马教皇们力图加强在位时的辉煌和权威，蓄意在意大利诸强国的艺术中亦南面称尊。罗马教皇的艺术政策，是要使教廷内的宫廷艺术超群，成为整个意大利的艺术中心。16世纪最初30年里，罗马教廷艺术保持了它的领袖地位，尤里乌斯二世是当时积极支持文艺复兴艺术创作的教皇。

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创建于4世纪，由于一千多年来的风吹雨打，迄15世纪已有多处倾斜、坍塌、破损、失修之处，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曾召过大艺术家米开兰基罗前来设计准备重建，但尚未动工。尤里乌斯二世上台的当年便批准了扩建重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计划。尤里乌斯二世上台前便与

布拉曼特、米开兰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家有密切的交往。他上台后，罗致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师巨匠，如著名建筑师朱利亚诺·桑力洛和布拉曼特，杰出的雕刻家米开兰基罗和大画家拉斐尔等为首的艺术家，长期在罗马教皇宫廷中从事创作活动，这些人形成为罗马画派，艺术上的宏大、庄重、强劲有力和具有纪念性质为其特色，其技巧也十分精粹和成熟。

1505年3月，米开兰基罗应尤里乌斯二世邀请抵达罗马。他接受教皇的委托，先后完成了《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铜像》(1506—1508年)和为西斯廷礼拜堂独自完成了大型天顶壁画《创世纪》(1508年5月—1512年10月)，通过一幅描写圣经故事的大型画，使礼拜堂变成了艺术宫殿。他还完成了尤里乌斯二世圣墓的雕刻任务。

1508年底，26岁的拉斐尔应尤里乌斯二世之邀到罗马工作，他在《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总标题下，将壁画画在四个大厅的墙壁上。壁画有《教义争论》(1509—1510年)、《雅典学派》(1510—1511年)、《帕那苏斯山》(1509年)。拉斐尔37岁逝世，他生前的最后12年是艺术创作的辉煌时期，同教皇给他创造条件、支持和宠遇分不开。由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提倡和支持，16世纪最初30年，罗马取代了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当时艺术家的活动中心。

批准"教皇子午线"的修正案

1492年哥伦布首次直航抵达美洲，发现"新大陆"后，这些土地的归属问题引起争议。西班牙决定将新大陆独吞为殖

民地，葡萄牙拟派军前往占领。西班牙请求教皇裁决。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主持下，西葡经谈判，于1494年6月7日两国在西班牙的托尔德西里雅斯缔约，决定在佛德角群岛以西370里加处（相当于西经46度线），划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即"教皇子午线"，线以西归西班牙，线以东归葡萄牙。两国都有权追击或夺取在这些海面上的外国船只，向他们征税，按本国法律审判他们的船员……。这是历史上全球性殖民势力范围的第一次分割。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于1506年批准了"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的修正案。1508年又授与西班牙国王充当"新大陆"中西印度群岛基督教"监护人"的名义和权力。此后，罗马教会一再发布敕令，支持西班牙、葡萄牙的"传教"和对海外的殖民扩张。在探险和远航队伍中的传教士表现不一，有的为殖民侵略卖力；也有的撰文记载和揭露了早期血腥的殖民掠夺。西班牙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年）曾七次去美洲，先后在古巴和墨西哥任过天主教主教，他的名著《西印度毁灭述略》便是关心和同情印第安人历史的真实写照。

集双重性、矛盾性于一身的利奥十世

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教皇利奥十世是一位有过充分表演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却又肆意享乐、挥霍无度；他积极、广泛地支持了文艺复兴活动，却又坚决反对和镇压宗教改革。数百年来，各国史学家对其功过的评析，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对这位集双重性、矛盾性于一身的教皇，应该以史实为依据，以历史作用为准绳，客观地加以叙述和评介，对是是非非予以公论。

出身豪门　学识广博

教皇利奥十世(Leo X)原名乔万尼·德·美第奇，1475年12月11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是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统治者罗伦佐·德·美第奇大公的次子。

艺术大师拉斐尔于1518年曾为已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世画过肖像。从留传下来的利奥十世同他的两个侄子在一起的三人肖像中，可以看出利奥十世是一个身材健壮、魁伟、却又显得肥硕的人。他的眼、耳、鼻都很大，头颅圆，面部丰满，手上没有带戒指等饰物，身穿的绒白袈袍的外面罩了一件红色披肩，他默默地坐着，身后站立的是两个侄子：朱理奥·美第奇

和鲁伊吉·罗西，都是主教，是他亲密的助手。从他眉头稍蹙，神情严肃、眼光抑郁烦闷的表情看来，1518年时，利奥十世由于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燃起的宗教改革的形势，而深感不快。

利奥十世的家族——美第奇家，早在15世纪时已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1428年，他祖父逝世时，留有279221块金币（每枚重约3.5克）的巨额财富。在政治上，美第奇家族从13世纪就参加了佛罗伦萨政府，1434年，控制了佛罗伦萨政权，建起僭主政治。利奥十世的父辈先后经营商业和房地产，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美第奇家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逐渐封建贵族化。

利奥十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是在人文主义学者、诗人、政治家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先受教于马尔西里奥·费奇诺，这位导师曾预言他日后能登上教皇宝座。他继而从德米特略斯·哈尔孔季拉斯处学习希腊文，从贝比埃那处学哲学。从童年起，他从其父宫廷内搜集的大量艺术品和珍藏中养成了审美和鉴赏能力。他一生酷爱古代文物和艺术品。13岁，他进入比萨大学，连续三年攻读哲学、神学、教规和民法，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薰陶，使他学识广博，喜欢与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他本人有人文主义观点，熟谙世俗生活的享乐，也拥有他父辈们慷慨宽宏的气度和广泛交友好客的习俗。

教职迭升　挥霍享乐

乔万尼·德·美第奇的父亲罗伦佐·德·美第奇大公，

是一个很有政治谋略、深思远虑的人，为了保持其家族的飞黄腾达，他深知必须取得罗马教廷的支持，跻身于宗教事务之中。所以他从自己的次子乔万尼幼年起，便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教职。乔万尼·德·美第奇7岁时便被授以僧职，继而被任为教产缺席受益人。仅仅8岁时，便被受命为佛兰西杜斯堡修道院院长之职，9岁时任帕西伦诺修道院院长；11岁任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他刚满14岁便被破格遴选为枢机主教。在乔万尼38岁登上教皇宝座之前，他已被先后任命过16个圣职。他在任枢机主教期间，曾参加选举过三任教皇的秘密会议。

当乔万尼准备赴罗马走马上任时，其父罗伦佐·德·美第奇在1492年3月12日为他送行，交给他一份手谕，其中写道：当你到达"万恶渊薮的罗马时"，要如同"往年经常自动拜领圣餐，私下忏悔，……养成履行这类职责的习惯……"。罗伦佐要求乔万尼应当明白，"如果红衣主教都能够做他应做的事，那么整个基督教世界就会因而繁荣昌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都会有一位贤明的教皇来安定基督教世界。"所以"你应当使别人以之为榜样，则这种普遍的福祐就可以期待了。"罗伦佐还谆谆告诫乔万尼道："此次初访罗马尤应多听少说。在公开场合，服饰应讲求朴素而不应奢华……，华丽衣服珠宝饰品并不适合你的身份，你的鉴识应表现于获得精巧的古玩、搜藏大量的典籍，以及你的侍从个个学识修养丰富。"

不久，罗伦佐·德·美第奇大公便逝世了。乔万尼刚抵罗马便又赶回佛罗伦萨办理丧事的善后，并协助其兄彼埃罗·德·美第奇支撑动荡的佛罗伦萨政权。1494年，法国入侵意

大利，修道僧侣萨伏那洛拉发动平民起义推翻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恢复了共和国。自此，乔万尼开始了连续六年的在北欧等地的流亡生涯。1500 年才返回意大利，定居罗马。1503 年，他参加了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9 月，选出教皇庇护三世，10 月，庇护三世猝死，又选出了尤里乌斯二世即教皇之职。

1511 年，枢机主教乔万尼·德·美第奇担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驻波伦亚和罗梅纳使节。1512 年，乔万尼借助西班牙军队的力量，镇压了佛罗伦萨的人民起义，并重新控制和统治佛罗伦萨，让他的弟弟基乌利亚诺出任政府首脑，乔万尼本人则幕后操纵。1513 年 2 月，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死去，枢机主教院 3 月选举乔万尼·德·美第奇继任教皇，法号为利奥十世(1513—1521 年)。

利奥十世登上教皇宝座后，继续推行原定的方针政策。利奥十世虽然热心于教廷政务，但却更醉心于娱乐和游猎、赌博，以及宴饮。他对演出和观赏戏剧、音乐甚感兴趣。他 1513 年刚任教皇时曾对其弟基乌利亚诺讲过一句名言："现在让我们尽情地享受上帝恩赐给教皇的大权吧！"。

教皇利奥十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极喜炫耀和挥霍的教皇之一。他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腐化生活，宫内奴仆计有 683 人之多，日常沉缅于钓鱼、狩猎及赌博、看戏。他把教廷收入全部花光，又欠下大宗债务，将罗马教廷积存的金银器、装饰品、圣像等也变卖或抵押，甚至他在任期间买卖教职成风。1510 年，马丁·路德从德国去罗马朝圣时所目睹的"罗马就是人间地狱"的见闻和由罗马教廷传播的荒淫腐败风尚时的教皇就是利奥十世。他沿袭前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遗风，

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许多艺术家们，延揽来罗马教廷，大兴土木，扩建宫廷，意大利的一些艺术巨匠都同利奥十世有过密切联系。

推行新的政策措施 拓建西方文明中心

利奥十世之前的几任教皇，在罗马城内不得人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儿子凯撒·布乔亚统治时期，阴谋、暗杀迭起；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以好战闻名，他在任期间，四出扩张领土，战乱和骚乱频繁。当新教皇利奥十世举行登基大典时，人们颇多期待。希望新教皇提倡和平与智慧。

利奥十世上台伊始，首先是制定新的正确的宗教政策，终止教会腐化分裂的现状，他重新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并在会上宣布大赦了某些反对比萨以及反对米兰宗教会议的红衣主教。还对教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减低征税额，缓和了教会僧侣内部及其与下层人民的矛盾。同时，利奥十世推行和平外交政策，欢迎意大利乃至欧洲各国的文人、学者前来罗马教廷。在经济方面，利奥十世也实行新政策，排干沼泽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在罗马城内严禁垄断和囤积居奇，注意控制食品价格，改善罗马街道与交通的管理，对罗马城及郊区的经济采取保护措施，还奖励农业经济的发展。利奥十世在任期间(1513—1521 年)，意大利北部各地居民纷纷移居罗马，罗马人口增达 85000 人，新建房屋达万幢之多，罗马社会经济繁荣后，罗马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布克哈特曾分析道：在利奥十世时代，"对于古代文化的享受和一切其他享受一起使得

罗马生活具有一种独特的神圣化的特征。梵蒂冈飘扬着歌声和乐声，它们的回音响彻全城，像是在唤起人们的欢欣和喜悦……”利奥十世时期，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已从意大利传播到法、德、英、西班牙等国，但由于他采取各种措施，结果使得“在罗马仅有的列奥十世的宫廷里却拥有一个世界史上无可匹敌的社交团体。”利奥十世同艺术巨匠米开兰基罗、拉斐尔等关系密切，他还招揽各国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艺术家来罗马为教会效力，他的活动使罗马在16世纪初仍然是欧洲文艺复兴和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之一。布克哈特指出，“自1520年以来，无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有什么影响，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利奥所给的鼓励。”

奖掖和大力支持文艺复兴活动

利奥十世重视教育，扶持学术研究。他于1513年11月5日颁布敕令，将1303年早已创办的梵蒂冈学院改组、扩大为罗马大学。他本人对这所大学加以赞助，为其招聘一大批热心办学的学者，先后聘用教授、讲师达88位之多。其中有些人的年薪竟高达530金币。这所大学成为全意大利最具有学术性、最负盛名的大学。利奥十世在罗马大学中开创了对希伯来文等闪族语系的研究，设立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讲座。利奥十世任命提索·恩布罗吉欧在波伦那大学讲授叙利亚语等闪族语言，他关心并奖励亚葛西奥·吉达衷里欧和桑德·巴格尼编纂希伯来文语法，利奥十世在经济上赞助后者努力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与此同时，教皇对受迫害的德

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约翰·勒克林(1455－1523年)加以保护和支持，使其完成了《希伯来语提要》(1516年)的著述。

利奥十世大力恢复对希腊文及其典籍的研究工作，他庄重地特聘当代著名学者约翰·拉斯卡利斯前来罗马，并为之开设了一所希腊学术研究院，专门从事希腊文和希腊古典作品的研究。他还命其手下的班柏写信给拉斯卡利斯的学生马科斯·莫萨罗斯从希腊聘来十多位具有良好品格和丰富知识的年轻人来罗马，开拓对希腊古典作品的研讨，由于利奥十世的支持，在罗马城内研究古代东方语言、古代希腊典籍蔚然成风，学术活动活跃起来。

教皇利奥十世奖励并支持古典作家及人文主义作品的编订和出版工作。1513年9月，出版家马纽球斯出版了马科斯·莫萨罗斯编辑的《柏拉图》一书，并将书献给利奥十世。而利奥十世则颁发给这位出版家以15年的专利特权证明。在新教皇的鼓励下，雅里诺·卡耐提将编译的希腊拉丁语字典付梓，有效地推动了对古典语言的研究，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德国的人文主义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莫于1516年将他所评注、翻译的希腊文《圣经·新约》新修订本献给利奥十世时，获准了出版。这部圣经新译本的出版，有重大意义。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直接阅读和传播。伊拉斯莫在其“自序”中就写道：“我期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阅读《福音书》和圣保罗的《圣使徒传》，我希望能使这些书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让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也让土耳其人及阿拉伯人都能阅读。我渴望种地的人一面耕作，一面吟诵；纺织者哼之于穿梭织布的旋律中；旅行者以此为娱乐而排遣其旅途中的无聊。”伊拉斯

莫在修订本《圣经·新约》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中加上一系列的评注和提出了质疑，抨击了天主教会和僧侣的罪行，这对触动神学思想体系和宗教改革都有启发推动作用。

利奥十世本人酷好诗文，他对文人墨客常慷慨馈赠。在他任教皇期间，古都罗马吟诗成风。许多人都愿把自己的诗作吟哦给教皇听。1513年，诗人安东尼奥·提巴底奥得悉乔万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利奥十世后，立即赶赴罗马献诗，因而被新教皇厚赠500金币。利奥十世还擢用著名诗人为自己的亲信。如名诗人吉安纳托尼·雷拉米尼奥的儿子玛坎托尼欧与沙都雷多均被利奥十世聘为秘书兼特林特宗教会议的秘书，他们得到教皇并许多枢机主教的赠赐。马可·吉罗尔莫·维达是一位很善于逢迎利奥十世的诗人，他精通拉丁文，写出高雅名著《论诗学》，获得教皇的高度赏识，成为教皇座上佳宾，给以高薪。罗马古城诗文繁盛空前，与教皇倡导奖励密不可分。

许多艺术巨匠、著名画家受到利奥十世的邀聘、重赏和款待。利奥十世对不善与人交往的米开兰基罗亲切相处，酒宴相陪；同拉斐尔性格相投，私交甚笃。在利奥十世的安排下，拉斐尔出色地完成了为西斯廷教堂的花毡设计底图、装饰教廷侧临庭院的走廊以及在圣彼得大教堂改建过程中绘画等等，颇受教皇的嘉许。16世纪初，罗马文艺复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利奥十世的支持有关。

热心发掘、募集和保护古典作品与文物

利奥十世对古代文物、作品特别崇拜和喜爱。据说他任枢

机主教时，从威尼斯商人处得到李维的一块肩部的骨头，被他珍惜无比，长期视为至宝。他上任教皇后，更加努力于搜集古典著述和手稿。他宣布：凡是为他得到古代作家手稿者，定获重赏。他派出特使、专人赴欧洲各地去搜集或以重金征购古代基督教徒、甚至异教徒的名人手稿，还派人携他致各国王公贵族的亲笔函去争取得到帮助。为了把有宝贵价值的珍贵手稿弄到手，他的特使不惜使用盗窃手段。例如塔西佗记述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前六卷（提贝里乌斯时代）的手稿，原来是珍藏在德国威斯特发里亚的科维修道院中。利奥十世的特使由于无法购买，便是靠盗窃而得到的。教皇对这种偷窃加以辩解道："为了让他们（指修道院负责人）明白这种偷窃对于他们的好处是多于坏处起见，朕已赐准大赦该修道院"。1515年，根据教皇的手谕，在罗马由倍罗阿尔都斯出版了该手稿，印成精美的传世版本。利奥十世在这道手谕中是这样写的：

"朕在早年就已常常想到，造物主赐予人类的，再没有比这些典籍的研究更美好更有用的了。如果我将她本身的知识和真正的崇拜除外，对这些典籍的研究，不但使我们获得人生的点缀和指引，而且适用于每种特殊的际遇，使我们在逆境中获得慰籍，在顺遂时益增愉悦与荣耀。因此，没有了它们，我们就要被剥夺人生的雅致和社交的润饰。……这些研究的达成与推广，端视两个重要条件：一方面是学者的数目，另一方面则是丰富的典籍了。关于前者，唯愿神恩降福、益显朕的热望与意向，以报偿并勋奖他们的功绩，对此早已深得朕的欣许。……至于典籍的罗致，朕诚感激上帝之恩，因目前亦获良机，

得以造益人类。”[1]

根据上述的意愿，利奥十世不惜花费重金，搜集了大量古典书籍和手稿，恢复并创建了许多图书馆。他先后把美第奇家族在1494年散佚的藏书，用2652金币购回，藏置到罗马劳伦坦图书馆内。他又大力扩充梵蒂冈图书馆，使之藏书量激增，任命著名学者为该馆馆长。在利奥十世统治期间，寻得了大量古代文物，如尼罗河神和台伯河神的雕像，将其置于梵蒂冈博物馆中；购回了美第奇家族一度散失的珠宝、浮雕玉石及其它珍贵艺术品，置于教皇寓内。罗马城又逐渐恢复为充满古典遗迹和珍贵文物的庄严、美丽的城市。

神权与政权互相结合 维护美第奇家族统治

教皇利奥十世依靠美第奇家族的巨大经济力量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者的权势，使教皇国的神权同佛罗伦萨的世俗政权互相勾结、利用和相互依赖，以巩固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地位。利奥十世上任教皇几个月后便帮助其兄弟恢复了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他并将实权操在自己手中。利奥十世既是教会元首、是教廷领地各邦的统治者，又是美第奇家族的首领。他一贯偏袒其家族和亲信。1517年有人企图暗杀他未遂，结果与此案有嫌的枢机主教佩特鲁奇被绞死，另外一些人也被处决或被囚禁。利奥十世不断把自己的支持者补进枢机主教团。他

① 杰·鲁·哈尔：《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1977年英文版第103页，及罗斯科著《罗伦佐·德·美第奇》第一卷第357页。

任期内，枢机主教增达31人。利奥十世为支持文艺复兴做了大量工作，但他的目的很明显，是利用学术、艺术为罗马教廷和美第奇家族服务。他在拉特兰第五次宗教会议后颁布谕令，严格限制和审查书籍的出版，许多禁书绝不准刊行。

利奥十世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变化多端。为了使教廷谋利，提高其家族地位，他在意大利国内外各派力量之间搞平衡。他在谋取意大利霸权过程中同西班牙和法国频起摩擦。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获胜，缔定《波伦亚协议》，利奥十世在意北部波伦亚迎接这位征服者时，竟向他献上了拉斐尔画的圣母像。1516年8月，利奥十世颁布一个妥协性谕令，今后法国国王有权直接任命主教及修道院院长，以及向神职人员征税，但新任主教第一年的年俸和其它同类税收需交教廷。而当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时，利奥十世趁机加紧活动，又转而支持德国和西班牙对法兰西的战争，伺机扩大教廷在意大利的霸权。

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和谋求意大利霸权的惊人战费，加上扩建圣彼得大教堂巨大工程的开支，以及利奥十世支持文艺复兴活动的花费，消耗了教廷的库存，为了挽救财政匮乏的危机，巩固其统治，利奥十世扩大了买卖教职的活动。他肆意增多教廷的机构和官职，利奥十世颁定1200个新教职，从中赚得90万兹库提，他又建立了由401人组成的圣彼得僧团，全由其宠幸担任。教职价格不断上涨，如罗马教廷内一个司书职务，利奥十世时比50多年前教皇加里斯都三世（1455—1458年在位）时，竟然抬高了三倍。1517年7月，利奥十世通过提名31位新任枢机主教的任职，便为教廷国库增加了50

万金币。罗马教廷还肆意迫害“异端”、“女巫”，凡被诬控者其财产、财物都被没收。

尽管加紧搜刮、巧取豪夺，但利奥十世时教廷的国库收入仅 32 万兹库提，而债务却高达 100 万兹库提，教皇入不敷出，为填补开支，利奥十世乃大肆兜售赎罪券。

倡销赎罪券　镇压宗教改革运动

为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早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时期的 1505 年起，已开始销售赎罪券。利奥十世当上教皇不久便宣布发售赎罪券是正确的。1514 年，利奥十世和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及马格德堡大主教亚尔培特共签了在德国销售赎罪券的协议。亚尔培特大主教得到承诺，在他所辖教区内所出售的赎罪券收入中，一半归他所有。在这位大主教的领导下，修道士和神父到德国各地向教民兜售。1517 年，他派遣能说会道的多米尼克会修士约翰·特策尔在德国推销。因未获准进入萨克森选侯的辖境，他便在附近的巢因兹和马格德堡教区内出售。有关赎罪券的销售情景，据当时目击者记述道：

“当销售赎罪券的特使快进城时，最前行的是一块大丝绒上张挂的教皇出售赎罪券的通谕，所有的神父、修道僧、市政官员以及学校校长率领全体学生和全城男女，都举旗并点燃蜡烛出去迎接，跟在特使后面游行唱诗，全城教堂都响钟。游行结束后，队伍来到城里主要教堂，把教皇旗帜在教堂中阀挂起来，活像迎接上帝的样子！……”。特策尔的宣讲，把赎罪券的功效说得天花乱坠。他说道：“只要买赎罪券的钱币落入钱

箱叮当一响，买主已死家属的灵魂马上就从炼狱升入天堂。他宣布："天堂的门已经开了，现在开始卖啦！……"。骗子的胡言，引起群众议论纷纷，在同事们的怂恿下，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登堡教堂的正门上公开贴出了题为：《关于赎罪券功效》的"九十五条论纲"。其条目是同美因兹大主教亚尔培特给特策尔销售指令的95条数目恰恰一致。路德并不反对赎罪券、没否认过教皇权力，也不反对教会的其它教义和信条，他主要是反对把赎罪券的功效过分夸大。他甚至最初暗示过，倘若教皇被告知实情，会出面制止弊端。尽管如此，但路德的"论纲"中，由于道出了德国人民对罗马教廷和教会不满的心声，因而这一行动如同在干柴堆中投下火种，触发了人们要求宗教改革的燎原大火。

教皇利奥十世开头对路德的行动并不在意，他认为"九十五条论纲"只不过是酒醉的德国教士的狂言呓语，但是，由于事态的发展和激化，不得不命奥古斯丁修道会会长出面制止路德观点的传播。1518年4月，路德被召到海德堡受审，路德不服。1518年6月，利奥十世传路德去罗马受审，这次由于德皇马米西米连一世和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干予和活动，加上当时教皇也为了笼络腓特烈以反对法国国王，教皇乃允路德可不必去罗马，改由教皇驻德国使节就近发落。由于路德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不完全屈服了事，于是教廷内强硬分子乃加强对路德的镇压。1520年春，教皇驻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的使节、博学的枢机主教托马斯·维奥(因其出生地而被称为卡叶坦)命令路德收回己见，但路德拒不从命。罗马教廷乃对路德列出41条罪行，斥为异端，革除教籍并焚毁其著述。革黜

的教谕在1520年6月15日由教皇利奥十世签署批准。1520年8月至10月，路德先后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等三本著名的小册子，进行抗辩。教皇特使将开除路德教籍的破门令于9月份带到德国正式公布，称路德是"糟蹋上帝葡萄园的狐狸"。但12月，路德在维登堡当众把教皇的破门令，投入火中付之一炬。

利奥十世又假手新德皇查理五世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德皇在1521年4月召开的沃姆斯帝国会议上，逼迫应召而来的路德承认错误，但路德却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利奥十世对乌尔利希·慈温利在瑞士苏黎士的宗教改革活动亦采取收买、破坏的措施。利奥十世鉴于英王亨利八世撰文批判了路德关于圣事的观点，乃封赐亨利八世是"信仰的维护者"。1521年12月，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深入发展之际，即将46周岁的利奥十世遽然逝世，结束了这位支持文艺复兴、却镇压宗教改革的充满双重性的教皇的一生。

领导天主教会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保罗三世

16世纪20年代起，从德国最先爆发，继而扩及全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罗马教皇为了扭转天主教会和教权的危机，为了阻挠新教传播，乃加紧进行反对宗教改革的一系列活动。在各教皇中间，以保罗三世最为突出和典型。

保罗三世的生平

保罗三世(Paul Ⅲ，1534—1549年在位)是继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之后的教皇。他的两个前任教皇阿得里安六世(1522—1523年在位)和克莱门特七世二人的作风，迥异。阿得里安是教皇史上唯一的荷兰籍人，他1517年被利奥十世立为枢机主教，受到重用。他对天主教会的穷奢极欲和堕落放荡极其厌恶，立意整顿教廷。可惜他在位仅年余，未展才能便去世了。克莱门特七世由于同德皇查理五世的争斗和一度被囚于罗马，以及面对英王亨利八世离婚案等团团乱麻，时常犹豫不前，因而对天主教内部整顿的工作未及开展，对欧洲宗教改革咄咄逼来的形势也没有拿出什么得力措施。

保罗三世原名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468—1549年)，出身于意大利托斯坎纳雇佣军家族，少年时家居罗马。法尔内塞

青年时曾因家族纠纷而被短期监禁过。后来枢机主教、西班牙人罗德里戈成了他的保护人。罗德里戈就是1492年即位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因法尔内塞的姐姐裘丽娅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宠妾，所以法尔内塞倍受提拔。1492年法尔内塞尚没有受神职时，便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委为罗马教会司库，执掌了财权，继而1493年内，25岁的法尔内塞被升为枢机助祭和枢机主教的要职。因此，他得到了"裙带枢机主教"的绰号，事实上，直到1519年他才正式被授以神职。

保罗三世是一个在观点、信仰甚至作风上都很矛盾、复杂的人。他不像亚力山大六世那样寡廉鲜耻，那样极端卑鄙。亚历山大六世自己承认私生子不下八个；为了谋财，身为教皇不惜投毒害命。但保罗三世也尽情享乐，在罗马兴建豪华宫邸，同出身高贵的情妇厮混，生活方式完全贵族化。保罗三世本人与"阿维农"时代诸教皇不同之处是，保罗三世对文艺复兴饶有兴趣，肯于出资支持。在他主持下，圣彼得大教堂的改建扩修工程继续进行，他在位时期，还建造了聚基亚阶梯和波林礼拜堂，专邀米开兰基罗为礼拜堂绘壁画。保罗三世本人能讲希腊语，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也有功底。

保罗三世一方面坚定的信仰天主教教义，决心整顿和重振教会，但同时又迷信星象巫术。他与星象家过从甚密，礼聘星象家担任要职，甚至枢机主教的会议何时举行，也请占星家靠星象去决定。

保罗三世上台时，面对全欧洲宗教致革风潮迭起，他的各种措施、活动和外交，都是围绕反宗教改革而进行的。

保罗三世时欧洲宗教改革的形势

16世纪上半叶，继德国之后，瑞士、法、英以及北欧、东欧诸国都发生了反对罗马教皇、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

1525—1529年德国农民战争后的路德后期的宗教改革是第一阶段，路德的主要活动是视察与整顿路德宗的教会和提倡宗教教育。1529—1546年是第二阶段，这时德国新旧教斗争形势时有变化，起伏甚大，最为激烈。路德进行系统的著述，加强路德宗的教理建设。

在瑞士，以苏黎世为中心的慈温利派宗教改革有一定成就，但后来遭到镇压，以日内瓦为中心的加尔文派宗教改革，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

在法国，16世纪30年代，加尔文教派在工业发达城市流行。封建统治集团对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采取镇压的方针。16世纪上半叶宗教改革受压制，1562—1594年爆发了宗教内战。

在宗教改革旗帜下的尼德兰，16世纪上半叶正处于大规模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北部各省的再洗礼派掀起暴动。路德和加尔文的著述广为传播。

在英国，英国亨利八世自上而下进行宗教改革，通过国会及各种方式打击罗马教廷在英的势力，指控英国神职人员接受教皇命令便是背叛国王。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授予国王以英国教会元首称号，英国建立了英国国教

——安立甘教。

北欧各国，在16世纪20—30年代路德教派传入瑞典、丹麦、挪威。瑞典国鉴于天主教曾支持丹麦入侵和统治瑞典，天主教会丧失民心，乃决定推广新教，并于1541年完成了路德教的宗教改革，受瑞典管辖的芬兰亦改信路德教。丹麦在国王腓特烈一世领导下进行宗教改革：1530年，路德教派的信徒已控制哥本哈根和维堡。1536年10月，丹麦国民大会宣布建立路德派的国家教会，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接着，挪威以及受瑞典控制的冰岛均接受了路德教。

东欧的形势复杂、曲折。波兰在30—50年代，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发展很快，波兰文圣经出现了，波兰语在宗教事务中取代了拉丁语。但后来国王西吉斯孟二世时压制新教，天主教会统治地位又得到巩固。在捷克，波希米亚人中新教徒比例较大，1561年起耶稣会传入后，天主教会的地位又有所恢复。在匈牙利，新旧教双方斗争激烈，互有胜负。在俄国，东正教是仅次于沙皇的最大地主，16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遭到沙俄政府的镇压，未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宗教改革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严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天主教会。天主教在下述的国家中明显地失去了昔日的地位，这就是：德国、瑞士的大部分、英吉利、苏格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有些国家虽然仍奉行天主教，但新教思想亦开始流行。

继德国之后，16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具有如下的特点，即：

（一）这是在宗教形式下的阶级斗争，经过多次反复。

(二)它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同步展开的，震撼并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三)因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之不同，而分成两类，在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地区，如瑞士、尼德兰和法国南部，宗教改革是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得激烈、彻底；在封建势力占优势的国家，如英国、北欧各国，往往由君主发动自上而下地进行。(四)当时封建制还占主导，天主教会仍有较强力量，不甘心于失败，因此掀起反宗教改革运动是必然的。教皇保罗三世便领导了这一运动。

保罗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

以教皇保罗三世为首的天主教会，为了扭转天主教的危机和阻挠新教的宗教改革，从 16 世纪 40 年代起，加紧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教皇的第一个重大措施便是支持和批准成立耶稣会。

耶稣会的创立者是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德·罗耀拉。他早年从军，曾任西班牙国王的宫廷侍从。1521 年反法战争中身负重伤以致终身跛足。他通过阅读宗教书籍和圣徒事迹，决心把自己献给上帝；1523 年去耶路撒冷朝圣，1524—1528 年，先后在巴塞罗纳阿尔卡拉和萨拉曼加等大学读书，1528 年去巴黎大学学习。罗耀拉前后在巴黎住了 7 年，结识了一批青年朋友，如意大利萨伏依人教士勒费夫和西班牙卡斯提人拉内兹等 6 人。这些人与罗耀拉一起狂热地信仰天主教、反对新教，后来都成为耶稣会的骨干成员。1534 年 8 月 15 日，他们 7 个人在巴黎蒙特马脱的圣玛利亚教堂做弥撒、宣誓，从此开始

了筹组耶稣会的活动。1537年，开始有了组织、成员和章程。罗耀拉根据大家以信仰耶稣而聚集，故名为“耶稣会”(又称“耶稣教团”)。1539年10月罗耀拉等人到达罗马，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优厚待遇，从此，与罗马教廷保持紧密联系。勒费夫被派往萨查大学讲授《圣经》，拉内兹则讲《神学》，罗耀拉在罗马筹建耶稣会。

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正式批准。1541年，罗耀拉当选为该会第一任总会长。耶稣会既从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政治斗争。耶稣会的宗旨和手段在《耶稣会章程》及罗耀拉撰写的《精神训练》和《组织》中有较详记述。罗耀拉认为原天主教会松散无力，必须重树教皇绝对权威，重振天主教的威力。耶稣会在“一切为了扩大上帝的荣耀”的旗帜下，决心剔除各种背离罗马教皇的“异端”派别(如路德、慈温利、加尔文等教派及其追随者，夺回天主教失去的阵地)。罗耀拉在耶稣会成立初期，使组织具有半军事的性质、有严格的纪律、规则。在《耶稣会章程》中强调耶稣会士必须：“永远毫不迟疑、奋不顾身地听从教皇对我们发布命令”。每个会士“要像一具死尸，任他摆布；或像老人手中的一根拐仗，随他使用”。罗耀拉解释道：“如果教会认为白的是黑的，应当相信是对的，必须立刻承认它是黑的，耶稣会士应把自己的上级视作基督本身。”后来耶稣会的理论家罗伯特·拜拉明(1542—1621)进一步发挥道：“如果教皇命令作恶或禁止修德，教会就必须坚信作恶是好事，修德是坏事；否则教会就犯了违背良心的罪行，因为教会必须顺从教皇的判断，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恶。”

耶稣会要求会士初入会时，除了同其他修会的修士一样要宣誓，即誓守清贫、贞洁和听命之外，还要发第四个誓愿，即宣誓效忠罗马教皇。宣扬"教皇至上"，高于国王，声称教皇是"牧人"，国王仅是"牧羊人的狗"。全体会士必须服从总会长（亦称"将军"）。他对所有会员有绝对统治权，有人称他为"黑衣教皇"，常住罗马，指挥着世界各地的耶稣会。耶稣会的格言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认为只要有利于天主教，不论谄媚、收买、欺骗、威胁、诽谤，甚至下毒、暗杀等手段，都可无所不用，为了教皇和天主教，可作任何"冒死犯难"之事。

耶稣会同其它修会不同。耶稣会士奉命以各种身份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与俗人来往，不少人跻身上层、深入宫廷、结交权贵、联系君王；也有人经营地产、工场、高利贷，从事殖民掠夺，或兴办文教事业、办学校、医院；抵制与破坏新教运动。教皇保罗三世对耶稣会格外支持和器重，而耶稣会也自称是"愈显主荣"而战斗的"耶稣连队"。

保罗三世反宗教改革的其它活动

保罗三世在天主教会内部实行整顿，惩办贪污腐化、渎职和严重违犯教规的教士。他把一些热心于整顿天主教会的人，如孔塔利尼、迦腊法、萨多来托和割勒等人安插到枢机主教会议之中，委派他们同别人组成"九人委员会"审查教会、专议改良措施，以便提高教会威信。各个委员也主张实行行政上和道德上的改革，但方法各异。孔增利尼主张同新教实行调和政策，但迦腊法却认为对新教要严加遏制，不可姑息。1536年保

罗三世发布通谕企图调和分歧，于1537年在伦巴德的曼图亚召开会议，教皇授权会议遴选部分枢机主教成立专门机构，就教会内部弊端提出报告。专门机构在当年秋将报告书呈给保罗三世，指责在罗马教廷之下，许多不称职的主教、司铎以及工作松懈、俸禄过高、腐化堕落等问题，强调急需彻底的改革。由枢机主教迦腊法发起，于1542年在意大利设立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即"异端法庭"。对有"异端"言行嫌疑的人，对从事新教传播和宗教改革活动的人，加以审讯逼供，或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放逐，对少数人甚至处以火刑焚死。这一类的"异端法庭"不久在许多国家中相继建立起来。此外，德皇查理五世、伊拉斯莫等人也从事过整顿天主教会工作，但他们的努力并无成就。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利用本身地位鼓动各国君主镇压新教的宗教改革活动。在德国，他怂恿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镇压路德新教诸侯的"士马尔卡登同盟"。在法国，支持1540年颁布"惩治异端条例"和1549年设立专门惩治加尔文教徒的"火焰法庭"，为法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镇压胡格诺派而赞赏。在英国，由于英王亨利八世亲自主持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保罗三世将亨利八世开除出天主教。

保罗三世反对宗教改革活动的再一项措施是1543年组成了查禁书刊的主教会议，教皇重视检查书籍和践踏科学。他们编出"禁书目录"，严禁天主教徒阅读，许多伟大的科学著作，均列入"禁书"之列。

在国际外交事务中，保罗三世也十分活跃。时而联合法兰西斯一世反对德皇查理五世；时而又充当德法意大利战争的

调停人。万变不离其宗，维护和巩固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会的地位，反对新教的宗教改革，是保罗三世的根本目标。

特兰托宗教会议

保罗三世领导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又一活动是召开了特兰托(又译特梭特)宗教会议。

这个会议酝酿已久。最初是德皇查理五世针对德国的宗教冲突敦促教皇召开宗教会议，原意是实施各方面公认的一些必要的改革，自由讨论，消除新旧教的分歧。1537 年时，新教的温和派曾赞成参加会议。但到 1545 年，沃姆斯帝国议会中的新教代表已拒绝与会。结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任务变成不再是调解天主教和新教的分歧，而是要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服务，与新教抗衡，并对天主教会的秩序加以整顿的会议了。

保罗三世主持的特兰托宗教会议于 1545 年 12 月 13 日在意大利北部阿迪杰河畔特兰托城举行。此会议召开时，已坚决把新教的一切改革方案弃于会议之外。保罗三世确定特兰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规定和编纂天主教的教理；(二)在不违背天主教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腐败的教会组织加以改良，改进教会生活；稳定教皇的集权地位；(三)弥补教会内部的矛盾和弊习，共同扑灭异端。这次会议召开时，协助保罗三世主持会议的是枢机主教德尔蒙特(日后的教皇尤里乌斯三世)和塞维尼(教皇马塞鲁斯二世)。这次会议(第 19 次大公会议)前后长达 18 年之久。它的经过可分三个阶段。从 1545 年

12月起在特兰托开会至1548年。因1548年特兰托鼠疫流行,会址乃迁至波伦亚举行。会议在那里开了一年,1549年会议中止。时断时续的会议,到1563年12月4日最后结束。

在保罗三世主持下的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肯定了“原罪”教义、教会的“基本信条”,谴责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1546年会议将4世纪时哲罗姆编订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确定为唯一权威的译本,还确认“圣传”是教会信条的来源之一。但保罗三世在位期间,特兰托会议只是开了个头,会议的第二、三阶段,是保罗三世逝世后,由教皇尤里乌斯三世及庇护四世领导下进行的。

保罗三世领导下,16世纪40—50年代,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活动,曾获得过暂时的成功。在封建势力强大、专制统治较强的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国,天主教会的势力曾得到了巩固,但宗教改革的洪流已难阻挡,欧洲各民族国家反罗马教廷、反天主教会的斗争在16世纪下半叶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

反对詹森派和迫害伽里略的乌尔班八世

继罗马教皇保罗五世(1605—1621年在位)之后，是教皇格利哥里十五世(1621—1623年在位)，他主持教廷的时间虽短，但却有两项建树：一是创立了不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教皇制度；二是在教廷内建立一个新机构——“传信部”(又称传信会)，分管外交传信事务。格利哥里十五世死后，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于1623年下半年登上教皇宗座。乌尔班八世出身于意大利的名门豪族巴尔贝里尼家，俗名为马费里奥·巴尔贝里尼(1568.4.5—1644.7.29在世)。教皇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在位)出山于复杂的乱世，国际性的三十年战争正酣，他是一个天主教正统的保守派，为扭转因宗教改革运动以致罗马教廷地位下降的局面而竭尽全力；他不顾深挚友情而迫害和折磨正直的科学家伽里略，都充分暴露了他心胸的狭窄和立场的顽固。

站在黎塞留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

乌尔班八世上台时正值三十年战争第一时期之末的重要阶段。教皇一方面支持“天主教同盟”，希望德皇、西班牙等与旧教诸侯联合镇压各地的新教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哈布斯

堡王朝、德皇势力过大而削弱教皇在意大利的势力，因而教皇便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及首相黎塞留结盟。

乌尔班八世1624年依靠法国人马萨林统率了一支教皇的军队。马萨林受教皇的委派在1628年担任罗马教廷驻米兰使节的秘书，后来成为黎塞留首相的亲信，巩固了法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良好关系。

乌尔班八世本身视新教为主要敌人，他保持着双重身分，一方面因为法国的天主教是国教，于是联合法国专制王权；另一方面又支持天主教联盟，他实际是站在黎塞留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力求平衡协调，保住自己的地位。

扩大教廷实力，谴责詹森主义

乌尔班八世竭力扩大罗马教廷和教皇的地位。他欣赏文艺复兴的美术，在即位之初，便广泛邀请意大利的艺术家，如文艺复兴晚期的雕塑家兼画家贝尔尼尼(1562—1629年在世)等到罗马，为他本人的教堂加工装饰，为他本人设计各式陵墓及祭坛雕塑等，对贝尔尼尼一再破格奖赏。乌尔班八世时代，继续从1450年便开始的扩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最后于1626年完成。教堂之大，艺术珍品之众多，当时已高踞世界之首位。它能容纳五万名教徒同时进行礼拜活动，这是集中了文艺复兴时代各地艺术大师和成千上万名工匠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与此同时，乌尔班八世又大力强化罗马教廷的实力，加固罗马天神堡，建造马提尔达礼拜堂，还在佛朗哥堡地区建造了

乌尔班堡，将契维塔韦基亚改建为军用港口，扩建蒂汉利兵工厂，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罗马教廷的财力和物力。

乌尔班八世在宗教方面有很多强化正统天主教的措施。1627年，他成立了乌尔班神学院，专司培养神学人材，从该院培训出的人员对近代基督教事业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作出了贡献。1623年，取消了原教皇格利哥里十三世于1585年颁布的禁止西方传教士前往中国和日本传教的禁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乌尔班八世反对詹森派，谴责詹森主义的斗争。詹森主义的创始人詹森（1585—1638年）是荷兰天主教反正统派神学家。他生于盖尔德斯，1602年就学于卢汶天主教大学，1604年赴巴黎，1611年在巴约纳管理当地主教学院。他自1614年起系统深入地研究奥古斯丁著作，1617年返卢汶，与该地大学生一道反对耶稣会士。1628年开始撰写《奥古斯丁书》（死后由其友人于1640年出版）。1636年任比利时伊普雷主教，并死于该地。詹森派被教皇判为异端。

詹森派（又译"羊森派"）是17世纪天主教中支持詹森学说的教派。詹森派严格持守奥古斯丁的"恩宠论"，崇尚虔诚而严肃的教规，反对耶稣会通常所主张的"或然论"（天主教会内认为凡遇道德律，包括神律"上帝十诫"、教会法规和国家法律，当有两种以上不同的可能性时，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之一而行事）。在詹森派看来，詹森的著作《奥古斯丁书》是主要根据，"或然论"完全错误。在天主教中詹森派的神学主张便是詹森主义。他们以《奥古斯丁书》为根据，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自由意志随之而丧失，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肉欲

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便不能遵守上帝的十诫；上帝若赐给人恩宠，人的自由意志便不能抗拒。

詹森死后，他的门徒及追随者们认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对詹森的谴责，是歪曲了詹森的观点及其著作的原意，还强调了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皇而属于公会议。詹森派的后继者有：詹森的门徒杜威尔琪(Duvergier，1581—1643年)、阿尔诺特(Arnauld，1560—1619年)及其子安东尼·阿尔诺特(Antoine Arnauld，1612—1694年)将詹森主义传播到法国、荷兰等地。乌尔班八世在1643年曾发表通谕谴责詹森主义，并禁止阅读《奥古斯丁书》，但因从者甚众，未能奏效。在乌尔班八世之后，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将詹森主义斥为异端，下谕禁绝，但詹森主义长期有不少信从。

囚禁、折磨伽里略致死

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伽利列奥·伽里略(1564—1642年)，早在乌尔班八世任枢机主教时，曾和他是朋友。

伽里略是坚持和发展哥白尼日心体系学说的伟大科学家，早在1609年他便制作了第一架天体望远镜，用来观测天象。他发现了许多新的星体及其形状、距离和运行规律，1610年伽里略的名著《星空使者》一书出版。人们称赞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里略发现了新宇宙。”1613年，伽里略发表了《论太阳黑子的信札》，说明太阳和地球都在缓慢地旋转，太阳在原地转，地球绕太阳旋转。《信札》证实哥白尼的学说正

确，托勒密学说错误。伽里略发表其观点后，遭到罗马教廷和神学家们的群起攻击。他们主张研究任何科学都应以《圣经》词句为根据，而伽里略是“不敬上帝”者，其结论“荒诞”，违背圣经，散布邪说。伽里略要求持有怀疑看法的人最好亲自用望远镜来观察，他们当中有的人讲用望远镜观察天体本身就是亵渎上帝，干脆拒绝；有的看了却说一些行星是魔鬼的幻影。伽里略写信给号称“尊重学术”的修道院长、多明我派高级僧侣卡斯德里进行申辩，这位权威却答复道，伽里略就是异端分子，“比路德和加尔文更坏”。

1616年2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命令宗教裁判所重申托勒密的地心说是唯一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违背“圣经”和天主教教义，禁绝一切讲授、传播哥白尼学说的书。枢机主教贝拉明在2月26日召见伽里略，严禁伽里略信奉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

1623年，当马费里奥·巴尔贝里尼当选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后，1624年伽里略再次抵达罗马。希望罗马教廷撤消1616年对他的禁令。新教皇虽然款待了伽里略，但并未让步。伽里略的愿望没能实现。

1632年1月，伽里略写作的《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在佛罗伦萨出版了，此书根据实际观测和力学原理，充分论证了哥白尼体系的正确，批驳了地心说的荒谬。欧洲学术界热烈欢迎，宗教界的敌人万分恐惧和震惊。乌尔班八世下令起诉伽里略。1633年2月，这位69岁古稀多病的卓越科学家伽里略，被押送至罗马的异端法庭，他遭到各种刑具的威逼、恫吓和折磨，多次审讯后，迫使伽里略在1633年6月22日跪着

发誓，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错误”。但据传他发誓后又嗫嚅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地球还是照样旋转着！”

1633 年，伽里略被罗马教廷宣判终身监禁并禁阅和出版他的著作，所有支持过伽里略的人多被教皇乌尔班八世惩办。伽里略被囚禁期间很凄凉地于 1634 年目睹了服侍他的女儿的病逝。1637 年他本人双目失明，更加孤独，1642 年巨人悄然逝世。这种种遭遇，同乌尔班八世的迫害是分不开的，直到二百年后的 1835 年，才把伽里略的著作从禁书目录中剔掉。

一再干预别国内政的克莱门特十一世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欧洲处于封建制垂亡、资产阶级革命陆续爆发，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已成强弩之末，罗马教廷的政治作用日益下降的时期。登上教皇宗座的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Ⅺ，1700—1721 年在位)，原为意大利教士，原名季安・弗朗西斯科・阿巴尼(1649—1721 年)。他没有雄才大略和治世之才，也没有干整肃教纪、惩腐倡廉工作，主要事迹是在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走钢丝"；在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但他遭到惨败。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左右为难

1701—1714 年，英、法、奥之间为了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和争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与海上霸权而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在这场战争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前后态度不一，引起过双方的不满。

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二世(1661—1700 年)死后无嗣。当时因法王路易十四之王后为查理二世之姊，奥地利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之王后为查理二世之妹，故双方都要求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在垂死时，曾留有

遗嘱，指定了法王路易十四之孙、波旁家族的安茹伯爵腓力(1683—1746年)为其唯一的继承人，但规定西班牙不得并人法国。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指定法国腓力接班的这个遗嘱，得到了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承认和支持，引起了奥地利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不满，指责教皇不公正、偏袒法国。

西班牙王查理二世逝世，法国路易十四立即宣布其孙腓力为西班牙国王并称腓力五世，同时发出特别敕令宣布西王腓力五世将来有继承法国王位之权，意即西、法可以合并。

这样一来，法国同奥地利之间为争夺西班牙王位，自1701年3月起爆发了战争。英国、荷兰因早已觊觎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深恐被法国夺去，于是英、荷同奥结成反法同盟，先后加入的还有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依，站在法国一边的有腓力五世治下的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科隆两个属于德国境内的选帝侯国。战争主要以意大利、尼德兰、德国和西班牙为战场。

在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战争过程中，法国逐渐失利。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一世继承其父利奥波德一世为皇帝兼奥王，更加敌视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约瑟夫一世在1708年出兵意大利进攻教皇国，占领那不勒斯，1709年逼迫教皇承认其弟查理六世为西班牙国王。结果引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对克莱门特十一世的严重不满，公开指斥教皇出尔反尔，并公开宣布天主教的西班牙王国同罗马教廷断绝外交关系。

教皇在法兰西国内斗争中的困扰

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上台后，面对法国国内围绕"高卢主义四条"和詹森主义的传播，而处于困扰状态。

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时代，自1682年法国神职界宣布的"高卢主义四条"对罗马教廷不利。这四条是：世俗统治者拥有处理世俗事务的全权，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法国教会的习俗教务不受教皇干预和指挥，以及教皇并非永无谬误。经过罗马教廷与法国教会之间较长时间的斗争，克莱门特十一世时代，法国教会虽然不再强硬坚持"高卢主义四条"，但仍有保留和讲授之权。法王路易十四是支持"高卢主义四条"的，这对罗马教皇权是个削弱和打击。

在法国，伊普雷主教科尼利乌·詹森（1585—1638年）的影响很大，支持者甚多。詹森主义传播广，他们坚信奥古斯丁的思想。法王路易十四支持耶稣会敌视詹森主义，对詹森派加以迫害。詹森派有能力的新领袖帕斯基尔·凯斯内尔（1634—1719年）被迫逃亡尼德兰避难。凯斯内尔在1687—1692年间写成一本灵修注释书，名为《新约全书法文版。关于道德问题的思想》，简称《道德思索》，引起了耶稣会的仇视。在法王路易十四的要求和耶稣会的怂恿下，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了著名的《克莱门特通谕》，（又译《独生子基督》）谴责凯斯内尔书中的101条论点，其中有些是逐字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摘录而来。巴黎大主教路易·安东尼·诺阿耶枢机主教（1651—1729年）对《克莱门特通谕》提出抗议，并呼吁召开公会议。法

国国内法院的官员和多数教会支持詹森派，法王、耶稣会却赞成教皇的通谕，争论、对立的局面延续几十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在位期间，困陷于法国国内教派的斗争长期难于自拔。

干涉中国内政，遭康熙痛斥

在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以前，各国传教士对于在华的传教权便有争夺，特别是在中国的耶稣会、方济各会（佛兰西斯派）和多明我会之间神学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葡属耶稣会自 1585 年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权，1622 年罗马教廷设传信部，负责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直接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便与葡萄牙出现矛盾。1632 年后，西班牙属下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教士来华，为争夺传教地与葡属耶稣会产生矛盾。以后，法属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来华，同样出现争夺传教权之争，这些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礼仪之争"。

17 世纪里，"礼仪之争"已进行很久。1633 年西属多明我会的黎玉花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到中国福建传教，攻击耶稣会不应当允许当地教徒保留中国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仪传统，甚至禁止教徒执行中国的礼仪，引起教徒反对。1643 年多明我会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说明中国礼仪乃是异端宗教的典礼。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 年在位）根据多明我会提供的材料，在 1645 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国礼仪。在华耶稣会士闻讯派代表卫匡国回罗马进行申辩，并提供中国人祭祖、祀孔乃社会礼仪，并非宗教迷信的材料。教皇亚历山大七世

(1655—1667 年在位)听取耶稣会的意见后，于 1656 年颁谕“如祀孔、祭祖的礼仪，真如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教皇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多明我会反对，认为教皇此谕否定了前一禁令。不久，教皇克莱门特九世(1667—1669 年在位)、罗马教廷圣职部又下令“前述两项命令均有效。后者并不废除前者。应按实际情况看，事件和哪项命令中所说的吻合，即执行该项命令”。由于传教士们对上述三项命令，不知适从，随后 20 余年间传教局面混乱。1676 年来华传教士纳瓦雷特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历史及宗教风俗概观》一书，把中国礼仪之争的详况向欧洲作了介绍，从而争论的范围更为扩大了。

1693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到福建传教，他坚决反对中国礼仪，并再次把中国礼仪问题提交罗马仲裁，于是中国的礼仪之争进入了新阶段。听说颜珰派使回罗马，耶稣会士赶紧行动，在他们的呈请之下，中国清帝康熙于 1698 年作了中国祭祖祀孔礼仪不是宗教迷信的批示，耶稣会士火速送往罗马。

克莱门特十一世于 1700 年即教皇位后，公开支持多明我会，置中国皇帝康熙的批示于不顾，于 1704 年再下禁令，并派遣教皇特使图诺来华执行，公开反对中国民俗、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斥责中国教会同印度巴拉巴尔教会的礼仪类同。教皇当时认为印度坚持用古叙利亚语作礼拜的巴拉巴尔教派属于“异端”阿利乌派。这是教皇对事实的公然歪曲，中国民间祭祖、祀孔乃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绝不该与什么教派同日而语。康熙对外国传教士中的争论本无兴趣，他的既定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一保护来中国传播科技的耶稣会士，二坚持中国人

的祭祖祀孔乃传统礼仪，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教皇特使图诺抵华后，从 1705 年起，康熙多次召见图诺，优礼相待，多次向他阐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礼仪由来已久，罗马教廷无权要求中国放弃民族的礼节和传统。如果外国人在华不顾中国人民俗，很难传教。但图诺是为执行克莱门特十一世的禁令而来，1707 年，他不听康熙的一再劝告，终于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的禁令。康熙闻讯大怒，一面颁旨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凡尊重中国民俗礼仪并遵守利玛窦传教成规者，领取传教印票，继续开展宗教活动，否则一律驱逐出境；一面派人把图诺押解澳门，长期拘押至图诺病逝。

康熙坚持了中国主权原则，但罗马教皇尽管教权已日趋下跌，却仍然固步自封、一意孤行，坚决支持多明我会。他甚至指责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是卖主求荣。1715 年，克莱门特十一世再颁通谕，重申凡传教士必须恪遵教皇禁令，否则革除教籍。1720 年教皇再派特使卡洛来华，带有“八项准许事项”，仅许中国教徒祭亡人、供牌位等在一些细小方面略加放松，但仍拒不承认中国人固有的礼仪、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康熙先后召见卡洛十余次，无奈卡洛的任务是为了贯彻克莱门特十一世的禁令，敦促在华耶稣会改弦易辙，他拒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康熙坚决逐出了包括总辖中国教会总主教在内的大批教士，并硃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教皇特使卡洛离华前 1721 年在澳门发表公函，宣布“他本人不能更动教皇禁令上一个字，也不能暂时停止禁令在中国的效力。”这是对康熙的挑战。中国清政府对殖民者挑战的

答复是自 1723 年起，雍正、乾隆时代的长期禁教。

康熙同克莱门特十一世的斗争，实质是捍卫了民族文化传统，策略上晓之以理，绳之以法，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任人摆布，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庇护六世

18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的运动虽已筋疲力竭，但仍千方百计地维护封建统治。法国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天主教会斗争的前沿阵地。新的革命舆论，从梅叶发表《遗书》起，霍尔巴赫的《揭穿了的基督教》、《自然体系》，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自然宗教》以及狄德罗的《哲学思想》等，对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沉重地打击了波旁王朝的精神支柱，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欧洲在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广大人民群众痛恨天主教会。特别是耶稣会声名狼藉，许多耶稣会士干涉政治、投身殖民贸易、道德沦丧，更引起激进的理性主义者的唾弃。甚至不少天主教徒也对一些耶稣会士的行为嗤之以鼻。耶稣会士1759年被葡萄牙逐出葡境，1764年在法遭镇压，1767年又被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驱逐。前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于1773年7月不得不解散了耶稣会。这都是教权下降的典型表现。

法国大革命前的庇护六世

罗马教皇庇护六世(Pius Ⅵ,1775—1799年在位)原名为贾南杰洛·布拉斯基(1717—1799年),意大利人。在他上台之前,罗马教廷和法国天主教会已经同法国波旁王朝一道迫害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被驱逐以前,曾两次被关入巴士底狱,狄德罗遭到过监禁。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在1770年和1771年两次发布谴责伏尔泰著作的专门命令。1770年法国教会通过了谴责霍尔巴赫著的《自然体系》的决议,认为霍尔巴赫的学说"将把人民引到完全无法无天的地步。"

庇护六世任教皇时,欧洲斗争激烈,局势动荡。他在1775年颁布了反对自由思想著作的专门通谕。教皇列举自由思想著作产生的影响来说明"基督教徒的现状,在教徒当中致使我们同神联结起来的仁慈是多么的冷淡……"。庇护六世认为是启蒙思潮引起了人们"道德败坏、语言放肆、行为肆无忌惮的蛮横、不公正和犯罪行为已普遍流行"。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根据"高卢主义四条"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推行了"约瑟夫主义"的新的教会政策。他支持特里尔副主教查士丁·费布朗尼乌(1201—1290年)的主张,在1781年颁布《宽容法令》,对一些新教派采取自由宽容措施,同时限制天主教主教的权力及他们同教皇的联系,重新划分教区,将一批神学院交由政府管理,还解散了一批隐修院。罗马教皇竭力阻挠"约瑟夫主义"的贯彻,1782年曾亲赴维也纳进行活动,但并无成效。

庇护六世的演说和公告

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7月汹涌澎湃地展开了。8月4—11日，陆续通过了废除封建政治制度的法令，取消教会什一税等。8月27日通过“人权宣言”，提出了反封建的纲领，及资产阶级的法治和维护私有财产权。教会被宣布为国有财产，新政权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改组天主教会。它还规定了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即神职人员一旦成为国家官员，应脱离他对整个教会的从属关系，必须对现行革命制度和新政权举行效忠的专门宣誓。这样一来，教会人士便形成了几乎相异的两部分：宣誓的和拒绝同新制度合作的不宣誓人。当然已宣誓的神职人员并非全加入了革命行列，后来也有人成为敌对分子，但反对宣誓的确实是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

教皇庇护六世坚决站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前列。庇护六世于1790年3月20日，在他指导下的秘密宗教法庭中发表了演说。他愤怒地列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新措施并坚决予以谴责，又特别指斥了法国制宪议会，并号召采取一系列宣传的、外交的和其它行动来扑灭革命。

法国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以庇护六世为代表的国内反抗斗争的活动愈演愈烈。1790—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确定了新的行政分区，废除世袭贵族制和爵号，又颁行《教士公民组织法》等，坚持对教会改革。法国天主教会此后隶属国家，摆脱教皇影响，主教、牧师等由选举产生，一切教士均应宣誓忠于宪法。

1791年6月，法王路易十六化装外逃未逞，在发棱被扣留后，教皇庇护六世发表了告全体法国人民书，批判《教士公民组织法》，又谴责法国革命政府。他威胁道："你们，法国人，教皇的敌人，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发抖吧！全国都对你们这些人怀着极大的憎恨。我们的力量将联合起来对付你们……应该让你们知道，还有卫道者，还有为保卫正在被你们消灭的父辈们的宗教的复仇者。"庇护六世在1792年2月25日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发出了呼吁，要求各国组织力量讨伐革命的法国。那时，"欧洲列强准备联合起来消灭法国国民议会……"。因而"这个国家的旧的管理制度将在它的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庇护六世与反法同盟各国表示友好，把他的赌注押到各国反法同盟上。

1792年11月，法国宫廷锁匠加曼揭露了法王路易十六在秘密壁橱中所藏的与外国勾结的叛国文件后，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庇护六世在1793年6月17日又在秘密宗教法庭中发表演说。他痛斥革命思想及其哲学学说，他认为自由是对人们的诱饵；平等是幻想，这种幻想，"否定社会的一切基础"；新宪法是"亵渎神圣"，路易十六是宗教的殉难者。教皇向法国及各国天主教界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反革命纲领，力图复辟封建制。法国天主教界对教皇的这个教令，意见不一，议论纷纷. 有些向共和国宣过誓的僧侣不再跟教皇走，但宗教界群众的多数还分辨不清，思想混乱。在旺代发生的保王党和天主教的反革命暴乱中僧侣成了主力军，暴乱者以白旗和白帽徽为标志，所有的人都戴肩章和念珠。最后失败的叛乱者中有数百名神职人员被斩决。

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

法国 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1769—1821)在政变后短期被囚。1795 年秋,拿破仑因指挥平息葡萄牙王党叛乱有功,任内防军司令。1796 年春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次年拿破仑打败奥地利,6 月入侵教皇领地。1797 年拿破仑迫使庇护六世同他签订停战协定,1798 年法军进占罗马,并将其改建为共和国。拿破仑命令将教皇带回法国。这时教皇庇护六世已是 81 岁的耄耋之年,他眼见在拿破仑士兵的铁蹄下,罗马许多教堂被毁,作礼拜活动大受干扰,神父倍受轻视,极为悲伤。他看到法国占领军虎视眈眈、耀眼的刺刀,混身发抖。他乞求他这把老骨头留在罗马不走,但法国士兵根本不予理睬,庇护六世被法国大兵"像一捆干柴一样扔到马车之上",押往法国。1799 年 8 月 29 日教皇庇护六世在法国巴黎东南的瓦伦斯的监狱中含恨而亡。

在庇护六世任期内,1797 年教皇同美国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但直到 1867 年教皇庇护九世时,双方才互派"公使"、"代办"及地方上的领事。

庇护七世同拿破仑的斗争和罗马教廷的新转折

前任教皇庇护六世被拿破仑侵意军队掳押至法国瓦伦斯狱中，于1799年8月含恨而亡后，罗马教廷一度陷于混乱，天主教会势力大为削弱。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1799年11月举行雾月政变后，并未放松对罗马的统治。罗马教廷中一部分流亡国外的枢机主教，在奥地利国王的支持和保护下，于1800年在维也纳召开秘密会议，推选出罗马枢机主教巴尔纳巴·基亚拉蒙蒂（1742—1823年）为新教皇，即位后法号称庇护七世(Pius Ⅶ，1800—1823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14年前)主要是同拿破仑周旋，坚持斗争而受辱和被囚；后一阶段(1814年后)在"神圣同盟"支持下，他重视教义和调整改革、意志坚强地使罗马教廷及天主教会有了新转折和复兴。而耶稣会得到恢复，以及越山主义思潮的兴起，更是庇护七世对天主教会的重要贡献。

同拿破仑的周旋

庇护七世是一位具有谦逊、自省能力、善于用人、会办外交的教皇。他58岁即教皇位后，挑选了一个精通法律学的枢机主教康萨尔维（1757—1824年）任罗马教廷国务卿。此人年

富力强，是才能突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与拿破仑的关系比较接近，多次代表庇护七世外出谈判，同时重视教廷内部的调整改革，力图恢复教廷的威信和作用。拿破仑这个人虽没有多少宗教感情，但他经"雾月十八日"政变，于同年 12 月当上"第一执政"后，决心破除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无神论和自由理性思考的习惯。他鉴于大多数法国人是天主教徒，故力图利用天主教会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经过同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的谈判，结果法国政府于 1801 年 4 月同罗马教廷达成"政教协定"的签约，1802 年又加进组织条款。根据这两个文件，双方决定，法国政府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正式恢复天主教的活动。但也容纳加尔文教派、信义宗教徒和犹太人教。天主教不再是法国国教，天主教的主教和首府大主教由政府提名，教皇任命。教区数目减少为 60 个。下级神职人员则由主教任命，但政府有权否决。各教派神牧人员的薪金一律由政府发放，他们必须宣誓永远效忠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教会事务由国家管理，教会要服从国家，教士服从政府。按该协定，教会放弃被没收并且已不归政府所有的全部地产，即不打扰新的土地所有者；但土地若仍在政府掌握中的则应归还教会，教皇宣布不恢复什一税。以上各条款，表面看来双方妥协，但最重要的是组织条款中加进去的规定共有 77 条，大部分对教皇不利。其中未经法国政府允许，教皇不得发布敕令、通谕、文告、信件，不得举行法国宗教会议；实际是教皇不得在法国行使任何权力，这个内容更遭到庇护七世的抗议。此后数年来，拿破仑同教皇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睦。

庇护七世受辱和被囚的经过

1804年12月，拿破仑·波拿巴准备称帝，他下令让教皇速到巴黎来为他加冕，庇护七世立即赶到巴黎圣母院。当加冕仪式进行过程中，庇护七世刚举起皇冠准备亲自给拿破仑加冕时，不料拿破仑却从教皇手中将皇冠夺到自己手中，并示意教皇走开，拿破仑自己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拿破仑的举动引起教堂内一片哗然，教皇受到奇耻大辱，面色苍白，无地自容，但却无可奈何。拿破仑给自己行完加冕礼，称拿破仑一世。从此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年)。在加冕宣誓时，拿破仑不按照传统的宣誓内容，如讲效忠教会、反对异端分裂而只讲保证宗教自由，实际是保证掌权者利用宗教的自由。拿破仑确实使法国境内新教和天主教处于同等地位，他也控制新教，利用新教实现其政治利益。拿破仑自己加冕登上皇位，是有意贬低教皇，接着他把教皇像仆人似地打发回罗马。

拿破仑利用天主教巩固专制统治的一个明显实例是1806年颁布的在法国所有学校共用的必修课本《帝国教理问答》。该书是经拿破仑亲自审订的。其中将传统的《教理问答》中"效忠上帝"等词句全改成"效忠拿破仑大帝"。还有下述条文："上帝……要拿破仑皇帝成为行使自己权力的工具，成为自己在人间的化身……"、"基督徒应对统治他们的拿破仑皇帝陛下表示爱戴、尊敬、顺从和忠诚，应当服军役和纳税。""谁不效忠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所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生受谴责，他的灵魂将永远毁灭，受地狱永罚。"这样的

《帝国教理问答》,成为法国学生必诵的“圣律”,教皇特使并不敢下令停止发布。拿破仑狂呼自己靠三大工具维护统治,即“我的地方官吏,我的主教,我的宪兵。”

庇护七世一直不甘心屈服于拿破仑。1808 年,拿破仑派兵占领罗马。1809 年,拿破仑宣布罗马是“自由帝国的城市”,教皇国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规定教皇只能管理罗马城的宗教事务,付给教皇年俸 200 万法郎。愤怒的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对教会活动的支持者全部开除教籍。拿破仑公开声明,他的士兵不会因为被开除教籍就放下手中的武器。重兵在握的拿破仑下令逮捕庇护七世,把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们全部押解到法国巴黎,统统成了拿破仑的阶下囚。1811 年,拿破仑召开法国天主教的宗教会议,强迫教皇同意法国教会的独立。1812 年,拿破仑又将庇护七世押解到枫丹白露,迫使教皇再签屈辱的协定。但 2 个月后,被囚的庇护七世公开表示协定没有法律效力。拿破仑认为庇护七世主要助手,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是个能力强、有计谋的人,故将其流放,以使庇护七世失去能干的帮手。

1813 年,反拿破仑的英、法、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奥地利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0 月在莱比锡同法国决战,双方投入兵力各约 60 万人,史称“民族大战”,法军大败。1814 年 3 月 31 日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退位。教皇庇护七世被囚数年后获得自由,返回罗马,此后开始了罗马教廷的新转折。

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的恢复、改组

反法联盟各国在击败拿破仑后，于1814年10月1日召开维也纳会议，直到次年6月9日结束。中间有过拿破仑在1815年3月1日开始的"百日事变"，战争再起。经过滑铁卢激战(1815年6月18日)，第七次反法联盟，彻底粉碎了拿破仑。维也纳会议中，罗马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代表教皇庇护七世出席了会议。由反动的封建势力占主导的维也纳会议，主要目的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封建统治，阻止新的革命运动的发生。会议通过了恢复封建法统的决议，并决定由罗马教廷重建教皇国。

在维也纳会议召开之前，1814年8月，庇护七世和康萨尔维便正式恢复了被克莱门特十四世于1773年被迫解散的耶稣会。耶稣会为罗马教廷的复兴出谋划策，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恢复后的耶稣会注意本身的形象，他们调整组织，改进工作，反对奢侈腐化，重视对外传教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耶稣会很快发展成为天主教中最大的修会，在对亚非开展文化教育、传播科技等活动中贡献很大。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教皇收回意大利境内的部分领地(约400平方公里)，由奥地利派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北部对教皇国负责保护和支持。庇护七世于1815年重新收复罗马后，采纳了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的建议，在教廷内部实行廉政并加以改组。他同前几代教皇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庇护七世十分重视从内部整顿天主教会，宽严结合。他一方面缩小对立

面，对原来被视为天主教会敌人中的一些人实行宽容政策，同他们和解。对异端法庭的诉讼程序加以修改，使之尽量符合通行的法律程序。例如改秘密审判为公开审判，又建立了公诉制度和被告保证制度等等。但另一方面，对德、奥的自由思想加以打击，在1816年对共济会和适应人民需要的圣经翻译工作认定有罪，这是庇护七世政策中仍有保守和反动一面的表现。

1815年9月成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以保卫君主政体和基督教义为号召，它竭力支持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它的原则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庇护七世以恢复中世纪教权极盛时代为目标，亦积极开展活动。19世纪20—30年代是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恢复、巩固的时期。

灵活的外交路线和越山主义兴起

1815年教皇庇护七世和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在重建教廷权威的过程中，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取得了新的合法地位。欧洲各国多愿恢复并维持宗教、和平和秩序，故多数国家的统治者愿与教皇合作，因为教皇是基督教国家传统的领袖。而庇护七世亦广泛联系法国、西班牙国内反拿破仑的力量，同拿破仑余孽作斗争。拉丁美洲于1810—1826年间陆续爆发了西属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许多国家相继独立，仍以天主教为国教，庇护七世推行积极政策，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

庇护七世在复兴罗马教廷权威的活动中，很得力于新浪漫主义和越山主义的帮助。

新浪漫主义兴起于19世纪初。它对文学、艺术和宗教曾发生过特别的影响。浪漫派注重情感，主张应从现代十分复杂的文明恢复到往日较简朴的生活中去，这种恢复包括对古代和中世纪要重新估价和给予肯定。他们坚决反对支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种新的估价，实际上是对天主教会及其历史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的倒退。新浪漫主义把罗马教会理想化了。在新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一些新教徒受感染后，决定重新皈依天主教。在英国出现的牛津运动更是明显的例子。牛津运动的领袖纽曼（1801—1890年）竟然从英国教会中引导和影响了150多新教的牧师转而改教到天主教方面来。

尤应强调的是越山主义的重大影响。越山主义兴起于1820年。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教皇的无上最高权。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一切宗教的和道德的权能应集中在罗马教皇的办公室中，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民族教会和地方教会之上，而且教皇关于信仰和道德方面的判断和裁决是无错误的。为什么称为"越山主义"呢？因为从欧洲的西部、北部看，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观点看，意大利是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他们尊崇的是山南那一边的教皇，故称之为越山主义。标准的越山派的观点是，幸亏有了教皇，而且必须由教皇主宰尘世的一切。越山派的具体理论逻辑是：若没有一个无错误的天皇，便不能有教会；无教会便不能有基督教；若无基督教便不能有宗教；无宗教便不能有这文明的社会，以此类推，便是真理。

庇护七世时代，越山主义的势力，因"传统主义三先知"的著作而增强。这三先知是：(1)约瑟夫·马里·迈斯特(1254—1821年)，(2)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卢瓦斯·博纳尔

(1754—1840年)，特别重要的是：(3)胡格·费利希特·罗贝尔·拉梅内(1782—1854年)。1814年，新恢复的耶稣会对越山主义思想的传播出力甚大。

1823年，教廷国务卿康萨尔维还同许多国家达成过一系列协议。后代对庇护七世时代重振教会事业的评价不一。有些人认为庇护七世推行的开明改革和灵活外交是让步求和解的投降、软弱政策。但实践证明庇护七世从1814年以后的政策在教权走下坡路途中，使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得到转折和复兴，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庇护七世在天主教会中的业绩不容抹煞。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前后的庇护九世

庇护九世(Pius Ⅸ,1846—1878年在位)是教会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罗马教皇,是天主教会封建主义时代结束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重要标志时期的教皇。1848年在席卷欧洲的革命高潮中,罗马教皇的政治态度经受了全面的检验并得到充分的表现。

庇护九世原名为马斯塔伊·弗列底(Mastai-Ferretti,1792—1878年),出身于意大利塞尼加利亚的贵族家庭。1819年任神父,1823年晋升为罗马教廷驻智利公使的秘书,1827—1832年担任意大利罗马教廷辖区斯波莱托的总主教,次年又被调往伊莫拉。1840年升为枢机主教。1846年教皇格利哥里十六世逝世时,弗列底的名气虽不大,但枢机主教团经过两天的秘密选举后,将弗列底选为新教皇,称庇护九世,在位32年,既是教皇、也兼最后一任教皇国的世俗君主。庇护九世在位期间,于1870年教皇失去原有的庞大教廷辖区,而只剩下梵蒂冈及其附近地区了。

缓解政治危机的温和改革

在庇护九世当选教皇之前,意大利境内波伦亚、卡拉布里

亚和里米尼等地都已爆发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庇护九世为了缓解矛盾，他一即教皇位便在教皇国领地内宣布释放政治犯，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成立咨询会，设立国民警卫队以及召回被放逐的科学会议成员等等。新教皇的这些让步和新措施，使庇护九世一度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爱戴，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改革的形象。有一段时期，新的改革又开始酝酿，如计划修筑铁路，提出了改善法律和司法的计划，而且有关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问题也着手考虑了，甚至开始任命了一些委员会。人们通过喝彩、欢呼和采取游行以表示支持。这一切鼓舞了既自负又敏感的庇护九世。

罗马教皇的温和改革中有一个设立国民警卫队的问题，被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所利用，他扬言若把武器交到人民手中，那是最危险的问题，所以在教皇当选的周年纪念日（1847年6月1日），一支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军队开进了教皇辖地上的斐拉拉城。奥地利的侵略行为引起了意大利各阶层的广泛抗议，意大利各地反奥维护独立的斗争出现高潮。自由派和教皇联合起来。托斯坎纳的人们要求出版自由和设立国民警卫队的要求不断高涨，在皮埃蒙特，成群结队的人欢呼并向教皇呈献玫瑰形徽章，热那亚一直是激进的城市，率先向撒丁王国的国王要求改革，1847年10月，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颁布了一长串改革方案。这时给予旧秩序沉重打击的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爆发的起义，把那不勒斯的驻军驱逐出去，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半岛大陆上。1848年1月，一个月内撒丁、托斯坎纳和稍迟一点的罗马等城市仿效西西里都发动了起义。庇护九世为了防止革命运动规模扩大，一方面向外转移矛盾，联络

军队参加意大利人民的反奥战争；另一方面同意在意大利进行改革，成立资产阶级内阁，以便缓解矛盾，但事实证明未能如愿。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头

1848 年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在领袖马志尼（1805—1872 年）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出现了反对奥地利侵略的斗争高潮，罗马成为斗争的中心。1848 年 11 月 15 日，罗马教皇的助手、对奥求和的倡导人罗西主教被人刺杀，次日，罗马人民进袭教皇宫廷，迫使庇护九世同意成立世俗内阁，于是在意大利出现了自由派内阁，推进民主改革活动。11 月 25 日，庇护九世在法国和巴伐利亚大使的帮助下，化装成平民，星夜钻进巴伐利亚大使夫人的马车，逃往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在那里，庇护九世依靠两西西里王国国王的保护，他的政治态度从原先对奥斗争的动摇而大转弯，他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各地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庇护九世还鼓动亚平宁山区的居民叛乱，反对 1848 年意大利革命。

1849 年 2 月 5 日，在意大利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罗马制宪会议，决定成立罗马共和国并宣布取消教皇统治罗马国家的世俗权力。威尼斯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面对奥地利和法国的共同镇压与包围，对侵略军予以抗击。尽管当时食物严重缺乏，霍乱疾病流行，1849 年春、夏两个共和国的保卫战，仍然在 1848 年意大利的革命史中谱写了令人赞叹的篇章。以马志尼为核心的三头政治，在罗马实行改革政策，使穷苦的农民和

牧羊人受益，粮食税等各种赋税减轻了，诉讼费也大为降低，共和国接收了教会的房屋和资产，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一种强派征收的公债使富裕的罗马人同共和国政权疏远起来。马志尼拒绝禁止出版自由，罗马的革命更重视解决社会矛盾。

法国提供4万军队供教皇庇护九世在意大利进行复辟的军事活动之用，西班牙提议举行天主教大国的代表大会，并且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到意大利，奥地利侵略军则攻占了波伦亚。当时，罗马共和国军事统帅加里波底虽然仅统率1万人左右的部队抗击列强的侵略，却表现得十分英勇。4月，法国将军乌迪诺率军在意大利登陆并向罗马挺进，但法军的两师人全被加里波底击败，只得退却。6月3日，乌迪诺拼凑援军3万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到7月3日才进入罗马，乌迪诺宣布无条件地恢复教皇对罗马的统治权，并留下一个师以维持统治。加里波底无奈，越过亚平宁山，撤退到托斯坎纳。1850年4月教皇庇护九世返回罗马，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刺刀护卫之下，继续担当教皇国的世俗君主，坚持其对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1849年8月，威尼斯经过激战，终于众寡不支，而向奥地利军投降，庇护九世在1848年意大利革命中反对意大利统一，反对民主和进步，反对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庇护九世的一些新的政策措施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庇护九世于1850年4月返回罗马后，趁各地出现白色恐怖和复辟之机，罗马教廷加紧了对外

活动。1850—1853年间，天主教在一些新教流行的国家中，如荷兰、英国和美国等，都取得了自由传教权。本来庇护九世对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热心，曾坚决反对在教皇国中铺设铁路，但这时，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教皇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热心与英荷等国合资经营，例如1852年开设的英吉利—罗马煤气公司便获得了大宗利润。

从卡沃尔伯爵与教皇庇护九世之间的关系亦可看出教皇的态度。卡沃尔曾被意大利学术界称为"四大国父"之一[①]。卡沃尔伯爵于1852年11月4日担任意大利撒丁王国(包括皮埃蒙特和撒丁岛)的首相后，他虽然忠于基督教传统，但力主并从事了意大利统一的活动，主张国家拥有自主权，教会与国家分离，反对教会干预国家生活，这便同教廷发生矛盾。卡沃尔本人多次试图与教皇取得和解，他也曾托友人政治活动家庞塔略尼(1810—1885年)和帕萨里亚(1812—1887年)给教皇带去"橄榄枝"，均遭拒绝，而庇护九世原来对卡沃尔本人是尊敬的，但因政见的尖锐分歧，终于在1861年5月25日对卡沃尔下了罪名："同所有犯有侵害教廷罪的肇事者、怂恿者、策划者、同谋者"一样，故被公开开除了教籍。

庇护九世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谨慎态度，如对于1859年法、意同奥地利的战争，这本来是从意大利将奥势力逐出的战争，教皇竟然宣布中立、不介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54年12月庇护九世颁布"玛利亚无原罪成胎谕"。这个通谕乃是教义中的重大建树。关于圣母

---

① 另三人是：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尔二世、马志尼及加里波底。

玛利亚是否也有原罪的问题，在经院哲学时期曾反复辩论过这个问题。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对此长期争论不休。[①]庇护九世在与天主教会各主教商量后，宣布圣母玛利亚无原罪始胎，即圣母没有原罪的任何污点。通谕道："童贞圣母玛利亚之成胎，是全能的上帝因预见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而赐予的特殊恩宠，因此她仍是纯洁的，没有原罪的任何污点。"庇护九世这样做，把19世纪以来教会中趋于一致的意见提高为信条了。

宗教裁判所活动甚久，罪行多端，为人们所深恶痛绝。西班牙国王在1835年曾下令取消国内的宗教裁判所（"异端法庭"）。庇护九世在1859年也发表通谕取消宗教裁判所，但保留它的某些职能，这些职能由罗马教廷中的专门机构执行。

公布《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教皇永无谬误"论

在庇护九世主持下编写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又名《邪说提要》）于1864年发表。该汇编谴责了大多数基督徒所反对的许多事物；否定了许多新的思潮、学派和组织；同时还斥责了当时国家赖以为生存基础的许多重要原则。总共被列举了80种"邪说"，从它们的题目中便可窥见一斑。如：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性主义、信仰淡漠主义、共产主义、放任主义、秘密结社、圣经公会、自由教士会、关于教会及其礼仪、关于世俗

---

① 法兰西斯会根据邓斯·斯科特斯的学说，确认玛利亚无原罪成胎说。多米尼克会则根据阿奎那的学说，认为玛利亚与其余人一样，承受了原罪。

社会及其与教会之关系，关于自然及基督教伦理道德、关于教皇世俗权力的邪说、现代自由主义邪说，等等，在《汇编》中公开斥责了政教分离、学校不分宗教、对各种宗教实行宽容等，甚至还公然反对新教会的权威、反对宗教上的不干涉主义、反对时代的主观精神，等等。在结尾时，《汇编》还指出，凡主张"罗马宗座可能而且应当同意进步、自由思想、现代文明并与之相协调"的，应被治罪。

1869年12月8日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是庇护九世任罗马教皇期间最登峰造极的事件。从全世界各地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数量甚大，最后在1870年7月18日会议以532票对2票批准"教皇乃最高权威"、"教皇永无谬误"的决议。这次会议有过激烈讨论，除了对上帝、启示、信仰和理性等方面，在教义上作了规定外，还历数了当代的邪说，并为基督的教会制定了重要信条，该信条计有四个要点，即：一、来自使徒圣彼得的至高无上地位；二、彼得的这种至高地位为罗马教皇所永远继承；三、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统治)的性质及权威；四、教皇永无谬误。这次梵蒂冈公会议的决议，表现出越山主义[①] 的胜利，是教皇绝对专制的表现。其确切而具体的涵义是："罗马教皇在其以教会元首身份发言时，即在其作为全体信众之牧人及导师行使职责时，由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使徒

---

① 越山主义起于1820年，其目的在于拥护教皇的无上权。主张一切宗教和道德的权能应集中在罗马教皇的办公室中("越山"，是从法国人和德国人看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观点而来)。标准观点是：若没有一个无错误的教皇，便不能有教会，无教会便不能有基督教，若无基督教，便无宗教，无宗教便不能有这文明的社会，耶稣会的人是越山主义的坚决拥护者。

权威，有天主许给圣彼得的助佑，他为普世教会所当共同遵守之信仰或道德规定的教义，乃永无谬误的，因为神圣的救主确定，他的教会就信仰或道德制订教义时，应享有此种权利；因此，罗马教皇所作此类决定，其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也为教会公意所不能改变。”

教皇宣扬的“一贯正确”、“永无谬误”论，实际表明教皇永远是“真理的唯一代表”，它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内的开明派，是教廷对科技成果的敌视，使天主教会部分地丧失了知识界对它的支持，教皇个人“永无谬误”论的决议，使“梵蒂冈公会议权威至高”的说法破产了，庇护九世利用这个决议作为反对新的政治原则和反对自由思想、反对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武器。

从此开始了“梵蒂冈囚徒”的阶段

教皇庇护九世利用1864年公布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1870年制定的“教皇永无谬误”信条，力图阻挠意大利的统一。但是，1848年意大利革命以来，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浪潮一再高涨。维托里奥·埃马努尔二世（1849—1878年）统治下的撒丁王国（建于1720年）和法国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联合对奥地利作战，得到了意大利加里波底（1807—1882年）领导的民族独立力量的热情支持。联合反奥作战的结果是1861年意大利王国的建立，埃马努尔二世任国王，往昔教皇国的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意大利王国之内。

维托里奥·埃马努尔二世与教皇庇护九世两者之间的关

系十分微妙。早在1855年2月9日，埃马努尔二世由于母亲和妻子相继逝世而悲痛神伤之际，他在给庇护九世的信中便对皮埃蒙特境内教会的陋习、对于撒丁王国宗教的沦落深表不满。他的信中写道："假如皮埃蒙特境内的教士们布施的仁爱能赶上其他王国教士们的一半……那么通情达理的皮埃蒙特政府便会怀着对教皇的无限恭敬，制止令教皇不悦的事态继续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态，系形势所趋……"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埃马努尔二世是在征战中获胜的君王，他虽然忠于天主，但一心想的是如何扩大国家版图和帝王权势，他很少读书，却崇尚武功，易冲动，爱挑战，又十分精于算计；而庇护九世则是神权政治的维护者，他时刻没忘恢复教会势力的责任，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初期，庇护九世实行过的温和改革和自由主义政策并未维持太久，当人民运动蓬勃兴起时，庇护九世便急转弯，并采取了镇压群众的反动政策。庇护九世不能指望撒丁国王有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国王对教皇的建议或告诫并不重视，而是竭力采取削弱罗马教廷的政策。

因为法国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年）奉行越山派政策，故罗马及其附近地区保留给教皇。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维托里奥·埃马努尔二世统率下的意大利军队趁驻罗马的法军撤离之机，于9月20日攻占罗马。10月当地居民投票表决罗马的归属问题，结果以10.3万票赞成，1.5万票反对，将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1871年5月13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教皇与至圣宗座特权法"（"教皇保障法"）中规定，教皇本人"神圣不可侵犯"，享有与君主同样的

各项特权，不受意大利的法律制约，在意大利国内和国王一样享有尊荣，王国每年付给教皇 322.5 万里拉，作为津贴；在国外享有处理世界教会事务的自主权，教皇绝对享有梵蒂冈教皇宫、罗马城内的拉特兰宫、安多尔福堡。这样一来，便结束了当时在欧洲连续长期存在的古老的世俗主权国家——教皇国，教皇原有的领地被剥夺了。1870 年以前，罗马教廷的辖区为 180 万公顷，人口 300 万人，而 1870 年后，教皇仅辖有梵蒂冈及附近地区，面积仅 44 公顷，人口不到 1000 人了，意大利政府每年向教皇拨款 322.5 万里拉作为教皇津贴，以补偿丧失领地的损失。

教皇庇护九世对教皇国领地的丧失，辖区缩小到梵蒂冈及附近地区异常不满，而提出抗议，教皇拒不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不接受"教皇保障法"。他以"梵蒂冈的囚徒"自称，并宣布将埃马努尔二世革除教籍。

从 1870 年直到 1929 年教皇与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解决了"罗马问题"以前，罗马教廷一直拒绝承认其世俗领地的丧失。此后教皇活动主要在梵蒂冈，加冕式则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进行。意大利其他地区实行政教分离。罗马教廷长期坚持它的所谓"圣彼得的领地"权，甚至发动各国天主教徒向教廷捐款以弥补财政损失，号召各国天主教会帮助教廷为恢复教皇国而斗争。但历史车轮难倒转，昔日的教皇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第一个“资本主义教皇”利奥十三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统治梵蒂冈长达25年之久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年在位)，是现代经院哲学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他热衷于资本主义的金融活动，企图重新确立罗马教廷在现代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开辟了教会史上罗马教廷与资产阶级政权合作的新时期。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奥十三世，又译为“良十三世”。原名为乔阿基诺·佩契(Gioa-Cchino Vincenzo Pecc，1810.3—1903.7)，贵族家庭出身，青年时代便聪颖过人，富有学识。1831年(他21岁)时获得博士学位。1837年任神父，次年起历任大主教、教廷驻意大利贝内文托、斯波莱托和佩鲁贾等城市的代表。1843—1845年领总主教衔，任教廷驻比利时布鲁塞尔总代表。1846年起任佩鲁贾教区总主教。1853年升任为枢机主教，1877年任罗马教廷事务长。1878年2月，教皇庇护九世逝世后，乔阿基诺·佩契以近古稀之年当选为新教皇，是为利奥十三世。

普法战争爆发及意大利军队进驻教皇领地和罗马，梵蒂冈宗教会议停止活动(1870年10月20日)后，教皇几不复存在。从此在天主教会史上进入了艰难时期。新教皇利奥十三世，是一位有学者内涵，具有超众才能、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

才干的人。面对19世纪新教传教事业的“伟大的世纪”，他一上台便把重新树立天主教会的权威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力图使天主教适应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利奥十三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新措施，在19世纪末，使罗马教廷和天主教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到一起，并扩大其影响，开始了天主教“复兴”的“伟大的世纪”。

罗马教廷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

资本主义时代，天主教不断地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宗教组织也逐渐沦为资本组织的附庸。在中世纪，教会及其有关的组织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而如今，天主教会却逐渐变为资本占有者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参加者。

教皇利奥十三世上台后，非常重视扩大罗马教廷的经济利益。据当时德国驻罗马武官恩格布列赫特掌握的情况向德国报告中提道：教皇庇护九世死时，梵蒂冈的财产共有8000万里拉。利奥十三世接受法国投机商邦特的建议，决定将梵蒂冈的财产化为资本。他与意大利一些大银行家合作，建立了“罗马银行”(1880年)，积极参与金融业务、证券、贷款等活动。迄1899年底，梵蒂冈的财产估计约有1.4亿里拉，此外，梵蒂冈的不动产价值约12000万—15000万里拉，而梵蒂冈每年的预算约600万里拉。参加创立“罗马银行”的意大利贵族中有帕切利银行家族。据沙皇驻梵蒂冈代表的报告称，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献给梵蒂冈的捐款平均每年有600—700万法郎，而逢圣年时则多达1000万—1200万法郎。

利奥十三世本人热衷于证券股票等投机活动。他当上教皇不久，1878 年便下令在他的私人小礼拜堂中专门设置一个防火的保险柜，用以贮存他个人私有的股票和有价证券，其中有法国、奥地利的，巴伐利亚和比利时的。几年后，这个保险柜装不下时，又添置了第二个。教皇本人是个千万富翁，1893 年，利奥十三世庆祝自己当选教皇 25 周年时，曾解私人之囊用 5 万里拉布施穷人。1903 年 7 月 20 日利奥十三世病逝时，他所拥有的私人财产额说法不一。有人说约有 3200 万—3500 万里拉，也有人估算为已超过 4000 万里拉。大笔钱款中有不少是有息证券，既有意大利的，也有外国的。此外，利奥十三世还专门留有现金 70 万里拉，作为自己的殡仪费和教皇选举会的用费。一向标榜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穷的长者”的他，一下赠给穷苦人 5 万里拉曾被世人誉为“卓越的仁爱之举”，其实那仅仅是他财产的 1/800(从 4000 万里拉中抽出 5 万)而已！

利奥十三世积极参加各种企业和金融活动。他开办各种公司和扩大投资，成立了梵蒂冈的“电车公共汽车公司”，又通过罗马银行给意大利巴契里家族贷款，创立了迄今仍存的著名的“庞泰涅拉面粉公司”，垄断了罗马的面粉业。梵蒂冈的信贷机构——“罗马银行”、“罗马通用银行”、“手工业者银行”和“信贷银行”等拨出巨款，在罗马大量兴建房屋，由梵蒂冈的两家企业(“不动产公司”和“贫苦者与劳动群众房屋建筑公司”)从事房地产的投机事业。梵蒂冈的代理人在意大利各地遍设水灾、火灾和人寿等方面的保险公司。罗马教廷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在教徒中宣扬说，参加教会创办的保险公司，可以“消

灾免难”，他们利用“保险”业务，谋取利润。到19世纪末，罗马教廷的金融资本已垄断了罗马的面粉、自来水、交通运输、建筑和电力、煤气等行业，直到今天，梵蒂冈的资本仍然在罗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罗马银行”的金融活动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它先后在许多地方设立了分支机构。罗马教廷的金融活动使教皇的命运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现代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

教皇利奥十三世上台伊始，便着重解决两个突出重要问题：一个是天主教对待当代发展变化的科学、哲学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协同各国世俗政权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方面，新教皇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

利奥十三世坚信没有教会和天主教的权威，文明的最高目的是不会达到的。他同前任教皇庇护九世一样，支持越山主义派的观点，对时代精神毫不退让。他从中世纪的天主教哲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找到了神的启示和人的理性，以及信仰和知识之间最和谐的统一。他认为这就是抵制非基督教哲学的解毒剂。他上台的翌年(1879年)便颁布《永生之父通谕》，宣布所有天主教哲学和神学课程都应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基础，一切神学院和天主教的教会院校必须把阿奎那哲学定为必修课。他还要求阿奎那哲学要同现代科学的任何发展“结合起来”，以便能有新的发展。1880年，在罗马开办了托马斯主义学院，在比利时的卢汶天主教大学设立了

经院哲学教研室。利奥十三世下令出版托马斯·阿奎那全集。由于教皇的倡议，托马斯·阿奎那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开始得到复兴。因此可以说利奥十三世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后一个老托马斯主义者，又是现代经院哲学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他甚至宣布阿奎那的学说是天主教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标准。

利奥十三世拥有学者的气魄风范，主张科学研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过去对圣经的研究，被字句、“灵感说”所限制，因而鼓励重新研究《圣经》，还开放了梵蒂冈的珍藏，以便有利于对历史的深入研讨。他恢复了天主教对于神迹、崇拜圣徒、敬服玛利亚、主张大赦、提倡对圣念珠的信仰。他特别重视怜恤和圣洁的生活，对于修道院的生活，以及天主教的青年运动都予以支持。

利奥十三世“社会”活动的加强和机动灵活的教廷外交

从19世纪末起，罗马教廷便被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以后，利奥十三世时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便逐渐在罗马教廷的全部宗教和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1878至1903年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颁发了教皇通谕共有30多次，在教皇的所有言论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号召加强“社会”活动，同“离经叛道思想”进行斗争，实际是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作斗争。

新教皇的第一号通谕《深奥莫测的天主》(1878 年 4 月 21 日)中，提到破坏教会威望和危及国家的“社会秩序的敌人”，实际就是指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人们。教皇的《关于使徒的职责》(1878 年 12 月 28 日)以及《持久性》(1881 年)等都包含有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内容。利奥十三世认为社会主义者拒不服从最高当局，也蔑视教会的权威。这样一来，在教会的教义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之间便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主义者主张“人与人之间天生平等”，而教会则教诲道“不平等源于造物主”，私有权和占有权是天主的权利，私有财产是“合法继承”，或“由于节俭获得”，因而必须由所有者掌握不受侵犯。利奥十三世早在 1878 年的通谕中便支持在宗教庇护下成立工会，以便组织工人们能“安于天命”。他宣传道，即使君主滥用职权，天主教教义也不允许擅自造反作乱。

利奥十三世一上台便特别重视罗马教廷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于 1878 年在致德皇书中表示希望改善德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信尾写道：“陛下的天主教臣民都是安分守己忠诚不渝的”。1878 年在致德皇的书信中提到“危及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的”“毁灭性学说”，教皇指出，为了与之作有效的斗争，德国政府和教会之间需要和解。因从 70 年代起，德国俾斯麦曾掀起反教权主义的斗争，他听取了医生鲁道夫·维尔肖的建议，冠之以“文化斗争”的美名，掩盖了真实目的。德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了教会势力，以致教廷与德国关系紧张。教皇努力缓解，妥协了事。

利奥十三世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对外国从不采取强硬手段和激烈言词。他反复申明梵蒂冈同各国结盟，对双方都有

利，教会组织在对抗社会民主主义上最有实力。在利奥十三世的广泛活动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新教派虽然在1866年时得到宗教宽容，这时却受到了遏制。在比利时以卢汶大学为中心，红衣主教麦瑟尔(1851—1926年)为领袖，天主教势力扩大，成了越山主义的大本营。耶稣会的人在西班牙十分活跃。1890年，教皇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且劝导法国的天主教徒要支持法国政府。利奥十三世共支持创立了五所天主教大学，其中以巴黎的天主教学院最为著名。1878年，他在苏格兰建立了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区，由于罗马教皇在1879年委任纽曼为英国红衣主教，因而与英国的关系从缓和到逐渐密切了。

利奥十三世时期，天主教会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比在欧洲诸国更为迅速。因为美国建国伊始，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国家中天主教从属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银行，比欧洲诸国早。在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议上，美国天主教会领导人之一阿兰德大主教宣称："……美国的教会应当是耶路撒冷、罗马那样的天主教会；不过，既然它的外衣受到当地气氛的熏染和支配，它应当是美国式的"。"美国化"的方针，使美国天主教中产生了分立主义倾向，并削弱了罗马教廷对美国教会的统治权。利奥十三世对美国教会内部的革新可以放任不究，但对削弱宗座权力则不能容忍。1899年发出了致巴尔的摩市大主教吉邦的通谕《慈惠的证人》，其中温和地谴责了"美国派异端"。利奥十三世1899年2月14日在致吉邦大主教的通谕中讲："为了罗马教廷的利益，要非常机智与灵活地处理问题。"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也无意与罗马决裂，访问罗马的美国阿兰德大

主教，为使教皇确信美国教会对罗马忠诚不渝（美国主教否认美国存在“美国派异端”）曾以美国主教团的名义感谢利奥十三世消除了“误会”，并声明美国的主教和教徒服从教皇。利奥十三世在 1900 年 8 月庆祝自己命名的招待会上对在座的阿兰德大主教特别亲切。在这次会上，利奥十三世向阿兰德提出了两个关于罗马教廷的关键问题：一、罗马教会最高领导的统一问题；二、它的首脑的世俗权力问题。已是耄耋之年的教皇从阿兰德口中得到令人放心的回答，即北美天主教居民全部接受了教皇权力至上论。早在 1899 年，梵蒂冈在华盛顿便创立了天主教大学。

利奥十三世期间，梵蒂冈扩大了对外联系，包括同一些信仰新教的国家。他又加强了与东方正教教会的联系。1899 年 4 月，沙俄驻梵蒂冈的大使恰雷科夫从罗马报告说，利奥十三世向往教皇同三国（德、奥、匈、俄）结盟，筑起防洪堤，以反对面临的“危险行动”（社会主义）。利奥十三世准备承认东方正教在教义和仪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但却坚持东方教会需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他企图使罗马教会与东方教会重新联合起来。

利奥十三世时期，曾一再发出通谕，为了扩大在各国的“社会”活动，曾力图在欧洲各国建立天主教的政党和天主教工会等各种组织。

重振教权，扩大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

利奥十三世一上台，便为重振教权，为恢复中世纪时教会

的特权地位而斗争。

利奥十三世努力使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条件。他本人一贯仇视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提倡人和保护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工人运动高潮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于西欧出现的。它表面呼吁关心工人，反对不公平，号召上层阶级对劳动人民要博爱仁慈"，宣传教会"始终关心和保护工人"，但对资本主义实际是"小骂大帮忙"。19世纪末，"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要变化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它不反对，而且加以神圣化，甚至它以巩固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基督教社会主义"还打入工人群众之中，企图将他们裹胁到各种教权主义的工人组织中去，使这些组织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抗。利奥十三世一度被打扮成"社会改良家"和"工人的伟大朋友"，借以蒙蔽和欺骗工人群众。

利奥十三世重视圣年活动，他决定恢复中断了75年之久的圣年庆祝活动，将1900年定为大圣年。据载这一年前往罗马朝圣者达40多万人，他们向罗马教廷的国库赠约2万法郎。这一年中，教皇约为80名新"圣徒"举行了隆重的典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天主教会加强了对外的传教活动。利奥十三世十分重视对外传教，许多隐修会和协会参加了传教工作。传教事业的活跃从越山主义的复兴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19世纪末，大批耶稣会士、修士涌向中国。1900年后，罗马教廷加强了对中国天主教的直接控制。在中国，皈依天主教的以农民为多数，天主教社团比新教社团人数众多。新教的传教活动主要在中国沿海城市，吸收信徒人数虽然不及天主

教，但从参加公共生活等方面看来，影响却比天主教为大。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天主教传教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教徒，并且打入社会内部。19 世纪末在非洲中部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赢得了大量信徒。各个传教的修会虽受派遣国的控制，但所有天主教会的传教，都贯彻罗马教廷的要求。

利奥十三世在逝世前，于 1902 年创设了宗座圣经委员会，支持学习和研究圣经。1903 年初，下令重新审订圣徒传，强调要以史实为依据，务将不实之处和神话从中删掉。

《新事物通谕》

在天主教的书刊中，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的各类书刊里，利奥十三世最露脸的事，要算是 1891 年发表《新事物通谕》了。天主教的政论家、史学家们曾把这份通谕夸耀为"劳工大宪章"和"社会改良"纲领等等。他们把利奥十三世誉之为"社会改良家"、"工人的伟大朋友"，有些教会作家甚至称利奥十三世是"伟大的、工人的教皇"。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创建人之一斯图尔佐神父在他的《意大利和世界新秩序》一书中写道："利奥十三世是历代教皇中第一个从事为工人确立公平之道的人，其根据就是教皇《新事物通谕》。"当 1931 年，纪念《新事物通谕》发布四十周年之际，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新的通谕《第四十年》中分析说：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与以前历任教皇的社会文告不同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幸福地解决""社会问题一类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的"正确途径"。

《新事物通谕》是怎样产生的呢？应当指出它是以各"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近半个世纪的活动为基础的。它的问世，与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化有关。

19世纪末的特点是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迅速壮大、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世界无产者的逐渐联合。1890年，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中爆发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给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苦难，群众中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增长。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5月15日发表的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亦称《劳工通谕》，就是打着"同情"和"关心工人"的幌子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承认工人生活贫困，并斥责"丧尽天良的企业家"和富人过度地剥削工人，告诫资本家应当"关心"劳动群众的"共同福利"等；另一方面却反对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学说，竭力为地主资产阶级辩护。在《通谕》中宣称私有制"出自人类本性"，属于"基本人权"。利奥十三世强调说：私有财产是"上帝赐予"和"神圣"的，世界上总有富人和穷人，社会上的不平等乃是"天经地义的"。教皇断言如果废除私有制，将会使同动物划等号。因为动物没有私有财产，只能去大自然寻觅现成的食物，没有私有制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好处。他还特别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危害工人自身"的理论，因为工人也失去了获得财产的前景，否则工人省吃俭用、忍受苦难、勤奋工作，还有可能发财致富。教皇力图使人相信，天主划分和分配私人产业所根据的是人们的"勤劳"程度和各族人民自身的各种"风俗"和成规。教皇声言神律禁止希图他人财产。财产私有权乃是天主教会的

一个信条。不管你试想如何提高下层人民的福利，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不得破坏。

怎么办？在利奥十三世《新事物通谕》中反复重申解决当代问题的出路是工人不要与资本家作对，应该同资本家"真诚合作"，"同心同德，互补不足"。这正如人体的各种器官之间存在着协调一致一样。教皇在论及社会各阶级的义务时，他所指的主要是工人对资本家的"义务"。《通谕》写道：他们（指工人）应当忠于自己的义务，不得给企业主造成损失，保护自己利益时也不得"造反"，不应听信别人的教唆。教皇对资本家们也有所要求，且看他的原话是怎样提的吧！利奥十三世提道：企业主不要像对待奴隶似的对待工人，对他们要公道，要给他们宗教活动所需的时间，要付"公平合理"的工钱，强使工人去干他们力所不能的活是不公道的。应从自己的"过剩财物中"拿出一部分施舍给穷人，"工人问题"最好在"慈善事业"的范围内解决。当时，工人正热火朝天地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这确实是新事物，但《通谕》恰恰回避了这个问题。

此外，《通谕》还劝说贫穷人和被压迫者：要注意"最高宗旨"，"彼岸生活"，上帝造人是"为了天上的欢乐"，永生并不取决于贫和富，相反，"财富是通向永乐的障碍……"，利奥十三世号召别人时那么说，而自己却热衷于金融、股票生意，他拼命多要钱财。《通谕》最后提及到国家，利奥十三世强调国家体制的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一样，只要能保证私有制长存就行。他反对政权归人民所有，而主张国家对社会上"一切阶级"都一视同仁；国家应当关怀各个等级的公共福利，关心"安定和秩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预防“抢劫私有者”。《通谕》的结论部分专门谈论“工人自助”问题。利奥十三世提议工人天主教徒成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以抗衡“危及”“社会安宁”的革命组织，切断工人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其它团体组织。

综上所述，可见教皇的“劳工”通谕——《新事物通谕》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是不相干的。它以“关心”工人面貌出现，但主要的使命是告诫工人群众忍耐，并动员教会力量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维护剥削制度的永恒存在。

反对现代主义派的斗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天主教内部出现了性质驳杂的流派——现代主义派。许多国家都有其代表人物，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修改天主教的基本教条，并主张改变教会的实践活动。法国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是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希伯来语和圣经诠释教师阿尔弗雷德·卢阿齐神甫(1857—1940年)，他最早写有《福音与教会》一书，主张耶稣不是千古不变的神的启示的代表，宗教教条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千百年来一直在发展。他还认为：宗教教条、圣礼和法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教会史多年的天主教历史学家路易·杜尚神父(1843—1922)作了大量教会史的批判工作，但他却不谈天主教会具有神圣的起源和“超自然”的性质。

德国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是盖尔曼·歇尔(1850—1906年)，他是维尔茨堡大学的辩护学、基督教艺术和考古学

教授，歇尔在《天主教教义是进步的原理》一书中，反对僧侣监护俗人、反对耶稣会士统治教会。他提出应允许教徒信仰自由和信仰与科学不矛盾的、“真正的”或“理想的”天主教。他主张教条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

英国现代主义派的代表是耶稣会士蒂勒（1861—1909年），他提出“相信自己所信宗教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基本真理可以综合”，蒂勒研究、论证经院哲学及研究圣经20多年，结果使他同教会发生冲突。他企图用与教会不同的精神去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证明教条在进化，教条中的道德涵义也有变化。意大利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是罗莫洛·穆利神父（1870—1944年），他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注意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不是神学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主义派的基本立场是没想同教会断绝关系，主要观点是认为宗教是信仰的事实，是由人创造的，教条没有永恒真理的作用，而是内心宗教状态的表现，因此是变化的；从福音书中不能为基督教教条找到根据；耶稣没有创立教会，教会不是神的机构。因而现代主义派们的结论是天主教会并非唯一的“救世”机构，他们反驳了教皇最高权力论，同时也批驳了教皇永无谬误论。反对关于原罪的教义以及关于存在地狱和阴间折磨的教义。

罗马教廷嗅到了教会中现代主义派主张的巨大危险性，因而猛烈抨击和批判现代主义者，禁止发行和阅读现代主义者的书籍，并将他们列入《禁书目录》，停止他们在天主教学校中的教学活动，开除他们的教籍，禁止按宗教仪式埋葬已逝世的现代主义者，甚至对死者加以报复，仍进行批判，教皇嘉许

批判现代主义派的人。反对现代主义派的斗争是由教皇利奥十三世开始进行的。1902年12月，在就天主教神学院的教学问题致意大利僧侣的教皇通谕中，利奥十三世宣称："世界上有一种对不明智的和可悲的革新的向往，但是僧侣应该高于凡人的意见和制度的可变性……"。利奥十三世号召对现代主义派的"可悲的革新"必须"毫不妥协"。

利奥十三世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完成了天主教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被人称为"第一个资本主义的教皇"。他在教会史上复杂的转折阶段，仍坚持保留了天主教的基本传统，并有所建树，被天主教誉为足智多谋、有超众治理才能，在教会中有重大影响的教皇。

庇护十世——利奥十三世的继承者

庇护十世（Pius X，1903—1914年在位）继利奥十三世之后，当选为教皇。他原名为朱塞皮·萨尔托（1835—1914年）。庇护十世完全继承了利奥十三世的路线和衣钵，但两人在许多方面适成对照。利奥出身贵族家庭，庇护是乡村教士出身；利奥有远见卓识和外交才干，庇护缺乏才能，但却执拗地忠诚于教会活动。

萨托原为枢机主教，在德、奥支持下，战胜了法、俄拥立的另一枢机主教拉姆波拉。他年近古稀时上台任教皇，法号庇护十世。他在任期间，西班牙年轻的枢机主教兼梵蒂冈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受到重用，许多政策和新措施多出自瓦利之手。庇护十世任教皇之始，有两个棘手的问题必须处理，一个是涉及法国的政教关系；再一个是教会中现代主义派的活动扩大，必须继续反对现代主义派的问题。

庇护十世时梵蒂冈的对法外交

法国国内政教关系长期紧张。法国的议会主张国家与教会要完全分离。20世纪初，法国政府发动了政教分离运动。1901年7月，法国瓦尔德·卢梭政府，通过限制宗教团体活

动法，禁止不在政府控制下的宗教机构从事教育活动。按规定，经申请批准方许开办学校，否则予以解散。1902—1904年，法国的孔勃政府与教权派把持学校和修会逃避执行社团法的规定作了坚决的斗争。教权派和耶稣会士主张学校教权主义化，并提出“教育自由”的口号；而孔勃政府却在1903年关闭了未获准许而擅自办学的修道会。在1904年7月法国的一道法令，甚至吊销了修道会从上届政府领到的办学许可证，一些教产被查封出售。梵蒂冈对法国政府的反天主教会措施深恶痛绝，一位红衣主教痛斥孔勃政府的政策是“雅各宾暴政的大发作。”

庇护十世在1904年3月18日发表了反对法国政府禁止天主教修会进行青少年教育活动的讲话，法国政府对这篇讲话正式抗议。教皇与法国关系日益紧张。但梵蒂冈与法国的绝交和废除宗教条约主要不是因为法国政府的结社法和限制宗教团体活动，而主要是因为法国同意大利的逐渐接近；是因为法国在“罗马问题”上的改变立场。1902年11月1日法意缔结了严守中立的协定，1903年10月意大利国王访问巴黎，1904年4月法国总统路贝将到罗马回访意大利国王和作国事访问。庇护十世认为意大利国王非法占据着罗马，一个天主教国家的首脑到罗马访问是对“圣城”、对教皇的莫大侮辱。尤其是法国总统路贝访意期间，法国的外交部长并未试图同梵蒂冈的国务卿麦尔·德尔·瓦利会晤一下，更使庇护十世格外愤怒。4月28日，梵蒂冈向法国政府发出抗议。庇护十世认为在罗马隆重欢迎法国首脑实际是意味着同意1870年取消教皇世俗权力的事件。

梵法关系剑拔弩张。1904 年 5 月 25 日，法国召回驻罗马教廷的大使。而罗马教廷的报复行动则是惩处两名法国主教，这两人全到罗马受审，并要求其中一名放弃教职，因而双方关系更为尖锐。7 月 30 日，法国政府宣布同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庇护十世并不妥协，因为当时教廷预见到孔勃政权的寿命不会长。1905 年 12 月 5 日，在法国接替孔勃的鲁维政府通过了《关于国家和教会分离法令》，实行政教完全分离。政府取消了对宗教（天主教和新教）的援助，教堂及其它教会财产一律收归国有，租给向政府负责注册的地方宗教协会等团体作礼拜之用。政教分离法，遭到庇护十世的反对。1906 年 2 月，教皇发表致法国僧侣通谕，公开抗议法国政府的《国家与教会分离法令》。许多法国主教想组织向法国政府注册的宗教团体，也为庇护十世所制止。1906 年 5 月，法国主教同意庇护十世的立场和决定。1906 年 8 月 14 日，庇护十世又发表一份致法国主教通谕，驳斥法国政教分离法中规定的宗教协会。教皇坚决不妥协的原因有二：（一）不承认法国政府事先未经罗马教廷同意的任何立法；（二）担心其它国家效尤。

由庇护十世及其助手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实行的使梵法关系紧张的方针，致使梵法陷入僵局，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这一局面没有改变。庇护十世曾帮助沙皇俄国镇压革命，外交上实行与德国、奥匈结盟的方针，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914 年），梵蒂冈是同这些国家站在一起的。

继续坚持反对现代主义派的斗争

庇护十世一上台，便强调教皇的权威应当扩大到所有领域，"政治教权主义"，不仅是权力，而且是职责和义务。庇护十世不允许天主教徒摆脱教会而从事任何社会活动，反对天主教徒的活动趋向政治化，他很敌视天主教会内部的民主运动和现代主义派的活动。

庇护十世上任后，便把反对现代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管理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中心任务。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史学家路·帕施托尔，在1903年10月17日受过庇护十世的接待之后写道："至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态度，我认为，新教皇将比利奥十三世更为严厉"。庇护十世在1904年12月的讲话中，告诫天主教的主教们："小心看管你们的神学院和未来的神父……，在现代居统治地位、肆无忌惮的批判精神的鼓舞下，年轻教士已经毫不尊重教会神父和教师……传授的科学了……"。教皇号召把思想自由的人撵出神学院。

1907年7月4日，宗教裁判所主教会议颁布的新的《要略》，即《西拉布斯》(Syllabus)或称《现代谬论目录》，共65条，是会议中受到谴责的65条论点。这65条概括了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天主教徒"）的基本观点。

《西拉布斯》谴责的是反对教会检查书刊、谴责那种认为教会不能对纯粹的人类作出判断的说法，以及对圣经的批判和说上帝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等论点。它还谴责与基督教教条和启示的教义不一致的各种论点，以及现代主义者对教会

体制问题的看法，驳斥了现代主义派的全部基本论点。

继《西拉布斯》之后，1907年9月8日，又发表了庇护十世的一个文件《牧羊通谕》，它扩展了《西拉布斯》的主要论点。这是一篇致“总主教、首席主教、大主教、主教和其他地方当局”的洋洋万言的文告。《通谕》中指出，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是以不可知论为根据的，还认为现代主义派搞无神论，又批判了现代主义派对教条、宗教仪式、圣礼、圣书等一系列的观点，驳斥了现代主义派的进化论和历史批判态度。《通谕》还提出了一整套反对现代主义的措施。梵蒂冈把现代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一个个地开除教籍。庇护十世发挥利奥十三世在1902年成立的“圣经委员会”的作用。他给予这个委员会有解释圣书经文的特权，所有对圣书的论述。有悖于圣经委员会观点的天主教学者，都有被开除教籍的危险。

现代主义派并没有束手就擒。意大利现代主义者在1907年发表了《现代主义纲领》，广泛地逐项回驳了庇护十世的《牧羊通谕》。《纲领》的作者自称是教会的忠实儿子，他们要将天主教引上现代的20世纪的轨道。

庇护十世坚持反对现代主义斗争的顶点是1910年9月规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宣誓。它要求各天主教神学系的教授、僧侣在晋级礼之前，宣誓忠于天主教教义，坚信教会的教导，尤其是启示、奇迹和预言；拒绝“现代的一切谬论”和现代主义派的全部论点（如教条进化论、宗教是人创造的……等）。宣誓者必须服从和遵守庇护十世发表的《西拉布斯》和《牧羊通谕》。

现代主义派的活动是天主教内部危机的表现。这一活动

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并未形成宗教改革运动。庇护十世通过一系列斗争，制止了现代主义派活动的泛滥。

天主教会内的新改革

庇护十世批驳了现代主义，但是20世纪初，罗马教廷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需要，对教会进行现代化改革是大势所趋。

庇护十世鉴于一些修士机构、社团中风气腐败，影响了教会的声誉，乃于1905年采用新的修会建立制度。从前，在主教辖区内建立新修会和社团由主教许可，然后报罗马教廷同意，今后建立新团体，经主教呈报后，必须得到罗马教廷的书面批准才可以。

教皇庇护十世，为了反对现代主义和抵制敌视教会的学说，在1904年颁布了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教皇敕书；还建议僧侣在神学院和天主教学校中严格遵照托马斯·阿奎那的精神传授神学和哲学。

1905年12月20日，庇护十世发布谕令，对圣餐活动加以改革，规定一切天主教徒，包括小孩子在内都要亲自常到施恩的圣餐台前领圣餐，因为圣餐不单是善人的赏赐，也是抵抗罪恶的解毒剂。

1908年，庇护十世着手改组、简化教廷的机构，给各个机关明确划分了职权范围。教廷职员，像世俗国家的官员一样，被分成等级，发予固定的薪金。而在这以前，他们只是从教廷所得的捐款中分领，而且数额不固定。

1909年6月，梵蒂冈建立了专门的教皇圣经学院，这与前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902年成立的罗马教廷下属的“圣经委员会”不同。新的学院是培养能在天主教学校讲授圣经、并维护圣经的能言善辩的教授，同时也是为了引导一般人精通圣经。院长由耶稣会士担任，直接受教皇监督和领导。这是庇护十世坚持反对现代主义派斗争过程中的新措施。

1901年，庇护十世采用新的、统一的主教与教皇联系的制度，同时废除从教皇塞克斯都五世（1585—1590在位）以来沿用的旧规定，从此以后，每位主教（或其助手）五年内必须亲赴梵蒂冈向罗马教皇汇报一次本教区的情况。

庇护十世还有一项与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直接有关的措施，即1911年减少过多的宗教节日，一部分节日被取消，一部分则被移至礼拜日举行。在圣谕中解释道，节日多，不适合工商业活动的现代化速度，减少节日，可避免工人因休息多而蒙受经济损失。

庇护十世还创办了俄罗斯学院，由耶稣会主持。耶稣会还兼管东方神学院、波兰神学院等。庇护十世任期内普世教会运动已兴起，关于异端的传统观念已有变化。他继续执行前任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愿同东方教会联合的方针。

本笃十五世时天主教会作用的扩大

经“十六次表决”后上台的本笃十五世

1914年8月20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三个星期，疾病缠身、刚满79岁的教皇庇护十世逝世了。传说教皇之死是因大战终于来临的震惊和悲痛。罗马教廷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指庇护十世）早已预见到并且预言了欧洲的冲突。一旦这场冲突真的爆发了，缠绕着他的惊骇和苦痛就十分强烈。残酷战争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及他所预见的斗争所必然引起的灾难和痛苦，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对比利时的入侵和最初几次交战的消息都使他内心充满了最大的苦痛和悲伤”。其它传说也甚多。有的讲老教皇曾为反对战争的爆发，进行过祈祷和奋斗；庇护十世因无力阻止灾祸而过于悲伤……

8月31日，梵蒂冈召开教皇选举会时，尽管处于战争时期，主要交战国的政府、外交家及教会上层，都积极活动，以图影响选举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法国驻伦敦、驻马德里的大使都接到本国训令，要他们联络英、法、比、西的枢机主教共同结盟，以便使协约国希望的人选上台当教皇。而奥

匈帝国和德国政府也都依靠本国的枢机主教和天主教领导集团广为活动，施加影响。在一份有德国天主教活动家 60 人签名的《关于世界大战的备忘录》上呼吁道："在这次战争中必须经受住来自东正教俄国人方面最沉重的攻击……俄国的胜利会给天主教带来最惨重的损失。"德国反复以"俄国的威胁来恫吓教皇选举会议。这份呼吁书对到会的枢机主教们发生了影响。人们相信倘若协约国拥护的人当了教皇，便是俄国和东正教的胜利。

教皇是很难产生的了。经过 16 次表决，才终于选出意大利波伦亚大教区大主教德洛克埃兹（1854—1922 年）继教皇位，取法号为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 年在位）。他出身于意大利热那亚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是一个沉着审慎的人、是个出色的、很有城府的外交家。他奉行前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方针。他挑选了一位与法国有紧密联系的费拉脱主教作为自己的国务卿。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境遇和地位比过去确有显著的改善。他在位的前期（1914—1918 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笃十五世的大部分时间是结合战争，发挥教廷和天主教会的作用，开展调解及多元化外交。他在位的后期（1918—1922 年），罗马教廷投身于金融银行及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使教会威信显著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本笃十五世

教皇本笃十五世上台伊始，便郑重声明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采取中立的立场，将为和平而工作”。1914年10月8日，罗马教廷的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声明，宗座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因为他认为各国人民之间和睦高于一切。教皇在第一通谕（1914年11月1日）中，阔谈了战争恐怖和流血、破坏等一般的论点。他没有提谁是战争祸首，没有谴责交战的任何一方，主要是呼吁停止残杀。他还在通谕中断言，一切罪恶之源在于不崇敬权力，这与忘记宗教原则和宗教道德有关，与将宗教赶出学校大门有关。本笃十五世在通谕中指责道：有人教唆人们相信没有必要去追求天国的幸福，而应当“在尘世就成为幸福的人”。“因为尘世上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并不均等，所以每个不幸的人便都起来反对幸运的人。……”从这段原话看来，教皇实际是把阶级斗争“解释”成“不幸者反对幸运者”的斗争。甚至鼓动人们应集中反对社会主义。

本笃十五世的第一道通谕结尾时抱怨教皇在罗马处境不佳和没有自由，并声明应当结束教会首脑不正常的境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双方都是为了掠夺、侵略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就其残酷和野蛮性来看双方不相上下，当时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乃首要任务，号召集中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运动显然是绝对错误的。

1915年初，法国成立了一个以巴黎教区大主教等人为首的“法国天主教国外宣传委员会”，专门出版揭露德国军阀战争罪行的资料、影集，如《德国之战与基督教》文集等。而德国方面，在1915年夏，仿效法国，有77名天主教活动家成立了“德国天主教徒委员会”，进行战争宣传，甚至也出版了一本《德国之战与基督教》的书，作为对法国同名书的回

答，书中大肆吹捧德皇、德军以及德国的战争目的。双方长期展开激烈争论。梵蒂冈对争论保持客观，本笃十五世表示过，希望争论中不要有教会活动家参加。

1915年1月22日，教皇发出了和平祈祷的圣谕。本笃十五世向枢机主教发表讲话，说流血不见中止。他在战争中严守中立。他号召占领他国领土的人们除军事占领外，不要毁坏任何东西，特别应爱护教堂、僧侣和宗教权利。而被占领国的居民，不得破坏秩序，以免处境恶化。教皇建议2月7日在欧洲各天主教堂，3月27日在其它各国教堂举行特别仪式祈求和平。结果，没有行通。

教皇对各国的态度并不一致。他对1915年5月意大利的参战问题保持中立。比利时遭德国入侵事，教皇没有对德国谴责。早在1915年3月本笃十五世就表态愿充当协约国与维也纳之间的调停人。教皇企图早日结束战争，以防人民革命运动的扩大。教皇在1916年出于同情，曾定了个"波兰日"，号召在这一天所有的天主教堂都为波兰祈祷，为波兰居民"募捐"。但本笃十五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独立、统一的波兰只是幻想。教皇对立陶宛的态度曾举棋不定，对立陶宛的独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只是允许为立陶宛的和平举行祈祷仪式。梵蒂冈对法国尽力讨好。1916年11月晋升为枢机主教的共10人，没有一个德国人和奥国人，其中法国人倒有3名。本笃十五世对俄国1917年2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为了天主教会的利益而高兴，梵蒂冈尽管视世袭君主制为最好政体，但却希望沙皇制垮台。这样一来，东正教教会的特权必然会废除，定会给罗马教廷在俄

国推广天主教以可能；另一方面又担心俄国革命可能不止于推翻君主制，不制止它，势必对其它国家有新影响。罗马教廷趁机于 1917 年 5 月在梵蒂冈成立了一个东方教会事务圣部，目的是向俄国推广天主教。

随着俄国二月革命的深入和各参战国人民群众革命呼声的高涨，罗马教廷力图尽快结束各国战争，乃于 1917 年 8 月 1 日由本笃十五世向各参战国政府发出了关于缔结和约的“和平照会”。在照会中包含了和平纲领，即：(1) 缔结各自裁军的协定；(2) 消除一切国际交通道路障碍，海上通航完全自由；(3) 各自完全放弃要求“赔偿损失与战争赔款”；(4) 各自归还现今所占对方之领土，如德国从比利时撤兵，自法国完全撤兵，交战国归还德国原殖民地……等。教皇的照会遭协约国的反对，教皇的建议没有考虑捷克、波兰人的民族意愿，英、美、意等均不接受。本笃十五世虽然善于随机应变，擅长外交，但因被称为是“亲德奥的建议”，故而在 1917 年并未解决和谈。1918 年末，当哈布斯堡君主国处于危机中，教皇为了防止德奥君主国发生革命，乃于 11 月 1 日又致电各国媾和，11 月 3 日签订停战协定。而 11 月 11 日哈布斯堡君主国早已不复存在了。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立场，乃是罗马教廷战前年代政策的直接继续。大战后，在对待德皇威廉二世的命运问题上，也可看出本笃十五世的态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 227 条，可以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威廉二世。但德国主教们同罗马教皇沆瀣一气，梵蒂冈的报刊扬言，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无神论的可悲政策”，因此，提出战犯问题是不妥的。由此可见，一次大战中间教

皇本笃十五世中立的立场有很大的局限性，实质是亲德、奥的。

梵蒂冈多元化的外交

教皇本笃十五世时代，天主教会的作用明显加强。梵蒂冈与各国之间的联系扩大了。英国和荷兰，自新教运动以来长期与罗马教廷关系不睦，从1914年末起，开始派遣代表至梵蒂冈。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英国皇太子、首相及美国总统都曾谒见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在其“调解”交战双方过程中，曾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教皇通过美国的吉邦枢机主教去迎合美国威尔逊总统的虚荣心。鼓励他在“跛脚和平”中卓有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在梵蒂冈设立了大使馆。法国和葡萄牙都恢复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教皇虽然推行“中立”多边外交，但不时也向法国抛出橄榄枝。例如，1915年7月，教皇在同法国《盖多马得尔评论》主笔洛德先生谈话时，一再声明，他的“中立”并不意味着他对一切漠然处之，他热爱法国，不只是爱天主教的法国，而且也热爱一般的法国人民，并表示只要一有可能教皇会真心实意证明这一点的。(发表于7月3日《费加罗报》)。

德、奥同梵蒂冈的关系非同一般。1914—1917年期间，在梵蒂冈最活跃的是德、奥两国大使。他们几乎“垄断了这里”。耶稣会士也在德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奖赏，或获得了铁十字奖章。1917年4月，德意志帝国政府正式废除1872年“文化斗争”时期通过的反耶稣会士律法。

德国派遣了专门驻梵蒂冈的大使以代替从前驻罗马的大使，教皇亦有圣使专驻柏林。德、奥特别抓住支持教皇解决自1870年以来的“罗马问题”，即应当恢复世俗的“教皇国”，以满足教廷所需，所以深得本笃十五世的赞赏。难怪“中立”的教皇，对德奥的要求常心心相印地理解或支持。

1915年2月，德国籍的波兰人士列多霍夫斯基伯爵当选为耶稣会总会会长，他同德、奥上层及教会人士有密切联系，德、奥与梵蒂冈之间有很多渠道相通。1915年在奥国的影响下，有两名教皇圣使（梵蒂冈驻慕尼黑圣使和驻维也纳圣使）都晋升为枢机主教。

1918年，波兰建成独立的民主国家，罗马教廷和天主教加紧了对波兰的影响。意大利人阿基莱·拉提（即1922年起即位的教皇庇护十一世）自1919年起，便以总主教衔任罗马教廷驻华沙圣使，达数年之久。由于他的工作，在波兰的罗马教会成立了5个总主教区，有15个副主教，天主教会在波兰成绩特别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笃十五世加强了经济活动。他把罗马教廷每年总收入的4/5投向金融、银行、企业，在意大利各地遍设各种保险公司和交易所，在中东设立“罗马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欧美各地开始占有矿山、工厂、企业。进入20世纪以来，罗马教廷与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罗马教廷的大量投资，它便自然地成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支柱之一，梵蒂冈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最大的企业家、银行家和资本家之一。

战后本笃十五世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和教会的调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教廷处境十分困难。根据中立的立场开展多元的外交，注意救济交战双方的难民，尤其是处理战俘问题。战争后期教廷主要从事战争的长期调解、和谈工作。教廷对双方战俘的待遇、交换等发挥过积极作用。

本笃十五世在天主教会的事务中，基本上保守的维持传统的作法。但一次大战后，由于时代、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天主教会内部普通信徒改革活动的兴起，促使罗马教廷也无法再僵化下去，只能在个别问题上趋向于宽松从事。

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继续反击现代主义派的活动和对抗新教的传播。1917年，在本笃十五世的主持下，新订了一部天主教会律例，名叫《教会法典》。这部法典从1918年5月起发生效力。法典基本上是重复、归纳了原来的一些规定。如在法典的第138条中规定，"不经教会事先批准，教徒不得出版任何书籍。教会若有充分的根据，有权禁止任何作者出版任何著作。"这条限制出版自由的枷锁，长期套在天主教徒脖子上，说明执行的仍是顽固、僵死的教条。当然在新的法典中已不再有教会可烧死任何一个作者，并烧毁其作品的规定了。这是历史的前进，决不是罗马教廷或任何人的"善心"。

1918年10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在捷克的天主教界人士当中，掀起了改革运动，例如，要求举行天主教仪式时用捷克语言、准许教牧结婚等。本笃十五世完全拒绝这些要求。结果激起了捷克社会各个阶层在1920年组成捷

克斯洛伐克全国性天主教会加以恢复。捷克天主教会自己选出了法尔斯喀博士为本国教会领导。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中，天主教的正统教会也组成了。

1919年，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成立，此党都是由天主教徒所组成。新的形势下，迫使本笃十五世在当年11月不得不明令取消从前规定的天主教徒不准参加意大利政治生活和政党的禁令。

一次大战后，本笃十五世为了适应战后各国疆界的新变化，为了加强传教工作，对教廷的机构作了一些调整。

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国许多天主教徒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罗马教廷闻讯后，派遣天主教教务巡阅专员光若翰前来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进行了一些"调研"、"座谈"，竭力为帝国主义侵华作辩护，一再表示和威胁道："坚决反对这次学潮，天主教徒不准参加，如果违反教会指令，将受上帝惩处……"。

教皇本笃十五世肯改革、破旧的一项业绩是，于1920年5月16日，决定追谥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为忠诚于上帝和天主教会神圣事业的圣女。15世纪法国的"奥尔良姑娘"、爱国女民族英雄贞德（1410—1431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她被教皇本笃十四世在位时的宗教法庭诬为"女巫"而活活烧死。这乃是天主教会史上的奇耻大辱。教皇利奥十三世时为贞德平反，公布了贞德的英雄业绩。教皇庇护十世时，于1908年废除宗教法庭，于1909年宣布贞德为升天者。本笃十五世则不仅对贞德彻底的平反，而且给予了贞德崇高的荣誉。这在教会史上是一件突出的大事。

二次大战前庇护十一世的梵蒂冈外交

庇护十一世（Pius Ⅺ，1922—1939 年在位），本是一名博学、有突出才干的学者。1922 年 2 月，他 65 岁时当选教皇。他是意大利的德西奥人，原名为阿基莱·拉提（1857—1939 年）22 岁（1879 年）起任神职，1882—1888 年在米兰修道院讲授神学，继而在安布罗斯图书馆工作，他担任过梵蒂冈图书馆馆长。1919 年以总主教衔担任罗马教廷驻华沙公使，1921 年升任枢机主教，驻于米兰。

天主教会事业的复兴和教育、科学的发展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新教的扩大和传播，使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地位受到极大影响，天主教的地位明显地削弱了。仅仅在封建制仍有较大残存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中南部，天主教的地位才较为巩固。帝国主义阶段，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工人脱离天主教和各种教会组织的现象很普遍。据德国教会学家科·阿尔格尔米森在其《无神论者、工人阶级与牧师》一书中写道："德国在 1919—1927 年间，正式（提出有关的书面声

明）脱离天主教会的人数达 303931 人。”据瑞士《新苏黎世报》(1929 年 4 月 3 日）刊载的资料，证明 20 世纪 20 年代比 20 世纪初，维也纳这个城市中脱离教会的人数是显著增多了。

维也纳城脱离教会及其中天主教徒人数对照表

年　　代	脱离教会的人数	其中天主教徒脱离的人数
1905--1913 年	20038 人	12348 人
1919—1927 年	140043 人	119870 人

据美国的天主教神父、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讲师姆·基尔希说，美国的教会每年要失掉 50 万信徒。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家梅纳德写道：美国每年加人天主教的人数并不能够抵补脱离天主教的人数。

庇护十一世上台时，面对天主教会地位下降的严峻形势，他把复兴天主教的任务列为第一位。庇护十一世在就职当年——1922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第一个通谕中，便实行天主教的总动员，教皇强调道，在人民当中应当努力促进和平与友善，阶級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万恶之源。应当同新教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坚决的争斗，要求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与平信徒，共同行动……

1922 年，庇护十一世把成立于 1822 年的教信会从法国的里昂迁到罗马，并将其改组成全部传信事业所需的机构。教皇对 20 世纪初由天主教平信徒组成的“公教进行会”给予指

导和支持，将其分为专业的和普通一般性的两类组织，广泛号召重新研究神学，在教会内推行教义和礼仪的改革运动，反对繁琐的仪式，反对腐朽、享乐。鼓动和赞助各国的传教活动。由于庇护十一世短短几年的复兴活动，特别是教皇的超群才能和积极活动，使天主教事业再度复兴。当1925年教会的“五十年节日”时，从各地到罗马前来的朝圣者竟达100余万人之多。

庇护十一世积极创办教育和研究机构，企图用教育事业为教廷服务。1925年成立过“宗座基督教考古研究所”，1936年成立过罗马教皇的“宗座科学院”。他毕生对文教科学事业饶有兴趣。

他在教皇史上首次在本人的签名中启用“教皇”头衔，自署拉丁文的“Pius papax”。

庇护在复兴天主教会事业的过程中，始终结合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1924年12月18日，教皇在向红衣主教团讲话时，专门强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他在1930年时，甚至妄图组织反共反苏的十字军，以便粉碎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信仰。1937年3月19日庇护十一世还发表过反对共产主义的特别通谕。梵蒂冈尽量同社会主义学说的敌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1930年1月18日，教皇发布通谕，宣布教皇在教育事业上有最高决定权。他以“世俗政权独管教育乃大恶之源”为名，强调必须由天主教会执掌教育。

庇护十一世严斥自然主义、早期的性知识、女子体育、淫书与坏影片等。他在1931年12月26日的《真理之光》的通

谕中，促进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联合，祈求马利亚的护佑，奉马利亚为上帝面前的调和人。庇护十一世是坚决、有力的越山主义派。

同墨索里尼的谈判和《拉特兰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约有70万人在战场中丧生，战费支出高达460亿里拉，意大利王国虽为战胜国，却负债达85亿里拉以上，矛盾重重，经济衰落。大战后初期，在俄苏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各阶层掀起了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高潮。1919年，有记载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人数高达1555000人次，而且工人阶级在某些地方甚至夺取了政权。这种形势使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国王和教皇都深为震惊。

一次大战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883—1945年）依靠其法西斯党徒的力量，通过“向罗马进军”的军事行动，于1921年10月29日取得政权。翌年2月，庇护十一世上台主宰了罗马教廷。大战初期（1914年11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创办过《意大利人民报》；战后（1919年）在米兰建立过“战斗的法西斯”半武装组织。他与庇护十一世早在米兰时便有过往来。墨索里尼认为争取教皇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法西斯党刚上台立足未稳，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在抵制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墨索里尼深感要想巩固政权，恢复大罗马帝国的盛世，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就必须同罗马教廷合作。庇护十一世目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

党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以及巩固了统治后，很是赞赏。教皇庇护十一世曾表示："看来，只有墨索里尼能够把意大利这只船驾驶到水面平静的海洋。"于是双方开始互相利用并秘密谈判。

庇护十一世鉴于罗马教廷的实力和地位已今非昔比，再想恢复13世纪前教廷的盛世和原教皇国的疆域已办不到，因而在与墨索里尼的谈判中不得不一再让步。当时在意大利有一个1919年成立的天主教人民党，本来受教皇支持，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1924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布里昂扎地区竞选时，天主教人民党竟然以24000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法西斯党。为此，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向教皇提出诘难。庇护十一世为了不得罪法西斯党，甚至动员意大利天主教徒应支持墨索里尼上台执政，三次发表撤消天主教会对以唐·斯图佐为首的天主教人民党的支持，为了不影响墨索里尼的一党独裁专政，在1926年竟同意该党解散。而墨索里尼对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亦表示友好，规定所有意大利的小学校内重新安上十字架，开设宗教课程，宗教游行不受干扰，民政当局在朝圣之年帮助运送朝圣者等等。

庇护十一世在同墨索里尼的代表法西斯党头目之一巴罗纳之间谈判过程中，要求划给他们一小块行使神权之地，为了同海外联系方便起见，他们希望划给他一条联结教皇驻地和通往意大利某港的一条通道。墨索里尼连这一点要求也未能满足，虽然他应允划给教皇一块世俗土地，但对于提供通往海港的一条通道并不同意，以致谈判一度停顿下来。从1928年9月起，因法西斯党代表巴罗纳去世，教皇代表乃与

墨索里尼本人重开谈判。这次墨索里尼不但亲自与教皇代表密谈，而且有8次是在墨索里尼的家中进行，主要由墨索里尼和教皇本人直接密商。后一段的谈判，耶稣会的秘书长塔兹·旺杜利神父（他原来曾是墨索里尼听告解神父）起过重要作用。最后教皇所坚持过的要有通往港口的“一条通道”的要求，被墨索里尼的“保证通信联络自由”的许诺所代替。显然这是教皇屈从了墨索里尼的意志和条件的结果。

其它内容方面，除教皇征得了只有天主教会主持的婚姻方为合法婚姻之外，谈判的结果多半是双方妥协，尤其是罗马教廷有较多的让步的结果。如关于教会对意大利境内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问题，在教廷任命之前必须先经意大利“国王同意”，而且要向国家宣誓效忠。这样一来，墨索里尼便通过国王是否“同意”的方式，变相控制了意大利高级教职的人选。再如，谈判中，围绕意大利天主教童子军的归属控制权有过激烈争夺，最终教皇还是将该组织并入了意大利法西斯的青少年组织。在财务方面，罗马教皇曾要求意大利王国赔偿普法战争期间（意大利军队趁驻罗马的法军撤离之际，于1820年9月20日占领罗马，取消教皇国，将罗马强行并入意大利王国）及以后教廷所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并一次用现款付清。通过谈判，最后墨索里尼只同意付给现金7.5亿里拉，另给有价证券10亿里拉（年利息为5%），作为教皇国被取消以后所受损失的补偿，但规定上述现金必须投资于意大利企业之用，教皇无奈，也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经过约三年的谈判，罗马教廷国务卿枢机主教加斯贝利

代表教皇庇护十一世，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政府，于1929年2月11日在罗马的拉特兰宫正式签订了《拉特兰条约》，其中包括政治条约（27条）和宗教协定（45条），另有四个附件。

《拉特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罗马教皇承认意大利王国，承认罗马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意大利各主教就职必须经政府批准并向王国政府宣誓效忠。而意大利王国则把梵蒂冈从罗马城划出来（位于罗马城西北梵蒂冈高地东坡，面积0.44平方公里），让教皇建立一个“独立”、“中立”的“梵蒂冈城国”。教皇以教会首脑身份，有派遣和接受使节的权利。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罗马城的梵蒂冈是天主教的世界中心和朝觐地。《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是双方相互依存、利用和妥协的产物，双方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和胜利，不能说仅仅是“墨索里尼的巨大胜利”。有的书籍评述为这对教皇来说“只是得到了一个体面的下场”是不确切的。因为事实是缔约使双方的关系得到调整，结为同盟。教廷所在地的统治权比教皇庇护九世以后59年间已略见扩展，梵蒂冈的辖区，梵蒂冈的主权地位获得了确认。罗马教廷的有关人士认为：“就教皇自己说是一个新时代的标记”。“从此开始努力执行我们新建立的事业，今后还有好些工作要做。”罗马教廷的高级僧侣克里斯蒂亚大主教曾评析道：“梵蒂冈城国的形成，对创立教廷作为政治强国的条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也有人评论《拉特兰条约》签订的作用时说：“此种外交上的胜利，使教皇的威望大增，且为教皇与世界各

国政府的重要关系开了道路。”[①]

1929 年 6 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互换了条约批准文本，“梵蒂冈城国”乃正式成立。梵蒂冈国又公布了宪法和国徽。宪法中明定罗马教皇享有统治梵蒂冈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全权，而且设在罗马城中的某些机构还有治外法权。国徽是两把交叉着的天国钥匙，衬托着教皇的三重冠。以签订《拉特兰条约》的 2 月 11 日作为梵蒂冈的国庆节。《拉特兰条约》和梵蒂冈国的建立，终于使长期悬而未决的“罗马问题”得到解决。

庇护十一世的外交政策和《第四十年》

20 世纪 20—30 年代，梵蒂冈以教皇庇护十一世为代表的外交政策在梵蒂冈的正式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和庇护十一世的历次通谕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有一句名言，就是：“一切都在政府的范围以内，没有什么在政府的范围之外”，其意是说，意大利教会在国内的活动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根据《拉特兰条约》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并不干涉意大利国境以外天主教世界的统治活动。所以应当指出的是意大利的大主教和主教们同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态度和表现上还有某些差别。多数大主教和主教等高层教会人士在法西斯党首领面前常常卑躬屈膝，对“领袖”墨索里尼则需阿谀逢迎。但教皇则有所不同，

① 谷勒本著《教会历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72 页。

庇护十一世比墨索里尼年长26岁，等于早一辈人，20年代末，庇护十一世已年过古稀。他常以坦率的态度谈论国民教育、种族偏见以及超国家主义等问题，并不完全投法西斯之所好。他较长时期错误地纵容过德、意、日的法西斯政策，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庇护十一世也表态，直言不讳地反对过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一些政策、措施。所以对庇护十一世梵蒂冈的外交应当具体分析。

庇护十一世公开反对墨西哥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通过的新宪法，尤其是卡德纳斯1934年任总统后所推行的土地改革、维护民族独立、打击外国垄断资本，以及将外资控制的铁路和部分教会土地财产收归国有等政策。罗马教廷公开攻击墨西哥1917年的宪法，并向墨西哥共和国提出强烈抗议。

1923—1924年，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纠纷，由于庇护十一世的努力，通过妥协而得到解决。1924年1月，法国政府批准天主教会有权按"主教区公会"的体制恢复从前失去的产权。

庇护十一世还先后同东欧、东南欧一些国家建立联系，缔结协定，加强同各国教会的联络。

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将前教皇利奥十三世及庇护十世的法律顾问斐理伯·帕切利之子尤杰尼奥·帕切利（即继任教皇庇护十二世）升任为枢机主教，1930年又任他为教廷国务卿。此后，帕切利协助庇护十一世主管外事工作，曾代表庇护十一世同德、意等国进行谈判。庇护十一世还将意大利对外传教后援会的会长隆卡利（即教皇庇护十二世以后的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到罗马教廷从事外交工作。隆卡利以枢机主教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特使的身份频频出使欧洲各国。

庇护十一世在位期间，因西班牙民主国的建立，教廷同西班牙的关系紧张起来。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地方自治的选举过程中，宣布西班牙成立民主国，西班牙国王离境出走。同年12月9日，西班牙采用新的民主宪法。新宪法规定国家与教会分离，废除同教皇所订之约，国家对天主教会给予的补贴取消，并由国家执掌教育全权。1932年1月23日，西班牙民主国下令解散西班牙境内的耶稣会，并没收其教产。罗马教廷对西班牙的新措施，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在1931年5月发表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教皇通谕，即《第四十年》，基于对西班牙反教权政策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来罗马教皇曾支持1936—1939年佛朗哥叛军的活动，并承认了佛朗哥政权。

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5月15日，为了纪念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著名的《新事物通谕》40周年，特地发表新的教皇通谕《第四十年》，庇护十一世在这篇通谕中，谴责财富分配的不均，号召要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以便使工人较公平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他还写道，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像19世纪末时那样的统一了，现今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为两大阵营：共产主义和温和改革派，后者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敌对态度，他们的纲领要求与教会的纲领很接近。教皇在《第四十年》再次攻击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用“布尔什维主义危险”来恐吓人们，通谕中宣布了资本主义、阶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是永恒、不可动摇的。

庇护十一世纵容德、意、日法西斯

希特勒利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狂热情绪，通过欺骗宣传，以及纳粹党与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勾结，在1933年初上台实行法西斯专政。同年7月，在梵蒂冈的影响和赞同下，欧洲最古老的德国天主教党——中央党宣布解散。罗马教皇派国务卿帕切利同德国纳粹政权在1933年签订宗教条约及有关的合作协定。《科隆快报》报导称庇护十一世是“最亲德的教皇”。1937年4月30日，帕切利写信给希特勒驻梵蒂冈大使道，梵蒂冈“认为建立……政治防线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具有重大的意义。”……“宗座也正在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只是用的方式不同。然而他也赞成采取极端措施。”1938年梵蒂冈纵容和同意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以及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梵蒂冈对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天主教君主国”的计划是支持的。由教皇任命编辑的《公教文明》杂志，不断发表反犹文章。

必须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政府撕毁与梵蒂冈的协定，在德国发生了反教权主义倾向和对天主教的迫害，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要求取消“天主教行动会的群众性组织，因而梵蒂冈同德、意法西斯的关系恶化了。教皇庇护十一世先后发表过《论不需要》（1931年）和《火焚的焦虑》（1937年3月14日）两道通谕，对德、意法西斯政府表示过谴责和反对。在1938年10月20日举行的基督教考古学家代表大会上公开揭露过德、奥的宗教迫害。他指

出，这些迫害使人想起了叛教徒儒略（又译尤里乌，即恺撒）时代对基督教徒的血腥迫害。庇护十一世还多次反对和抗议过德、意“过份的民族主义”，国务卿帕切利也向德、意提出过几十份抗议的照会和备忘录。

庇护十一世在1934年还错误地公开承认过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支持了日本对华侵略。1935—1936年纵容和同意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937年3月19日发布反对共产主义的特别通谕。梵蒂冈最初曾同意大利一道反对德国吞并天主教的奥地利，后来随着罗马日益依赖柏林，教皇特使甚至直接参与了德兵的“合并”过程。

庇护十一世与中国

教皇庇护十一世非常重视天主教会的对外传教事业。他一上台便在1922和1923年两次派专门圣使来中国扩大传教，重视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1926年，庇护十一世发表一份专门的《教会已往成绩》通谕，重申加强培养各国本地神职人员的方针，唯恐“一旦政体改变”，恐怕要“驱逐辖治自己”的“传教士出境”。他强调只有扶持和培养各国本地的神父，“才能有备无患，预防这个困难”，罗马教廷1926年时，首次为6名中国籍主教而祝圣。30年代华籍的各级神职人员已骤增为8000余人。

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位期间，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教育、文化和医疗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庚子年（1900年）以

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只有法兰西斯、奥古斯丁、多米尼克、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十余个修会，而20世纪20—30年代来华之修会竟陆续增加到20—30余个。天主教徒也显著增多。1922年耶稣会在天津创办了工商学院，1935年天主教又在北平创办了辅仁大学，此外还办了许多师范、中小学、一些神学院和孤儿院。迄30年代末，天主教在华所设的医院比在亚洲任何国家均多，天主教的诊所仅次于设在南非的数目。印刷和报刊方面，天主教创办了天津的《益世报》(1915年)，在中国新闻界占重要地位，30年代发行量显著扩大。1928年在北平设立的中华公教教育会，管理在华天主教的出版事业。

据中国协和书局“图书汇报”的材料所作的不完全的统计，迄20世纪30年代，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内的外籍教士，在华先后出版的著作共有27类，约3000余种，报刊杂志达136种；教会在华设立的各类教会学校中，大学计16所，中学231所，小学6812所，在校学生总数为337.744名之多。30年代，外国教会还办有各种育婴堂、聋哑学校、妇孺救会、华洋义赈会等等；在中国大小城市各类教会医院已达400多所。总之，基督教会逐渐扩大了在华的作用和影响。

二战期间和战后五十年代的庇护十二世

庇护十二世的上台

1939年2月10日，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病故了。当时正是战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二次世界大战公开爆发的前夜。法西斯分子在慕尼黑政策下虽步步得逞，但战争贩子的胃口永远填不饱。他们积极插手于新教皇的选举之中。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梵蒂冈展开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报刊广造舆论，要求选出一个能"统治世界"的人物来。驻梵蒂冈外交使团团长、德国大使冯·贝尔根在1939年2月16日向全体枢机主教公开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在对枢机主教们的演说中大肆吹捧希特勒的"新秩序"，并且要求选教皇时应符合"轴心"列强的利益。

教会权贵当中不少人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崇拜者或应声虫。62名参选教皇的枢机主教之中有35名是意大利人，其中不少人热衷于纳粹主义。3月2日，枢机主教、庇护十一世的助手、教廷国务卿尤杰尼奥·帕切利当选为罗马教皇，接受庇护十二世的法号。他任命前教皇驻巴黎圣使、枢机主教马里昂纳为他的教廷国务卿，这是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扭

任新教皇的助手，成为他的亲信是当之无愧的。马里昂纳是由于代表梵蒂冈参与法、意两国关于阿比西尼亚事件的勾结而披上红衣的。

庇护十二世（Pius Ⅻ，1939—1958 年在位）原名尤杰尼奥·帕切利（1876—1958），生于罗马，出身于同梵蒂冈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斐理伯·帕切利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一世的法律顾问。他的弟弟直接参加过梵蒂冈同墨索里尼缔结 1929 年“拉特兰条约”的一系列工作。尤杰尼奥·帕切利的伯父创办了天主教最大的银行之一“罗马银行”，帕切利家族与意大利最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关系密切，它的许多成员在银行、各种企业中有很大权势。或为经理，或是股东，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地位显赫。庇护十二世毕生的政治态度同他家族的经济地位密不可分。

庇护十二世青年时，于 23 岁（1899 年）接受神职。1901 年利用其与梵蒂冈上层人物的关系，开始在梵蒂冈的外交部门供职。1905 年任罗马教廷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他任教廷非常事务部秘书，这是梵蒂冈中央机构非常重要的部门。1917 年他被任命为教廷驻巴伐利亚（慕尼黑）的圣使，接着又任驻柏林的教廷圣使，曾协助德皇威廉二世挽救德国。1920—1929 年，帕切利以亲德外交家著称。1929 年他被立为枢机主教，次年被教皇庇护十一世遴选和任命为教廷国务卿。1933 年代表教廷与希特勒合作订约。他代表庇护十一世参加过多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有丰富的经验，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翻云覆雨。63 岁时的他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大力支持下登上教皇宗座的。

二次大战中的庇护十二世

庇护十二世上台后，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基本上是贯彻慕尼黑路线的。

1939年3月，在庇护十二世加冕的日子里，正值德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在新教皇演说时，他对此事只字未提，反而宣布自己热爱德意志，并愿为德国做许多事……"。1939年5月，希特勒过生日时，庇护十二世给希特勒写去亲笔的祝贺信。6月间，德、意两国抗议不合他们侵略者胃口的梵蒂冈无线电广播时，新教皇竟然将无线电广播的两名领导人德利亚耐主教和金列伊全部撤职。

1939年5月，德、意缔结军事同盟，而后日本也加入这个轴心国的同盟。6月14日教皇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人士时，庇护十二世宣布"愿上帝赐福于国王和墨索里尼"。

庇护十二世曾赞同意大利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的行径，祝颂过佛朗哥反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教皇把佛朗哥制度称为反对"当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斗争中的"天主教堡垒"。在波兰问题上，梵蒂冈赞成把但泽给希特勒，以满足他的要求。庇护十二世竭力反对英、法同苏联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方针，而是主张召开五国（英、法、意、德、波）梵蒂冈会议，用妥协、牺牲波兰来"缓和"形势。直到离大战爆发只有几小时了，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8月31日的照会中仍希望靠召开一个中型的会议（有英、德、法、意、波、比、荷 、瑞士及美国参加），以便使德波停止争端。这是多么的脱

离实际。

庇护十二上台后，对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根据罗马教皇的指示，教皇驻中国代表蔡宁在1939年3月14日公然向中国的天主教会发布要“中立”命令，要求中国的天主教会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应抱“不偏左”、也“不偏右”的态度，禁止爱国教徒投入抗日活动。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在欧洲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开始整整一个月，教皇对德国入侵波兰一直保持沉默。当波兰的法西斯恐怖盛行，梵蒂冈无法再装聋作哑时，9月30日庇护十二世接见了波兰枢机主教赫隆德和波兰驻梵蒂冈大使为首的居住罗马的波侨代表时，他也只讲了一些不疼不痒、令人失望的话。庇护十二世的原话是：“我并不奉劝你们收起眼泪，波兰不愿亡国。你们应该像你们土地上厚雪覆盖下的花儿等待和煦的春风那样，相信祷告的力量，期待上天恩赐安宁时刻的到来。”

1939年10月20日，庇护十二世发布了大战以来世人瞩目的第一号通谕《至上的教皇职位》。

这份由空泛词句堆砌而成的通谕，没有涉及战争的祸首，也未谴责纳粹暴行，完全避开了政治和现实问题。教皇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世人信仰“种种错误的学说”，在于“反基督教运动的谬论增长”，在于“背离天主”；甚至荒谬地说，战争“是由于在物质上没有信心，或利害之争所引起；是由于争取公平地分配财富所引起的”。庇护十二世还断言，用尘世的力量去结束战争毫无结果，应该“心向教会……应该祈求和平。”从这份通谕中可以看出教皇的基调是中立，利用战争

来巩固教会的“理想”和“阵地”。

1939年12月24日，庇护十二世发表了“和平计划”（即呼吁交战双方媾和的“五项和平条件”）的圣诞节文告，呼吁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以便协力反对公敌——无神论。1940年，庇护十二世对二战中法国的失败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对贝当卖国集团的支持都是错误的。

必须指出，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二次大战中基本倾向是亲德、意两国的，但是教皇并非同德、意法西斯亦步亦趋，因为名义上是“中立”的立场，故而同法西斯亦有一定的矛盾。1940年春，梵蒂冈加紧同“中立”的美国联系后，其“中立”的态度更为明显。梵蒂冈公开广播波、捷境内宗教迫害的情况，同时还在各个交战国政府间穿针引线，曾推动英德妥协。特别是阻止意大利参战，《罗马观察家报》遭到法西斯当局的抨击和压抑。1940年4月，当德国占领挪威、丹麦，5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际，庇护十二世公开表示“痛心”，而且许下诺言，要“为恢复这些国家的和平和独立而祈祷。”庇护十二世的这些表现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希特勒大举侵入苏联后一周，1941年6月29日，庇护十二世在广播演说中，谈到了战争的惨祸及对各国人民和家庭生活的灾难，但并未谴责侵略者。据统计，德国法西斯在苏联国土上烧毁、抢劫和消灭了1670所教会、237座罗马天主教堂、69座礼拜堂、532所犹太会堂和258幢属于宗教机构的其它建筑物。但梵蒂冈一直噤若寒蝉，从未涉及。庇护十二世的“五项和平条件”中根本没有提到“彻底消灭纳粹暴政”。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珍珠港突袭，于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开了战，梵蒂冈不仅没有揭露“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反而在1942年3月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庇护十二世同意日本驻法国维希的代办原田为日驻梵大使，而派马列拉主教为驻东京圣使。任何宗教上的理由都无法说明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是对的，梵蒂冈有什么必要同日本建交，何况“神道教”的日本与天主教并无共同的宗教利益。看来双方都着眼于政治目的是无疑的了。日本侵占菲律宾后推行殖民奴役政策，菲律宾的居民中2/3是天主教徒，日本当局还在马尼拉建立配合统治的“日菲天主教友好协会”。但人们听不到梵蒂冈谴责日军侵菲的罪行。1942年6月，梵蒂冈还同“轴心”阵营的仆从国芬兰法西斯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夏，经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德军陷入严重危机，梵蒂冈的策略和方针亦从而发生转变。此后，一面继续与轴心国合作，一面却开始采取了亲英、美，特别是亲美的方针。1942年12月24日，庇护十二世发表圣诞节文告，除重申保持“中立”外，又玩弄了个人“自由”、“权利”、“秩序”等词藻，强调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永恒性，并号召人们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止“共产主义的危险”。庇护十二世和天主教的主教们投入了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活动。美国则关心于战后的世界霸权。

1943年9月1日，庇护十二世乘战争四周年之际，通过电台发表演说，抱怨道，现在“暴力的精神战胜了和解的精神”，他主张“拥护和平者幸福无穷”。要对“战争中运气不

佳的强国”抱“公正态度”。对1943年10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和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宣言，庇护十二在12月24日发表的圣诞节文告中表明了态度。他劝告各国人民要忍受苦难，等待天国的奖赏，要“公正的和平”，不应该用“数字去计算双方力量的对比”。其目的是让侵略者取得好处。

1944年末至1945年夏，二次大战接近尾声。1944年9月1日，庇护十二世通过无线电发表了战争五周年告全体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书。他号召捍卫私有制，维护资本主义。他强调说，没有资本家，社会便不能存在，坚决反对工业国有化。1944年12月24日，庇护十二世发表了有关战后体制问题的圣诞文告，他再次要求尽快使德、日法西斯得到“温和的和平”。教皇主张战后要把“民族”和“民众”区别开来，认为“民族”乃是精神素质卓越、性格坚强的优秀人物集群；民众是“不定型的”，他们倾向于破坏社会秩序。1945年4月29日，庇护十二世接见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声称，任何一个天主教徒都不该接受教会所谴责的社会理论。

1945年5月9日胜利日，庇护十二世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了告全世界书。他号召在“公正”的基础上结束对日战争。对欧洲，教皇主张在“唯上帝之命是从和听凭上帝吩咐”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对法西斯战役则要“慈悲为怀”。二战结束后，庇护十二世曾同意一些战犯在梵蒂冈窝藏和避难。教廷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在1945年6月10日曾对教皇为什么对法西斯罪行保持缄默的说明中写道：因为教皇“是

远远近近所有牺牲者和肇事者的父亲”；或解释为当时不了解这些迫害活动的“惨无人道性质”；并说梵蒂冈仅仅是在战后才了解事情真象的。

二战后的庇护十二世及其与中国

1945 年 10 月 3 日，教皇庇护十二世宣布，天主教会是“极权主义”的敌人，这个字眼既包括“民族和种族”学说，也包括关于阶级的学说．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1945 年 11 月，教皇通过意大利圣使向意大利政府宽恕意大利的一些法西斯头子，天主教报刊也要求宽恕希特勒罪犯。

二战后，美国对梵蒂冈的影响明显扩大了。庇护十二世在 1945 年 12 月宣布了 32 名新枢机主教候选人，并在 1946 年 2 月 18 日正式任命了他们。如过去那样，通常意大利枢机主教占多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新的枢机主教中不少人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政府有关系的人物。

1945 年教皇庇护十二世表示支持美国杜鲁门政府的马歇尔计划，对在中国传教事务颇为关怀。在北京成立日思高经学会、天主教信证学社。在华天主教中美国势力渐大，曾派葛惠良等进行调研，拟订出“战后教会事工计划”。

1946 年，罗马教廷宣布中国“成立正式教统、划全国为十二教省”，擢升原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为枢机主教兼北平总主教，于斌为南京总主教．田耕莘到职后在北平办“耕莘中学”、“上智编评馆”、“圣多玛哲学院”，扩展天主教势力。同年，美国正式任命长期在华传教和主持燕京大学的“中国

通”司徒雷登（1876—1962）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任后，立即恢复基督教差会，并直接参与制定和执行“拥蒋反共”的“复兴计划”。

1947年，庇护十二世任命于斌为江苏教区总主教，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总人数为4200人，其中美国人占1/7。司徒雷登到上海发表讲演说：“今天我所要请你们注意的是如何实践这一爱国目标，而渗入基督理想，使其适应贵国目前的需要……”。

1948年，美国天主教枢机主教贝尔曼及主教华理柱一行来中国，会见蒋介石，煽动反苏反共，并扩展“公教报国团”教会武装，组织圣母军，宣传天主教超政治，还组织教士隐蔽或撤退。

1949年7月，庇护十二世给中国天主教各修会下达了“紧急通谕”，全名为天主教友如何对抗共产党”，并命华理柱、黎培里等留华指导执行。主张把所有信奉和讲授共产主义学说的教徒逐出教会，并拒绝给“自觉或任意地”支持共产党活动的人举行圣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爱国教友于1950年7月开始酝酿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1957年7—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反对以庇护十二世为首的罗马教廷的控制，并宣告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

“礼仪改革”和庇护十二世的晚年

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恢复教会的礼仪，使之既符合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又适应当代基督教徒的生活，乃将19—20世纪以来出现的“礼仪改革运动”的要求付诸实施。1951年与1955年对复活节前一周礼拜进行改革，后得到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的赞同。庇护十二世把自13世纪以来留传已久的教皇入主宗座的登位典礼也作了一定改革。规定由教皇自己选择法号；制定新一届罗马教廷的国徽；登位时由典礼主持人给新教皇戴“三重冠”；全体枢机主教应当匍匐在地去吻教皇鞋面上的圣像，名之为“亲足礼”。各枢机主教还要向新教皇宣誓效忠；最后由新教皇宣读重新任命的教廷官员，礼成后，各负其责。

二次大战后，罗马教廷于1948年发布了最后一个禁书目录，将4000余种著作列为禁书。从1559年长篇大部的禁书目录公布出来，已近400年，教廷总共公布的禁书目录共达22版，其中以18世纪与20世纪为高潮，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书名日益增多，很不得人心。由于各国人民群众及天主教徒的斗争，1966年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终于废止了禁书目录。

1950年11月1日，庇护十二世宣布圣母玛利亚肉体升天的教义，并以此作为第25个大赦年的高潮。

庇护十二世早在1946年时，即宣布前教皇庇护十世为圣徒，后来在1954年5月29日，庇护十二世亲自主持了以前

教皇十世谥圣的仪式。庇护十二世为了与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国际劳动节抗衡，1955 年时，他宣布确定 5 月 1 日为玛利亚的丈夫、工匠、耶稣的养父圣约瑟的瞻礼日。

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晚年，他的观点有明显的进步。他明确地表示反对现代战争，为了控制人口，避免盲目过快增长，他赞成节制生育的主张。1958 年 10 月 9 日，庇护十二世以 82 岁高龄离开了人间。

约翰二十三世与天主教会的开始中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曾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彼此声援、广泛合作过。人们对此记忆犹新。罗马天主教会中平信徒和青年对许多保守观念和传统模式逐渐不满，教会中更新和改革的势力日益扩大，群众要求推行新政策的形势日渐成熟，终于在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1958—1963年在位）上台后，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死后，枢机主教会议经过多次激烈争辩，进行过12次投票，终于在1958年10月28日选出了安吉洛·朱塞皮·隆卡利为新教皇。

教廷外交家的生涯

安吉洛·朱塞皮·隆卡利（Angelo Giusepe Roncalli，1881—196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毗邻瑞士边境的贝加摩城。年轻时服过兵役。自1904年起，便在罗马任神父职，1921年任意大利对外传教后援会的会长。1925年任主教。教皇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时期，隆卡利便到梵蒂冈开始了专门担任罗马教廷外交家的生涯。他拥有了同各式各样人物和多种类型政治团体打交道的工作经验，他曾代表罗马

教廷在保加利亚、希腊工作（任教廷巡阅使），同东正教世界有过广泛接触，他还担任过罗马教廷驻土耳其使团团长。二次大战中，他在英国代表教廷担任驻戴高乐将军自由法兰西的特派使节，努力改善法国同罗马教廷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缓和法国青年传教士中的过激情绪，并引导法国天主教会恢复独立自主的权力。他竭力使被俘的德籍天主教神学学生获释。隆卡利既善于调解各种矛盾，又能灵活处理教廷与各国的各种关系，因而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信任和器重。二次大战后，1953年他被庇护十二世立为枢机主教并出任过威尼斯大主教。1958年，隆卡利被选任新教皇时已是77岁高龄，被称为“看守教皇”。他自己选用的法号是约翰二十三世。在西方教会分裂结束时，三位并存争位的教皇当中曾有一位称约翰二十三世（原名是：巴尔塔扎尔·柯萨），这位教皇在康斯坦茨会议中于1415年3月出逃，后来在1415年5月29日被废黜。自此以后的五百多年来，任何教皇都没有再用约翰法号。如今，隆卡利选用约翰之名，其目的在于恢复基督教会史上备受人们爱戴的称号，而他之所以又用二十三世，则表现出他的信心和观念。他认为：1410—1415年时不称职的巴尔塔扎尔·柯萨，是僭教皇之位，隆卡利不承认柯萨是约翰二十三世，而自己才是真正的约翰二十三世。

隆卡利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后，基于多年对外交往的亲身体会，他决心引导天主教会按世界的新形势考虑自己的政策、模式和改革，以便适应世界，发展和壮大自己，他在位不到五年中，发挥了外交特长，实现了改革夙愿，创立了一系列突出业绩，被人们誉为从此开启了天主教会的中兴时代。

筹开普世大会

约翰二十三世上台伊始的1958年，他便宣布要重新召开中断了近百年的第二十一次普世大会（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他声称，要用公开对话、开诚布公的态度，使天主教会同其它基督教会克服长期分裂对立，认清各自责任，以便建立真正的普世主义的关系。1960年，约翰二十三世主持成立了“促进基督教徒合一秘书处”，他任命奥古斯丁·卡迪纳尔·比(1881—1968)为秘书长。这样一来，方便了同其它教会开展联系和对话。他指派了五名正式观察员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三届大会，认真调整与其它教会之间的关系。约翰二十三世还接待了英国安立甘宗、其他教派代表以及东正教的领袖。

约翰二十三世根据世界上人们关心的问题，为了纪念《新世物》通谕七十周年及颁布《四十年》通谕三十周年，他在1961年7月14日新发表了《慈母与导师》（又译为《母亲与女教师》）通谕，宣传天主教会的学说就是人类的需要，强调应谋求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教会像慈母一样关怀人类，像导师那样指引人们的方向，还号召人们要努力“跟上时代形势”。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开幕。与会人总数计达2300多人。参加开幕式的主教共254人、神学家201人，还有新教及其它宗教的代表约40人。俄罗斯东正教首次派来观察员列席会议。主教当中不仅有革新派，也有保守派。在这

次会议中，许多敏感、人们关心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例如：要求改革教会结构、取消宗教裁判所、废除教廷颁布的“禁书目录”等等。会上矛盾突出，意见分歧甚大。要想通过这次大会去“跟上时代形势”，实非易事。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不得不在12月8日休会。约翰二十三世生前，这次大会虽然再没有继续下去，但是，通过这次普世大会的召开，天主教会内部企图改革和提倡普世教会运动的精神已明确地反映出来。

教廷改革与“打开教会的窗户”

约翰二十三世为了适应天主教会开展活动的需要，在1958年便将枢机主教增加为85人，从而打破了四百年前教皇西克斯图斯(1585—1590年在位)时于1586年所规定的枢机主教不得超过70名的限额。他还让从未担任过教廷公职的许多国家的主教，参与了罗马教廷的工作。

约翰二十三世为了改善天主教会同犹太人的关系，他下令把礼拜仪式中对犹太人有刺激性的欠妥言词全部删除；他带领一批高级教士共同决定并宣布，各国天主教会可以用本民族语言举行宗教活动，而不局限于用拉丁语。从天主教会角度来讲，这是十分重要的新措施。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亚非万隆会议后和60年代初，亚非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与地区，相继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而纷纷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教会，对西方教会的自我中心地位和神学的观念、模

式，提出了批评和疑问。这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也处于发展的形势，人们希望上帝和天主教会对世界上无权、贫困的有色人种（多数是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能有更多的关心。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有鉴于此，主张天主教会应根据新的历史潮流，放弃陈旧的方针，“打开教会的窗户”，以便让新鲜空气进入长期封闭的罗马教廷。他呼吁天主教会的学说、政策应不断革新以跟上时代。他提出所有发达国家应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给以必要的援助，天主教徒要为了人类的共同福利，而同持有其它信仰的人合作，在一切工矿部门给工人以更多的发言权。

约翰二十三世本人身体力行，扩大对外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他不顾高龄、不辞劳苦，跋涉旅行。他主动走访意大利总统，在梵蒂冈频繁会见各国当时的首脑或政要，以及不同教派的领袖、要人，如美国的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苏格兰长老会主席；以及日本神道教的大祠官等。特别是打破惯例，会见了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领袖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一时成为世人议论的话柄。

“世界和平”新策略

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间，一方面仍固执地坚持梵蒂冈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哲学教义”，继续竭力攻击和否定唯物主义，说私有制是“长存的”、“具有永久效力”。但另一方面，他却公开主张，世界应当克制、和平，他强调道：为了人类的生存，西方资本主义同东方共产

主义两种制度，只能和平共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之间一度关系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约翰二十三世一再呼吁，美苏双方应慎重、克制。

1963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表了著名的《世界和平》（又译为《人世和平》）通谕。这是他临终前为天主教会留下的一篇纲领性文件。文中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思想为基调，着重论述了应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建立有“自由、公正、真理、正义、和平”的世界。通谕中宣布：“一切人，生而具有同样的尊严”。号召各国停止军备竞赛，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政治上和平共处。提倡“基督教会的合一与改革”，宣传普天之下的天主教徒应为人类的共同福利同其它信仰的人们合作，还呼吁：建立世界各国共同体，以确保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这篇通谕内容令人瞩目，词句感人，是天主教会史上的重要文件，罗马教廷曾广为宣扬。

约翰二十三世尽管再有振兴天主教会的雄心和献身上帝的超凡魅力，但毕竟已达耄耋之年，心力交瘁不支，而于1963年6月3日病逝于梵蒂冈教皇寝宫。他未竟的事业由继任教皇保罗六世继续下去。

“跟上时代形势”的保罗六世把堂区扩及全世界

约翰二十三世于1963年6月3日病逝不久，6月21日枢机主教焦温尼·巴蒂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当选为新教皇继位，称保罗六世（Paul Ⅵ，1963—1978年在位）。

蒙蒂尼于1897年9月26日出生于意大利米兰东部布里西亚城的一个律师家庭。1920年起担任神职司铎，赴罗马进修神学。1923年任教廷驻华沙使馆参赞。自1933年起，便在梵蒂冈教廷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赞赏，1939年任罗马教廷国务卿，1954年出任米兰大主教。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上台的当年，便立蒙蒂尼为枢机主教，被约翰二十三世倚为左右手。他支持教皇进行教廷改革，积极推动“打开教会的窗户”及“打开东方之门”的活动，人们称他为稳健革新派。1962年10月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开幕时，蒙蒂尼是主席团成员。从1963年起，他共历漫长的15年教皇生涯，继承、发展了约翰二十三世的事业，为天主教会留下许多“德政”，对一些革新决策划上了句号。他的视野和足迹遍及全世界。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及其历史性文件

保罗六世任新教皇时，虽已年过花甲（近 66 周岁），但他目标坚定，精力充沛。新教皇决定继承约翰二十三世的遗愿，紧抓两件事坚持不懈。一项是力争开完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再一项是走出教廷，广泛开展外交。

梵蒂冈公会议的第二届大会是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起召开的。目的是为了"跟上时代形势"，改革教廷、调整政策和机构，推进普世教会的合一运动。会议举行不久，因分歧过多而于 1962 年 12 月 8 日休会，并未取得什么结果。新教皇保罗六世决心继续领导会议，并将重要决议形成文件，付诸实施。他终于从 1963 年秋季起，主持开完了每年一期的最后三期会议，而且通过了 16 份长短不一的决议和文件。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及其文件[①]在天主教会史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这届会议完成的第一项工作是制定了《神圣礼仪宪章》。会议中围绕礼仪革新问题的辩论相当激烈而且混乱。不愿放弃旧礼仪的人，认为这是涉及美学的争论，他们坚持要保存旧礼仪中庄严高贵的"神秘感"；但新礼仪的支持者们主张礼仪中结合柔和的音乐以及使用本国语言，完全是从牧民出发而并非美学问题。他们认为：拉丁文的弥撒，使许多信徒漠

① 见沃尔特·姆·艾博特编辑的《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文件集》纽约 1966 年英文版。

然听不懂，这类陈规必须用文件的形式予以更动。最后终于根据礼仪改革的成果为基础，对圣礼和弥撒仪式作了修改，这样便于吸收更多的信徒参加宗教的活动，还恢复了共祭仪式，如一个教区的司铎们和主教同祝圣体奥迹；或全世界的主教共聚一堂同教皇共祭，藉以体现对教会共负责任的精神。

会议通过的《关于教会与非基督教关系的宣言》，言简意赅，只有1000多字。它主要论及基督教同犹太教的关系问题。它对任何形式的反犹、排犹主义，对由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之别而受到的歧视或迫害表示遗憾。文件鼓励与非基督徒开展对话，支持为共同福利而合作。另一篇《教会在现代世界之牧职宪章》，文字长达23000余字。这篇文件是根据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社会问题通谕》中的许多观点阐发的。它不只是写给基督徒，而且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呼吁。文件号召全体神职人员同平信徒合作，共同抵制由于技术社会的发展而丧失人性，应努力创造一个有人性的人道世界。

这届梵蒂冈公会议制定了两份关于神学、教会和教义的基本文件。一个是《关于教会的教义宪章》；另一个是《关于天主之启示的教义宪章》。前一文件本是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时未能完成的任务，这次会议中将这一文件草稿反复讨论、加以修改，这是一篇重要杰作。它不再以教阶制度和管辖权为重点，而是比较注重《圣经》和历史，对一些问题改为灵活有力的立场，强调全体主教的教士职能，主张教皇和全体主教共同负担整个教会的责任，通过组成主教院等适当的形式以便管理教会，绝不能停留在“布告板上的告示”阶段而无

实际举措。会议文件中的这一要求，后来确实是兑现了。

后一文件全面吸收了普世教会运动中关于“启示”的记述。抛弃了从前只把《圣经》和圣传当作“启示的来源”的传统看法，采取了当代解释和理解《圣经》的方法，同庇护十二世 1943 年发表的《神圣的精神》通谕中的提法一致，指出根据上帝的旨意和意向的启示，是赐福全人类。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一切信徒有权利用“经过教会当局同意”的各种圣经译本，包括新教学者们翻译的译本。

本届会议还通过了十分重要的、新的《关于普世教会运动的教令》。在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时，天主教会推行的普世教会运动的目标乃是争取一切基督徒回归罗马天主教会，并未提出过天主教会本身应加入到普世教会运动的活动之中去。但本文件则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主张天主教会亦应加入普世教会运动，还承认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分裂，是双方面的失误和过错造成的，双方都在教义、教规和活动上受到损害。不能再把东正教、新教称为“裂教”、“异端”。文件号召，天主教徒同他们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共同祈祷和活动，应受到鼓励。这份文件初稿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宗教自由宣言》。这个宣言在会议中间引起十分激烈、尖锐的辩论。会议最后宣称，宗教自由的基础是个人的尊严。《宣言》对于天主教会与其它教会之间建立直接沟通的新关系发挥了作用，对于天主教会在世俗事务中广泛发挥作用有着重大意义。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教会具体工作和实际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如关于主教、神父职责、神职人员的培养、宗教生活的

更新，以及传教、教育和生活问题等等。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经历最后三期于1965年12月8日正式结束。会议最后号召全世界青年，在世界历史巨变的新时代中应敞开心扉，用全副精力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本届会议进程中，礼仪的改革、用民族语言作弥撒、各教派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使天主教会的变革扩大了。本届会议是教会史和全世界的重大事件，会后普世教会运动和许多革新举措迅速传播开来。

教廷机构改组和全球主教代表会议

保罗六世上任时，他的办公桌上有两份报告在等待着他。一份是已故的泰里亚枢机写的，他提出教廷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有些机构职责不清，互有重复或缺乏协调，如教义部与圣职部的任务有重叠等。再一份是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访问了教廷的每一位成员，人们对财政上颇有顾虑。保罗六世在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进行期间，便对罗马教廷机构作了调整。当时罗马教廷各机构总共有2260名成员（其中仅有九名女性），人员精干，尤其中层，都是精英分子，熟谙神学。整个教廷是教皇的办事机构，随历任教皇的意志和特点为转移。例如，教皇倾向于集权，则教廷必然是集权化机构；倘若教皇习惯于落询，则教廷各机构也会倾向于落询办事。

在保罗六世时期，留下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罗马教皇选举法》，确定了由枢机主教会议选举教皇的规则和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件，甚至具体到任何人都不准对会议安装电子窃听器。

根据教皇的安排，1965 年 8 月 15 日在罗马教廷机关中创立了教廷经济事务部、宗座财产管理局、教皇宫廷管理局、教会中央统计局及其他各部，同时，颁布了“普世教会制”，对教廷的国务院、三法庭（最高、高级、特赦法庭）、各秘书处等机构及其职权，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中对圣职部（执行异端裁判所职能）专门维护“信仰纯洁”的强烈意见，而于 1965 年 12 月 7 日，将该圣职部加以改组，更名为信仰理论部，成为与修会部、圣礼部类同的十个小部之一。

1966 年 6 月 14 日，教皇保罗六世正式宣布，对于早在 1509 年时第一次公布的、在 1947 年又重申过的《禁书目录》不再有效而废除。1975 年，天主教会中最后一位教廷宗教裁判员奥塔维亚尼也以年达 80 岁而离职退出枢机主教团。保罗六世于 1970 年 11 月 23 日在下达的通谕中，对教皇人选的年龄作了规定。即，“年过 80 岁的枢机主教没有被选举权”，而教廷中的官员满 75 岁时则自动退休。保罗六世时期多次增加过枢机主教的人数，迄 1978 年 8 月他逝世前，枢机主教已增达 145 人。他还扩大了教廷国务卿的职权。

教皇保罗六世根据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中主张加强全体主教对教会共负管理责任的要求，在 1965 年 9 月 15 日颁布的《自动手谕》中宣布成立一个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目的是向教皇“提供资料和意见”，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可有“决定权力”。这个“全球主教代表会议”在保罗六世任期之内共举行过五次会议。

1967 年的会议，共讨论过五个题目，即，修改教会法、教

义、修院、混合婚姻及礼仪。1969年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商讨共负责任问题，藉以弥补和充实教皇保罗六世发布的《人类生命》通谕。1971年专门讨论了司铎职务和世界正义。这次会议效果突出。向天主教徒介绍了教皇领导下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工作。1974年，主题是研讨福音的传播，但没有结果。会议向教皇呈上了一系列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份报告为保罗六世在1975年12月8日发表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通谕，提供了大量素材。教皇在通谕中写道："宣传福音的人四分五裂，宣传福音的力量显著减少，这可能是今日宣传福音的最大弱点之一。"他甚至分析其原因道：这是由于"道理的争辩、意见的分歧，或基督徒互相指责"所致。保罗六世任期内最后一次全球主教代表会议是1977年举行的，任务是处理教理问题。此后，这个组织形式虽然继续存在下去，并未被废除，但却呈现出日渐软弱无力的趋势。

保罗六世是一位稳健温和的革新派，他有"跟上时代形势"实行前述的革新政策的一面，应该说这是基本的；但是他还有坚持保守、传统观点的另一面，这在下述两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司铎独身》和《人类生命》两道通谕

保罗六世在推行教廷改革的过程中，又有意识地在天主教会中采取了对革新和保守两派都不得罪的原则，他常常回避参加一些会议或虽然出席但不轻意表态。他一再声称只能放弃教会中明显过时的措施和旧传统；而天主教会的许多传

统观点则仍应恪守。教皇在教士独身和节制生育两个问题上不让主教会议过问。

1967年，他发表了坚持《司铎独身制》通谕。在通谕的头一句话便强调这是："教会皇冠上一颗最珍贵的宝石"，而且讲这是为了使教职人员能够作到"随时供差遣"、"完全奉献"等等。他对某些修士还俗或违背誓愿者十分不满，频频谴责。

1968年，保罗六世发表了《人类生命》（又译"人类生活"）通谕，重申他继承历代教皇的观点，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传统立场。事先他曾任命了一个由主教和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大多数委员经过审议之后，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对世界已构成威胁，要求改变罗马教廷的旧立场，批准某些节育办法，以限制人口过剩。但教皇却置他们的意见于不顾，在通谕中绝对禁止一切形式的人工节育方法，结果引起许多天主教神学家、教徒，以及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同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所制订的《教会在现代世界之牧职宪章》的精神相违，与人们的期望相反。但保罗六世顽固坚持其保守观点，在1970年10月12日，又在致天主教医师大会的信中提出：合法堕胎无异犯杀婴罪，要求"对人应绝对尊重，从他成胎的最初时刻一直到呼吸停止。"上述两个问题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敏感问题，都涉及到个人的自由，虽然许多人的不满和反对并未改变教皇的决定，但这个过程本身反映出天主教会内已有所松动，最高首脑——教皇的决断已能引起讨论；教皇的权柄本身也受到批评和攻击。教会内已出现教阶制下从来没有过的某种自由。从20世

纪60年代末起，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无限权威已面临新的变化和考验。无怪乎保罗六世多次告诫耶稣会会长并重申："耶稣会仍要忠于教皇制"、教士应坚持苦修和修道生活，而平信徒则必须"坚定信仰"。

他的堂区是全世界

著名的文化形态论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970年时对教皇保罗六世曾评述道："在他为和平而努力时，教皇把全世界看作他的堂区，把全人类视为他的羊群。"保罗六世本人长期坚持的政治观点是："不能在革命中寻求正义和得救，而必须通过和谐的进化和演变。"

保罗六世同他的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样，本人曾是一位长期从事涉外事务、经验丰富的教廷外交家。他上任后，不仅保持了梵蒂冈外交的连续性，而且有新的开拓。从约翰二十三世起，已经开始同社会主义国家"从咒骂到对话"。保罗六世的第一篇通谕便是呼吁"向世界开放"、"研究无神论"、"研究最近代的意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呼吁道："必须尽快地（与无神论者）建立有效的会谈基础。教廷、主教团、神学家、神职人员以及普通教徒都应为此而努力。"

保罗六世特别重视推行他的"东欧政策"，以便有效地联系东欧的6000万天主教友、扩大天主教会在东欧的势力和影响，并实现和谐的演变。他曾认为对匈牙利、捷克难有发展，而在波兰则大有可为，从而选定波兰为梵蒂冈的主要目标，在保罗六世任内，波兰天主教会日益增强。

教皇鉴于在非洲和远东新兴国家陆续涌现，另一篇通谕是《论民族的发展》，主张教会应重视被人们称为“第三世界”这一面。据统计，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分布状况，1960年时在欧洲、北美占总数的51%，但到2000年时，欧洲、北美的教友比例会减至30%，而其余的70%将来自第三世界。

教皇很重视行动上同其它教会沟通联系。1964年1月，保罗六世亲自到基督信仰的发源地——耶路撒冷朝圣。1967年，保罗六世远道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会见了希腊正教的普世牧首阿桑纳戈亚斯，这是五百多年来东西方教会领袖第一次会晤，是扭转一千年历史的重大事件。过去，罗马长期声称它的教会的普世性及对所有教会的管辖权，这次则有了根本性转变。在呈给东正教大教长的文书中，保罗六世写道：“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分离和彼此误会之后，现在，藉天主的恩宠，我们的教会再度承认彼此是姐妹教会。”接着，双方同时宣布正式撤消1054年互判革除教籍的决定。当然，实际上的分裂不可能结束，因为在教义、礼仪之争的背后，乃是经济和政治利害的争夺。教皇保罗六世还有惊人的高“姿态”。1975年12月15日，当他在西斯廷教堂接待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使节团时，保罗六世忽然在米利敦总主教面前跪下，亲吻他的脚。惊愕万分的客人首席总主教一时无措也想跪下，却被教皇所阻。几天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狄米特略一世对保罗六世此举赞叹道：“教皇向教会和全世界以行动证明他是全体基督徒的首席主教、是教会与世界修和团结的桥梁。”

保罗六世对圣公会也表示特殊的和解。当费塞总主教的继任人兰而博士1966年访问梵蒂冈时，教皇在西斯廷教堂接

待时也亲切地拥抱他。保罗六世道："阁下莅临，重新建立罗马教会与坎特伯雷教会折断了许多世纪的桥梁。"我们把充满争端的过去，交到"仁慈的上主手中吧"！1970年10月25日，罗马教廷为16至17世纪40名殉教者举行谥圣典礼，利用这次盛会，保罗六世强调天主教会和英国圣公会的团结恢复后，罗马"再也不会有削弱圣公会合法的威望和正确名称的企图"，一定会实现"在耶稣的爱与自由的精神之下圣人的共融。"

保罗六世重视全方位的外交，四方活动。1964年，他前往印度，参加了在孟买举行的天主教徒谢恩大会；1965年，他访问美国纽约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教会参与这些组织的工作，是一种人世的方法。"他呼吁道："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1969年7月，保罗六世访问乌干达，向早期传教的殉道者致敬。1970年，罗马教廷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大使级关系。1970年，美国派遣了亨利·卡伯特·路奇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使节常驻梵蒂冈工作，加强了双方联系。1970年，保罗六世对巴西监狱使用酷刑加以斥责。他说道："酷刑像流行性的传染病一样。""残忍、不人道的酷刑，用以作为逼供手段，对此我们应直斥其非！"保罗六世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时，一下飞机马上亲吻拉丁美洲土地，使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之震惊。1971年，南斯拉夫铁托总统访问了梵蒂冈；1974年，教廷同波兰正式建立了工作关系；1977年匈牙利元首卡达尔访问梵蒂冈……教廷同东欧各国关系逐渐正常化。

外国首脑正式访问梵蒂冈的次数，在保罗六世在位期间

显著增多。据统计，庇护十一世时有10次；庇护十二世时26次；约翰二十三世时共34次；但保罗六世时竟达90次。在教廷国务院领导下的驻外使节自1967年后明显扩大了。据1973年9月统计，梵蒂冈驻各国使节曾齐集罗马附近的花士加第开会，与会人数总数是：教廷大使36人、副大使36人、教皇代表16人、教皇代办1人。保罗六世早在1970年便曾亲自对齐集马尼拉的驻远东使节讲过："教廷公使的职务虽不断发展，但他只是教皇的代表。"他的这一观点长期坚持不变。他还说过："对外交感到绝望就是对人感到绝望。"保罗六世的外交成就是很突出的。

保罗六世"最后的爱"和十三年前的遗嘱

教皇保罗六世是1978年8月6日（星期日）逝世的。这天适逢耶稣显容的盛节。其实，当1977年耶稣升天节时，教皇就对一群教友讲过："我离世的日子日近了。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庆祝这个节日。"8月5日，教皇由于膀胱炎发作，血压升高，呼吸困难。8月6日傍晚6时的感恩祭是他的秘书麦奇神父代他举行的。临终前，教皇催促国务卿韦犹为他进行了敷油礼，他在合掌祈祷中溘然长眠。巧合的是，他1920年出使波兰购买的那个闹钟，平时总是晨6时闹响，这一次竟然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晚上9时40分时忽然响起来。

教皇的遗体停在冈道夫宫供人们瞻仰，不时出现人们悲痛晕倒和挤、拉、拖的声音，8月9日，遗体在直升机和大量摩托车护送下，移入罗马圣伯多禄大殿。最动人的事是8月

11 日（星期五）公布的教皇保罗六世的遗嘱，那是一篇共 11 页的手稿，封面是用一张上面用凸字印着教皇徽号的便笺，他用工整的字迹写有："以下是我的遗嘱的要点"，是早在教皇上任的第三年——1965 年 6 月 30 日写的。遗嘱很像是感情奔放的感恩祷词，他对宇宙间一切事物都赞美、对友谊感到欢悦；他对死亡没有忧伤、却很泰然。保罗六世写道："此刻日已将尽，一切都要结束。而我也必须离开这个奇妙和动乱的世界，我感谢你！主。"他表示，虽然身为教皇，但和基督徒兄弟姐妹是同等的、分享同一信仰，教会是一个精神的共融。自己的死亡是对"教会最后的爱。"

保罗六世在遗嘱中写道：属于他家庭的东西，一一交还给他的弟弟，其它所有的一切全归教廷。麦奇神父被委为他遗嘱的执行人。他要求举行简单葬礼，不要灵车，不要在墓碑刻上任何墓志铭。1972 年 9 月 16 日及 1973 年 7 月 14 日又在遗嘱中加有附注，只是肯定上述安排，别无补充。

8 月 12 日（星期六）庄严肃穆的葬礼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百多名枢机一律穿红色祭衣，头戴主教冠。枢机团团长 85 岁的甘弗罗尼利致悼词，殡葬礼的全过程笼罩着感恩气氛，人们很自然地忆起保罗六世 15 年教皇生涯中的事迹和他承担的巨大工作量。他的足迹之广、审阅案卷数目和处理问题之多，以及他在教廷改革、外交和普世教会活动中的贡献，世人有目共睹。晚间近 8 时，当月亮离高升起时，保罗六世的遗体被埋在圣伯多禄大殿地下室内离约翰二十三世的坟墓不远处。他的确继承和向前发展了约翰二十三世的未竟事业。

当代梵蒂冈宝座上约翰-保罗二世

前任教皇之死

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惊人消息从罗马教廷传了出来。在位仅33天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1912年10月17日生，原名为阿尔比诺·卢恰尼)，在1978年9月29日凌晨5时30分逝世。第一个发现他猝死的是这位教皇的留任英文秘书马基。当教皇没有按惯例出来奉献感恩祭时，马基心情不安地走进教皇的卧室，发现室内的电灯虽然还亮着，但教皇已在床上停止了呼吸。一本《师主篇》还放在榻上。据医生诊断，约翰一保罗一世死于心脏病的突发。人们是在惊奇与不安中传播着教皇逝世的消息。因为头一天他还精神抖擞地会见过一些教友，在接见一群菲律宾主教时，仍充满活力地告诫他们要积极宣扬基督信仰的精神理想和努力减轻社会的贫穷。当晚10时，当约翰一保罗一世准备就寝前，听到一个左倾的青年在罗马被人谋杀的消息后，他还轻声地自言自语道："现在年轻人也互相残杀了！唉！……"。这便是他最后的话语了。

10月4日下午，不停的雨水拍打着人们伤痛的心。约翰一保罗一世的葬礼在进行中。悲泣的主教和记者们忍不住互

相诉说着："天也在流泪啊！"葬礼由高龄的甘弗罗尼利枢机主教主持，共有95位枢机主教在场，不少外交官员也到来，还有数以万计的教友们。

枢机主教们经过酝酿，决定选举新教皇的枢机会议不能耽搁太久，应从10月14日开始。因为许多枢机主教都有原定的各种安排，不便在罗马停留过长。突然失去教皇使一些枢机主教感到沉重而茫然无所措。正像枢机会议前三天（10月11日）在圣思维教堂举行感恩祭时，威斯敏斯特的休谟枢机主教在讲道中表露的那样："我们的许多希望和期许，都同他一起被埋葬了！"

在罗马，111名枢机主教都到齐了。因为坐轮椅的励德枢机主教早已补上了鲁士安尼（约翰一保罗一世当选教皇以前担任枢机时的原名）的空缺。10月会议同约翰一保罗一世当选教皇的8月选举时的背景不同了。

十月的枢机会议和八次票决

这次选举新教皇，既不能把8月选举时的落选人一一再在候选名单中重列一遍，而在意大利籍人范围之内又很难找出类同约翰一保罗一世那样健谈、挥洒自如和充满活力的人。约翰一保罗一世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讲过：教会中需要有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教皇。他本人在8月选举时便一直投53岁的巴西卢塞德枢机的票。10月枢机会议中，人们倾向于从一位最博学、圣善、能干又谨慎的50多岁的枢机主教中选出一人担任教皇。这个人不会突然死去，但也不应任期太长，以免

晚年专断和迂腐。最好选一位他愿在适当时候便引退的教皇。于是许多枢机主教对新教皇的候选人便开始投向：巴西的卢塞德、非洲贝宁的甘定、威斯敏斯特的休谟、西西里岛巴勒摩的巴巴杜拉、佛罗伦萨的贝纳利，以及波兰克拉科夫的韦提拉，等等。

许多枢机主教都饱经世故、有主见，很难被别人左右。选举新教皇之前，首先是重新思考和界定“牧民”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少人认为：八月会议时所主张的“牧民”是指“从一个教区而来”（即教皇应从管理大教区的人中选出）的意义过分狭窄。费城的贺尔枢机认为：凡在教区婚姻法庭工作过或在教廷的高等法院中工作的人，不可笼统地归之为行政人员，都应属于牧民工作者，均可担任教皇候选人。赞同这一主张的有底特律的狄腾和贝宁的甘定枢机。还有人指出，教皇庇护十二从未任过哪一个教区的主教，但并未影响他成为“牧民”的教皇。

大选之前，有一个人曾是人们心目中候选教皇的竞争者，他便是热那亚总主教施理枢机。施理的资格甚老，1944年任主教，1952年已晋升枢机，早在1958年便同约翰二十三世竞争过教皇。这年8月会议选举教皇的第一次投票时，他曾一度领先于鲁士安尼（25票：23票）。10月12日，意大利一家由国家控制的电台，曾将施理的生平广播了十分钟，不少报刊的文章也看好于他。除他之外，退隐在佛罗伦萨的贝纳利枢机主教也是一位颇有实力的教皇候选人。

10月14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韦犹枢机主教主持了感恩祭。他在开场白中强调了枢机主教们在人性上的责任。他

说道："我们是以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的身份去选举。"参加感恩祭的群众比8月那次要多，绝大部分是关心教皇选举的人，也有好奇的游客。这时波兰的韦提拉（Wojtyla）枢机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知名度。

根据罗马教皇选举法中严格的守密规定，任何与会的枢机主教都应忠于誓词、守口如瓶，不准透露教皇选举的经过和内情。在选举教皇的西斯廷教堂入口处用双重大板封闭，不准向外打电话。我们只能通过分散透露的一些材料来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有一个惯例，即西斯廷教堂的"烟讯"，是选举进展情况的反映。小教堂顶烟囱冒出的若是"黑烟"，则说明投票并无结果；只有冒"白烟"才是完成表决的标志。

第一天，10月14日上午，一些没有经验的群众就过早地聚集在圣伯多罗广场等待"烟讯"了。他们中有些人把印着111位枢机主教照片的罗马观察报折成纸帽戴在头上以遮阳光。他们看到了11时26分西斯廷小教堂顶上冒出的第一股黑烟。第二天上下午等待的群众不断议论着冒出的烟究竟是什么颜色。直到下午6时19分，群众中传出激动的吼声："白烟"，"白色的"！果然，白烟持续冒了几分钟。接着，6时44分，费利西枢机在圣伯多罗大殿中间的露台上高声地宣布道："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已有了一位新教皇，他就是至敬的罗马天主教会枢机主教韦提拉，定名为约翰一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1978年—　）

晚间，7时22分，约翰一保罗二世向群众发表演说。他没有按照传统用拉丁文，而是以群众最熟悉的意大利语说道："赞美耶稣基督！（群众报以：今兹亦然，以至永远）。亲爱的

兄弟姐妹：我们仍在哀悼敬爱的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因此枢机主教们召选了一位新的罗马主教。他们从一个遥远的国家把他召来，这个国家虽然在地理上很远，但在心灵上很亲近。因为我们在信仰和基督徒的传统中共融。我不敢接受这个责任，然而在服从主和对玛利亚——我们的至圣母亲完全信任的精神之下，我接受了。我用你们，不，用我们的意大利语和你们谈话。如果我犯错误，请你们更正我。我请你们和我一起努力维持我们的信仰、希望和我们对基督和教会之母玛利亚的忠诚，同时和我一同开始在教会历史的路上前进。我将以天主和人的帮助起步。”

约翰—保罗二世精力充沛和坚定而亲切的讲话，深深地赢得了广场上约20万罗马群众的心。用意大利语演讲，两度对玛利亚表示崇敬，使群众高度兴奋，欢呼和掌声经久不息。

10月枢机会议的选举使全世界震惊。不仅因为当选者就任教皇的年龄很轻（年仅58岁）；更重要的是选出455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任教皇。8次投票才出结果，也证明表决的艰难。本来最初许多枢机主教仍想选出意大利人当教皇，但票数太分散，多数意大利籍的人只能各得20—30票，最激烈竞争教皇职位的两个意大利人枢机主教是施理和贝纳利。他们的名气虽大，贝纳利又独得70多票（近于当选之票），但却连续受到拥护施理的约40位枢机主教的坚决反对。他们声称：“若贝纳利当教皇，则等于20年的独裁政权”。而施理实际是自己堵住了登教皇宝座之路。他对意大利“人民日报”访问者的辱骂，在10月14日已见诸报刊。而他本人太狂傲，欠缺谦虚沉静作风。对比说来，韦提拉在当选前比往昔的鲁士

安尼更有影响。早在1971年他便当选过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委员，1974年，他提交了一份传播福音神学的报告，表明他有高深的学术素养，他精通多种语言，明智含蓄，尤其很重视地方教会同罗马教廷之间关系的协调和服从性，从而深得教廷的好评。还应指出，维也纳的古宁和慕尼黑的赖辛格枢机主教以及美国的一些枢机主教，一到罗马参加约翰—保罗一世葬礼时，便主张应选一位非意大利籍的人当新教皇，有些人已把韦提拉列入候选者名单之中。

韦提拉的青少年时代

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教皇韦提拉，1920年5月18日出生在波兰古老的名城克拉科夫的市郊小镇华都卫斯（Wadowice）。

克拉科夫位于维斯杜拉河流域，城内华威石灰岩丘陵上竖立着华威古堡，在1607年以前这里长期是波兰国王的宫廷和陵墓所在地。城市主教座堂也是古堡建筑之一。城内有著名的圣玛利亚教堂和文艺复兴式的市场。克拉科夫城长期保留有19世纪奥地利—匈牙利王朝时代的夜总会、剧院、名贵餐厅和一些文化遗迹。华都卫斯距克拉科夫30公里，小镇人口约1万人，是小麦、马铃薯等农产品集散地。

韦提拉的父亲是一个秃头、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戴夹鼻眼镜的职业军人，他奉命驻守华都卫斯这个要塞。韦提拉三岁时丧母，当医生的胞兄在二次大战前因传染病夭亡。韦提拉18岁（1938年）时进入克拉科夫著名的哲基洛安大学学习

波兰文学专业。韦提拉酷爱诗歌，参加了由团长科拉斯基创办的剧团——“史诗剧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兰的克拉科夫等地惨遭德国侵略者的蹂躏，文化生活中止。韦提拉之父于1941年去世。21岁的韦提拉，到一个采石场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比利时人开的化工厂做工。自1942年起，他到克拉科夫总主教沙碧夏枢机的府邸中工作。沙碧夏出生于帝王之家，本人是王子，也是著名的“教会的王子”。1946年11月1日，韦提拉晋升为司铎，这是韦提拉一生的重要里程碑。当波兰国家、民族和教会处于危机之际，26岁的韦提拉从此开始了供职于教会的生涯。

韦提拉的才华和毅力受到赏识。二次战后他被选到罗马天使大学（1946—1948年）深造。他写出论文《圣十字约翰著作中的信仰概念》，这篇论文的导师是法国圣芳济会会士格里高利·拉蓝则。韦提拉在罗马期间，既精通意大利文，也掌握了法文，假期里他为流亡在意大利的波兰人和比利时人服务。1948年，韦提拉回到克拉科夫。先在纳格威任助理司铎，一年后调入克拉科夫中心的圣弗兰教堂。韦提拉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1951年，他利用一年休假的间隙，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进修，集中写他的“教育学”论文。他的题目是《以史勒(Max Scheler)思想体系为基础建立天主教系统伦理的可能性》。史勒（1874—1928）是一位天主教哲学家。“爱”是史勒的中心观念，是他所谓的“价值的先驱”。他主张：爱是辨别与发现善和其它价值的通道。除非我们能爱一个人，否则不能说自己认识他。这其实是圣奥古斯丁论题的复苏。史勒所强调的需要有圣人或英雄作为仿效和竞争对象，

否则道德生活将很薄弱和失去方向。这些都成为韦提拉观点的一部分。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人与行动》，尤其是《爱与责任》（1960年波兰初版）中均可以找到。

不久，韦提拉受聘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伦理哲学教授，同时也在克拉科夫授课。他用笔名耶文等发表了不少长诗。从诗中流露出他的基督徒的人文思想。他在讲道中表示“向所有人——每个人呼吁”并引述名言道：“天主的光荣在于使人生龙活虎般地活着。”1958年韦提拉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助理主教，这年他刚38岁，是主教圈中最年轻的。1960年，他写过剧本《金银器铺子》，通过三对夫妻的故事，讲述婚姻和爱情等人生问题，该剧本被译成22种文字，销售量达8000万册。1964年1月13日，韦提拉被擢升为克拉科夫市总主教，从此他成为天主教会的上层人士。

克拉科夫总主教

韦提拉被任命为总主教时，他在波兰国内已因其著作、担任神学教导以及热心培育学生而闻名遐迩。他的声誉逐渐向国际范围扩大。在梵蒂冈的历次国际会议中，韦提拉都有所表现。1962年11月7日，他曾就礼仪问题发言，同年11月21日，他又对有关启示的根源问题表述意见。后一次会上，与韦提拉同时作报告的还有巴黎的马谛枢机和本笃会的布德勒主教，但是他的发言却引起了公众更大的兴趣。1963年9月23日，韦提拉呼吁圣统制在处理任何事务之前，必须牢记“天主子民”。韦提拉的多倾向圣经少倾向神职的观点，使人

们改变了过去认为波兰神学太注重传统的误解而异常欣喜。富有演说和外交天才的韦提拉还主张，对无神论者不应粗暴地定罪，而应当采用启发式，从人们的实际经验人手，通过交谈，尽量寻找与无信仰人士之间的共同立场，然后逐步推进天主教的影响。

韦提拉总主教是罗马教廷综合委员会中的委员之一。该委员会需要处理“第十三草案”，即后来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当时围绕这个文献的名称引起了争论。有人说它不只是原则，并涉及到原则的应用，故不应称它为宪章；另些人坚持不能改变文献名称，否则会降低文献价值。而韦提拉的折衷性意见，博得绝大多数人赞赏。韦提拉主张：文献虽主要不是阐述教义，但所述与牧民生活有关，故从牧民角度去观察，它确属“牧民的宪章”。

韦提拉总主教曾积极配合波兰华沙维新斯基枢机主教的计划，从1965年12月起便积极筹备庆祝1966年基督教传入波兰一千周年的纪念活动。当1967年6月26日韦提拉被罗马教皇按惯例（克拉科夫总主教一般均系枢机）擢升为枢机主教之后，尽管他同维新斯基在观点、性格、作风上有很多差异与矛盾，但他却竭力维护并搞好同维新斯基的团结。

韦提拉比维新斯基年轻20岁，维新斯基对知识分子一直不信任，而且不断指责他们。但韦提拉却同知识分子、学生、演员们有密切联系，他本人常常阅读最新书刊。维新斯基在教仪中坚持用中古时的拉丁文，而且主张这属于波兰传统的一部分，反对礼仪中引进本国的民族语言，他在教堂内甚至不肯与人握手为礼，只能互相严肃地鞠躬，他的理由为教堂

不是客厅。但韦提拉枢机主教却有新的见解，主张在神学上不能自我关闭。韦提拉写过名为《革新的基础》一书，介绍梵蒂冈及其理论需结合波兰情况加以应用。韦提拉不断阅读并强调现代神学，关心如何培育教友。他强调既服从波兰的传统，又要改革，要着眼于如何在20世纪下半叶使天主教的信仰生根和扩大。

韦提拉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在教区内，任何人只要在上午都可以去谒见他。先到者先见，不必提前预约。他每个月都亲自为工人、知识分子、司铎、修女们主持两天研习会。他在假日喜欢同朋友滑雪或划独木舟。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叔叔"。有一次，在萨高坪滑雪时，一位警察看到一个滑雪技术特别出色的微胖的中年绅士之后，很惊讶地向该人索要证件看看。这个人（即韦提拉）出示了身份证。警察开头吃惊并愤怒地诘问道："你这个证件是怎么弄来的？快如实讲，否则你将被拘留呢！……"。因为无人相信身居高位的枢机主教本人会去滑雪。还有一次，在萨高坪的司铎旅舍中，有一位从另一教区来的年高司铎，住进韦提拉的邻屋。这位老人摆起架子叫年轻的邻居韦提拉去为他倒茶、寄信件，而韦提拉都顺从地做了。当老司铎发觉后倍感尴尬，但韦提拉却巧妙地说：此乃趣话一桩。

韦提拉竭力推行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联合与"合一运动"，为鼓励教友传教，他把修院改成独立的神学院，把教区内的牧民分成500个小组，每组15—20人不等。他还将东正教友、美以美会、浸信会教友同天主教的教徒尽量多接触，共同祈祷、参加晚宴，一道旅游等。

韦提拉任枢机主教后频繁出国参加国际活动。1967年和1977年他两度出席过全球主教代表会议。1969年在全球主教代表特别会议上，他是撰写最后宣言的委员会主席。1970年他去澳洲参加了圣体大会，归途访问新几内亚。他还到过美国和加拿大。1976年出席美国费城的圣体大会并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他拜访各地主教以扩大联系。

1971年韦提拉被选入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的常委会，会议在选举常委时，第一次表决中韦提拉得54票，名列第10位；第二次表决他得90票，晋为第9位。在1974年的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中，韦提拉宣读的论文：作为辩论传播福音的神学内涵导论，受到普遍赞扬。英国索福特主教贺澜博士认为韦提拉的这一篇"雷霆万钧的神学论文，其中许多论点是前所未见的深刻"，又说"这是过去十年来的神学伟论。"有些观察家认为韦提拉枢机主教是一位"深研演绎法的神学家"。1974年10月22日在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中，韦提拉的得票数一跃进入第4位。这次前十名当选者仅有两个欧洲人，韦提拉乃其中之一，足证韦提拉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约翰-保罗二世上台之初的举措

韦提拉当选罗马教皇（称约翰-保罗二世）后，成了世界知名人物。他受到人们的赞许。许多主教说新教皇不只是学者，而且心肠好、厚道，精力过人。约翰-保罗二世在就职感恩祭开始之前，他甚至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向每一位枢机主教问候致意。当年长的枢机主教同他打招呼时，他无例外

地都站立起来回话。他态度诚恳沉稳，步伐有力，日常很少急躁，风度谦虚高雅。

1978年10月17日上午，约翰-保罗二世当众宣读了自己亲笔写的讲词（实际是他的施政纲要），他讲道："我们应该使文献中所列举的一切，产生实效。"他强调在教会内司铎们应共负责任，"共负责任的精神的意义就是使各种新设立或原有经过革新以适应时代需要的组织，能得到适当的发展，以便建立基督奥体，即教会的工作，能达到心、意和行动的更大团结。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他还主张："合一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共融。"即："在基督徒之间似乎不可能仍然存在着分裂的悲剧——这是造成混乱、甚至羞辱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心要按着已经开展的步骤推进，采取有利的方式和除去不利的阻碍。这样，希望在全体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后能达到完全的共融。"

10月18日上午11时，约翰-保罗二世在礼堂接见了同梵蒂冈建交的各国外交使节。教皇以信心十足的口吻用法语说道：教会欢迎各民族"形成一个文化、历史和语言特别丰富的多元统一体。"他主张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应当是"稳定、互惠、有礼、谨慎和忠诚的关系。"10月22日上午10时，举行"就职为最高牧者"盛大典礼时，天气晴朗，到场人数达30万人。约翰-保罗二世先用意大利语宣讲道："主绝对然而又温和的力量，与人的全部深度，他的理智、心灵、意志、最崇高的愿望相呼应。它不讲霸力，但从爱和真理之中表达。"随后，他又分别用波兰语、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苏联、捷克和乌克兰语简短讲了问候的话。最后他用极其

诙谐幽默的一句话作为他的结束语："现在到了大家用午餐的时候，教皇也一样啊！"

约翰-保罗二世把他本人在波兰教会的工作模式和经验带到罗马。他广交各界朋友，不知疲倦地同知识分子、工农、甚至佛教徒也交谈。1979年3月15日，约翰-保罗二世发布通谕，重申执行前代教皇保罗六世的"保罗政策"，要按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精神治理教会。在教皇人选问题上，他坚持保罗六世的主张，"年过80岁的枢机主教没有被选权"。他调整了枢机主教的人数和职能，1979年12月在任的枢机主教共129人。从1979年起，约翰-保罗二世将罗马教廷的卫队固定为100人，仍由瑞士籍士兵担任，士兵持中世纪时的武器，穿中世纪时的服装。由于神学家汉斯·孔对新教颇感兴趣，对天主教教义和罗马教廷不断提出过批评，经约翰-保罗二世批准，罗马教廷的信仰理论部在1979年12月，竟然宣布汉斯·孔不再是天主教的神学家。这个实例明显说明约翰-保罗二世的"改革"和"厚道"的局限性。

新教皇和耶稣会

耶稣会是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于1534年为对抗欧洲宗教改革而创立的组织，1540年经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的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它有严密的规章和纪律。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遭到一些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抨击。1773年，教皇克勒芒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一度解散了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宣布恢复并继续发展耶稣会。长期以

来，耶稣会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在世界各地广泛活动。迄今，由它主办的大专高校计 92 所，还有罗马教皇圣经学院、东方学院及各种著名神学中心等共 70 多个。耶稣会士还担任许多贵族的“神师”（灵修指导）。耶稣会会长的地位高、权势大，在天主教会当中仅次于罗马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登上教皇宝座后，对耶稣会进行干予。要求耶稣会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自查。1980 年 4 月，第 28 任耶稣会会长彼得罗·阿鲁佩不甘受压，向约翰-保罗二世提交了辞呈，这是耶稣会有史以来的空前事件。1981 年，约翰-保罗二世授于意大利人保罗·达查和约斯夫·比托作为修会中“教皇的代表”全权管理耶稣会。教皇一方面淡化耶稣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某些国际组织加以扶植支持。教皇宣布“圣十字架僧侣会”创始人埃斯克里夫为“圣徒”；给“主的工程”国际组织领导人波尔蒂洛主教以荣誉。新教皇有意用这些组织取代耶稣会，成为由教皇直接指挥用以对抗教会中革新派的有力工具。

约翰-保罗二世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新教皇上台不久，在外交事务中十分活跃。当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纪念圣斯丹尼士鲁逝世 900 周年大典活动时，约翰-保罗二世于 1979 年 5 月 8 日应邀回到祖国亲自参加。他还前往战火纷飞的黎巴嫩和西奈半岛。他甚至前往英、法等国。1981 年 5 月 31 日在一次集会上，约翰-保罗二世被阿拉伯人穆罕默德·阿里·阿加连开三枪，击中腰部和手臂，腰伤虽

然使他的身体更加佝偻，但他的精力仍充沛，毅力仍坚强，尽量遍访各地。1984 年 1 月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使美梵之间中断了长达 117 年之久的大使级关系重新确立起来。1987 年 7 月，教皇再访美国。约翰-保罗二世特别重视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多次亲赴拉美。因为那里绝大多数国家以天主教为国教，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约占全世界天主教徒的 46%。1990 年，苏联、罗马尼亚都同梵蒂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等东欧各国的剧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附　　录

历任罗马教皇世系年表

任序	在位时间[1]	教皇名称[2]	出身国籍、地区
1	41—67年?	彼得（St. Peter）	巴勒斯坦
2	67—76年?	林纳（St. Linus）	小亚细亚
3	76—88年?	阿纳克列特一世（St. Anacleclus I）	巴勒斯坦
4	88—97年?	克莱门特一世（St. Clemens I）	意大利
5	97—105年?	伊瓦里斯特（St. Evaristus）	希腊　安条克
6	105—115年?	亚历山大一世（St. Alexander I）	意大利
7	115—125年?	塞克斯都一世（St. Sixtus I）	意大利
8	125—136年?	特勒斯福鲁斯（St. Telesphorus）	希腊
9	136—140年?	亥吉诺斯（St. Hyginus）	希腊　雅典
10	140—155年	庇护一世（St. Pius I）	意大利　阿克维尔
11	155—166年	安尼塞特（St. Anicetus）	叙利亚

① 在位年代均系公元后。按史实考证，在位时间有具体月日者均尽量写明。前9任教皇根据传说整理。先后两位教皇之间未及时继位者，加注空位时间。同时并存的教皇均列入。

② 教皇名号译法不一，本表采用国内通用的传统译名。括号内是按教皇英文名译法载入。加St.的，是由教会承认或追认为圣徒的教皇。

12	166—175年	索得（St. Soter）	意大利
13	175—189年	依留特立乌斯（St. Eleutherus）	希腊 尼科波里萨
14	189—199年	威克脱一世（St. Victor I）	非洲
15	199—217年	翟非林（St. Zephyrinus）	意大利
16	217—222年	卡里克斯特一世（St. Calixtus I）	意大利
	217—235年	希普波立特（Hippolytus）（与卡里克斯特一世和乌尔班一世同时在位）	意大利
17	222—230年	乌尔班一世（St. Urban I）	意大利
18	230年7月21日—235年9月28日	庞提安（St. Pontian）	意大利
19	235年11月21日—236年1月3日	安特尔（St. Anterus）	希腊
20	236年1月10日—250年1月20日	法班（费边）（St. Faban）	意大利
		空位14个月	

21	251 年 3 月—253 年 6 月	哥尼留（St. Cornelius）	意大利
	251—约 258 年	诺瓦替安（Novatian）	意大利
22	253 年 6 月 25 日—254 年 3 月 5 日	卢修斯一世（St. Lucius Ⅰ）	意大利
		空位 2 个月	
23	254 年 5 月 14 日—257 年 8 月 2 日	斯德望一世（Se. Stephen Ⅰ）	意大利
24	257 年 8 月 30 日—258 年 8 月 6 日	塞克斯都二世（St. Sixtus Ⅱ）	希腊 雅典
		空位 11.5 个月	
25	259 年 11 月 22 日—269 年 12 月 26 日	道尼苏斯（St. Diosysius）	希腊
26	269 年 1 月 5 日—274 年 12 月 30 日	非力克斯一世（St. Felix Ⅰ）	意大利
27	275 年 1 月 4 日—283 年 12 月 8 日	攸替西安（St. Eutychians）	意大利 托斯坎纳
28	283 年 12 月 17 日—296 年 4 月 22 日	盖约（St. Gains）	达尔马提亚

		空位 2 个月	
29	296 年 6 月 30 日—304 年 10 月 25 日	马塞尔林（St. Marcellinus）	意大利
		空位 43 个月	
30	308 年 5 月 27 日（6 月 26 日）—309 年 1 月 16 日	马塞鲁斯一世（St. Marcellus I）	意大利
		空位 3 个月	
31	309 年（310）4 月 18 日—309（310）年 8 月 17 日	尤比阿斯（St. Eusebius）	意大利
		空位 10.5 个月	
32	311 年 7 月 2 日—314 年 1 月 11 日	麦基亚德（麦西亚德）（St. Melchiades）	非洲
33	314 年 1 月 31 日—335 年 12 月 31 日	西尔维斯德一世（St. Silvester I）	意大利
34	336 年 1 月 18 日—336 年 10 月 7 日	马可（马卡斯）（St. Marcus）	意大利
35	337 年 2 月 6 日—352 年 4 月 12 日	尤里乌斯一世（St. Julius I）	意大利
36	352 年 5 月 17 日—366 年 9 月 24 日	利比里（利拜尔）（St. Liberius）	意大利

	355年…—365年11月22日	非力克斯二世 (Felix Ⅱ)	意大利
37	366年10月10日—384年12月11日	达马萨一世 (St. Damasus Ⅰ)	西班牙
	366—367年	乌尔申 (Ursinus)	意大利
38	384年12月15日—399年11月26日	西里夏 (St. Siricins)	意大利
39	399年11月27日—401年12月19日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 (St. Anastasius Ⅰ)	意大利
40	401年12月22日—417年3月12日	英诺森一世 (Innocentius Ⅰ)	阿尔巴尼亚
41	417年3月18日—418年10月26日	左息马 (St. Zosimus)	希腊
42	418年12月28日—422年9月4日	卜尼法一世 (St. Bonifacius Ⅰ)	意大利
	418年12月29日—419年3月29日	优拉利乌斯 (Eulalius)	意大利
43	422年9月10日—432年7月27日	塞勒斯廷一世 (St. Celestine Ⅰ)	意大利
44	432年7月31日—440年8月9日	塞克斯都三世 (St. Sixtus Ⅲ)	意大利

45	440年9月29日—461年11月10日	利奥一世（St. Leo Ⅰ）	意大利 托斯坎纳
46	461年11月19日—468年2月29日	喜拉里（St. Hilary）	撒丁岛
47	468年3月3日—483年3月10日	辛普立西乌（St. Simplicius）	意大利
48	483年3月13日—492年3月1日	非力克斯三世（St. Felix Ⅲ）	意大利
49	492年3月1日—496年11月21日	吉拉修斯一世（St. Gelasius Ⅰ）	非洲
50	496年11月24日—498年11月19日	阿那斯塔修斯二世（St. Anastasius Ⅱ）	意大利
51	498年11月22日—514年7月19日	塞马库斯（St. Symmachus）	撒丁岛
	498、501年—505年	劳伦提乌斯（Laurentins）	意大利
52	514年7月20日—523年8月6日	贺尔米斯达斯（Hormisdas）	意大利 坎帕尼亚
53	523年8月13日—526年5月18日	约翰一世（St. John Ⅰ）	意大利 托斯坎纳
		空位　1.5个月	

54	526年7月12日—530年9月22日	菲力克斯四世（St. Felix Ⅳ）	意大利 坎帕尼亚
55	530年9月22日—532年10月17日	卜尼法二世（Bonifacin's Ⅱ）	意大利
	530年9月22日—530年10月14日	狄奥可鲁斯（Dioscorus）	希腊 亚历山大
		空位 1.5个月	
56	533年1月2日—535年5月8日	约翰二世（John Ⅱ）	意大利
57	535年5月13日—536年4月22日	阿加皮图斯一世（St. Agapetus Ⅰ）	意大利
58	536年6月1日（或8日）—537年11月11日	昔尔维里（St. Silverius）	意大利 坎帕尼亚
59	537年3月9日—555年6月7日	维吉里（Vigilius）（昔尔维里在位期间他已任教皇位）	意大利
		空位 10个月	
60	556年4月6日—561年3月4日	皮雷吉一世（Pelagius Ⅰ）	意大利
		空位 4.5个月	

61	561年7月17日—574年7月13日	约翰三世（John Ⅲ）	意大利
		空位 11个月	
62	575年6月2日—579年7月30日	本笃一世（Benedict Ⅰ）	意大利
		空位 4个月	
63	579年11月26日—590年2月7日	皮留吉二世（Pelugius Ⅱ）	意大利
		空位 7个月	
64	590年9月3日—604年3月12日	格利哥里一世（St. Gregory Ⅰ）	意大利
		空位 6个月	
65	604年9月13日—606年2月22日	萨比尼安（Sabinian）	意大利 托斯坎纳
		空位 12个月	
66	607年2月19日—607年11月12日	卜尼法三世（Bonifacius Ⅲ）	意大利

		空位 9个月	
67	608年8月25日—615年5月8日	卜尼法四世（St. Bonifacius Ⅳ）	意大利 马尔萨拉
		空位 5个月	
68	615年10月19日—618年11月8日	德意斯德底（St. Deusdedit）	意大利
		空位 13.5个月	
69	619年12月23日—625年10月25日	卜尼法五世（Bonifacius Ⅴ）	意大利 舒波里
70	625年10月27日—638年10月12日	洪诺留一世（Honorius Ⅰ）	意大利 坎帕尼亚
		空位 20个月	
71	640年5月28日—640年8月2日	塞维林（Severinus）	意大利
		空位 3.5个月	
72	640年12月24日—642年10月12日	约翰四世（John Ⅳ）	达尔马提亚

		空位　1个月	
73	642年11月24日—649年5月14日	狄奥多尔一世（Theodore Ⅰ）	巴勒斯坦
		空位　2个月	
74	649年7月…—655年9月16日	马丁一世（St. Martin Ⅰ）	意大利
75	654年8月10日—657年6月2日	尤金一世（St. Eugenius Ⅰ）	意大利
		空位　约2个月	
76	657年7月30日—672年1月27日	维塔利安（St. Vitalian）	意大利
		空位　2.5个月	
77	672年4月11日—676年6月7日	亚德奥达特（St. Adeodatus）	意大利
		空位　4.5个月	
78	676年11月2日—678年4月11日	顿纳斯（Donus）	意大利

		空位　1.5个月	
79	678年6月27日—681年1月10日	阿加托（St. Agatho）	意大利 西西里
		空位　8个月	
80	682年8月17日—683年7月3日	利奥二世（St. leo Ⅱ）	意大利 西西里
		空位　约12个月	
81	684年6月26日—685年5月8日	本笃二世（St. Benedict Ⅱ）	意大利
		空位　约2.5个月	
82	685年7月23日—686年8月2日	约翰五世（John Ⅴ）	叙利亚
		空位　约2.5个月	
83	686年10月26日—687年9月1日	科农（Conon）	意大利
	687—692	帕斯加尔（Paschal）	意大利

84	687年12月15日—701年9月8日	塞吉阿斯一世 (St. Sergius Ⅰ)	叙利亚
		空位 1.5个月	
85	701年10月30日—705年1月11日	约翰六世 (John Ⅵ)	希腊
		空位 2个月	
86	705年3月1日—707年10月18日	约翰七世 (John Ⅵ)	希腊
		空位 约3个月	
87	708年1月15日—708年2月4日	西辛尼阿斯 (Sisinnius)	叙利亚
		空位 约1.5个月	
88	708年3月25日—715年4月9日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叙利亚
		空位 1个月	
89	715年5月19日—731年2月11日	格利哥里二世 (St. Gregorius Ⅱ)	意大利

		空位 1个月	
90	731年3月18日—741年11月29日	格利哥里三世（St. Gregorirs Ⅲ）	叙利亚
91	741年12月10日—752年3月14日	扎迦利（St. Zacharias）	希腊
	752年3月22日—752年3月25日	斯德望（Stephen I）（当选三天便逝世，教皇名册未载入）	意大利
92	752年3月26日—757年4月26日	斯德望二世（Stephen Ⅱ）	意大利
93	757年5月29日—767年6月28日	保罗一世（St. Paul I）	意大利
	767年6月28日（7月5日）—769年8月……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	意大利
	768年7月31日	腓力（Philip）	意大利
94	768年8月1日（7日）—772年1月24日	斯德望三世（Stephen Ⅲ）	意大利 西西里
95	772年2月1日（9日）—795年12月25日	阿得里安一世（Adrian I）	意大利
96	795年12月26日（27日）—816年6月12日	利奥三世（St. Leo Ⅲ）	意大利

97	816 年 6 月 22 日—817 年 1 月 24 日	斯德望四世（Stephen Ⅳ）	意大利
98	817 年 1 月 25 日—824 年 2 月 11 日	帕斯加尔一世（St. Paschal Ⅰ）	意大利
99	824 年 2－5 月—827 年 8 月	尤金二世（Eugenius Ⅱ）	意大利
100	827 年 8 月—827 年 9 月	瓦伦廷（Valentine）	意大利
101	827 年 9 月—844 年 1 月	格利哥里四世（Gregory Ⅳ）	意大利
	844 年 1 月	约翰八世（John Ⅷ）	意大利
102	844 年 1 月—847 年 1 月 27 日	塞吉阿斯二世（Sergius Ⅱ）	意大利
103	847 年 4 月 1 日（10 日）—855 年 7 月 17 日	利奥四世（St. Leo Ⅳ）	意大利
104	855 年 7 月（9 月 29 日）—858 年 7 月 17 日	本笃三世（Benedict Ⅲ）	意大利
	855 年 8 月—855 年 9 月	阿那斯塔修斯（Anastasius）	意大利
105	858 年 4 月 24 日—867 年 11 月 13 日	尼古拉一世（St. Nicolaus Ⅰ）	意大利

		空位 1个月	
106	867年12月14日—872年12月24日	阿得里安二世（Adrian Ⅱ）	意大利
107	872年12月24日—882年12月16日	约翰八世（John Ⅷ）	意大利
108	882年12月16日—884年5月15日	马丁二世（Martin Ⅱ）	意大利
109	884年5月17日—885年9月	阿得里安三世（St. Adrian Ⅲ）	意大利
110	885年9月—891年9月14日	斯德望五世（Stephen Ⅴ）	意大利
111	891年10月6日—896年4月4日	福尔摩苏斯（Formosus）	意大利
112	896年4月—896年4月	卜尼法六世（Bonifacius Ⅵ）	意大利
113	896年5月—897年8月	斯德望六世（Stephen Ⅵ）	意大利
114	897年8月—897年11月	罗马努斯（Romanus）	意大利
115	897年12月—897年12月	狄奥多尔二世（Theodore Ⅱ）	意大利

116	898年1月—900年1月	约翰九世（John Ⅸ）	意大利
117	900年2月1日—903年7月	本笃四世（Benedict Ⅳ）	意大利
118	903年7月—903年9月	利奥五世（Leo Ⅴ）	意大利
119	903年9月—904年1月	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意大利
120	904年1月29日—911年4月14日	塞吉阿斯三世（Sergius Ⅲ）	意大利
121	911年4月—913年6月8日	阿那斯塔修斯三世（Anastasius Ⅲ）	意大利
122	913年7月—914年2月	兰多（Lando）	意大利
123	914年3月—928年5月6日	约翰十世（John Ⅹ）	意大利
124	928年5月—928年12月	利奥六世（Leo Ⅵ）	意大利
125	925年12月—931年2月	斯德望七世（Stephen Ⅶ）	意大利
126	931年2—3月—935年12月	约翰十一世（John Ⅺ）	意大利

127	936年1月3日—939年7月13日	利奥七世（Leo Ⅶ）	意大利
128	939年7月14日—942年10月	斯德望八世（Stephen Ⅷ）	意大利
129	942年10月30日—946年5月	马丁三世（Martinus Ⅲ）	意大利
130	942年5月10日—955年12月	阿加皮图斯二世（Agapetus Ⅱ）	意大利
131	955年12月16日—964年5月14日	约翰十二世（John Ⅻ）	意大利
132	963年12月4日-6日—965年3月1日	利奥八世（Leo Ⅷ）	意大利
		约翰十二世生前当选	
133	964年5月22日—966年8月4日	本笃五世（Benedic Ⅴ）	意大利
134	965年10月1日—972年9月6日	约翰十三世（John ⅩⅢ）	意大利
135	973年1月19日—974年6月	本笃六世（Benedic Ⅵ）	意大利
		空位 3个月	

136	974 年 10 月—983 年 7 月 10 日	本笃七世 .(Benedic Ⅶ)	意大利
		空位 4.5 个月	
137	983 年 12 月—984 年 8 月 20 日	约翰十四世 (John XIV)	意大利 巴维亚
138	984 年 8 月—985 年 7 月	卜尼法七世 (Bonifacius Ⅶ)	意大利
139	985 年 8 月—996 年 3 月	约翰十五世 (John XV)	意大利
140	996 年 5 月 3 日—999 年 2 月 18 日	格利哥里五世 (Gregory V)	德意志 萨克森
		空位 3.5 个月	
	997 年 4 月—998 年 2 月	约翰十六世 (John XVI)	意大利
141	999 年 6 月 2 日—1003 年 5 月 12 日	西尔维斯德二世 (Sylvester Ⅱ)	法兰西
142	1003 年 6 月—1003 年 12 月 6 日	约翰十七世 (John XVII)	意大利
143	1004 年 1 月—1009 年 7 月	约翰十八世 (John XVIII)	意大利

144	1009 年 7 月 31 日—1012 年 5 月 12 日	塞吉阿斯四世（Sorgius Ⅳ）	意大利
145	1012 年—1024 年 4 月 9 日	本笃八世（Benedict Ⅷ）	意大利
	1012 年	格利哥里六世（Gregory Ⅵ）	意大利
146	1024 年—1032 年 11 月 12 日	约翰十九世（John XIX）	意大利
147	1032 年—1045年	本笃九世（Benedict Ⅸ）	意大利
	1045 年	西尔维斯德三世（Sylveater Ⅲ）	意大利
148	1045 年—1046 年	格利哥里六世（Gregory Ⅵ）	意大利
149	1046 年—1047 年 10 月 9 日	克莱门特二世（Clement Ⅱ）	德意志
150	1048 年—1048年 8 月 9 日	达马苏二世（Damasus Ⅱ）	德意志
		空位	
151	1049 年—1054 年	利奥九世（St. Leo Ⅸ）	法兰西

		空位	
152	1055年—1057年7月28日	威克脱二世（Victor Ⅱ）	德意志
153	1057年—1058年3月29日	斯德望九世（Stephen Ⅸ）	法兰西
154	1058年	本笃十世（Benedic Ⅹ）	意大利
155	1058年—1061年8月27日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	法兰西
156	1061年—1073年	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	意大利
	1061年—1072年	洪诺留二世（Honorius Ⅱ）	意大利
		空位	
157	1073年—1085年5月25日	格利哥里七世（St. Gregorius Ⅶ）	意大利
	1080年—1100年	克莱门特三世（Clement Ⅲ.）	意大利
		空位	

158	1086年—1087年9月16日	威克脱三世（Victor Ⅲ）	意大利
		空位	
159	1088年3月12日—1099年7月29日	乌尔班二世（Urbanus Ⅱ）	法兰西
160	1099—1118年1月21日	帕斯加尔二世（Passchal Ⅱ）	意大利
	1100年—1102年	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意大利
	1102年	艾伯特（Albert）	意大利
	1105—1111年	西尔维斯德四世（Sylvester Ⅳ）	意大利
		空位	
161	1118年—1119年1月29日	吉拉修斯二世（Gelasius Ⅱ）	意大利
	1118年—1121年	格利哥里八世（Gregory Ⅷ）	法兰西
162	1119年—1124年12月13日	卡里克斯特二世（Calixtus Ⅱ）	法兰西

163	1124 年—1130 年 2 月 13 日	洪诺留二世（Honorius Ⅱ）	意大利
	1124 年 12 月	塞勒斯廷二世（Celestine）	意大利
164	1130 年—1143 年 9 月 24 日	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	意大利
	1130 年—1138 年 1 月 25 日	阿纳克列特二世（Anacletus Ⅱ）	意大利
	1138 年在位	威克脱四世（Victor Ⅳ）	意大利
		空位	
165	1143 年—1144 年 3 月 8 日	塞勒斯廷二世（Celestine Ⅱ）	西班牙
166	1144 年—1145 年 2 月 15 日	卢修斯二世（Lucius Ⅱ）	意大利
167	1145 年—1153 年 7 月 8 日	尤金三世（Eugenius Ⅲ）	意大利
168	1153 年—1154 年 12 月 3 日	阿那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 Ⅳ）	意大利
169	1154 年—1159 年 9 月 1 日	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Ⅳ）	英格兰

170	1159 年—1181 年 8 月 30 日	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意大利
	1159 年—1164 年 4 月 20 日	威克脱四世（Victor IV）	意大利
	1164 年—1168 年 9 月 20 日	帕斯加尔三世（Paschal III）	意大利
	1168 年—1178 年	卡里克斯特三世（Calixtus III）	意大利
	1179 年—1180 年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德意志
171	1181 年—1185 年 11 月 25 日	卢修斯三世（Lucius III）	意大利
172	1185 年—1187 年 10 月 20 日	乌尔班三世（Urban III）	意大利
173	1187 年	格利哥里八世（Gregory VIII）	意大利
174	1187 年—1191 年 3 月 20 日	克莱门特三世（Clement III）	意大利
175	1191 年—1198 年 1 月 8 日	塞勒斯廷三世（Celatine III）	意大利
176	1198 年—1216 年 7 月 16 日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意大利

177	1216 年—1227 年3月18日	洪诺留三世（Honorius Ⅲ）	意大利
178	1227 年—1241 年8月22日	格利哥里九世（Gregory Ⅸ）	意大利
		空位	
179	1241 年—1241 年11月10日	塞勒斯廷四世（Celsline Ⅳ）	意大利
		空位.	
180	1243 年—1254 年12月7日	英诺森四世（Innocentent Ⅳ）	意大利
181	1254 年—1261 年5月25日	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Ⅳ）	意大利
182	1261 年—1264 年10月21日	乌尔班四世（Urban Ⅳ）	法兰西
		空位	
183	1265 年—1268 年9月29日	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Ⅳ）	法兰西
		空位	

184	1271 年—1276 年1 月 10 日	格利哥里十世 (St. Gregory X)	意大利
185	1276 年	英诺森五世 (Innocent V)	法兰西
186	1276 年—1276 年8 月 18 日	阿得里安五世 (Adrian V)	意大利
187	1276 年—1277 年5 月 20 日	约翰二十一世 (John XXI)	西班牙
188	1277 年—1280 年8 月 22 日	尼古拉三世 (Nicholas Ⅲ)	意大利
		空 位	
189	1281 年—1285 年3 月 28 日	马丁四世 (Martin Ⅳ)	法兰西
190	1285 年—1287 年4 月 3 日	洪诺留四世 (Honorius Ⅳ)	意大利
		空 位	
191	1288 年—1292 年4 月 4 日	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Ⅳ)	意大利
		空 位	

192	1294年	塞勒斯廷五世（St. Celestine V）	意大利
193	1294年—1303年10月11日	卜尼法八世（Bonifacius Ⅷ）	意大利
194	1303年—1304年7月7日	本笃十一世（Benedict Ⅺ）	意大利
		空 位	
195	1305年—1314年4月20日	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Ⅴ）	法兰西
		空 位	
196	1316年—1334年	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Ⅱ）	法兰西
	1328年—1330年	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	意大利
		空 位	
197	1334年—1342年4月25日	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Ⅱ）	法兰西
198	1342年—1352年12月6日	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Ⅵ）	法兰西

199	1352 年—1362 年 9 月 12 日	英诺森六世（Innocent VI）	法兰西
200	1362 年—1370 年 12 月 19 日	乌尔班五世（Urban V）	法兰西
201	1370 年—1378 年 3 月 26 日	格里哥里十一世（Gregory XI）	法兰西
202	1378 年—1389 年 10 月 15 日	乌尔班六世（Urban VI）	意大利
	1378 年—1394 年 9 月 16 日	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	瑞士
203	1389 年—1404 年 10 月 11 日	卜尼法九世（Bonifacius IX）	意大利
	1394 年—1423 年	本笃十三世（Benedioct XIII）	西班牙
204	1404 年—1406 年 11 月 6 日	英诺森七世（Innocent VII）	意大利
205	1406 年—1415 年	格利哥里十二世（Gregory XII）	意大利
206	1409 年—1410 年 5 月 6 日	比萨，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	希腊
207	1410 年—1415 年	比萨，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	意大利

		空　位	
208	1417 年—1431 年 2 月 20 日	马丁五世（Martin V）	意大利
	1423 年—1429 年	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Ⅷ）	西班牙
	1424 年—1433 年	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	法兰西
209	1431 年—1447 年 2 月 23 日	尤金四世（Eugenius Ⅳ）	意大利
	1439 年—1449 年	非利克斯五世（Felix V）	意大利
210	1447 年—1455 年	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	意大利
		空　位	
211	1455 年—1458 年 8 月 6 日	卡里克斯特三世（Calixtus Ⅲ）	西班牙
212	1458 年—1464 年 8 月 14 日	庇护二世（Pius Ⅱ）	意大利
213	1464 年—1471 年 7 月 26 日	保罗二世（Paul Ⅱ）	意大利

214	1471 年—1484 年 8 月 12 日	塞克斯都四世（Sixtus Ⅳ）	意大利
215	1484 年—1492 年 7 月 25 日	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	意大利
216	1492 年—1503 年 8 月 18 日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	西班牙
217	1503 年	庇护三世（Pius Ⅲ）	意大利
218	1503 年—1513 年 2 月 21 日	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	意大利
219	1513 年—1521 年 12 月 1 日	利奥十世（Leo Ⅹ）	意大利
		空 位	
220	1522 年—1533 年 9 月 14 日	阿得里安六世（Adrian Ⅵ）	荷兰
221	1523 年—1534 年 9 月 25 日	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Ⅶ）	意大利
222	1534 年—1549 年 11 月 10 日	保罗三世（Paul Ⅲ）	意大利
		空 位	

223	1550 年—1555 年 3 月 23 日	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Ⅲ）	意大利
224	1555 年	马塞鲁斯二世（Marcellus Ⅱ）	意大利
225	1555 年—1559 年 8 月 18 日	保罗四世（Paul Ⅳ）	意大利
226	1559 年—1565 年 12 月 9 日	庇护四世（Pius Ⅳ）	意大利
		空　位	
227	1566 年—1572 年 5 月 1 日	庇护五世（Pius Ⅴ）	意大利
228	1572 年—1585 年 4 月 10 日	格利哥里十三世（Gregory ⅩⅢ）	意大利
229	1585 年—1590 年 8 月 27 日	塞克斯都五世（Sixtus Ⅴ）	意大利
230	1590 年	乌尔班七世（Urban Ⅶ）	意大利
231	1590 年—1591 年 10 月 6 日	格利哥里十四世（Gregory ⅩⅣ）	意大利
232	1591 年 10 月—1591 年 12 月	英诺森九世（Innocent Ⅸ）	意大利

233	1592 年—1605 年 3 月 5 日	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VIII）	意大利
		空 位	
234	1605 年 4 月 10 日—1605 年 4 月 27 日	利奥十一世（Leo XI）	意大利
235	1605 年—1621 年 1 月 28 日	保罗五世（Paul V）	意大利
236	1621 年—1623 年 7 月 8 日	格利哥里十五世(Gregory XV)	意大利
237	1623 年—1644 年 7 月 29 日	乌尔班八世（Ulrban VIII）	意大利
238	1644 年—1655 年 1 月 7 日	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	意大利
239	1655 年—1667 年 5 月 22 日	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	意大利
240	1667 年—1669 年 12 月 9 日	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IX）	意大利
		空 位	
241	1670 年—1676 年 7 月 22 日	克莱门特十世（Clement X）	意大利

242	1676 年—1689 年8 月 12 日	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	意大利
243	1689 年—1691 年2 月 1 日	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	意大利
244	1691 年—1700 年9 月 27 日	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	意大利
245	1700 年—1721 年3 月 19 日	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	意大利
246	1721 年—1724 年3 月 7 日	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	意大利
247	1724 年—1730 年2 月 21 日	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	意大利
248	1730 年—1740 年2 月 6 日	克莱门特十二世（Clement XII）	意大利
249	1740 年—1758 年5 月 3 日	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	意大利
250	1758 年—1769 年2 月 2 日	克莱门特十三世（Clement XIII）	意大利
251	1769 年—1774 年9 月 22 日	克莱门特十四世（Clement XIV）	意大利
252	1775 年—1799 年8 月 29 日	庇护六世（Pius VI）	意大利

		空 位	
253	1800 年—1823 年 8 月 20 日	庇护七世（Pius Ⅶ）	意大利
254	1823 年—1829 年 2 月 10 日	利奥十二世（Leo Ⅻ）	意大利
255	1829 年—1830 年 11 月 30 日	庇护八世（Pius Ⅷ）	意大利
256	1830 年—1846 年 6 月 1 日	格利哥里十一世（Gregory ⅩⅥ）	意大利
257	1846 年—1878 年 2 月 7 日	庇护九世（Pius Ⅸ）	意大利
258	1878 年—1903 年 3 月 20 日	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	意大利
259	1903 年—1914 年 8 月 20 日	庇护十世（Pius Ⅹ）	意大利
260	1914 年—1922 年 1 月 22 日	本笃十五世（Benedict ⅩⅤ）	意大利
261	1922 年 2 月 6 日—1939 年 2 月 10 日	庇护十一世（Pius Ⅺ）	意大利
262	1939 年—1958 年 10 月 9 日	庇护十二世（Pius Ⅻ）	意大利

263	1958年10月28日—1963年6月3日	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	意大利
264	1963年6月21日—1978年8月6日	保罗六世（Paul VI）	意大利
265	1978年	约翰—保罗一世（John Paul I）	意大利
266	1978年	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	波兰

同时并存的罗马教皇对照表

任序	教廷承认的教皇（在位年代）	对立教皇（在位年代）
16 17 18	卡里克斯特一世（217—222） 乌尔班一世（222—236） 庞提安（230—235）	希普波立特（217—235）
21 22 23 24	哥尼留（251—253） 卢修斯一世（253—254） 斯德望一世（254—257） 塞克斯都二世（257—258）	诺瓦替安（251—258）
36	利比里（利拜尔）（352—366）	非力克斯二世（355—365）

37	达马萨一世（366—384）	乌尔申（366—367）

42	卜尼法一世（418—422）	优拉利乌斯（418—419）

51	塞马库斯（498—514）	劳伦蒂乌斯（498、501—505）

55	卜尼法二世（530—532）	狄奥可鲁斯（530）

83 84	科农（686—687） 塞吉阿斯一世（687—701）	帕斯加尔（687—692）

93	保罗一世（757—767）	君士坦丁二世（767—769） 腓力（768）

101	格利哥里四世（827—844）	约翰八世（844）

104	本笃三世（855--858）	阿那斯塔修斯（855）

140	格利哥里五世（996—999）	约翰十六世（997—998）

145	本笃八世（1012—1024）	格利哥里（1012）

147 148	本笃九世（1032—1045） 格利哥里六世（1045—1046）	西尔维斯德三世（1045）

156	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	洪诺留二世（1061--1072）

157	格利哥里七世（1073—1085）	克莱门特三世（1080—1100）

160	帕斯加尔二世（1099—1118）	狄奥多里克（1100—1102） 艾伯特（1102） 西尔维斯德四世（1105—1111）
161	吉拉修斯二世（1118—1119）	格利哥里八世（1118—1121）
163	洪诺留二世（1124—1130）	塞勒斯廷（1124）
164	英诺森二世（1130—1143）	阿纳克列特二世（1130—1138） 威克脱四世（1138）
170	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	威克脱四世（1159—1164） 帕斯加尔三世（1164—1168） 卡里克斯特三世（1168—1178） 英诺森三世（1179—1180）

196	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	尼古拉五世（1328—1330）
202 203 204 205	乌尔班六世（1378—1389） 卜尼法九世（1389—1404） 英诺森七世（1404—1406） 格利哥利十二世（1406—1415）	（阿维农教廷） 克莱门特七世（1378—1394） 本笃十二世（1394—1423）
 206 207	（比萨教廷） 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 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5）	
208	马丁五世（1417—1431）	克莱门特八世（1423—1429） 本笃十四世（1424—1433）
209	尤金四世（1431—1447） 尼古拉五世（1447—1455）	非利克斯五世（1439—1449）